

第四卷 书信与随笔篇

湖北人民出版社

张斌峰 编

殷海光文集



殷海光（一九一九—一九九一）

湖北黄冈（今团风县）人

他是中国台湾地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

逻辑学家和政治家

他以“五四之子”为自称

“横空出世之心力

开自由、民主、理性和科学的要求

开展“后五四”时代思想启蒙的

历史与心路

从而锲而不舍地把自己偏执成为

“真正意义的自由主义者”

——从《不灭的火焰》到《自由与

尊严》成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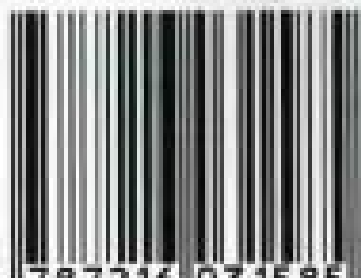
最有力的人格化象征和象征人物

书信与
艺术篇

第四卷

殷海光 文集

ISBN 7-216-03158-X



9 787216 031585 >

ISBN7 - 216 - 03158 - X

C-155 全套定价:98.00元

港台海外鄂籍学人文丛

第四卷 书信与随笔篇

湖北人民出版社

殷海光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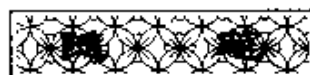
张斌峰 编

目 录



一、致本国友人(十二封)	3
致徐复观(一封)	3
致王道(二封)	5
致朱一鸣(二封)	9
致钱思亮(一封)	18
致许冠三(四封)	20
致韦政通(二封)	27
二、致外国友人(八封)	29
致爱因斯坦(一封)	29
致罗素(一封)	30
致屈莱果(二封)	31
致克里福神父(一封)	37
致杨教授夫妇(一封)	39

致卡根夫妇(一封)	40
致欧达伟夫妇(一封)	43
三、致学生及后辈(七十六封)	45
致林毓生(二十四封)	45
致张灏(二封)	111
致何秀煌(七封)	121
致罗业宏(十九封)	133
致黄展骥(四封)	166
致林悦恒(二封)	170
致伍民雄(二封)	173
致陈鼓应(五封)	177
致於梨华(一封)	180
致徐传礼(二封)	185
致周堃(一封)	192
致玉仁(一封)	193
致张伟祥(一封)	195
致何友晖(二封)	196
致何步正(一封)	204
致佚名(二封)	205
四、致卢鸿材(二十六封)	214



西行漫记	263
空中小姐	264

东京印象·····	266
爬虫多,不咬人·····	269
究竟为消费而生产,还是为生产而消费?·····	271
太忙!太忙!太忙!·····	274
蝴蝶满街飞·····	277
相应不理·····	277
见微知著乎?·····	279
书·····	282
小游,小谈·····	286
显明的对照·····	294
一点印象,意见·····	299
从口头语看·····	304
风格与才干·····	309
玻璃花·····	312
唐人街·····	320
华盛顿湖畔·····	323
和尚读逻辑·····	326
基本假设·····	329
我们守住哪一层楼?·····	334
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	340
我们的教育·····	351

附录:

殷海光论著目录·····	359
--------------	-----

4 殷海光文集

一、著作	359
二、译著	360
三、论文	360

书信

一 致本国友人* (十二封)

致徐复观^[1]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佛观先生：

八月十五日清晨，先生所提出在专制政体下纯理思维难以伸展的问题，颇激起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思索，甚为感谢。八月十二日，先生偕唐君毅先生来舍探病，引起我对当代智识之士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唐先生所树立的为儒门风范，所成就的为道德理想，而非知识。以他的学术资本，思想训练，和个人才力，显然不足以完成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和规模。古往今来，道德的奇理斯玛人物，往往如此。相识二十多年，先生为光提到时常所厌恶的人物，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10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但亦为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这种矛盾,正是不同的生命火花激荡而成。一个时代创造动力的源泉也许辩证地孕育在这一歧异中吧。现在复兴中国文化的叫声似乎颇大。然而一究其实,不过空泡而已。在我看来,对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的认知,尚是一大片未曾开拓的处女地。这有待真才实学之士的奋发努力。“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现实情况看来,今日若干知识分子的处境,似乎天小地狭;但就开辟观念和知识的新天地而言,则无限无穷。今日有心人最重要的事,在于树立一超越现实的自我。对外界的成败誉毁,颇可不必计较。际此是非难辨之世,吾人必须学习隔离的智慧,抖落一切渣滓,净化心灵,然后跨大鹏之背,极目千里神驰古今。但又同时能如现代的探矿师,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发展形态,及去脉来龙,能有真实的了解。先生如能将认知模式稍加调整,也许在这方面可能作进一层次的努力。光现与癌魔搏斗。在不久的将来,果能康复,希与先生倾谈上下古今,并请我吃脚鱼与鳗鱼。一笑! 谨祝

康 乐

殷海光

一九六九年八月廿四日

注 解

[1] 录自徐复观:《痛悼吾敌,痛悼吾友》。《人物与思想》第三十四期(香港,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页8—11(原载台北《自立晚报》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徐复观先生说,这封信是“由殷先生口述,陈(鼓应)君笔记,并由殷先生签名”,又说,“这可能是他最后写给朋友的一封信”。我认为这是不错的。因为殷先生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写《〈海光文选〉自叙》给我时,手力已经很弱,以后病情一直加重,不会再有能力写信。殷先生死后不久(十月

四日),殷太太写一长信给我,叙述殷先生病逝前后的详情(该信刊登在《明报月刊》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号),所用的信封是殷先生生前写好的。可是他去世前也曾想写信给我,但写不成。——编者

致 王 道 (二封)^[1]

·1·

[一九五三年十月廿七日]

云生兄嫂^[2]:

先谈谈照片。那位小姑娘,不知是否王嘉陵,已经妩媚动人了。一双眼睛,充满了智慧。嘿!时光溜得真快!她小时撒尿在鄙人地板上,常被鄙人打屁股的。那位小弟弟,瞪着一双眼睛,鄙人可未识荆哩!

关于“呆气”一节,您二位真没资格说鄙人。鄙人常对别人说:“香港有个王云及其太太,穷得没饭吃,还要巴巴办个啥子刊物。如今居然有这种人!”接下去的话一定是:“傻瓜!”

这些年月,常常想写封信给你们俩。但是,普通问寒暖的话我殷海先是不写的。要写真话,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有时,看到《人生杂志》,虽然现出一对伟大的夫妇,但王道那股迂拙劲儿,以及近年来改名字以后那副道貌,委实引不起咱这小丑底雅兴。同时,这年头儿,人心烦事忙。所以,总是把写信的事搁起了。

二十五号结婚了,自动放假三天。趁此难得的机会写信给你们俩吧!嘿!不瞒您二位说,我底太太真漂亮。有点西洋风。切勿以为此话系自我恭维。而尤值得说者,她底心性之好,在现今实在少见。她有一个完整的人格,我常自觉惭愧。结婚的那一晚,镁光闪闪不绝,相片确照了不少。等洗好了以后,再送你们一张。

我这几年一直在读书,有时写文章、翻译、栽花、擦打小孩。但就心情说,总不比在任家花园好。那时吃鳊鱼、喝橘酒……充满了情趣和……。哎!……还是不说的好。当然,我不知消极为何事。

再问一声,你们还困难否? 饿不饿得死? 祝

秋 佳

光

十月二十七日

这信写好了一个多月,未寄。因等“玉照”洗来再寄故。

兹寄上一张。本要说些话的,但又无话可说了。算了!〔3〕

注 解

〔1〕这两封信是王道先生送给我的。殷海光先生去世的时候,我邀请王先生撰写悼文。王先生回信(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说,他对殷先生的去世感到十分悲伤,但他自己也患上严重肝病,医生嘱咐不能多操劳,故不能为文。但随函把殷先生早年给他的两封信原件影印给我,王道先生不久也病逝。——编者

〔2〕王道先生原名“云”,后改号“道”,字“贯之”。关于殷、王的交往经过,请参阅王道夫人沈醒园女士写的:〈忆故人,忆斯人〉(《殷海光先生纪念集》页14—18)。——编者

〔3〕此信和王道先生的复信曾载《人生杂志》第七十三期(香港,一九五四年一月)页五十五。——编者

·2·

〔一九五四年四月七日〕〔1〕

云生兄嫂:

并不是不回信,实在是因为太想回信了。可是,等到一提笔,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至于“惜墨如金”之说,那是太恭维鄙人了。咱并无如此之高贵。鄙人是一思想现代型而兼有浪漫情调

的书生,绝不想什么“立言”,啥子“垂教后世”。想到这些,我就作三十日呕!

我常常觉得,我真把我自己搞得没办法。读起书来,搞起解析来,唯理是尚;但,整个气质,似近狂飚时代人物。偏偏现代是个反狂飚时代。如何活得下去?在政治信念上,我坚持民主自由。可是,喂!咱在气质上,却又崇拜拿破伦、隆美尔,深喜卓越超群的人物,欣赏一世风云儿;又艳称罗素在知识领域中出人头地的成就。一个脑袋装这两样,如何“统一”咧!在一方面,我深恶历史主义,痛恨一些人夸张“历史文化”。然而,不瞒您说,我看见长满了青苔的庭院,忆见古城落日,常怅怅惘惘者久之。我是深恶美国那种忙乱,工厂、汽车、……所表现的什么;我深喜那静寂,闲散,宽舒的东方情调。愿我能浸润于其中一辈子吧!因为,只有在那种气氛里,我才会是个真真实实的独立自由人。“庭院深深深几许”,多够我低首徘徊啊!然而,我一想到东方人那种混沌头脑和语言,我立即怒火中烧。尤其那种“言大而夸”的“哲学”,我实在弃之如遗。……也许,你会道貌岸然地说:“你这是没有在整个文化精神里浸润而得到内在的调和。”鬼话!鬼话!我早已不信这些好听的鬼话了!这些都是无意义的语言!

我这样的—个“矛盾虫”,怎能提笔面圣,和王道夫子论道啊!每一念及,辄废废然面止焉!但是,在情感上,却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未有意连系的实在连系。咱们底想法尽管不同,但正而正视人生则—。走的路途各异,但追求真、善、美同样迫切。所以,一提起王道他们,便不胜其念念之情。当然,碰了而,谈得不对头,也许又要吵架的。咳!这年头儿,为了原则而吵架,已经是太高贵的事了!是吗?

我底生活,大体如常。当然,结了婚,有些节目不同。可是,目

前仍以研究为主。同屋有两个小孩,又是姓王的,真巧!有时,我这间屋子,成了儿童乐园。我坐在椅子上,两腿伸直,让小的一个从上滑下,是之谓滑板。或者,用糖果请小客人,要他们端坐地下,俨如作客。近来买了一瓶乌梅酒,有时每人请尝一口,津津有味。不过,有时我读书不顺利,或写文章思路不畅,他们要是适逢其会乱哭,我就大骂,大肆批评,说她们外婆妈妈管教不良,又夹杂着叹气之声:“完了!完了!小孩子都是如此,中国还有何望!”接着两三天,一定是连瞧都不瞧这两个小家伙一眼。可是,过了几天,看见两个样子还不错,我满天云雾顿消,丽日晴天,恢复邦交如故焉!我常常不自觉解,我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不像“大人”的大人。人是个奇怪的玩意吧!

《自由与文化》一书收到。译事如此之认真,堪称近来少见。本来打算评介的,张佛泉先生抢了头,就作罢。娄贻哲先生底“跋”着笔谨严,思路清晰,为哲学界少见之作。可惜海角天涯,逢面无缘。不然,当可作好朋友也!据说你们还出版得有王书林译杜威哲学(即 Ratner 之引论,似乎如此)。可否寄赠一册。请别以为系有意“揩油”,实因此间无法购致。

关于刊登愚夫妇照片事,事已过去,算了。你们不开照相馆,我们也不够格当模特儿。何再计较之有?不过,通信不如见面。为了增进直观的体认,兹寄赠近照数张,您们可想见一般。

算了!不写了! 祝

俚 安

光

四月七日

注 解

[1] 此信和王道的复信曾载《人生》第八十三期(一九五四年四月),页二十六—二十七。——编者

致朱一鸣 (二封)

·1·

[无日期]

一鸣乡兄:

1

手书转到。通信良非易易,展读至再。

你每次的来信,对我像是黑夜孤舟,看见远处灯光闪现,在心灵上□起莫大慰藉和鼓励。

2

来信所要“为中国□□□□□”。这恰恰是我二十多年来为学苦思的重点。午夜梦回,苦思焦虑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七亿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问题。我虽身陷困逆,对这些问题未尝一日去怀。

* * *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白种资产主义者支配世界的势力已成尾声。有色人种藉社会文化革变而构成新的形势。美国人填补英国人在亚洲遗下的权力真空,似欲创霸,但缺乏霸术与经验。他们对于亚洲问题缺乏认知,对于其中的中国问题更缺乏认识。越战给予美国人的教训至大,使他们知道仅靠金钱同武力不能解决问题。这会在长远的过程中影响美国的亚洲政策,以及对华政策。

* * *

未来的世界,并非如包尔所说的“三个半”权力,而是在美国、苏俄及中国三个权力重心的动理[dynamism]支配之下。我把这个形势称为“新三国”。这三个新三国有两个结合原理:一个是人种。依照这个原理而行的结合是美苏以对中;另一个结合原理是 ideology[意理]及 politico-social system[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依照这一原理而行的结合是中苏以对美。

在上述两种可能结合中,无论哪一种结合,都可构成世界势力之一紧张的均衡,而勉强保持不安定的和平。

就目前的 manipulations[局势]来看,显然是第一种结合原理及第二种结合原理并存,不过美俄微妙的互让以制中稍占比重。

* * *

在这新三国之中,中国只在半 actual power[实力],半 potential power[潜力]的况位;苏俄在稳健而冷静中发展,美国在表面最强,但是我认为后劲最堪忧。美国能给世界什么呢?除了金钱与武器以外,什么也没有了!美国的金钱已在不够稳定的状态。美国的武器独占局面已成过去:美国会造的大体别人也会造。

若干美国保守人物反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根据是说共产主义乃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美国人普遍的人生观是“现世的享受主义”。这是最具体的唯物主义。美国的宗教信仰已形成社交活动,富人大亨成人间上帝。一百几十年来,美国的物质文明使美国发展成一个像是肌肉四肢发达而心灵萎缩空虚的巨人。年轻一代的失落是明显的征兆。也许,一百多年后的人会见美国像罗马帝国一样的衰落。

* * *

中国左派势力之形成目前的状态,除了中国近一百几十年蜕变中社会文化的导因以外,(1)他们好尚斗争的 ideology,(2)蒋氏

集团的迫害,(3)美国之出于无知与恐惧赤祸的对华政策。

美国人在对付战后亚洲共产势力之兴起上,缺乏英国人的冷静和远见。美国二十年来的对华政策,系基于传教士之无知, MaCarthy[麦加锡]主义的势力,有产者与有产者结纳维持现状,情绪不愉快等等。美国决策人士对中国问题常发言盈廷,振振有词,其实根本没有抓着紧要处:无论喜爱与否,中国左派势力之兴起,根本是伏根于中国社会文化内部的根苗,受到西方势力入侵的势力,日本侵华所造成的大震荡,益之以左派挑起的农民暴动,知识分子之唤醒,蒋氏集团在政治及思想上应付乏术而采取火上加油的方法所造成。美国再从旁煽风,这个问题岂能解决?

* * *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这样古老帝国在一百几十年脱骨换胎的过程中所害的大病哪有特效药可愈于一朝?何况有不明病理的美国蒙古医师从旁瞎医,愈弄愈糟?从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变迁着眼,从战后世界新形势着眼,从全人类今后的和平民主发展着眼,今后的政策必须是:

第一,包含美国在内,必须承认中国因这一基本变动而形成的统治形式。

第二,美国必须尽早改变二十年来损人不利己的对华政策。摒除一切意气,帮助中国提高农业技术,工业水准,发展通商,交流文化。

第三,中国的希望在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发展:对外睦邻,跟一切西方国邦友善相处;对内尊重人民的基本人权,停止虚妄的狂热行动,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应争取至少三十年的和平喘息的时间,从事培养民力,作根本的千年大计。

饱受逼害,靠斗争起家的这一代过去了,暴戾之气渐消,主义

的废话……新生的一代起来建国,让科学的理智作主,苏俄及东欧就是中国的远景之端倪。

* * *

今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要为七亿同胞服务,必须把数十年来各党各派一切主义式的叫嚣,抖落得干干净净,而另辟思想和行动的新境界。今后中国最重要的事,是从一切党争之中彻彻底底抽出来,独立而不移的确立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作时代的灯塔[1]。

* * *

依此,中国有心的知识分子今后对人民应为之事是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中心及言论中心。从这一中心出发,中国大陆统治集团做得对,则在国际上予以扬誉,做的不对也公开批评;并就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外交,随时提出新的建议[2]。

这一方式,短时不易见效;但持之以恒,一定可以收效。

* * *

在美国创办一中英文并刊的刊物,在香港与东京设分支,做这种事必须有相当的资本。没有资本,连基本的生存也难保,其他一切雄图壮志更是空谈。兄弄与药物有关的科学。我希望你幸而有进一步的发明,发一笔财作资本。这事需四五年的准备。那时我们可以大展鸿图。

* * *

你现在的研究工作,如果发展得顺利,可以在身体方面造福人群。如果再以所得作基础,进而造福七亿同胞,则价值更大。西德前总理艾德诺先生在纳粹时代被关进牢狱,后来七十三岁出来为德国人民服务,把德国领向复兴之路。你现在才不过四十多岁。

* * *

如现况不变,在可见及的将来,我离台来美的可能程度颇渺。这可从几方面来估计。第一,美国对外国的影响除经济、政治、外交、军事诸力以外,在心理上更基本的力量是威望。美国根本不懂得怎样保持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的威望高峰,二十年来,美国逐渐从这一威望高峰跌落。尤其是近年来打越战及国内动乱,威望一落千丈,台湾的统治集团固然不成东西,但是他们对别人的要求怪高的。他们为了对抗“共匪”,表面跟美国人敷衍,骨子里看不起美国人,而且懂得怎样耍美国人。美国人如果有不可侵犯的威望摆在那里,在他们的心理上构成压力,那末美国大学邀请的学人要赴美,他们自然不敢留难。这一压力既然不存在,要美国为了一个学人被请而出境被留难的违犯基本人权的事而动外交,那绝不是今日的美国政府。第二,这里也有被请而遭留难,但由校方施以压力的事情,但哈佛校方对我事拒绝这样做。每一个人的情形都是一个特例。在这类人事上我找不出一一种逻辑的决定程序(decision procedure)来断言,若由哈佛施以压力则对我出境一定有利。所以,我找不到有力的根据要求哈佛对此间官方施以压力。第三,过去冯玉祥、甘介侯,等等种种的人在美国的言论及活动令此间的统治集团认为“痛苦备尝”。我不是一个搞现实政治的人,他们当然很清楚。但是,台湾二十年来的一套“反共戏”完完全全是一套假把戏,他们心里当然也清楚。二十年来我不附和这一套,他们也清楚。我这种人不能用“国家利益”(其实是蒋家利益),“反攻大陆”(其实是反攻民主自由),这些空话来套住。而我对现代中国问题的了解,也不是胡适等心智已经死亡者可比。像我这种人,一旦出笼,我固然不会搞实际政治,但是他们唯恐我被海外的人“利用”。所以,我成了笼中鸡。

* * *

依此,只有等越战和平解决,美国内部 hectic〔混乱的〕的情形澄清一点,再出现一个奇迹,美国政界有力人士肯出面就我事来拿点言语,我才有出台的可能。

在这一段期间,我只有耐心等待、工作、读书、著作。现在要完成《中国近代思想史》,再修改《中国文化展望》,这都是着意使今后中国人了解近代中国,也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在这完成了之后,拟写《中国与世界的未来》。

唯在这期间,有一件令人担心的事。如兄所知,我这种人,如中国文人习气,向不注重生活问题。就这方面而论,离校二十多年来,完全是随便的混。以致头发苍白,依然毫无凭藉。台湾地方,只要不讲原则,不露出“不满现实”,高级知识分子混生活倒不难。但是,二十年的言论,和表现的态度,我已成“众矢之的”。我的门早可罗雀算了不说,我偶然上街,十几年的老同事碰见了,有的似点头非点头的交臂而过,有的明明看见,转脸作购物状。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这一点也不能错怪这些人。良以二十年来统治的恐怖形成的空气,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前年与去年之交,全家生活陷于极大困难,幸亏林毓生、李楣、张灏等等学生得讯,仗义相助,颇支持了一阵。但这种事是可一而不可再的。现在有哈佛小款相助,可以挨过一年。明秋若仍不能成行,则一切生存问题茫然。

年来,我在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我总想弄到一小点研究费,最好三年,但总是无从着手。我的生活简单,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可以算得是一个准清教徒的生活。但是,除最低限度维生以外,少量研究费不可没有。我曾想〔得到〕每年一千八百元加购书在内六百元共二千四百元一年的费用。三年只合一个初

出茅庐的美国大学助理教授一年的薪得而已。但是,我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

* * *

人的言论和行动趋向,说到究极处,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总都是取决于内心深处所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念和基本情感。我之所以关心国事,自童年起即受从事辛亥革命的父执辈的深刻影响,后来置身于一个大动乱时代,受西南联大那种环境的□□。身受抗战惨痛,国共斗争之酷烈,以及将近二十年来目睹台湾极权之害,有时,我常想,台湾知识分子因胡适以降都麻木了,我一个人势孤力薄,不要再谈国事,从此作个纯学究。尤自大病之后,更应放弃一切念头,搞纯哲学。但是,中国的现状,以及我自幼至今所受的影响使这颗心要放也放不下。你也如此关心国事,我则不甚了了。从表面看,你已经奋斗有成,有了 Ph. D. 有了教席,好的研究环境,大有资格作个“现代人”。大可不必再操身外之心。然而,人生难道止于现实? 关切时代之心,大多数人的苦难之情,才弥可珍贵,才是历史的动力。

中国经过六十年的长期变乱,国共权力斗争死人在五千万以上(仅江西一省在八百万以上),财产的破坏,人民所受痛苦,社会进步所受阻碍,更是难以计量。我看真是够了! 今后无论何派,凡主张以武力解决政权问题的,都是国贼。何况今后的世界,不打仗则已,一打必是核子战。哪里还可做“王师西征,恢复故土”的残梦?

此间今年官方大抽其税,不断开设衙门,“造原子弹打共匪”,激起百物高涨,民不聊生,叫苦连天^[3]。

注 解

[1] 殷先生在此段旁边还写道：“泥于其中，永远搅不清，因此也就永远没有出路。”——编者

[2] 殷先生在此段旁边还写道：“只有这群人出现，中国才有办法。”

[3] 此信根据信稿整理，可确定写于一九六八年。原稿越写越潦草，故文意不太连接。殷先生还在信末空位零零星星写了一些眉批和提纲如下：随时转移，长期抗战 语焉不详，要面谈 出来的估计 fund〔研究费〕
面谈人生现 无论身在何处，著作的计划……帮助外国了解近代中国

·2·

〔一九六九年一月廿四日〕

一鸣我兄：

1

当我提笔，这信给你的时候，颇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盖因内心的感慨太多，而能写出的太少也。

2

首先就想到的是你和你全家都好么？一切的事都顺利？有什么新的发明没有？

我们的现况，可用“如常”来概括。但是，在这样的“如常”之中，有太多的非常。

3

去年寄给你的一封长函，想已收到。多年以来，我对中国今后的问题苦思穷究。近二三年，我在大病未死之中，所得尤多。今后美国的动向，以及尼克逊就职宣言，大势逐渐朝吾人希望的方向发展，此间的马戏班则感冷水浇头。我希望能出此笼，与你深谈，并展望世局，作一切时的参证，俾有益于七亿人的前途。

所以，关于怎样助我出笼的问题，希望随时把握机会。在我这

件事上,“pressure”〔压力〕是必须使用的。但是,用的太少,这些人可以置诸不理。年来的经过足以证明这一点。用的不多不少,即是不大也不小,可能产生反作用。所以,必须有最大的“pressure”才行,因此间的马戏班绝不知人间尚有信义;一切的考虑全从“利害”着眼。

4

我所要的书已经收到。谢谢。研究和思想的工作绝不能松劲,否则生存全无意义和价值。我一时既不能逃出水幕,我要恢复“三一制”,即向友好提出一人一年一书赠我的要求。书名由我决定。你和乐义因为关系特别,尤其是同你通信这样不便,所以我希望你们二位每年赠我一书。(我想,如果你在经济力上可能而且我也读得及,要求你一年赠我一千本书,你也没有什么不愿意的)乐义的信直接写给他。我现在对你提出的所需的书的名称等等开列在下面。不过,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我所要的书在美国常常买不到。所以,我开来三书。如果头两种书中万一有一种购不到,就购第三种书。书购到后请交乐义一起寄来。请告诉乐义,年来我从外面寄来的书物,常常莫名其妙的失踪。为了减少这种损失,请嘱他在寄书时最好挂号^[1]。

有机会再谈。 谨祝

全家福

海光

一月二四日

1. Friedrich, Carl J. and Z.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极权独裁和专制政府》

2. Friedrich, Carl J., *Man and His Government*, New York, 1963.
《人和政府》

3. H. R.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v. 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中国革命的悲剧》

注 解

[1] 朱一鸣先生是微生物学家。

殷乐义先生是殷海光先生的侄儿。——编者

致 钱 思 亮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

思亮先生：

前几天接到校方转来的教育部的一纸通知，我想就这事表示几点意思。在表示几点意思之前，我要作一个说明。就是，您现在是台湾大学的校长，我是教书先生。可是，您从前是西南联大的教授，我是学生。我现在不从一位校长和教书先生的关系和您谈论，而是回到从前的那种关系和您谈谈。因为这样我觉得谈论所受的拘束会少些。

首先，我所要表示的，是台湾大学请了我这样的一位教书先生，若干年来给您生许多麻烦，实在抱歉之至。至于我二十年来的言论和行为究竟是功是过，我的著作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都要让后世的人去评断，我雅不欲与时人有所论辩。时间将会考验一切的。

我常常想，我这样使外界人士放心不下，一部分是由于我个人

颇与众不同;另一部分是由于这一社会文化颇与中国文化的正轨脱了节。其实,自雷案^[1]发生以来,加以近四五年我的种种切身经验,风风雨雨,以及日渐增长的对中国社会人生的体察,我的思想逐渐发生若干的改变。和时下一般知识分子对照起来,我简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然而,“生不逢辰”。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一般人既视理想为泡影,我就应该退隐到自己的天地里。我少年时代本来就有孤独的倾向。现在,这一倾向愈来愈强烈。除了买书之外,我连上街的兴趣都没有,还谈什么其他的呢?

实实在在,归根究底,我那一触即发的愤激吐放,几乎完全是从这里分泌出来的:并非我有意要和现实为敌。我对于我所在的这个社会氛围在我心灵最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厌倦。因此,对参加任何群式活动我都缺乏兴趣。我只渴望到那遥远而静僻的角落、著作、沉思,作着心灵的安息。我在这闹哄哄的地方得不到我渴望的境界,我总想在别处得到。近四五年来,我曾不止一次设法易地谋生。可是,也许因拙于活动,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拿撒勒人耶稣尚且在本地不受欢迎,何况我这种人呢?耶稣说:“飞鸟有巢,狐狸有洞,唯独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我今日在这个炎热得令人窒息的岛上几乎有同样的处境。虽然如此,我并没有一定在台大待下去的意思。我只是想,像外界对我所作种种处断,不仅严重地侵犯民主社会的人权和学人尊严,而且在事实上使我来不及转身。我希望,我只希望得到一点时间,继续努力,设法到别地谋生。如果一时还是不成,我希望有机会转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之类的纯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完成我预备著作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果连这都办不到,我再设法做点小生意谋生。到那一时候,即令外界环境容许我在台大执教,我也不愿继续下去的。

十几年同事的经过应能使您感到,除对真正够得上是学术思

想的问题有所坚持以外,我根本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我对现实无求。我不与任何人为敌,也不使人难作。我在以上所说的,除基于个人的原因以外,还是想多保存一点学术尊严。在目前的气氛之下还谈“学术尊严”,简直是“天方夜谭”。您办学的困难我是想像得到的。可是,我同时想到当年蔡子民先生的伟大风范,不禁心向往焉!

如您觉得有必要,可约会面谈。 谨祝
安 好

殷海光

八月十五日,一九六六年

注 解

[1] 指台湾国民党于一九六〇年九月逮捕雷震、判处十年徒刑,间接迫令《自由中国》半月刊停刊的事件。殷海光先生是《自由中国》的共同创办者、社论主笔、编务委员、经常撰稿人。——编者

致许冠三 (四封)[1]

·1·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冠三先生:

1

读到《明报月刊》和里面有关我的文字,真像“雪里送炭”。我又像一个孤独的夜行人,……看见远处村落里灯火一闪,心中增加了一些勇气,觉得我并不孤立。没有尝过真正孤立生活的人,是不易想像这种心情的。

2

我的近况,实在和台大无关,更和钱校长无关。我在美国的学生得知我的情形后,有些很愤慨,要写信质问钱校长。这实在是不明底蕴。钱校长固然不及傅校长的才识,但确实是一位规规矩矩办学校的人。他从来没有想到利用职权来图谋自己的私利。某党老早讽示他解聘我的,他不肯照办。若是别人,也许我老早被踢出台湾大学了。还待去年暑假?

3

我的近况之形成,关系乎我个人的得失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这实在象征着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没落,和写照着中国学术的悲哀史。如今在台湾,[……] 什么真理、什么学术、什么师道尊严、什么基本人权,一碰到现实的政治权力,无不粉碎! ……我们要忍耐,要作长期奋斗,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在观念上重新铺路。我个人虽然这样受困,但二十年来,此志益坚,深愿和先生们一起努力以赴。

4

我读到你的那篇文字^[2],勾起无穷的回忆,思潮像江流起伏不已。我决心要离开……,到外面寻求新天新地。当然,困难是多的。我像一只笼中鸟,眼看着笼外自由鸟振翅高飞,心中好不烦闷。其实,我的翅膀跟他们一样健。为什么我不能也飞?近三四年,特别是自我被迫高职的半年来,我为了“奔向自由”,作过相当的努力,可是迄今毫无收获。这也难怪,我是这样一个独特(unique)的人,而且不太具备国际“学术市场”上那些格码,尤其没有人事活动的能力,叫人家怎会要我?如果真的有什么地方要我,那只能算是奇迹。但是,我只有出来的一条路好走。……当然,如果我能够到××,和先生们“旧梦重温”,共同从事自由的文化创建工作,那

也是我心愿的。

5

但是,留在这里的日子却不知短长。如果最近有奇迹出现,居然能够离开这个岛,到别处谋生,那真是一了百了。如果在相当长久的时间不能到别处谋生,那末别的且不说,实际的生活就大成问题。正如先生们所深知,我是一个很不善谋生的人。说来也惭愧,离开校门以后二十多年后,依然“两袖清风”。当然,这种待遇也不可能有积蓄的。我的收入被切掉了一半,另一半今年七月三十日停止。所以,生计问题马上临头,躲也躲不掉。这是必须跟老朋友们切实商量的,也必需老朋友们设法的。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6

当然,我可以做点笔墨工作。不过,你可以想像,自文星“改组”以后,我可走的路愈来愈窄了。我只有向香港展望。……我的思想很多,二三年以内写也写不完。一个月贡献一万五千字并非难事。诚然,这距离解决生计问题还远。不过,总可以构成一个补助。此外,我围绕着《中国文化的展望》的新观念二年来又涌出许多。这书既在此间被查禁,正好可以重写。我计划写六十万字。在港谁可资助写作和出版?复次,《中国近代思想史》也在计划写作。目前正在发现一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由之而变化的基线。这也是需二年才能完成的吃重工作。未知港方可有出版家愿意资助。或文教机构资助也好。(但听说全被把持。哎!)

7

除此以外,还有往来的沟通问题。在自由天地中的人简直不易想像,“隔离”和“孤立”是多么利害的统治工具。个中滋味,那些

往来于港台之间的政治观光呆子,那里想像得到?

8

这事不能太慢。请和××先生及××等谈谈。如何?七月转眼就到。若不及早筹划,就来不及了。本来自我的月费切掉一半以后,生活陷于大难。幸经朋友援助,得抒小困。但总不宜亦不能长此以往的。

海光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又务请及早告知××弟。据说有一位谢姓人士即将来港,请××含蓄一点。人心不古也。

注 解

[1] 前二信原载《人物与思想》第三十一期(香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页十四至十六。——编者

[2] 指许冠三写〈我的朋友殷海光〉,《明报月刊》第十二期(香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页58—62。

·2·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

冠三先生:

日前致函,谅达左右。

光虽处身困厄,但对中国自由民主的实现之问题,未尝一日去怀。兹特利用现在的机会,再为先生等进一言。

我们自由知识分子所当坚持的,为自由民主的大原则。我们所要争的,为是非真妄。合于这些大原则的言论,我们必须大勇以赴。小节细事,我们可以根本不理。除非为了例释这些原则和真理,我们不与何人何党为敌。必须这样超越于现实的权势之泥混,

吾人所持道理才能显现,照耀于众黎之上。中国近数十年来,所有政治言论,除了作主张以外,就是发党见。若吾人稍一涉足其间,则无真是真非可言,且永无澄清之望。自党争大兴以来,所谓为“民族”也,为“国家”也,为“主义”也,为“人民”也,“赞成”什么也,“反对”什么也,种种等等,无一不被利用,无一不是为了建立一人一家一姓一党的私权私势私利私益。痛定思痛,对于这些玩艺,我们实无兴趣奉陪。我们必须远离这些乌烟瘴气,才能真正认清时代,创建新的观念思想,构造新的价值系统,为今后的中国人民指出可行的新方向。

光偶然得见港地出版的一二报刊,立论标榜“中立”。但是,一触眼际,便觉观念模糊,视线不清,而在潜意识中则仍是一条倚赖虫。这个样子的“中立论”,再标榜一百年,还是不会有影响的也。中国近五十年来,政治言论,被大的势力集团挤压和塑造得不归于杨即归于墨,寢假而成气候。要能冲破而别创新格,必须有伟大的抱负乘以优越的学识。所谓“中立”,只能中立于党见,中立于人事势力,中立于私情恩怨,而万无中立于是非真妄之理。不然,便是乡愿。乡愿利于生存,但何能开创新的境界?吾人今后不能也不可以武力为中国打开一条出路;但藉思想言论开辟一条出路,是我们自由知识分子之无可放弃的责任。我们要做到这一层,必须一起步在观念上超越于诸权势集团的意识形态之上,并作持久的努力,建立一思想言论的王国。在这一目的上,光愿随诸先生之后,做一名过河卒子。

近十数年来,国际人士之关心中国问题者,所接触到的发自中国人的言论,除幼稚的“中立论”以外,大都为党是党非。这些言论距离客观的真理甚为遥远,作为人家分析研究的素材是够格的,作为人家解决中国问题的启示则为事之必无。这是一块尚待开辟的

新园地。先生等所处的地利,恰好适于发展。年来我们只听到国际学人放言高论,谓中国问题应该怎样怎样解决。而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之中听者,几乎没有。一二老朽所发,直类曾左时代的梦呓。这种情形,言之令人羞愤。无论怎样,中国自由的知识分子今后必须有够格的代言人。光作这一建议,决非有意制造领袖。真正的领袖是制造不出来的,而是种种不易预见的条件碰成的。我之所以作这一建议,实感于中国问题之迫切需要与夫时代之彷徨与失落。

就光近年接触所得,国际人士渴望知道中国人民真正的声音。然而,真正的声音在哪儿? 海峡两边,亿万人的声音都被堵死了。港地的自由知识分子正好替中国人说话。如果所说的话真代表中国人的心声,并且又合于国际学术水准,那末一定可以引起国际重视。这样的时机正在微妙的逐渐形成之中。甚盼朋友们把握时机,作切实的努力。

言不尽意。有机会再谈,并希望尽可能的回我片羽。

殷海光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

·3·

[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

鸿材弟请转致许冠三先生

冠三先生:

1

六月二十四日的手书收到。谢谢。

2

《人物》改为《人物与思想》,真是一个好观念,我举起两只手赞成。

3

我愿意为贵刊执笔。不过,如果作者不能亲眼看见他的作品被刊出,那末他将会产生他的作品被投进黑洞洞的茫然感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的写作动力就消失了。这一交通问题,请你留神。

4

我迄未见到我在《人物》上刊出的第二篇东西。

再叙 并祝 全家福

殷海光

七月五日

·4·

[一九六八年八月廿七日]

鸿材弟请转交许冠三先生

冠三先生:

1

手书收到,谢谢。

2

直到提笔写这封信为止,我还没有收到所寄的《人物与思想》。我必须在见到刊物以后才动笔。在这一环上,绝对不能通融的。香港方面的朋友,似乎并不深知我们的痛苦也。

3

如写文章,在可见及的将来,我拟多用小品或通信体裁。理由:

a 减少交通困难。

b 比较轻松。

余事续叙。 谨祝

文 安

殷海光

八月二十七日

致韦政通 (二封)

·1·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

政通学兄：

前晚漫谈，甚提精神。废颓至极，其有灵光吐放耶？

二十年来，诟我者多矣；美我者亦大有人在。然此皆非吾所需者。吾所需者，除志行之砥砺外，为严格之批评。我在生活情调方面，尚不脱东方人色彩，然在为学方面早已直追西方精神。愿爱我者在此方面助我。助我或亦有助于此一时代也。

书生处此寂天寞地之中，众醉面独醒，内心常有一阵一阵莫可名状之凄寒。寂寞之长途旅人，甚愿见路边之烟火人家，灵魂有个慰藉的小茶店。喝口热茶，暖暖心头，打起精神，重新走上征程，或可发现一个新境界于迷茫之外也。

不一 谨祝

俚 安

海光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夜书

·2·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

政通学兄：

1

如果可能,我想送你一个称号“思想工作者”。

请你太座别小看这一称号。从台湾看到香港,在我心目中,够这一称号的,不到五人。方东美根本不算,他并没有真正的思想力。

2

在思想工作范围里,除了必备的学绩(scholarship)以外,最见硬功的就是解析能力:一点也假不来。

但是,中国思想界近几十年来,稍有才智之士,大都腾云驾雾的建立大体系。结果,这类人物名噪一时,但不旋踵而烟消云散,长篇大论与废纸为伍。

3

人海茫茫,智者沉销,何其苍凉!我想我是你的著作之最知己的读者。在一切短长以外,你有颇为丰富的思想潜力。你可严重的工作二十五年。

4

星期六要来的话,最好不要两点来。这太花时光。希望你在四点半来。如果那时没有特别的事情,我可请你吃小馆。

如果星期五下午四点得空能来更好。谈后也可同吃小馆。

别的论题,见面再叙。 谨祝

春天快乐

太太请代致候

海光

四月八日,一九六八年

二 致外国友人* (八封)

致爱因斯坦^[1]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

爱因斯坦先生：

近来读到你底文章《科学定律与伦理定律》，我深深钦服你对伦理问题的实证看法。五十余年来，由于主要地浸沉于纯科学工作之中，你也许不明了地球上另一部分人是怎样的过活的。形成他们底灾难之原因固然不少；可是，在伦理方面，受权威支持的道德绝对主义则是主因。绝对主义者，一提起“相对论的”，尽管并无所知，但深恶痛绝。在实际上，我们身受其苦。近若干年来，东方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10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的自由知识分子注意并欣赏你在这方面的文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希望你允许我把你这篇作品译成中文。我想,在一长远过程中,你底这种思想可以有助于我们。

殷海光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

注 解

[1] 录自殷海光译:《科学定律与伦理定律》。《自由中国》第十二卷第九期(台北,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页五。文中附有爱因斯坦的复信。此文收入殷海光著:《思想与方法》(台北文星书店,一九六四年十月)页127至130,殷海光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时写这封信的。——编者

致 罗 素^[1]

〔一九五九年〕

罗素先生:

我是这儿的一个哲学教师。在现代哲学里,我最喜好的要数你了。你的著作我曾读过大部分。你的行谊、风范,对真理的热爱,和关怀整个人类的襟怀,我真有难以说出的景仰。

现在,容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在新近出版的著作《常识与核子战争》的第一六页中主张保存自由,可是在同书第六八页中却认为民主国邦可与共产国邦一起协商,尤其认为个人自由未尝不可加以限制。这在逻辑上,并不一致。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看来,一个人的个人自由如被限制,就等于他的生命被限制。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儿也许还是活的。可是,它的生命意义,比在天空展翅

飞翔的鸟儿来,实在差的太远了。所以,我认为个人自由不容被限制。在太阳底下,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限制别人的个人自由。您以为然吗?

我希望您寄张近照赠我。这并非把您当作偶像来崇拜。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从来不把人当偶像的。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您也不希望被人当作偶像。我之所以希望得到您赠的照片,只是为了给我同我的学生们一点鼓励。 敬祝

安 好

殷福生

一九五九年(日子已经忘记)

注 解

[1] 录自殷海光:《我同罗素的讨论》。《殷海光近作选》香港海光文选委员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第214至215页。罗素的回信见同书页212至213。——编者

致 屈 莱 果 (二封)[1]

·1·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

屈莱果教授:

1

谢谢你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的来信。

2

你向〔华盛顿大学〕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建议送我的三本书已收到。它们的学术价值颇高,对我很有用。艾森斯塔特教授(S.

M. Eisenstadts)的著作应被视为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的杰出成就。但比书籍本身更宝贵的是这些书所代表的你对我的关怀。

3

关于我最近发生的不幸,并非三言两语所能清楚形容和分析的。这件事本身是值得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sinologists)去弄弄的个案研究的主题。我现在能做到的只是给你一个扼要的叙述。

我被逼离开台湾大学不是起因于一个低级官员的偶然行动,而是国民党经过长时间的考虑,阴谋对待异端的结果。

你知道,中国人并没有西方人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传统。当“民主”之名在一九一二年流行以来,不论政治和伦理中社会结构或人格形成,极权主义仍是占有优势和无所不在。从许多角度来看,现在台湾掌权的国民党人都是以前北方军阀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中途岛。由于受到严重的挫折,国民党人比他们以前在大陆的时期更加盛气凌人。他们把自己失去在大陆的权力归咎于鼓吹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对所有异端分子的宽大政策。

[……]

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人对他们失去在大陆的权力十分痛心,他们的补救办法是千方百计紧紧握着权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巧妙地镇压或清除(如需要的话)所有真正的或潜在的异端分子。他们进行时,不像希特勒或卡斯特罗那样公开执行,而是用一种十分复杂和隐闭的方式,不易观察到。这里的统治集团日复一日挥舞着它的权力,逐步占领,并恫吓人们对政治事件的言论必须绝对一致,并须一致拥护某种主义。

我是一个书生,完全没有什么政治活动。但我和学生谈论思想问题时,我总是直言不讳,毫不理会党派的路线。我只谈我认为是真的。国民党当局却觉得这样无法容忍。

今年夏天,一份一千四百名文化工作者抗议“美国的共匪姑息分子”的宣言匿名地出现,没有人知道它是哪儿来的。论断这份宣言是否充塞着攻击的言辞、非份的请求、脆弱的论据和党派观点,未免太迂。但宣言的背后的确蕴含着台湾的一些政治意图。国民党通过签名者和拒绝签名者名单,可得知谁拥护它,谁不拥护它。文化工作者如果拒绝签名,几乎都会面临可能被怀疑为“不忠”或失去工作的后果。大多数的文化工作者在与官方保持和谐关系上都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明白签名背后所蕴含的真正意思,于是麻木地签上名字。你知道这是中国人在不利情况下寻求自保的一种传统方式。作为一个自由人,我率直地表示我对这个准共产主义伎俩(quasicomunist trick)的憎恶感觉,拒绝签名。于是引燃了爆发点。我实际上被台湾大学免职。事实上,台湾在这个秋天发生了一系列的清算事件。我的一群学生静静地被免去在学校里的职位,而我是第一个开刀。

中国许多事情都不是由外表便能看清楚。为了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必须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在表面上,我现在是被调到教育部,其实我是被逼和一再被恫吓辞去我在大学中的职位。前一个举动纯粹是中国的一种官僚手段,以便掩饰后一个行动的实质。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已被一只无形的手击至遍体鳞伤。

中国人的传统是避免家丑外扬,但我认为知识分子的第一任务就是说真话。隐讳是大多数社会毛病的温床,但公之于众倒能治疗一下。

4

当我在写作《中国文化的展望》时,正如我平时谈论经验世界的各种事物一样,我脑子里总记着阿里士多德的名言,虽然我很清楚这在处理人文现象时是不易达到的理想:

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或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便是假的;而把是什么说成是什么,把不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便是真的。

不过,我一向尽我所能,务求达到这个理想。根据这句话,我们看问题自然要避开某个时地流行的种族中心思想、党派偏见、以及伪造的舆论。但这跟台湾官方正好针锋相对,因为他们散播种族中心思想、党派偏见,以及伪造的舆论,作为他们统治的心理支柱。他们采用劝说或恫吓的手段,或二者兼用,巧妙地把差不多所有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出版物充作这些心理支柱的反映。这实际上是限制和左右台湾一切知识活动的党派世界观路线,而这是在台湾长大的大多数人所难以察觉的;对中国历史、语言、心理不熟悉,而又不认真观察的外国人当然就更难识别了。在我的新著《中国文化的展望》里,我完全不受我所生活的环境影响,我行我素;除了真理外,我一概不服从。我下笔时虽然已用一种十分慎重和保留的方式,但官方还是不能容忍我,所以我的书被查禁了。

5

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在台湾立足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美国去谋生。我任教西方哲学已超过十七年,所以,很自然地,我使人产生一个印象,以为我是西方学术的教师。我却不以为我的西方学识及得上美国大学里的优秀教师。当然,如有七八个星期给我练习用英语授课,我讲授西方哲学的能力,例如现代知识论、解析哲学、逻辑概论等,必会或多或少有所改进。不过,我十分清楚我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能力和潜力远在我做西方学问之上。我以为,由于种种原因和理由,我在这方面的能力并非大多数献身于中国研究的学者所能轻易代替的。如果我有机会从事这种研究工

作,我想我能对近代中国贡献一些可信的知识,由此而促进对近代中国的理解。但我简直不知怎样去找一份工作。我是一只孤独的狼,极需美国朋友帮助我。我现在填写一份申请表格,要求你做我的咨询人。请问可否允许我借用你的大名呢?如蒙应允,并为我写一份推荐书,将会使我的努力顺利获得成果。对你的宽宏大度,我表示感谢。

顺向屈莱果夫人、你和小屈莱果们问好。

殷福生(海光)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

·2·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

屈莱果教授:

1

府上经过一个愉快的旅程,应该已经平安回家吧。

2

我真的感到惊奇——分别了八年,你在七月二日下午四点倾盆大雨的时候,突然走来看我们。

这件事使我对奇妙的宇宙和不可思想的人生一再陷入沉思。在人类知识领域,现代科学在作出预断上的能力是卓越的。所以电子计算机提高估量的能力。不过,有鉴于人类行为,特别是思想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科学所能做到的实在极其有限。即使是拉普勒西鬼怪(Laplacean demon),也不能精确地预料捷克或达拉斯明天将发生什么事,或谁是美国的下任总统。

对于上帝,我一直没有清楚的概念。我以为这是人类的“不可能”。因为所有关于上帝的说法都是在文化或在制度上预设的,因此上帝能建构一切,同时又不受一切约束,超越一切,而又置身一

切。年纪越大,我越是感到,我们实在无能力去揣摩包含了人类心灵的宇宙是怎样形成和为什么形成的。在冥冥中必有一个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和主动的存在,不论我们称它什么,怎样藐视它,到底它已使这样一个宇宙成为可能。人类的心灵可能就是这个存在的有意义的实质。据我们所知,道德标准、正义感、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等等,只能在我们的心灵中存续下来。二次大战之后,这些可贵的品质已受到严重的考验,代之而起的是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但这些心性不曾消失。有些人继续珍惜着它们。这也许就是人类希望的幼芽。

3

我现在几乎好像一个隐士那样生活。我不去看电影。除了看书、写作、思想之外,我通常做一些手工过日子。但我不把现代化看作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最近我把家里的水池扩大了,罗拉、凯蒂和文丽都曾经常在这个池子游泳。现在只有文丽站在池边了。我觉得她十分寂寞的。我没有受过水泥工的训练,做起泥工来笨手笨脚。你很容易想像到,我所做到实在非常粗糙。附上几张内人拍的照片,希望你欢喜。

4

近况可好? 嫂夫人协助你料理家务,一定十分快乐。华伦现在上哈佛了。罗拉和凯蒂都上学了。除了教书之外,你可能准备写更多的书。希望一切顺利,愿伟大的造物主庇佑你。

5

我需要下面列出的三本书,它们对我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如果愿意向研究所建议赠我这三本书,我表示感谢。即祝

教 安

殷海光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edited with translation by Jung-pang Lo.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康有为传》

Theory of Society, edited by Parsons, Shils etc.《社会通论》

Theories of the Mind, edited by Jordan Scher.《关于心灵的各种理论》

注 解

[1] 这两封信是屈莱果教授(Donald W. Treadgold,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远东及俄罗斯研究所)送给林正弘先生的并同意发表(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八日),原信是英文,中译是由林正弘先生做的。

致克里福神父^[1]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克里福神父:

1

十分感谢你把我的近况告诉给屈莱果教授。

2

透过你的推介,我认识了科普斯顿神父(Father Copleston)。在阅读你送我的科神父的近作《边沁到罗素》,我感到非常高兴。该书文笔简练,论断精审,对问题的辨别和发展趋势交代清楚,他的确是哲学界中奇特的人物。

他在《边沁到罗素》一书中,到处强调玄学的必要性和不能免除性,你知道,我曾经沉迷于逻辑经验论。循着这样的思考路线,

我认为玄学没有意义，一切有关玄学的哲学问题都是似是而非的问题。现在，我应该忏悔，我反对玄学的论点与其说是对玄学的一种谨慎而公平的论评，不如说是一种打倒偶像的举动。如果哲学真是一门在行动上配合宗教、道德和科学的不可缺少的学问，那末它不能仅仅是玩弄文字。哲学必须是各门理性的学问和合理的行为所预先设定(Presupposed)，不论是意识地或非意识地。如果没有在至低限度上默认玄学，那末即使建构知识论也是不可能的。

3

我曾经读过科普斯顿神父同艾尔(A. J. Ayer)的争论。他真是和艾尔一样，是一个尖刻的思想家。但我没有看过他同罗素的争论。想像到他运思之敏锐，我想他当能与罗素匹敌。如果方便的话，可否寄一本给我？

4

你在台湾的时候，我已对你说过，我的台大聘书到明年六月即告期满。而目前我已被停止教书。你在某个程度上会知道，我现在身处非常困厄的境况——我实际上是孤独的群众中的孤独个体。我必须在美国找一份工作，这需要朋友们的帮助。我现在正填写一份申请表格。你曾经是我同事，也相当了解我，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很合适做我的咨询人。你的关怀和热忱对我的努力必十分有帮助。

并请代我向屈莱果教授征求同意，做我的咨询人。

5

另函附上我为你送给我的大作写的一份简短的读后感，希望你高兴读到它。

6

我同时希望尽早收到你的回信。 即祝

学 安

殷福生(海光)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注 解

[1] 克里福神父(John W. Clifford, S. J.)任教于西雅图大学。

致杨教授夫妇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

杨教授、杨太太：

1

时间过得真快。我已很久没有写信给你们了。你们都好吗？你们写完了论袁世凯的那本书吗？国民党把袁视为叛徒，我却觉得他是一个功勋过人、野心勃勃的领袖。你们给他一个公平论定吧。

2

我的处境仍然很尴尬。除了不准离开台湾之外，这里的政客们、恶意煽动家们、雇佣文人们一再公开谴责我和费正清合伙阴谋出卖台湾。请看看附上的一篇文章中的一篇剪报。不说其他，这样产生的气氛是有毒的，对笼中之鸡逼害甚烈。

3

不久前，哈佛燕京学社寄给我一千美元。这样虽然已很慷慨，但还不足够。不过，这笔款子多少可帮助我从事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而在这一关联上，对我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我并不

孤立。

就我所知和我的感觉,在可预见的将来,我还没有希望离开台湾。如果我被逼明年也要留在这儿,由于上述的理由,我希望研究补助费能顺延一年。但因为某些习惯上的理由,我感到由我直接向斐理哲(Pelzel)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适当的。可否请你代我向他提出这件事?当然,在提出这个建议时,我无意让他牵涉到政治里。我本人现在差不多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

4

我完全不知道卡根(Kagzn)一家的地址。麻烦你尽早把我的信转给他们。谢谢。我在给他们信中所写的内容有所不同,但也是我想写给你们的,所以我希望你们顺便一读。

5

你们的孩子怎么样?我想他们在美国可能更加没有拘束。你们的女儿还记得讲国语吗?
祝你们都好。

殷海光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

致卡根夫妇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

卡根先生、卡根太太:

1

收到你们那张美丽的圣诞卡和写在卡里的信。

2

我应在很久以前便写信给你们了。但寄出一封有点意思的信,你们都知道,必须等到有一个适当的机会。

3

你们现在都好吗?我想像得到,你们二人正勤奋工作,努力达到学术的目标。我感到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很忙碌的。人们经常被业务缠绕,这似乎是现代工业化国家的一种特质和趋势。道学并不赞成这样。但道学家们正迅速消失中。

4

柯梅近况如何?我肯定她比在台湾时长得更高大了。她已上幼稚园吗?她还说“打!打!打!”和打这打那吗?

5

十分乐意告诉你们,你们的雀儿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内人从没有忘记每天早上给她食水和食物,并跟她玩;但我想她很孤独。你知道我的院子尽是花草树木,而飞鸟在春天来临时总是喜欢在树木间聚在一起翱翔的。有一天,一个不速之客(在中国是一种有名的啼鸟)飞到你们的鸟笼外,探望你们的鸟儿。我不知她有什么感觉。

6

我和家人尚未获得到美国的通行证。这儿的官僚对我们的申请既不批准,又不否定。他们只是无限期延迟作出决定。我的一些朋友叫我忍耐。忍耐是中国人对付暴政的一个传统方式。但盼望远东的政治局势能在不久的将来有所改变^[1]。无论如何,约翰逊先生已很聪明地作出决定,把南越的战争降级,同北越展开和谈。每一个敏感的、心智正常的和热爱和平的人都会高兴看到这新行动。但这儿的很多高官却非常担忧和谈所产生的各种可能的转变,因为他们的现状是建立在天下大乱的基础上。

7

以下三书,我很想一读,但在这儿不能买到。可不可以代我买来?它们是:

- (1)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New York.《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如果没有新的,旧书也行)
- (2) Shanti Swarup, *A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5.60.《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
- (3)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力》

直接寄这类书籍给我是非常不方便的。我有一个美国朋友魏君住在我家附近。魏君为人敏锐、热情、负责,是来自哈佛的青年人。请把书寄给他,他会转交给我。你明白,这个岛上的政府对美国人非常有礼和尊重。由于收件人是美国人,当邮检员想把书扔到海里时,他们必须多一层考虑。魏君的地址是:(略)

至少在目前来说,把上述三书的费用直接从台湾寄给你是不可能的。为了补偿你的支出,我提出下列三个办法:

- (a)我把书钱交给这里的美国人或请你们在这里的朋友转交。
- (b)你们来台湾时,我当面把书钱奉还。
- (c)或任何其他你们认为可行的办法。

即祝

俚 安

殷海光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

注 解

[1] 殷海光说这句话三、四年后,即发生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大陆、中共进入联合国大事件,整个远东形势为之大变。由此可知殷海光洞察力之强。——林正弘注

致欧达伟夫妇

[日期不详]

达伟、苏珊:

1

你们走后,我感到好像缺少了甚么。

2

香港虽然是一间大型的百货商店,但你们在那里可以享受到大城市的气氛,看到各种各色人物和事情,而且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到各地去,那是我梦寐以求的。

3

我用平邮寄了一本书给你们。这本书虽然在形式上是小说,但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本社会史。书中对部族社群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描写很诱人,并且对费孝通教授的实地研究作了补充^[1];该书的文笔亦十分优美。盼望你们能从中得到益处。

4

经过谨慎的身体检查,证明我的病是一九六七年患上的胃癌的复发。我曾躺在台大医院整整五十天,现在我又整天躺在家里。

我的身体好像纳粹集中营里的俘虏那么虚弱,但我不以为我会被小鬼们打倒。

除了每天吃西药和注射外,我还喝草药汤。据医生说,根据传统的医学理论和实践,这种“汤”能够治我的病。于是我的胃成为东西汇集、新旧合一的地方。我完全服膺实验的精神,不采纳丁文江先生那种拥护科学的僵硬理论。

无论采用甚么手段,我都要和死亡斗争。不过,就在这个关口,哈佛燕京学社竟然停止在经济上支持我。这真像救火时停止供水一样。我不知道怎样办。

5

希望你们给我一信。祝双安。

海光

注 解

[1] 欧达伟(R. David Arkush)先生是哈佛大学博士,其博士论文是以费孝通为主题。他现任教维珍尼亚大学。——编者

三 致学生及后辈* (七十六封)

致林毓生 (二十四封)

·1·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

住址仍旧,门牌变了:台湾,台北温州街十八巷十六街九号。

毓生老弟:

在两个多星期以前接到你底来信时,正好在午前,读了以后,兴奋得睡不着午觉。为什么呢?因为,从你底信中,我简直看见了自己底灵魂在芝加哥大学搏动;你所走的路子,正是我所要走的路子。怎么竟是这样“不谋而合”呢?如果我迟生二十年,我简直要长一双翅膀来芝大求学呵!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10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三千元的奖学金不足使子成百万富翁。然而,这代表公正。我一辈子没有获得这样的公正。公正,对于奖掖社会进步,太重要了。能得像 Hayek 这样的教授赏识,真是三生有幸。又有那么多第一流的角色挤在一个系院里施教,该多么富于启导力。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如果再不能有所成就,我看只有一棒子打下地狱去!

实在使我惊喜,怎么你到芝加哥所探出的为学线索,与我这个土包子在这个小文化垃圾堆上所想出来的竟如出一辙。我只好自己说自己是“天生的芝加哥学派”。你准备拿五年时光作基础,再研究拟议中的专题。这种不急功好利的态度,这种劲头,足见学人气象。我们且等着你底大著作从美利坚的土地上出现吧!

我读你底信,最获益的是打破一项成见。即是,从我们这个路线下来的人,往往不喜生料(raw materials),鄙视文学作品,而只愿读人家精制过了的二手货——我底这一 disposition〔倾向〕表现得最强。如今经你这一提醒,简直如大梦初醒。然而,在我,已经一下子就错过二十多年了。可见,在那些基本关键上,有无高人指点,是多么重要啊!

现在,请你抽空办点事。请你将(1)Theory of Culture〔文化学理论〕和 Culture Change〔文化变迁〕,(2)Sociological theories〔社会学理论〕,(3)Sociological anthropology〔社会人类学〕有关的书;就 title, author, press〔书名、著名、出版者〕,和价目开一个单子给我。你知道我不喜读些杂七杂八的书的。每一类请开列二三种极棒极富代表性的大作就够了。

你送我的 Merton 之书已收到,谢谢。那是一本高级货色,只是太贵,不好意思。

我预备在五个月以后有点小事想托你帮点忙。所以,如果你在此间住址有变动,务请告知。

本月十八日是罗素底生日,循例拟请本届毕业生。今年有请鲍家麟等。届时可有点小热闹也。

你要我常常写信给你。你是我底一个小天窗,岂有不愿之理?不过,我底财政状况你是知道的。写一次信就影响日常费用,如何可以多写?

张灏有信给你否? 即祝
进 步

海光
五月一日

·2·

[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毓生老弟:

七月十五日的信也收到了。读你底这封信,正同读你每一封别的来信一样,我像电瓶受到充电一般:激起无限的灵感和思绪。你底信充满着洋溢的热情和智慧的光芒。每次读了又读,真是一种高度的享受啊!

就我感觉所及,许许多多留学生一到美国就被机器卷走了,忘却了自我。咳!没有了自我,就算一天到晚吃牛奶面包,也不过跟猪差不多。这种生活多么可悲!而在孤寂中,你却昂然保持着原始的自我(这个名词在社会学里不通,姑用之以表达我意),表现着一种超越环境的气概。这是最令我欣慰的地方。一个知识分子,唯有如此,才能发挥他原创的力量。你说呢?

美国有许多学人治学的方法和成绩,我是心悦诚服的。可是,美国社会一般人底生活形态,几乎完全是 urbanization[城市化]和 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上面的副产品。我没有什么标准据之以说它“不好”;但是,从我底感情来说,我认为“浅薄”,“乏味”。说到这

里,我忆念少年时代的北平生活,我向往古老的欧洲情调。嘿!美国一般人一天忙到晚,汽车冲冲冲,没有 meditation〔沉思〕,那里可能含孕出深沉而远大的思想!你对美国社会的观察是很深入的。足见年来你所学有了实质的进步。你底孤寂和磨练是有代价的。希望你以此作起点,获得最高的成就。那咱们才快乐哩!

从照片看去,你比在台湾的时候又成熟多了。照片底背景也很有点文化气息。这都是令我高兴的。李楣他们常来舍。这次留学考试,除鲍家麟以外,他们全部落第,很感到沮丧。我鼓励他们,说,在人生过程中,这是很平常的事;明年再来。鲍家麟这几天没有来,大概办手续去了。她要在九月赶到 Indiana〔印地安那大学〕去。

你开的书单,一看就知是很有价值的。开书单是不容易的,也须要一番学养。我最厌恶若干中外人等,动不动开上百种以炫其博。老实说,我们根本就不想做书虫,根本就不不要像张贵永等人那样为读书而读书。读书,对于咱们而言,不是一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致知的手段,一种帮助了解世界百态的手段。因此,我,至少我,只挑精要的书读。其余的只好慢慢来。你这次挑的书,极合我这种口胃,很是谢谢。可惜目前太穷,只有等以后设法购置。

我当然很喜欢多跟你通信。可是,你能想像得到,通信次数无法太多。一次十元,多了就影响“国计民生”啰!这种光景,外国学人岂能想像!

给张灏的信务请你去看他时带去。之所以托你带,一来不知他底住址,二来这样亲切些,三来可以省邮费。张灏信中的事,不在你信中赘述。即祝

进 步

海光

八月六日

不悉你近来的财政状况如何。如可,可否送我一册 L. A. Coser & B. Rosenberg ed, *Sociological Theory*《社会学理论》? 如穷,就算了。此书 \$ 5.75, Macmillan Co.

·3·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毓生老弟:

又是好久没有通信了。可想像地,你是忙着搞学问去了。我也是颇忙,当然事情更杂,生活亦累人也。

前不久令妹秀贤来访。我们谈了许久。兄妹相似的地方有这么多,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我问起你在美国的情绪生活,她告诉了我一些。从她所说的种种,关于你的情绪生活,我知道一个大概。你一个青年,跑到异地求学,骤然从父母、兄弟、姊妹,亲朋种种 primary relations〔基本关系〕里抽出来,自然而然地会感到无名的 lonesome and helpless〔孤寂和无助〕,而且失去了 sense of belonging〔归属感〕。复次,“少年维特之烦恼”又夹攻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底情绪多半是很脆弱的。人在情绪脆弱的时候,最易失去对诱惑的抗力,因而也最易找个东西依附,或是找个经过想像作用塑造了的异性来爱恋。说实在的,这是宗无可奈何的事,几乎任何年青人都难得避免。在目前的环境里,可行的救药似乎只有三样:一,把爱情移向将来一点点;二,藉搞大学问来昇华若干;三,找些 outlets〔遣兴〕,例如,听音乐,等等。你说怎样?

又纸所剩不多了,赶紧将请你就近办理的事说出。我亟需下列这本书。劳驾尽早买好寄来。万一没有新的,买 second-handed〔二手的〕也成——虽然我不喜欢。书价,俟集成一个不太零碎的

数目后,再送到你家。 祝你
进步和愉快

海光

三月二十八日

Holjer: *Language in Culture*, 《文化言语论》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麻烦你。又及。

·4·

〔一九六二年六月四日〕

毓生老弟:

两封信先后收到,二本书也收到了。

同你写信是我最高的享受;读你的信尤其是像在这沙漠中孤独的旅人看到绿洲般的欢愉。当我收到你寄的书包,打开时,一阵一阵洋书的香味,扑鼻而来。嘿!老弟,这种光景所给予这穷书生的快乐,你是不难想像得到的吧!

好像,我给你现在写的信,写到这里,要停止也够了。再往下写,真不知从哪里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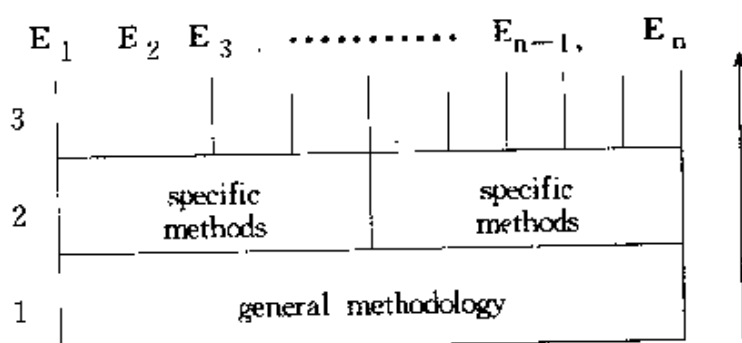
咱们先谈海耶克先生的书吧!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由的制度受到基本的挑战以来,保卫自由的伟大著作,就我迄今所知,只有二本。第一本是众所周知的K·波普尔先生所著 *Open Society* 《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这本书是从思想史着手俯冲而下来解析地保卫自由。第二本我看就要数海耶克先生这部大作了^[1]。显然得很,海耶克先生是 being semantically enlightened (搞通了语意的)。这部大著,一开局就不同凡响:气象笼罩着整个自由世界的存亡,思域概括着整个自由制度的经纬。不仅如此,海耶克先生不仅作此大幅度的开展,而且能将他所立原则,具体地引用于一些紧要的个别问题。这是一般思想家所望尘莫及的地方。论其为学,

书中 footnotes〔注释〕,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附注之多,简直逼得人透不过气来。我把查附注叫做“盘底子”。我把书后的老底子一盘,发觉海耶克为学之深切,实在少有。海耶克先生读书数量之多倒不怎么打紧,最难得的是他读的书种类复杂。他对于哲学一行,也保持着最新的接触。海耶克先生为学如此,难怪这样受到芝大尊重。现在我们家里,连六岁的 Abby 都知道他的大名。Abby 近来常伸出大拇指问我:“Hayek 是美国第一流的教授,是不是?”我要细嚼此书。自恨无缘作他的及门弟子。你真是幸运哩!假若还来得及的话,请你代我致谢他的签字并致敬意。我想,在港台一带,我即令不是唯一能了解他 political theory〔政治学理论〕方面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人之一。

毓生老弟!我不是老早说过,你是我的小天窗之一!(在哲学方面,有业宏他们。)几乎你每次的来信,不仅给予我以学术方面的 information〔请报〕,而且给予我以新的刺激,新的提示。尤其当着说到彼此的见解不谋而合之处,真使我欣慰,并且提高了自信力。所以,你每次来信,我总是阅读不下三次,希望每一次从里面发掘一点新的玩意。同时,抱着“美味不可独食”的心情,尽可能地把你的信给来访的青年友好阅读,让他们也好分享一点新的刺激。毓生!你是从台湾出口的人。你会知道新的刺激在这里是多么缺乏。前些时吴章途来访。我就把你的信给他看。他很欣赏你。我觉得朋友们互相欣赏长处,无论怎样都是 desirable〔可取〕的。里然是初次正式晤谈,他能当面把过去对我不满之处直直说出,这比 backbiting〔背后伤人〕岂不高出万倍!他底心灵已很 mature〔成熟〕,不固执,而且非常正直,非常 sincere〔诚恳〕。这样的青年,在此时此地,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现在赶紧谈谈你上次长信中某些极关重要的 points〔论点〕。

你说“所谓‘方法’实在与各科的 subject matter〔主题〕有连带的关系”。这话,自然是对的, but it is only partially true〔但只是部分正确〕。严格地说,这种说法, so far to the extent that you have claimed, is only a dimly grasped understanding〔至少在你说及的范围内,只是一种模糊的了解〕。这个问题,细说起来,实在复杂已极。我们现在姑且简略图解在下面:



请注意 general methodology is underlying〔一般方法是从属〕在一切 specific methods〔特殊方法〕之下;并且是一通统的。Specific methods 则系因材而制定的。

E_1, E_2, E_3, \dots 表示有待处理的个别事件或题材。第 2 层为 specific methods with respect to the particular subject matters as indicated on level 3〔与第 3 层的个别主题相关的特殊方法〕。一看这个图解,我们就知道,第 3 层的处理,必须假定并且藉着第 2 层。第 2 层之制定一定得与 3 相因,即就材设法处理。可是,第 2 层在基本上又得建立于第 1 层,即 general methodology 之上。准此,1 为 2 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而又必要的条件。而 2 又为 3 之处理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而又必要的条件。你所谓“‘方法’实在与各科的 subject matter 有连带的关系”,这种“关系”实在是 2 和 3 之间的关系。然 2 和 3 之间的关系,除普遍关系以外,常为 ad hoc〔特殊看

待),须作“就题决定”。怎样作就题决定呢?这又须我们的心智因料制宜:直到目前为止,人类还在 *groping their way out* [摸索出路],迄无一式一律的通则可以援用。这大概就是你所说“方法和题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之诠释吧! *To this extent, and to this extent only, I agree with you* [在这个范围,而且只在这个范围里,我同意你的看法。]

其次,关于包括人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等等部门在内的行为学科与历史构造(请容许我暂且这样说)之间的相干是怎样的相干呢?这也得分几层来说。第一,就历史构造之 *theoretical layer* [理论层]而言,行为科学实为前者不可少的依托。当然,这一点也不意含,搞行为科学即算构造了历史。我底意思是说,如不依托行为科学,则所谓历史也者,不过只是 *a haphazard collection of drifting facts* [把零星的事实漫无目的地集拢起来]而已。这样的历史,对我们何用?所以,就这一关联来说,我非常之坚持史学之科学化。第二, *so far as historian's capability concerned* [就史学家的身份来说],一旦 *conversant with the entals fundamental of 行为科学* [熟习行为科学的基础知识],眼力可不能与只具常识者相提并论。我自己年来之进境,和过去相比较,可作例证。因此,关于这一点,我不敢与你苟同。其他都赞同。

我们该讨论的东西多着哩!纸上谈起来,实在挂一漏万,太不过瘾。毓生!你来信说:“海外读书,毫无慰藉。快乐时无人与你分享;苦恼时无人与你分担。凄清孤独的感觉自然是难免的。我在这里几乎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此情此景,我完全能够体味。白屋诗人[刘大白]说:“千钟驷马非所欲,得一知己万事足。”咳!真正谈得来的朋友,是多么重要啊!我幻想着,咱们如能于工作之余,漫步于树荫之下,眺望于五湖之畔,谈学论理,那么这种凄

苦清寂的况味就可减少多了。

越写越多了,以后再谈吧! 祝你

进 步

海光

六月四日

内人和 Abby

致意

注 解

[1] 指《自由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殷先生曾作过详细的介绍,见《海耶克和他的思想》,《文星》丛刊一八〇号(香港文艺书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编者

·5·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二日〕

毓生:

0

你八月十八日写给我的信,老早收到了。自从收到你的信以来,几乎天天想写信给你。只是,思潮起伏,像涨大水时河川塞了口一样,关于学问,关于私事,千头万绪,不知从哪儿说起,所以反面临笔彷徨了。然而,信毕竟非写不可。现在,只捡我认为最重要的写出来。

1

今天,因为要写信给你,把你的信又看了一遍,真是提神之至。论文笔,你目前当然远不及梁启超。然而,论气势之磅礴,论情理之并茂,说你为一 latent〔潜在〕的梁启超,实在不算过分。又你对于你认为不对的说法能予“痛斥”(引用你的原文),这种作风,在目

前的社会,很易使自己陷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我却大为欣赏这种作风。之所以如此,一部分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这种人。不过,更深一层看,是由于我觉得人必须有真是真非,而且有勇气拿出真是真非。这,在当今之世,是多么重要啊!

2

来信说:“最近小妹寄来五本《文星》,是关于文化论战和胡[秋原]先生的,读了令人非常气愤!文化沙漠上居然能听到征战的号角,固然是可喜的现象,但两方面都是不学无术一派胡言。”接着你又说:“这仍然是从前绍兴师爷耍笔杆,舞文弄墨的作风,真是如何得了啊!”读到这里,我不禁大笑。老弟!难得你的情感这样丰富,这样认真。不过,你既习社会学及人类文化学,难道不知这种土里只合长出这样的菜?将来真正的高手出来了,还怕这些玩意不烟消云散?

据道路传闻,说在西化派这一方面,是我在后面调度。咳!这真是活天的冤枉。年来我形同隐居,不问外事,报也不看了。除教书糊口以外,我唯一努力的工作就是完成中国近代思想史。哪有闲空去搅这个混水!只是,这场论战中,有一方面是我的学生。在论战之初,他们三四人——并不止一位——前来问计。我对于这桩事的态度非常鲜明。我说:第一,我个人绝不写文章;第二,要不要打笔仗,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既不反对又不赞成。“可是”,我又说:“如果你们决定打笔仗的话,就得在技术和学问上站得住脚,以免为人所乘。”哦喏!此语一出,那三四位就纷纷拿文章来改。学生请老师改文章,老师岂有拒绝之理!而我的用字,我的思路,又是别无分店的。这么一来,大家就纷纷议论,说是这些人代他们的老师出马作战。其实,在他们之中,有的个性特强:即令我细心改其作品,也不见得完全接受。比如你所指责的“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文明即梅毒〕的怪论，我一再力主删去。无如该作者拒绝接受^[1]。这叫我有什么办法？结果外面的人骂我，说我教出这样的门人。台中某大学教授夫人因其夫被骂，特地跑到台北来大兴问罪之师，要打该作者的耳光，并且责问：“你为什么跟着殷海光走？”天哪！殷海光固然学问欠佳，何致于唱那些奇说？真是“哑吧吃黄连，有苦无处诉”也。

3

你对于我托你见 A. Wright 而你未启齿，这种处置方式和态度，在基本上是 quite proper〔十分适当〕的。莱特教授曾有信来，似乎很客气，而且他寄给我的东西多于我所要求的。我最近想再写信给他夫妇俩，探讨一些问题。你说：“此人甚傲慢”，我不知道这话所指的实际情形是些什么。就我所知，年来西方世界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问题，在许多方面超过中国人远甚。说句直话，大多数在美而又吃中国历史饭的中国人，至少在理解问题上，在处理材料上，是已经落人之后了。拿莱特教授做例子吧！他写的东西就非常棒，北方口语叫“Ber bon”。我很钦佩他。他寄给我的一篇作品“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文明研究〉，其中所表现的识度之深宏决非胡适可比。至于才学次于胡适的徒子徒孙们，则更无论矣！目前他们比较吃亏一点的，只是中文较差，而且体验(erleben)不足。如果他们自觉到这些缺点，而且又意识到自己已有的成绩高于中国人，把这些横梗于胸，以之临中国留美穷小子们，觉得你们“只不过多认得几个难学的中国字，其实关于中国的东西你们并不知道多少”，那就也许产生一点 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了。只有希望像你们这样的新人物出来，既懂中国东西，又慢行为科学，建立新史学，这样才能叫人看得起。是吗？

来信所谈学问，我完全同意。

4

这个暑假被人赠送咖啡四罐,洋书三十四本。对我而言,这真是破天荒的事!在这些书中,有些是学生如罗业宏之流者所送。其中有一本叫做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中国对西方的回应》。这本书,在某方面,对我所研究的论题,颇有帮助。可惜接在这本书后面的尚有一 *Research Guide* for 它。我想请你替我买一本:愈早愈好,而且因为怕失落,所以最好挂号寄。此外,请你另外又替我买几本别的书。书到后,连同前次五元一起,我就把书款送到府上,好藉此到府上去奉看一次,像前次一样。麻烦你。今年托你的事,到此为止。关于以后朋友赠书的事,我已和李楣商量,实行“一人一年一书”制度。这就是说,大家要送书给我,我当然感谢。不过,有时所赠的书,并不切合我的需要。为顾及大家的财力和我的需要,由我提出书名,一位送我一册,在一年以内不再提出。如果你认为这个办法合理,那末一九六三年我向你提出一次。

5

又〔马〕宏样久无来信,不知他现在何处,近况怎样?时在念中。他跟你有联络吗?

又是写了许多。咱们话说不完的,就此搁笔,以后再谈吧!

祝你
进 步

海光
十月十二日

注 解

[1] 指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星》第五十二期(台北,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编者

·6·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毓生：

十月八日的信收到。

※ ※ ※

魏思兰小姐来舍三次。她是一个好人。虽然并不深刻，我倒乐于接待她。她也约我到外面去吃过一次饭。第四次我函约她来舍吃咖啡，久久未得回信。正在奇怪之际，我的信遭退回。上面批着“该人早已回国”。本来她告诉我要住到十二月才回去；她又说好八月底要来看我，借一本书给我看的。忽然不辞面别，无踪无影，真使人摸不着头脑。未知她已否回美，已否与你见面。

※ ※ ※

魏思兰带来你的“Hannah Arendt”收到，谢谢。她的学问是颇佳的，可惜的确有点 under the German spell〔受德意志魔力影响〕。你写的有关 Locke 和 Rousseau 的两篇作品，以前者为佳。看来你对 Rousseau 的攻读和见解似乎不及对 Locke 的。

※ ※ ※

你的 Ph. D.〔博士学位〕资格考试顺利通过，自是一件可贺可喜的事。从此可以放手做论文。如果你的论题是“西方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那末便是一个极有意义的题目，而且与我所做的有相同之处。你们教授真是会出题目。不过，在那六道题目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关于 Max Weber 的。我这人，说来说去，还是 theoretical orientation〔理论取向〕较强。是吗？

※ ※ ※

我还不十分清楚你为什么那样大骂 × × × Hsu。此人好卖野人头，做电影广告。你封他一个“comprador scholar”〔买办学者〕，可

谓妙极。我看现正在哈佛就读的某君正在这条路上发展。是吗？不过, anyway[无论怎样], F. Hsu 多少还开始做些 field work[实地考察]什么的。比钱穆那些 ethnocentric[我族中心主义]的幼稚宣传家接近科学多了。至于钱穆以下的那些纸上空吹文化的玄学客,更不足道了。高下之分,原是相对的啊!

※ ※ ※

上次台北大风大雨,灾情颇重。我家因地势较高,就这样糊里糊涂过去了,未受大害。我们知道三重水势甚大,你家一定不得了。但是,根本失去了联络。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家搬到哪个乡下去了。我也无从获悉你妹妹的情况,以及她留学的事情。下次来信,请你把你家的详细地址告诉我。我想跟你妹联络一下子。

※ ※ ※

现在寄来我写的 Notes[笔记]。希望得到你的批评,切切实实的批评。因为,于史学一道,无论怎样,我还是一个初手。为了做试验,我把这篇小东西给此间弄历史的人士看,反应是什么呢?只有“茫茫然”三字可以形容。最糟糕的是,有学历史的人,口中也用“conceptual scheme”[概念编序]这样的名词,可是,一谈到它的应用则也是“茫茫然”。哎!这样搞学问怎么行?

※ ※ ※

前些时碰到许倬云。他说,有人托你打听芝大的“social committee”[社会委员会](?), (大概是“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社会思想研究系])的情形,久久未得你回音。希望你早日给他一个答复。

※ ※ ※

来信没有提到已否买来 F. Hsu[许烺光,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文化人类学家]那本书给我。如果没有的话,请快停止,改买下列

一书。你赠我或我把书费给你家都可,都不是重要的事。重要的事是在不太迟的时间之内请把书寄来。

祝你

进步,新年快乐

海光

十一月二十二日

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1956〔农民社会及文化〕

·7·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

毓生:

1

我要买的书,开列在后面。

2

为海耶克先生出专集事,我最高兴,决全力推动。我对彼书 *The Value of Freedom*《自由的价值》最有兴趣,亦较有把握,拟写五万字。夏〔道平,台北政治大学教授〕先生写他的经济思想。你至少写二万字来,集成十二万字。

3

祖锦与秀贤曾来一次,适我外出。我现在太忙。拟再过二个半月请彼二人来我家吃饭。

《旅人随记》有存书否不知,待找。

4

两个半月后,我再写一长信给你。近日思如泉涌,快把书买来。 祝你

进 步

海光

二月十五日

- 1) Arthur Seldon, *Agenda for A Free Society*, London, Hutchinson & Co.《自由社会论文集》
- 2) J. N. Findley, *Language, Mind and Value*, Allen & Unwin《语言、心灵和价值》
- 3) *History and Theory*, Mouton & Co, The Hague, 请订一年〔《历史及理论》学报〕

·8·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六日〕

毓生：

1

来信,芝加哥的目录,都收到了。两本书今天刚从英国寄到。他们对我都颇有用。真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

2

你提到若干留美学人之糟,实在使人伤心。老一辈的人中,除赵元任等数位很要得以外,其余的简直没有脑了。我曾碰到过一二位教哲学的,腐气逼人,闭塞不堪。其对美国哲学情况之不明瞭,更甚于我这支“井底蛙”。至于搞“汉学”的通人尤少。劳干的老底子根本就是他在北平那种气氛之中无意染上的唯物论,至今犹时时浮现而不自觉。且固执自是,从不知接受改正。你说的另一位连大脑都没有,真懒得谈了。不过,令人奇怪不解的是:为什么要让这些废物到美国去糟蹋金钱?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来培植有希望的青年?中国这种文化传统真够奇怪,一个人的思想生来是怎样便一辈子是怎样,而且不能改,改了就认为不忠。年青一辈之在美国的,除学理工的以外,学文法的好脚色似乎很

少。道路传闻,有些人在美国作小政客,播弄是非。这一套已经搞了半个世纪,老早搞穿了,还有什么可搞的?近年来我想来想去,际此时日,我们读书人除了“敦品励学”以外,实别无路可走啊!

3

某君骂我已经是第三次了。最近你所看到的那篇大作,这几天已在《民主评论》及一刊物上转载。我从前以为“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年来我修正了这项错误观念。现在的兵,经过十几年的整顿,军风纪比大陆时代实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兵爷们也像文人们拿笔杆杀人一样,拿起枪杆子杀伐,那还成什么世界啊!我的隐逸思想,自童年时代已经伏根。多少年来因大时代动荡的刺激,这个观念被压下去了。此间有枪的人,真是没有故意找我的麻烦,至少面子上勉强过得去——我知道有不少关于我的谣言,甚至传到美国,但谣言毕竟是谣言。哎!想不到几许文人这样跟我过不去。这加速并加强我找个生地方退隐的念头。人生几何,书也读不完,那有闲空和这些人士搭腔?当然,办理退却的事并不简单,急也急不来。以后再详谈。

4

替海耶克先生出集子的事,决全力进行。《文星》近来骂人的作风似乎改善了一些。我寄来近四期,是水路挂号的,希望你在六周以后可以收到。现在请你要海耶克先生的四寸半身最近的照片,以作封面。当然,先不必告诉他这事。事不宜迟,务须早办。照片请以妥当方式寄来,并避免折坏。

5

有一事我要预先跟你说明。海耶克先生光降,我自然高兴,但我不能亦不愿到外面去作任何应酬。如你所知,我是愈来愈不愿到外面去幌了,我尤其不愿和那些并非真正读书的人打交道。我

的这种心情,以及何以致此的历史,你是深知的。

以后再谈 祝你

进 步

海光

四月十六日

·9·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

毓生:

1

要说的话不知有多少。临提笔又壅塞住了。心情在平静里又有不平静。且等一个月以后再说。

2

接你六月廿三日来信,谓关于海耶克先生的文章——一篇是关于他的思想,一篇是关于他的生平的,六月底可以写好寄来。现在已至七月底仍未见寄来,不知你的近况怎样。

3

许久以前托你代订的 *History and Theory*, Mouton & Co., The Hague《历史及理论学报》,也还没有寄来。未知你已否去订。如未,请赶早代订。

4

翻译海耶克的专文也好,但我希望把原文一同寄来。

5

History and Theory 上有一篇文章 C. B. Joynt and N. Rescher, *The Problem of Uniqueness in History*《历史的独特性问题》。但我这儿查不出在哪一期。可否查出影印一份寄我?

6

你近来论文等工作的进度怎样？情绪可好？都在念中。

7

临书神驰，不尽欲言。暂停。并祝
近 好

海光

七月三十日

·10·

〔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

毓生学弟：

刚巧寄你一信的第二天，就收到这些。

1

你寄来的作品，译文，海耶克先生的文章影印，都收到了。

2

你的作品和译文，我收到时当即看了一下，“可恶”之声，脱口而出。盖因小的毛病太多，恐需花我三天修改，且需重抄。你应请我吃一顿好饭以补心血。

3

海耶克先生的二文，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别的且不说，即题目都现出他的 originality〔原创性〕，折服之至。吾恨不能从此人游。近来第二遍阅读他写的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自由的构成》，更觉其为学深厚渊博。彼之思想除把握着正统的英吉利 Liberalism〔自由主义〕以外，实兼有海洋和大陆学派二方面的长处；而融会贯通之力，实非一般美国佬可与比伦。

4

人在孤寂时最易 vulnerable〔受伤〕。你大概起先不知道那位中文先生之无聊(boring)。他在你孤寂时于你在潜意中需要他来

填空时 slip into your life〔滑进你的生命里〕。等到愈陷愈深,造成灾害,在意识中发现时,便需你挣扎一番,把他弹回去。老弟! 人常常是一个未设防的城市啊! 祝你

好

海光

八月四日

又信上托办的事情留意

·11·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

毓生学弟:

1

十月五号的来信早已收到了。这一个多月天天等待《海耶克专集》出版事告一段落就写信给你报告经过。可是,直到今天还没有眉目。不能再枯等了,所以我今天写这封信给你。

就我所经验到的而论,时至今日,subject to our command〔我们控制得来〕的事物似乎越来越少了。区区一点文字出版的事就是如此。可是,文章既已落入人手,似乎只好由人摆布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静候发落”。夏先生也因他的作品未能及时刊出而发闷。但是,你急他不急。奈何?

2

海耶克先生来台简直是 dominated by social activities〔天天酬酢〕。我当然不愿 engage〔插足〕到这种场合里去。因为,显然得很,这种场合是无法谈学问的。他作过几次公开讲演。在台大的那一次,我去听过。在讲演之初,他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到后来讲兴奋了,accent〔土音〕纷纷夺口而出,就不分英语和德语,便难懂了。

3

在他快要离台之前,有一位热心的先生硬要我们作一次机会难得的私人晤谈,于是我们在圆山上有一次谈论。在台湾,能和他谈经济学的可以找出三五人。但是,能同他谈 Philosophy〔哲学〕和 social thought〔社会思想〕的人就少之又少了。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与我谈得颇为对劲,他说一回西德去就要把他的作品寄给我看。结果,不等他回去,在他离台的前夜就寄来他的近作“The Results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并且附言道:“I find that I have with me a copy of this essay which may interest you. The other I will send from Freiburg. It was a pleasure to meet you.”〔我发现带了这篇文章在身,你对它可能感到兴趣。其他的将在弗莱堡寄给你。能与你一聚,真是乐事。〕他说要赠作品给我看时,马上掏出卡片,要我写上通信地址。我起先以为只是一个礼貌,想不到竟是这么认真。若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与我只有一面之缘,而且我这个人是这样 unsociable〔不懂社交〕,生生硬硬的,除学问兼骂人以外别的一概不谈,老早把我忘光了哩!海耶克这种 type〔类型〕的人对我有“感召力”啊!

他的照片看起来相当冷峻,但本人是很热和的。我每次提及“liberty”〔自由〕一词,他的欢愉之情,简直溢于颜表。我之 liberty-searching〔追求自由〕,是不难了解的。而他这样热爱自由,热爱到在西方人中也是少见的,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个案。我和他讨论时,除了学识上的滔滔不绝以外,所表现的爱智的真诚,在中国文化分子里我只见于本师金〔岳霖〕先生等少数学人。这实在令人感动。我向他问起你,他对你印象颇深。

4

现在寄来有关海耶克的思想之近作二篇。希望你看后给我一

些论评。地球虽广,人口虽众,读书的人虽然也不少,可是茫茫人海,尤其在这个岛上,我的知己竟是这样的少。你的论评和意见,我总是尊重的。

5

History and Theory《历史与理论学报》中的一篇文字的 xerox〔影印本〕已经收到,可是 *History and Theory* 迄未收到。我看如果不妨事的话,就算了,不必再订购了,以免麻烦你。你在台时曾告诉我,有一位先生对于西方 intellectual history〔思想史〕的研究超过了 Randall。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如不相当的通晓西方 intellectual history,就搞不好中国的 intellectual history。如果你可能的话,就请你改买那位高明先生所著 *intellectual history* 赠我,以妥当的方式寄来。好吗?

6

真是纸短言长,书不尽意,亦不能尽意。但愿有日促膝谈心。

祝你

进步,快乐

海光

十一月十日

·12·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

毓生学弟:

1

关于我的文章里的“未经检查的 ideas〔看法〕”,即令不是没有,至少 key ideas〔关键性看法〕之“未经检查的”是没有的。可能是我的 taken for granted〔以为理所当然〕的 ideas 与你的不同而已。

2

遍查全文,迄未发现我有极权国不能发展“自然科学”之说。也许你太忙了,未看上下文。

3

我觉得你过于破费。我的意思是该刊既然如此难订,买一本书就算了。

4

兹寄 Abby 的小照一张。圣诞卡收到,谢谢。

余事再谈,即祝

新年进步

海光

一月一日

·13·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张灏看后请即妥交

毓生:

1

四月二十六日的信早已收到。在这之前,祖锦去美,许久许久不知你们的音信,也不悉你们的婚事怎样,时在悬念之中。我时常对内人说:“这两个人怎么搞的?”我有几次想到深坑去问讯,但因想到路费且因那时太忙,终于作罢。现在好了,知道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我放下了心。毓生这下子也不寂寞了。如果祖锦能像我这样了解欣赏毓生的为人和品性,那末我想她一定深深爱他,并帮助他成就学问和事业的。我们为你们祝福。

2

你说专做五四时期的 Iconoclasm〔打倒偶像主义〕和 Scientism〔科学至上论〕,我有点着急。就 substantial〔基本的〕的材料来说,

这方面的东西实在少：只有吴义陵，陈仲甫，及胡适之等的一部分言论。这怎够成一篇大论文？可是，如要“screen”〔筛出〕二者在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却又非常之费力。比如说，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 monism〔一元论〕及 ideologically inclined〔倾向意理〕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了。中国人早期讲经济学的不是讲成各种各色的“主义”么？这对于中国近几十年的大变动起着多么深远的作用？至于 Iconoclasm 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 cultism〔文化至上论〕之一大 reaction〔反动〕。而在 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 ambivalent character〔对极性格〕。于是，我们又得从 characterology〔性格研究〕着手。条条蛇咬人！弟其注意及否？

3

恐怕邮费增加，暂时打住。别的事见于张灏信中。以后可慢慢谈。 祝你和祖锦
快乐

海光

六月四日

·14·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毓生和祖锦：

你们于十月卅日的来函已经收到。最近的信和支票也一起收到。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只是，我知道你们是负担不轻的人。

许久就想写信给你们。可是，一提起笔，笔是那么沉重，就废然而止了。千头万绪，真不知从哪儿说起。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

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无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我们的大门现在更是“门虽设而常关”了。寂寞在磨练着我们。你们的来信和帮助,表示这个地球上尚有人了解并关切着我们。寒冷中吹来一阵温暖。

别的情形,只有留待别的机会去谈吧! 祝
你们二位新年快乐

海光

十二月一日,一九六六年

·15·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毓生学弟:

1

今天院内阳光普照。我手植的杜鹃、石榴、九重葛、紫茉莉正在盛开。大地充满了春的气息。上帝也有叫人好过的辰光。我刚才在我自己修筑的小水泥上慢步归来,全心全意写这信给你们。

2

我看见祖锦,仿佛是昨天的事,现在忽然做起妈妈来,好快!我记得毓生家里的人因为毓生毕业了好几年找不到女朋友,发了急,说毓生“没有行为能力”。这下儿怎样? 顿雪“国耻”了吧!

一副形象顿时浮现在我眼前。记得你们订婚时,你父亲带病参加。他老人家感动得涕泪纵横。这样真挚的情感,好像只属于那一辈人了。那一辈人,生活在世代承袭的传统里。他们一

心一意指望儿子,尤其是长子,完婚,抱孙子。现在,他们真的抱孙子了。他们该是多么喜悦啊!

我们当然也喜悦。不过,我们的喜悦和他们的有些不同。你们看着自己的生命在摇篮里发酵,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你们每天看着小脸长圆,这里没有陈旧,也没有厌倦。无穷无尽的希望,从那小床里伸展出来,向未来的世界澈照。有而且只有在这里我们才体验到生命的奇妙。这奇妙成了你们的焦点。

记得有便时寄一张小宝贝的照片给我们欣赏欣赏,“全家福”也好。天涯咫尺。吓!这儿的人愈多愈寂寞!

3

托带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那是一个阴雨的冷天,顿时室内充满了温暖。Hempel先生这本书,我早已知道。年来我就盘算怎样有一本才好。只因价昂,所以迄未实现。前几天接到了你的赠本,真是惊喜交集。对我而言,这下正是“投其所好”。我不禁抱起书,在脸上连亲了几下。茫茫人海,有什么比真情和真理更值得我们追求的?际此时日,知识爆炸,印刷机昼夜疯狂转动;仅英语世界,年出新书以万计;有几人知道这本书在我心目中的分量?

这本书可说是 Hempel 先生三十多年功力的结晶。其中有些文章我已读过,正好可以温习。而“The Logic of Functional Analysis”〈函数分析的逻辑〉一篇巨制,我心仪已久,苦于处此井中,无缘得睹。现在好了,我可以畅读了。这本书现置案头,每天读一点。且读且思,我惊叹西方人的认知能力的确已经达到这一地步。我们应该怎样急起直追才能探到世界学术和思想的高峰!

4

我“易地谋生”的事,似乎可能有点开展。究竟怎样,当然还得看以后的情形。我真希望我得到一个机会,把我的时间用到“运用

现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及知识来了解中国近百年来思想的变动”这一件事上。但愿能如愿以偿啊！

再谈 谨祝

你和祖锦好

小宝贝好

海光

三月二十六日

又赠近照一张。此照最能代表我的精神和心灵。存念。

·16·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

乐义、园玉阅毕请转

毓生：

我总有好几十天，没有写信给你们了。原因之一，是我现在真正能伏案工作的时间每天并不多。据说蟒蛇吃了青蛙、兔子或鸡类以后，就要躺在草丛消化。我现在正是这种光景。婶母做饭本来就很高明。目前为了调养我的病体，做的东西更是高明。我病后变得更贪嘴。什么好口味儿的东西概不拒绝。吃了以后，得马上睡在沙发上消化。一睡下来，往往立刻进入梦乡。一进入梦乡就是一两个钟头。这样的一条懒蛇，怎会有多的时间做正事？

这样懒过了一个多月，在我一生是很少有的事。现在，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了一些，我必须重理学业。同时，我也得为来美的事作准备。所以，作懒蛇的事势须逐渐缩小了。

首先，我觉得我必须把我底病前病中里的种种向关心我的亲友作一个报告。我认为，这是作人的义务。

大概是三月初，我的吃欲就不振。当时我的了解是，像我这样“多愁善感”的文人，“愤世嫉俗”的思想者，弄得胃也跟着“闹情

绪”，实在不足为怪，吃吃胃药，调养调养，就会好的。三月十日，我同学生一起到中南部去旅行。这是十七年来破题儿第一遭。在旅行过程中，心情相当不错，只是愈来愈不对劲，食欲越来越低。回家以后就一直衰弱下去。我们有位医生亲戚，她劝我去医院检查一下，我一听到“医院”，“检查”这些字眼，头都大了。我儿时为了治脚痛，在医院住了一年多，医生在我心目中简直变成阎罗王。所以，我不睬她的话。不睬尽管不睬，我愈来愈不能吃，体重锐减，每天的工作逐渐停摆了，到了四月底，在几位学生的严厉迫促之下，我终于只有到医院“检查”了。

起初进的一家医院是新开设的宏恩医院。这家医院的建筑新式，设备现代化，我们市民觉得不错。住进以后，就是进行各种检查，X光当然是少不了的。X光检查以后，大家闷声不响。但是，我一看大家的脸色就明白了。我是罗素之徒。我别的没有学到，“不自欺”是十足学到了。如果一个弄哲学的人在平时神智清明，勇于面对现实，可是一旦碰到自己生死存亡的关头就不敢正视他最不愿想到的情况，那末他的所谓“哲学”不过纸上谈兵而已。这种关头，是考验人的关头。我在这个关头，绝未含糊，更没有编故事来欺骗自己。我当时就向围在床头的青年们说：“检查的结果总是有癌啊！”经我这一说破，沉闷的空气立即就打破了。他们看见我这样无畏地面对死神的威胁，便告诉我，医生说“百分之八十五是癌”。我的分析就来了：“如果是癌，并不会因忌讳而变得没有。一般之所以忌讳，系因病人心灵脆弱，一听到‘有癌’，等于宣告死刑，更难支持，所以相戒不谈。……但是，我岂是这种人，你们何必瞒着我？”

既然得了这种“不治之症”，犹疑是多余的。我想的问题是怎么样办理人生的结束，而且办理得心安一点。

不知是什么原因,那时的我,并没有恐惧。我整个的心情,被愤怒和绝望所支配。愤怒的是天道何其不公。无论是就为学的热忱说,就对理想的追求说,甚至就年岁说,总还轮不到我就此撒手人间。何况我觉得我的工作,刚刚开始哩! 绝望的是,一个人的生命何其渺小,要跟死神抗争,胜利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当我被这种心情占有时,对人间也产生一种“旅店”的感觉。探病的人送来一束一束的鲜花,多美丽! 我想我看不久了。我的内人来探望和照料我时,我的内心涌出难以名状的难过。我想念跟她结婚十几年,她简直没有幸福可言,简直太对不起她了。她的丈夫是这样的怪。一切行为和观念,必须通过他的思考,他才肯接受。他是那样落落寡欢。为着避免和不愿见面的人打招呼甚至点一个头,他不坐校车,宁可“安步当车”的走到学校里。上起课来总不忘记批评东,指摘西。好像一个人和整个时代为敌。结果,十几年来,他所给她的生活,是孤立、危险和贫困。我们有时连买菜的钱都发生困难。但是,她从无半句怨言。我想到这里,就背着流泪。我的独生女儿来看我时,看见她的爸爸还是很好的样子。她被新式的医院所吸引,没有意识到可能严重的事态在后头,一进来就跳跳蹦蹦。我想着她快成没有父亲的孩子了。她还很小,怎么办?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背着她伤心流泪。我开始想到,我的内人应该设尽所有的方法把她带到外国,把她教育成人,我才心安一点。我预备写信给××,××和××,就 Abby 的事向他们托孤。这三个人是我认为最可信赖的人。他们会尽力帮助我的内人把 Abby 抚大的。

我住在宏恩医院,等待院方的处断。就在这个时候,医院业务上少有的事端发生了。我在医学院的学生来看我,问我为什么要住这家医院而不进台湾大学医院。我告诉他们,我自己毫无医学常识,因此我对于任何医院都没有定见。他们说这家医院“根本不

行”，要我连夜搬出，刻不容缓。年轻人火性大，他们在我的病房外，就我转院的问题，在我的病房门外和宏恩医院的主治医师辩论起来。医学院的学生为了他们老师转院的问题，跟别家医院的人实行辩论，这似乎是一件新鲜的事儿。宏恩医院的医师拗不过，于是我就搬到台湾大学的医院了。

到了台湾大学医院以后，我不知怎的，心情为之一变，对于自己的信心突然增加：我觉得我不会死。说也奇怪，婶母也一扫满脸的阴霾忧惧之色，满脸现出喜悦之色和信心。住进台大这个病房以后，来照顾我的护士小姐，竟是一个朋友的女儿，我们看着她长大的。这次竟在病房相见，实在是巧！我一看到她，立即以开玩笑的口气说：“小琅！我得了胃癌，不久就要再见了！”她听到这话，呵呵一笑，马上说：“不会！不会！不久就会好的！”真是这样了！

我这次得了这种“心腹之患”，一开头就抱定“一人有祸一人当”的主意，不愿意张扬。我的考虑是：如果我的病不治，那末告诉了大家，徒滋惊扰，使大家着急，但于事无补。然而，我的一些学生则很惊惶。他们四处传播，结果弄得香港、美国，甚至远至加拿大，都有人知道。就台湾内部来说，有的人从中南部赶来看视。有学生从福隆海滨赶来，只要看老师一眼。有摆地摊卖书的人来探望。有些来探望的人和我根本一面不相识。这些情形，颇出我意外。学生们则日以继夜守候。这种种温暖和关切，实在使我感动，不知怎样报答才好。

内外科的医师会商结果，决定开刀。在这之前，作过种种检查。其中一种叫做“照胃镜”。这是美国学来的新花样。其法是用一节特殊装置的粗橡皮仪器伸入胃中，在胃中翻七捣八，胃里任何一点毛病都逃不出这只科学眼睛。喉头及胃部的麻烦过后，人大呕大吐，浑身出冷汗，简直不能支持。这是我整个医疗过程中最受

罪的一次,也是我唯一失去自我控制力的一次。现在回味起来,都觉得不愉快。希望有生之年,再不用吃进这种洋东西了。

五月一日上午九点钟,我被手车运进手术室。我躺在手术台上,面对那么多仪器和灯光。我的心情,不知怎的,是那样宁静。我努力检查自己的潜意识界,看看有否隐藏的恐惧感。实实在在,我一点也找不出。护士小姐对我说:“请你不要怕。”听到这话,我心里想:“如果我真的害怕,那末这话提醒了我。如果我不害怕,那末这话岂不是白说?”我就平静地告诉她:“我是不会害怕的。”一会儿,主持麻醉的主任医师,内科专家,开刀的医师等都来了。主持麻醉的主任医师对我说:“殷先生,现在有这么多的重要人物围绕着您。”我说:“真是谢谢,我感到光荣。”这时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上麻药。可是,我喉管里有一口痰,不上不下的。我就对主持麻醉的主任医师说:“李先生!我麻醉是麻醉不死的。但是,我喉管里现在有一口痰,当着我昏过去的时候,它可能把我的气管堵住,那不是可能也闷死我?”他听到我这一番言论,便从白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像蚯蚓的东西,拿在手里一晃,对我说:“如果发生那种情形,我就用这个东西来对付。”说时脸上现出一副东北人粗豪的神情。他随即用一个大黑鼻子(想是橡皮做的)在我的鼻子上一按,命令我“行深呼吸”。我呼吸了三五次有点香气的什么,便完全失去了知觉。一觉醒来,什么都做完了,伤口也缝好了。这一切都在二小时以内完成,可是在我的感觉上只不过有两秒钟。医师说,麻醉效力过去以后,伤口会痛的。可是,奇怪得很,我的伤口就从来没有痛过。我实在想不出是由于什么原因。动过手术以后,医师用一根橡皮管从鼻孔塞入胃里面抽胃液,一连三天加四个早晨,一动也不能动。稍微一动就引起呕吐。实在是“不自由”之至,到了第四个早晨才被拿掉,我简直是“如释重负”。这时清爽极了!

以后的事就是恢复。五月十五日上午从台大医院搬回家。一切都很顺利。病后显著的不同,就是变得好吃;再就是思想方面有些调整,对人对事的看法不像从前那么峻急。这个人问世不是一个逻辑系统。(下略)

海光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

·17·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毓生、祖锦:

1

又有许久未曾通信了。我不禁兴隔世之感!

本来老早就想写信给你们的,无奈提起笔来觉得笔太重,写不下去。但是,老是不写的话,内心一种难以名状的压力日渐增加,像夏天闷雨似的,到现在非动手不可了。

大概有些所谓“创作”,就是这样闷出来的。

2

你们的近况想来都好吧!有否准备过圣诞节?这种年头,多一点欢乐总是好的。

毓生写论文,谅必大有进展。我希望你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写一点出来,留给后世看看。于是,“revitalization”〔重新激励〕最要紧。

你们的小宝贝一定更长大了,动作的花样更多了。前些时毓生来信,提到祖锦照料孩子很累。这使我联想到故乡农家年青妇女带孩子,一带三四个是常事。那不知是怎样弄的?我想当然不够周到。你们养孩子,大概就像养金丝鸟。

我内人说,小胖现在不大会走路,所以目前是在他的“最佳状

态”。不久的将来,那双小脚会跑时,伤脑筋的事才会层出不穷哩!

3

哈燕社主任斐理哲(John Pelzel)作亚洲之旅,台湾是他的一站。十一月五日,他来看我,进门便谈学问,没有闲话,更没有一般美国人惯常出口的对人廉价恭维之词。我觉得颇为对劲。

他对我的近况颇为关心。他和我当面协定,在我滞台期间,哈燕社将 funds[研究费]寄台,由此间一机构交给我。我本来极力避免同这里的任何机构发生关系的。可是,事势到此地步,只得将就一点。

大概 funds 不久会来的。

4

无论身在何处,工作是不能停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写作,酝酿了许久,现在非动笔不可了。请你介绍论述西方 Liberalism[自由主义]的著作给我。要精,不要多,三五部力作就行(请写明作者,出版家)。我是要把西方的 Liberalism 作为一个 frame of reference[参考架构],来对照中国近代的或现代的“Liberalism”。这样比较易于进行透视的分析。

附带有个要求。我有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但是,我有的这个版本字小,看起来眼睛吃力;边窄,无法批注。这样伟大的史著,我觉得至少应该恭恭敬敬的细读一遍。何况,那里面的教训是太多了啊!请毓生介绍较佳的版本(说明出版家)。

不管我是否会成众矢之的,我依然认为读书造学问是少数知识贵族的事。我极不赞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知识分子“大量生产”的趋势。这是造乱!依此,我固然很穷,我认为在原则上书必须贵而且装璜高雅。这样方显知识的尊严。这种想法真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但是,时宜是什么?我根本看不起时宜!所以,

就书而论,在原则上我不喜 paperback〔平装本〕。但是,我也并不是毫无条件的排斥 paperback。比如说,Free Press 的 paperback 字大,边宽,且价廉嘉惠寒士,因此可以将就。

此外,如果出了奇书,你认为值得我精读的,也请一并介绍。

你们就是我的天窗。

5

谈到读书,真是“做到老,学不了”。个中奥妙,非千言万语所能尽。

首先,我们得认清读书的价值。人类有食色等生物性的欲求必需满足。这是未可厚非的。科学技术在这些方面对人类已经帮了许多忙;但是,在有些地方实在帮忙过火,发生反作用。电视就是邪魔的东西。Radio〔收音机〕更是烦躁之源。没有高深灵魂的人才亲爱这些玩意。书,则是人类最高级的心灵满足的发明。感谢上苍,我们居然是读书人,并且真爱读书,并且说到最后又是为读书而读书,真是有幸!

我一向读书,因长期受罗素及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偏重于读通则性质的书。例如,毓生赠我的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科学解释的诸方面》就是我最看重的著作之一。我几乎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展开读一阵。这类的书里面,充满了 principles, laws, universals, functions, deductions, inductions, theories〔原理、定律、共相、函数、演绎、归纳、通论〕,就是藏不住 particulars, novelty, uniqueness〔殊相、奇异性、独特性〕。久而久之,于不经意之间,我认为只有这类才算得是知识,其他不具此格的一概不算,于是轻而忽之。记得好几年前,毓生说文学著作也很重要,不接触的话就是一个损失。这话有时在我心中浮现。我近来有机会接近一点文学著作,益感毓生所说严重。第一流的文学著作固然

不是纯知识,但刺透人生特殊角落之深,启发想像力之激动作用,远非普遍性的知识所能及。这一比较的观察,使我了悟,我们既要把握住 generality〔共性〕又要抓住 particularity〔殊性〕,才算是得到丰富的知识。

6

我近来身体还算好,只可惜“独学而无友”。这里有二三学生可谈,但学力究竟差了一段,因此谈起来不够劲,也使我吃力。四十岁以上习文法科的,几乎大脑退化到跟周口店人的差不多,简直无可谈者。何以至此,说来伤惨!我除了读书、写作以外,就是在院内小水泥径上来回踱步。毓生,祖锦!你们二位可以想像这一时代一个孤独的心灵的光景吧!

愿我们终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谨祝

新年快乐

海光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18·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毓生学弟:

1

你许久以前写给我的那封十页长信,早已收到了。信中涉及若干基本问题,而且你所表现的思想是那么丰茂。我计画着好好复你一信,讨论那些问题。

2

你寄来的复印品,海耶克先生的新著,David Grene 的书,和 E. Shils 的作品,都妥收了。这些出版品,对我有增加思想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之帮助。真是谢谢。

3

Michael Polanyi 先生的 *The Logic of Liberty*《自由的逻辑》早已读过。不久之前,一位书店老板赠我一本他著的 *Personal Knowledge*《个人的知识》。我才读不多页,便被他的精深所吸引。我几乎失声叫:“我失学了啊!无论是思想和学问都差得太多了!”Mont Pelerin Society 的 Popper, Hayek, Polanyi 三位先生,在我心目中,像三颗星,临照在我头上。这三位先生才是这混乱时代人类自由的保卫者和指南针。所以,当我翻到 David Grene 书后面,发现 Michael Polanyi 先生尚有一书 *Science, Faith and Society*《科学、信仰和社会》的时候,我几乎喜极而狂。这一股求知的冲动,无论怎样也难以平静下来,逼者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你尽早买此书一册赠我。另外,我看见有 Marjorie Grene, *Introduction to Existentialism*《存在主义导论》,我也希望你一并赠我一册。我为什么也急于要读这本书?原来老早有人说我有颇深的存在主义的时代感受,而且我的思想构成中有这一面。我对于这一点并不太自觉。你知道,我认为从香港到台湾,搞思想的人甚少不是胡搞的。我无法信任那些人。美国的出版界拉拉杂杂,良莠不齐,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供我作选择。我想芝加哥大学出版的 Phoenix Books〔凤凰丛书〕是可信赖的。所以,为了知道一点存在主义也请你购一本 M. Grene 的书给我。

4

我知道你极其看重我的这份“爱智”热忱。你更不是吝啬的人。不过,当我提出上列要求时,总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打搅你太多了。不过,除此以外,尚有一段“隐情”。今年哈燕社赠我一千元,我拿到手订了许多书。我内人是世上少有的贤慧女性。我平时买书用钱,她从不过问。这次开口了。言下之意,我们这样穷,

怎么不稍微注意一下家里来日的生计问题。我为了尊重她的意思,所以即令是上述 paperbacks〔平装书〕,也不好意思去订。

5

你的论文进行得怎样了? 在念。

肇敦满周岁了吧! 可否寄个照片来?

许久没有去看你父母二位老人家了。你家原来的住宅门前两只大狼狗,基于去年三月的经验,使访客不大轻松。我又把通信地址丢了。希望你写信要你弟弟带我去看一次。他们是标准的中国人啊! 再叙 谨祝

你和祖锦都好

海光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19·

〔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

毓生学弟:

1

现在是五月一日下午三点。我选定这个时候开始给你写这封信,当然也就是给看得到这信的人写。去年此日此时,我从手术室出来不久,神智尚未恢复,一动也不能动,一点东西也不能吃。今年此日此时,我能认真的思考,能全心全意的写信。我真感谢上苍,也感谢关切和帮助我的人。

2

你的那封长信,我仔细看了两遍。那封信是你的力学乘灵感的产品。它给我的思与想不少的冲击。我本来打算跟你谈谈那信中的问题;可是,等到动手时,我发现你信中有几个重要的论题,而且谈起来颇费笔墨。我想,要把这些论题谈出一点眉目,一封信是

不够的,大概需写二三封信。现在,在这封信里,我预备先把易于表达明白的几点说出,然后再谈一个重大的问题。

3

首先,我所要打开肺腑说的,是我不想掩饰我内心对人类今后自由问题的忧虑。这主要的并非我个人的遭际使然。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岁月,个人的幸与不幸,又算得了什么?我真正关心的是整个人类前途自由的明暗。人本主义(humanism)及科学本是近代西方互相成长的一对双生子。可是,西方文明发展到了现代,科学通过技术同经济的要求,几乎完全吞灭了人本主义。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看到“文艺复兴人”了。我们只看见大批“组织人”,“工业人”,“经济人”,纷纷出笼。他们不是被归队于公司,就是被束缚于工厂。我们偶尔瞥见个把海耶克,彳亍在西欧的街头。大部分人的活动及个性逐渐被科学技术织成的组织之网缠住。大学也企业化,工商管理化,教师成为雇员。地球的面积为一常数,人口则不断增殖。自由所需的物理相度(physical dimension)是“广漠之野”。一只加拿大狂欢鹤需有一百六十亩才能生存愉快。现代都市人住鸽子笼,谈什么自由!

古代的“naive freedom”〔朴素的自由〕已成尾声。在经济集中化,人口不断膨胀,及组织技术的威胁日增的情况之下,我所梦想的“elaborated freedom”〔精心制成的自由〕如何实现?

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谈到这儿为止,希望将来能同你从长讨论。

你提到的 Michael Polanyi 先生,我认为堪称学识“精深博大”。我稍一接触到他的思想,便觉得他是自由人中的一颗钻石。但是,他的影响力实在不及应有之大。就台岛而论,知道他的人真是少得可怜。你说“可惜他的著作似乎没有得到应有之注意。”之所以

如此,因素很多。我现在只说几点。第一,他的思想形态跟工业社会不合,去所谓“大众文化”尤远。所谓“大众文化”乃蚂蚁文化,混帐已极!第二,他的一些 claims〔要求〕,跟战后的焦虑人群之情绪走向背道而驰。这样的时代,需要廉价的安慰。第三,他的著作浓度太大,不像罗素的那样 lucid〔明晰〕。比如,他的 *Personal Knowledge*《个人的知识》一书,有时一句话要想许久才能了解。现代人大都忙着赚钱,有空就看妖魔鬼怪现形的电视,耳朵也给 Radio〔收音机〕随时统治,脑子里充满了数字,哪有耐心读他那么精深的书?

你说 S. N. Eisenstadt 先生“到哈佛时,Parsons, R. N. Bellah 诸教授待之几若当代继 Max Weber 地位的人。”我记得两年前我刚一接触他的大著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s*《帝国政治系统论》时,对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说:“Oh, Eisenstadt is just great! I should think that he is a new Max Weber.”〔噢!艾森斯塔德就是伟大嘛!我认为他是新的马克斯·韦伯。〕我不习社会学,而且是一个独学无友并孤陋寡闻的人。我对 Eisenstadt 的判断,主要是凭多年蕴积起来的一点实在的识别力。想不到我的这点识别力所作判断跟 Parsons 这些专家不谋而合。这使我感到安慰,同时也增加一点为学的自信心。

有人说台湾的经济是“浅碟子经济”。这个 model〔模型〕用来描状胡适的学问,再恰当也没有了。从表面看来,胡博士的学问很博;可是,稍一究诘,真是浅得很。像这样的人,如何不像你所说的“终生崇拜这样的美国文明?”令人遗憾的,是,这类人物居然成了学术重镇,和新时代的领导者。你曾经告诉过我:“中国近几十年来,凡是发生大影响的人,无一不是糊涂虫。”这话常常在我心里荡漾。默念中国近几十年来,在知名人物里,除了严又陵及梁启超二位先生比较有些成熟的见识以外,都是青苹果。这些人物的名望

和地位及所事,无一与其知识与才能相比。试问一个工程师需要几年培养?一位物理学家需要几年才成型?一名真有思想的人要有多少时间的心智努力才成得了气候?这几十年来的实情则是,无论什么人,只要机会巧,打乱仗打胜了就可成神,鸡犬也跟着升天。甚至学界也是讲“混”。所以,一切都乱。我们不知何时才黄河清!

以上五月三日写完。我现在要理发去了。晚八时半

一觉醒来,今天就是五四了。我看手表,针指五点十分。记起毓生对五四人物所说的一些话。那些话非常中肯,也非常高明;不过,只能看作“criticism”[评论],而非对五四所作的“social, cultural, intellectual analysis”[社会、文化、思想的分析]。这一层,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跟你讨论。

多年来五四不是被 distorted[歪曲了],便是被 eclipsed[蒙蔽了]。真令人浩叹。

我住台湾将近二十年,几乎哪儿都没有去过。待会儿八点钟,我要同几个学生搭火车往新竹…佛学院一游,作为纪念此一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节日。What an irony[何等可笑!]

五四清晨六点钟记

昨天因要赶赴新竹的火车,早晨到台北车站。好久没有上街和到车站了,一接触这一带的气息,我立刻感觉到自己是个乡下人。台北车站里的售货部门,满是红红绿绿的杂志,各种各色廉价的糖果, popcorn[爆谷],塞满了视线,令人为之目眩,呼吸感到窒息。这就是飘洋过海而来的美国风?把人吹成幼童了!

昨天下午往游新竹附近的青草湖。湖水渺远,杨柳依依,荒烟蔓草,鱼跃鸥飞,野趣盎然。哎!羁台将近二十载,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由。自由和自然有什么关系呢?是否有一 naturalistic foun-

ation of liberalism[自由主义的大自然基础]? 自然的地面,一天一天的在消失中,怎样抓住? 我凝思。

以上五月一日晚九时记

4

我们还是回到本题。

史华兹(B. Schwartz)先生的“Fetish of the ‘Disciplines’”(教义的偶像)一文的命意未出历史学者和理论家们论争的 issues(问题)的范围。可是,该文中有些 expressions(句子)的“所指”及“所谓”不够 perspicuous[清楚],而且我又恐我的英文欠佳以致误解他的原意,于是读了三遍。关于该文,我可以提出两层的看法。第一层是关于“linguistic”(语言的)方面的;第二层是关于他所提出的问题。我先说前一层。

关于前一层,可说的如下:

- (1) “wisdom”[智慧]是说的什么 faculty[才能],我从他的 context[上下文]无法确定。
- (2) mechanical application of an isolated “disciplined”……,此词想来相当于中文“硬照什么之学死套公式”。但是,如有此事,只表示研究者个人的学力或心智不够,以及史华兹先生对于这类情形的耽心。但这既不构成客观的 logic[逻辑]问题又不构成客观的 methodology[方法学]问题。
- (3) “a build-in dynamic principle of its own”。这一 entry[条目],在此关联中 is too restrictive[很有局限性],因为他可能是别的什么。史先生之只提到这一 entry,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习于这一 entry 的思想模式。
- (4) “ultimate philosophic implication”[终极的哲学涵意]何意?

“ultimate”〔终极的〕何在？

- (5) “model”〔模式〕，“system”〔系统，体系〕，我怀疑史先生误解这些名词的正式意义。为了节省篇幅，我现在只提出“model”谈谈。

史华兹先生说：

A model, it be noted, is not an idea or theory even though it may employ ideas and theories generally derivative from others as its bricks.〔应该注意，虽然模式可以把别人的思想和理论当作自己的砖石来运用，但模式并非思想或理论。〕

这一说法颇为费解，实在令我不放心。在现代科学方法论或科学的哲学文献中，“model”是一个重要的“construct”〔建构〕。兹举常被引用的重要的说法在下面：

- (a) R. B. Braithwait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Chapter IV, Models for Scientific Theories, their use and misuse.〔《科学解释》第四章，科学理论模式的应用及误用〕这一章分析“model”的构造，用法及其与系统演算的关联。第92页说：

To think in terms of the model is therefore frequently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ory,……〔因此，用模式来运思常常是最方便的，关于理论结构的思考方式，……〕

- (b) May Brodbeck 常被引及的名作“Models, Meaning and Theories”〔模式、意义及理论〕中拿“Isomorphism”〔同质〕来界定“model”。

$M \sim M'$ Two theories whose laws have the same form are isomorphic or structure-ally similar to each other. If the laws of one theory have the same form as the laws of another theory, then

one may be said to be a model for the other. [两种理论,如其诸定律的形式相同,则彼此是同质的,或在结构上是相同的。如果某一理论的诸定律具有另一理论的诸定律的相同形式,则可以说该理论是另一理论的模式。]

又说:

The notion of "model" as isomorphism of laws is obviously symmetrical. However, when an area about which little is known, then the familiar area providing the form of the laws may be called a model for the new area. [有关“模式”是诸定律的同质的说法显然是对称的。但是,如果我们对该模式的某个范围所知不多的话,则提供诸定律形式的熟悉范围可以说是新范的模式。] (Gross, L. ed. p.379)

除了上面所引的以外,我们再看 E. Nagel,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Chapter 6, *The Cognitive Status of Theories*《科学的结构》第六章〈各种理论的认知况位〉Carl G.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s*, 12.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科学解释的诸方面] 6. *Models and Analogies in Scientific Explanation*. [科学解释的模式和类比]

上列都是有关“model”的标准说法,但都不是史华兹先生所说的。

关于第二层,即史华兹先生在该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关于这一层,就我的了解,他的主要命意如下:

- (1) 在 humanity [人文] 的研究上,各科的门户独立不适当,而且有其限制。因为,分割式的研究所得结果都是 one-sid-

ed[片面]的。

- (2) 在 *humanity* 的研究上,即令各科分立,也有些勉强。因为,*humanity* 的各个方面都是 *organically intertwined*[有机地互相联系]。
- (3) 吾人因此不可过分依靠专科式的“*discipline*”[学术训练],面要对 *humanity* 持一总全的看法,并要诉诸 *intuitive understanding*[直觉的了解]。

史华兹先生所提出的这些论点,和你在长信中的重要问题,有基本的相同。因此,我现在将二者合起来讨论。

以上五月六日写

5

你们二位所触及的问题,最后分析起来,可以约缩成二个不同但又相联的问题:

第一,科学以及行为科学能否无遗漏的说明或解释人事的历史。

第二,科学的历史是否可能。

我们要能进行讨论这两个问题,必须首先明白历史的说明或解释之几个相度(*dimensions*):

- (1) 凭常识或诉诸直观的了解。
- (2) 根据这样或那样的史观。
- (3) 根据科学知识。

有许多人认为纯正的历史只叙述史事,不谈说明或解释。说明或解释是哲学家的事。这才是痴人说梦,行之习之而不察之!说明或解释在史事叙述的背后。说明或解释是史事叙述的背景。没有了这一背景作史事叙述之建构的必要条件,史事叙述势必寸

步难行。问题不在史事叙述是否必不可没有说明或解释为之底层,而在史事叙述者是否意识到,是显明或隐含,是直接或间接。在从事史著的工作时,一个工作者所预先假定的说明或解释,在大后方就决定了他的史著的品质之高下,广狭,深浅,甚至于雅俗。科学的本身无所谓雅俗。但是,史著除了求真以外尚有雅俗问题,和格调之高低问题。一个超凡绝俗的心灵所写史著,其流露的“气氛”,也一定是超凡绝俗的。关于这方面的种种,请看下面的分析便可更加清楚。

(1) 凭常识或诉诸直观的了解

常识是人类知识原料的贮藏库。离开了这一贮藏库,人类知识的来源一定所余无几。在说明或解释中,有一种趋势,就是拿我们已经习知的东西来光照尚未习知的东西。在这一要求之下,常识是我们天然的依赖。历史中有我们共同经验的部分。这共同经验的部分就是常识。所以,历史的说明或解释往往诉诸常识。

但是,常识是未经精练的知识。未经精练的知识里面有可靠的部分,也有不可靠的部分。这样的知识是片断而不相联属的。片断而不相联属的知识就是尚未纳入一个系统的知识。尚未纳入一个系统的知识,我们无法核证核此之间是否矛盾。既然我们无法核证常识彼此之间是否矛盾,于是我们也就无法核证藉常识所作的说明或解释彼此之间是否矛盾。复次,一种知识既然叫做常识,那就表示它的深度不够。既然它的深度不够,于是藉它所作说明或解释也就深度不够。深度不够的说明或解释,是未能刺人人生活经验的里层及其特殊角落的。到了这些田地,常识之道路已露。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心灵的创造。了解人类心灵的东西有而且只有人的心灵。在这一场合,“直观的了解”扮演有重要的角色。我们诉诸直观的了解,往往能透刺人事历史的里层,幽微的角落,

奇诡的变异。直观的灵光一闪,有时能透过伪装的浓雾,直接照射人心的本相。自古至今,人类伟大的创造有时出于伟大的直观。但是,伟大的错误也有时出于伟大的直观。藉着直观的了解所作的说明或解释,有时奇中,但有时奇错。直观的了解之限度,就在它无法返回到检查它自己。既然直观的了解无法返回到检查自己,于是它也就无法保证它自己不错。因此,要保证直观的了解不错,必须求之于它以外的法度。这法度就是逻辑的演证,语意的解析,以及经验的检核。

(2) 根据这样或那样的史观

在“the rise of ideology”[意理兴起]的时代,任何史观都容易被入坚信,当作真理的代用品。因此,依据史观来解释历史,仿佛是水到而渠成的事。何况依据史观来解释历史,不仅能满足我们的“统摄感”,而且能使我们产生“无往而不适”的快乐?但是,史观除了几句可作多样解释的笼统之词以外,究竟能给我们多少积极的和特指的知识?实在少得可怜! May Brodbeck 说得对:

Where knowledge is scarce, speculation abounds. [知识贫乏的地方,玄思便蓬勃发展。]

(Gross L. (ed.) *Symposium o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1959, p. 380)

无论哪一种史观,所观的都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导因与或大趋向。这类说法,一概是 sweeping[一网打尽]的。这样 sweeping 的说法很难决定其真假。至于说历史有何归趋,那简直是作“historical prophecy”[历史的预言],并非 scientific prediction[科学的预言]。历史的预言固然动人,因此掀起时代的旋风或所谓 Zeitgeist[时代精神],但与致知何关?

(3) 根据科学知识

根据科学来说明或解释人事历史,也就是人事历史的“科学化”。这一企图的内容并不简单:有 strong sense[充实]的,有 weak sense[经不起考验]的;有 militant[好强的]的,有 non-militant[心平气静]的。至少,受 positivist philosophy[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十九世纪的 Thomas Buckle 的看法就很 strong 而且 militant。一九〇二年 J. B. Bury 所表现的,是将历史及科学的关系作过分乐观的估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转变了。他甚至怀疑建立历史因果之可能性而强调偶然在历史中的作用。Thomas Buckle 想要证明“人类行为的齐一性”,这如何可能?我想大部分正统历史家,无论是明示的或隐含的,都不相信所谓“科学的历史”。本世纪初叶 Trevelyan 所著 *Clio. A Muse* 便是显著的实例。近人说历史不能科学化的理由渐较前人精密。但是,近人所说历史可作科学的说明之理由也远较前人坚实。E. Nagel 及 C. Hempel 等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著是很好的例证。

双方的看法颇有距离。因此而引起的问题怎样解决?我常常在思索。除此以外,实际阅读资料的工作也给我一些启示。

就我的思想努力的经历来说,一个曾涉足于逻辑经验论的人很自然的容易走上用科学知识来求说明历史的路途。可是,近四五年来,从实际的工作经验中,我知道事体并不是这么简易。不过,我同时目击一大些以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人搞不出什么道理,充其量只是编录档案而已。这怎能使稍有头验的人满足?

我着实为这类问题所困扰。我希望得到我能继续工作下去的理论基础。

6

史著与科学之间干隔的问题,分析到最后,就是 particulars[殊相]与 universals[共相]之间干隔的问题。

任意多边形不能等于圆周。如果任意多的 universals 不能描绘一个 particular, 则科学不等于历史。

科学的世界是一个洗炼得很纯净的世界。恰恰相反, 历史的世界是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依此, 科学不能无遗的说明历史。科学迄今不是说明历史之充足而又必要的条件。但是, 科学是说明历史的必要条件。在这一关联中, 史著是 a ground where universals and particulars meet (共相殊相碰头的地方)。一位历史家, 既须有 theoretical thinking (学理的思维) 作引导, 又须有对人生的常与变的体验作内容。一部伟大的史著, 一定是普遍知识与特殊经验之和谐的结合。仅仅有理论的普遍知识是空架的; 仅仅有特殊的经验是盲目的; 必须二者结婚, 才能产生健全的历史知识的麟儿。

我现在把上面所说的伸论一下:

R. Carnap 先生说:

The observations we make in everyday life as well as the more systematic observations of science reveal certain repetitions or regularities in the world. Day always follows night; the seasons repeat themselves in the same order; fire always feels hot; objects fall when we drop them; and so on. The laws of science are nothing more than statements expressing these regularities as precisely as possible.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所得和科学界的较有系统的观察所得, 都透露了世间的重复性和规律性。白昼永远跟着黑夜; 四季总是顺序循环; 火焰永远是炽热的; 投掷物件总是跌落地上; 等等。科学定律便是尽量精确地说明这些规律性的表式。卡尔纳普:《物理学的哲学基础》, 页三。]

(Rudolf Carnap,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Physics*, 1966,

Chapter One, The Value of Laws: Explanation and prediction,
p. 3)

在物理现象里,我们可以找到“repetition”〔重复性〕和“regularities”〔规律性。〕

在生物世界,打点折扣,我们可以找到“repetitions”和“regularities”。

在行为领域中,我们要找到“repetitions”和“regularities”,就大感困难。

在人事历史里,我们要找到“repetitions”和“regularities”,为事更难——假定并非逻辑的不可能。而且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就在那无可化约的及无可代换的特殊事件之出现,或一去不复返。

上列递增的困难,在知识组成的程序中,也在各类知识的性质和结构之殊异上。最伤脑筋的是历史知识:(1)历史知识的性质和结构之本身往往不能不含蕴一丛价值活动。在这一关联中,价值判断及事实陈述常难截然划分。例如,“天子征伐”,“诸侯背叛”,“庶出之子”,固然是叙述事实,但背后却假定了一些价值架构。如果不假定一些价值架构,那末所谓历史的事实叙述,即令不是不可能,也必大为改观。(2)在物理科学中,我们可以找到相对独立的因果系统和相干系统(a system of relevance)的确定边沿。这在数理天文学中显然易见。一八四六年 Leverrier 发现 Neptune〔海王星〕就是很好的实例。然而,在人事历史中,客观的因果脉络往往无法确定,而且相干系统的边沿何在根本难以摸清。Ernest Nagel 先生说:“In many cases we are ignorant of the appropriate initial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cannot make precise forecasts even though available theory is adequate for that purpose.”〔我们常常对有关的原始情况和边沿

情况毫无所知,故此不能作精确的预测,虽然有现成的理论可供这个目的应用。)于是,每一史事的探究,都有 ad hoc〔特定〕的一面。我们从事探究时,范围在哪里,要找些什么材料,事先无法确定,而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去摸索。所以,从这一方面观察,每一本史著都是一个创造。

Sophocles 说:

None is more wonderful than man.〔谁也不及“人”那么多姿多彩〕

要了解历史,必须了解人的 wonderfulness〔多姿多彩性〕。要了解人的 wonderfulness,主要的在抓住人的 uniqueness〔独特性〕。到了这一层,才算对历史入木三分。到了这一层,普遍定律或推广便英雄无用武之地了。Wilbert E. Moore 说:

The current anxious pessimism concerning the topic of social change can readily be traced to several related sources. One such source is clearly the downfall or slight acceptability of global, simplifying theories. Sweeping evolutionary or cyclical doctrines have provided a relatively poor fit to data. Even where generalization may have been “justified”, the loss of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abstraction has resulted in relevance to only minute segments of observed changes, or in other words, in low predictive power.〔当前关于社会变迁主题的焦虑和悲观可以追索至许多个有关的源头。其中之一显然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简单明朗的学理日形没落,或较少为人接受。所向披靡的演进学说或循环学说和

实际情况又不大符合。甚至在通则已得到“证实”时，抽象过程中损失的资据却使通则只能跟零碎的已观察到的变迁情况发生关联，或者，换句话说，和定律预测力量发生关联。}

(Cited from Don Martindale, *Social Life and Cultural Change*, New York, 1962, pp. 4-5.)

显然, what is true of the social science is true of history(在社会科学中是真,则在历史也是真)。但是,这并非说人事历史 is absolutely unique in itself[本身绝对别具一格]。果真如此, it would be utterly unintelligible[非常费解]。这样的历史,怎能进行研究? 即令能进行研究,对今世及后世有什么可理解的关联?

历史诚然是 unique[独特]的, but it is relatively unique[但是相对的独特]。

从历史的这一性质之了解,我们可以窥出研究历史的一条坦途。

海耶克先生说:

I trust I shall not be misunderstood as identify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that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and the historical. This is certainly not my view. I am not defending what I regard as the erroneous view that the study of society is nothing but history, but I merely want to stress that the need for understanding history arises in every application of our knowledge. The degree of abstraction which the theoretical disciplines in our field require makes them at least as theoretical, if not more so, than any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This, however, is pre-

cisely the source of our difficulty. Not only is the individual concrete instance much more important to us than it i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but the way from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articular is also much longer. [在辨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以及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差异时,我相信我没有理解错误。这的确不是我的看法。我不是为所谓“社会研究即历史的研究”的错误说法辩护,我只是强调,我们在各方面运用知识时,都必须对历史有所了解。在我们的范围内的理论训练所要求的抽象程度,使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中的任何学科少一些理论性。可是,这正是我们的困难根源。不仅因个别的具体事例对我们比自然科学重要得多,而且因为由理论建构走到解释殊相的路途冗长得多。]又说:

……Indeed, most successful research work will require a very particular combination of diverse kinds of knowledge and accomplishments, and it may take half a lifetime before we are better than amateurs in three-quarters of the knowledge demanded by the task we have set ourselves. [……的确,绝大多数成功的研究工作将需要分外用心拼集各种各色的知识和建树,但在我们为自定厘定的工作所需要的知识之四分之三比业余人士来得扎实之前,拼集知识和建树的工作可能需要花半辈子时间。]

(F. A. 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Chapter 8, The Dilemma of Specialization, pp. 124 - 125.)

海耶克先生这席话,真是精采绝伦,“深获我心”。这几年来我的思想一直是向这条路子发展的;但是,由于学力不够,我说不出

来。今见海耶克先生把我心内的意思很准确的说出,真是快慰极了!

年来我的工作经验及其理解告诉我,从事史著如只从一条单线的 discipline〔学术训练〕入手,简直是不够。要结果丰富的话,必需求诸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科际整合〕。这当然是一件难事,但丰富的趣味也正在此。

下次再详谈 谨祝
你和祖锦快乐
小宝贝健壮

海光

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写完

·20·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毓生学弟:

1

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想着要写信给你,但是一直延迟下来。原因之一,就是晴天要做水泥工作。

现在专诚同你笔谈。

2

八月九日下午四点多,你的母亲、祖锦和肇敦三人忽然来舍。这使我意外惊喜。你和祖锦上次来舍时,只有两个人,现在却创生了一个。人生多么奇妙!

小弟的模样很像祖父。他来舍时不停到处跑。当时我正在做水泥工作,工程还未干。他忽然举起小脚一扫,像武松踢虎似的。幸喜大人抢得快,没有扫垮我的泥墙。他跑到哪里,祖锦总跟到哪里。我看她有点累,而且黑瘦了些。

3

九月十七日下午四点多,我到你家新住,去看你的父亲和母亲及祖锦母子。祖锦母子下乡去了。你的父亲的健康情况比上次见面时有些进步,真正是红光满面,同时也可以缓和的运动。这种成绩,除了得力于现代医药以外,还归因于生存意志的坚定。我同他们二老谈了许久,等于上了真正的中国文化一课。兹记谈话要点于下:

(1)谈往事 年老人爱忆往。在台湾这种陌生环境里,咱们大陆亡民过这种无根的岁月,自然更易忆往。你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靠自力奋斗起家的人。他几十年的事业像梦一般的幻灭,如今什么也不能做,内心充满了惆怅之情。面对台湾目前的商场,他们特别怀念过去大陆商场上的商业道德。他们说开了那么多行号,从来没有人捣鬼;而且别一家无论出多少钱,自己这边的人也不会见利忘义的跑过去;种种等等。

我静静的听,也静静的想,这里面实在含有颇深的社会变迁问题。传统的中国,靠人伦秩序作基础来维系人际活动,并且推行业业,如务农、经商、卖艺的跑江湖、甚至组织武装力量。时至今日,这一套破产了。推行业业得靠非人身的组织(depersonalized organization),考核、监视,等等;否则就会出毛病。究竟从前的办法有人情味些,还是现在的办法有人情味些?究竟诉诸义气有人的尊严些,还是诉诸监视有人的尊严些?这太明显了。中国近百年来,的激剧社会文化变迁,人理方面可贵的东西变掉了太多,剩下来的多是令人不敢接近的东西。令人浩叹!

(2)谈王老先生 上次去深坑你家,你的母亲很起劲的对我谈王老先生。这次又谈,而且又是津津乐道。这些话,若出别人之口,我一定听不入耳。但是,从你的母亲嘴里说出,而且态度又是

那样诚恳、真切，我仿佛少年时在母亲身旁听话，一点抗力也没有。人，究竟不是逻辑的推演机！

你的母亲说：“殷先生，你读书很多。可是，书是书，道是道。”我不太能分析这话。但是，我感觉到这话是素朴的，绝无玄学的卖弄。“道是道”，我想在民族学里得到更根源的了解。许许多多的意识活动，是文化地从这样的根源出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真是“人心浮动”的世界。人类的器用生活相对的高度发展，而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类的超自然生活却相对的萎缩。无论怎样，科学知识代替不了“credo”〔教义〕。时至今日，人类心灵上的自律力真是脆弱得可怜。科学的技术之空前发展，给我们置身于“新洪水猛兽”时期的边沿。往古诚然没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留恋，战后这样的“新时代”又有什么多的东西令我们感到“心至如归”？如果人类的力量不可企及那最后的永恒，而真诚的信持与人无害的旨义，那末又有何不可？

(3)谈孙儿 “林老先生！您的孙子回来了，您总高兴吧！”此语一出，你的父亲的脸上顿时笑开了花：“呃！是的，是的！”除了笑和点头以外，什么言词都是多余的。

传统的中国人注重祖宗和子嗣血统的延续。这几乎成了一种最具支配力的“quasi-religion”〔准宗教〕。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儿孙血统在流，他就产生自己的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是这一流之一环，他就觉得自己不是孤魂野鬼而是有所归属，同时又觉得自己的生命随之而扩大。祠堂是这一丛结的庄严焦点。所以，注重血缘实在是“a biocultural self-identity”〔生物文化的自我认同〕。现在的中国人，连这一点也骤然打断了，真成了原子化的人(atomized entity)。惨！

最近我又翻阅你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给我的那封长信。虽是第三遍了,读后有如北方人吃“盒子”。这种北方面食,外层是酥皮,里面包的是大馅儿,富有人家的馅儿特别丰富。你的信就像富有人家的盒子,我觉得看后营养丰富。信中第七节说:

“我最近常想到您平生提倡科学方法的志趣与您近来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宏愿。您做人的风格上充分表示出您是具有 *intense moral passion* [紧张的道德热情] 和 *poetical inspiration* [诗人气质] 的人,读您最近的数信更 *confirm* [确定] 了我这一看法;但几十年来偏偏提倡科学方法, *colorless thinking* [无颜色的思想]。究其原因实受时代环境之刺激,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方法是一个 *tool* [工具],是一个使人头脑清楚不受骗的工具。至少在下意识里科学是满足您 *moral passion* [道德热情] 的道路。However [不过], *moral passion* 和科学方法的溶合有时能产生极大的 *tension* (if not *contradiction*) [张力(如果不矛盾的话)]。这种 *tension* 有时能刺激个人的思想,但有时却也不见得不是很大的 *burden* [负荷]。”

这段对我的 *characterization* [描写],真是说的再对也没有了!俄国文豪高尔基说:“别人是你的一面镜子”。毓生真是我的一面镜子。这段对我的了解,实在比我自己深透而且清楚。它道出我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知我者,其毓生乎?我这一辈子,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样了解我啊!

经弟的 X 光对我透视,我才自觉到,我二三十年来与其说是为科学方法而提倡科学方法,不如说是为反权威主义,反独断主义,反蒙昧主义 [obscurantism],反许多形色的 *ideologies* [意理] 方面提倡科法。在我的观念活动里,同时潜伏着两种强烈的冲力:第一是 *iconoclasm* [打倒偶像];第二是 *enlightenment* [启蒙]。恰好罗素的著作中充满了这些因素,所以我早年爱上了罗素。

何以致此？除了受五四的影响和五四后期的西南联大的熏育以外，我所出生及长养的时代环境和家世背景大有关系。我这一辈子眼看着中国大大小小的政治势力因争夺权利而败德的各种表演。这曾给予我心灵中道德意识极度的不安和反感。这五年来，随着我对人生世事了解的加深和扩大，我的这种不安和反应渐渐净化并且概念化了。我自己觉得这是我的境界的升高。这一境界的升高，所花代价则够大了。在家世方面，当我童年少年时，家道已经中落，但是长一辈的人还要摆出一副架子，说话矫揉造作，室屋之内充满理学式的虚伪。我简直讨厌透了！这成为我日后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文化的心理基础。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但是，我如今学业一无所成，真是愧对师教。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利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相形之下，我深恶痛绝家庭里的那一套，摆脱之唯恐不及。顺着这条道路发展下来，加之我无法得到英美一般学人的顺境，所以不知不觉发展成你所说的样子。

5

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思想，总是在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衷这一泥沼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你的批评以及提出的“*a viable creative reformism*”〔有生命的创造性改良主义〕，就我所知，直到现在为止，是开天辟地的创

见。我读了又读,内心引起了说不出的怡愉。我盼见到你有关的详明论析。你写的东西如不给我看,几乎可说是白写了。

你的 approach〔治学方法〕是脚踏实地的在中国实有的文化基线上行最少抗力的 transformation, metamorphosis, or spontaneous growth〔形变、质变、或不知不觉的成长〕。这样,既非泥古,又非脚不落地的趋新;既不会引起社会文化的解体,又不会招致目前的大混乱。这既不是乌托邦式的“全盘西化”,又不是胡说不通的“中体西用”。如不是无谓的幼稚的破坏原有的制度,符号系统,价值观念,及信仰网络,则 identity〔认同〕保持住了。如果 identity 保住了,则不致引起守旧势力的强烈抗拒。这样一来,近代中国可望孕育出一种类似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内新运动”。如果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有这样的一种运动,那末就不致出现目前的文化旷野和废墟加垃圾堆乘小丑了。

现在的中国文化思想没有什么可谈的了。真正的本土知识分子几乎整个覆灭了。即令在五四当时,领导人物又哪里有深远一点的眼光?他们多会呼叫,少能思想。何以致此?至少有这几个原因:

(1)胡适之流的学养和思想的根基太单薄。以“终生崇拜美国文明”的人,怎能负起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导责任?更何况他所崇拜的美国文明主要是五十年前的?他虽长住美国,其实是在新闻边沿和考据纸堆里过日子,跟美国近五十年来发展的学术没有相干着。

(2)五四人的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的“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有关联,但究竟不是一回子事。他们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思想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劲反权威,反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在这样的气流之中,有多

少人能做精深谨严的学术思想工作？

(3)新人物反旧；旧人物也反新。互相激荡，意气飞扬，防御是尚，于是形成两极，彼此愈来愈难作理性的交通。一九一一年以后的中国就没有像日本那样的稳定的社会中心，以及深厚的中间力量。加以左右的政治分化和激荡，更是不可收拾。正在此时，日本人从中横扫，遂至整个土崩瓦解。新秦便崛起废墟。

关于这个大问题的种种，有太多足够今后的历史学人研究和思考的。

我们的话是说不完的。这次写到这里停笔。以后再叙

谨祝

进步，健乐

海光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

·21·

毓生学弟：

1

昨天收到你的来信。这两天掀起许多思绪，迫着我非再吐放一点不可。

2

在这之前，我想说一件事，即是请你替我购致一本书：

A. N.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科学和现代世界》

怀德海先生夫妇居住剑桥那么久。年轻一代的人似乎淡忘他们了，但是老剑桥人对他们留有很敬重的印象。前几年海耶克来台，我和他谈起美国哲学的情形，他一出口就是怀德海，而且敬重

之情溢于言表。近年来我的心灵有新的发展。罗素是英国经验论的 J. S. Mill 后继的中兴名臣,数理逻辑的大师,才气高华,我一直敬爱。但是,近年来我总觉到他的心灵里缺乏一点什么。而罗素所缺乏的,我却在怀德海那里找到。怀德海的思想深奥,文笔艰难,使我不易接近。可是,我近来有时翻阅架上几本他的著作,便觉如饮圣泉。这可见我的心灵发展,渐渐与他有些方面接近了。

上列一书,我本来有一册纸面的,但因字太小于是赠给一位年轻朋友了。我现在请你罗致这书,有两个理由:第一,这书很老了,较大字的版本在别处很难找到。第二,你本人现在剑桥,机会实在难得。在剑桥一带,有些旧书店,我想不难找到的。我并不一定要新书。只要看得清楚,那陈旧的、发黄的、有笔迹的本子,在我心目中的价值比时下的新装高得多。

如果我说将书费送到你家里,那末所引起的反应一定不佳。其实我所考虑的并非别的,只是你此时似乎还没有正式工作。

3

来信谈到东西文化问题,真是千言万语说不尽。

中国近六十年来,谈文化问题的人士谈出苗头的实在是少。梁启超是一个文化的诗人。梁漱溟是一个空幻的构想者。胡适是一个美国主义者。陈序经是一个新闻记者式的宣传家。目前的几位先生是新义和团主义者。

我自己在几年以前有西化和现代化的倾向。现在,如果有人问我,是西化好还是中化好,是古代好还是现代好,我的答复是:

我不知道。

你说对中国“传统文化”我的“内心深处究竟有无切肤之痛”。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心深处倒有切肤之痛,而且现在仍在切肤之痛中。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社会层面。在这一方面,家

庭和旧风俗,对我的发展阻力最大,因而我最厌恶中国的“人事”。另一方面是致知层面。在这一方面,中国人之分不开人事伦范的社会关系和客观的认知判断,使科学的心态不能超然独立。这令我一直深恶痛绝。我越来越不喜跟这里的人谈论,这是主因之一。

近几十年来,无论是赞成西化或主张保守中国文化,大抵都是从这类个人的利害原因及情绪作用出发的,很少根据文化等等作客观的认知。无疑,直到约五年以前,我一直是一个 antitraditionalist〔反传统主义者〕。现在呢?我只能自称为一个 non-traditionalist〔非传统主义者〕。虽然,我现在仍然受着中国文化的许多扼制,但是我已跳出过去的局格,面对它作客观的体察。就认知的智识(cognitive knowledge)而言,包括数学与逻辑在内,西方远较东方发达。由这些学识所产生的技术,成为西方“power”〔船坚炮利〕之源。至于政教礼俗,人生观,和世界观,是谁的“好”呢?在世界普同的“人性”从特殊的文化里发现出来以作必要的建构基据以前,这个问题根本无从解答。

不过,至少至少,美国文明的病象已经显露了。Henry Steele Commager(1949)的透视,很值得美国人士警醒。一个社会,技术肥胖,伦范消瘦,唯利是图,个个忙的失魂落魄,怎样维持平衡呢?不平衡必至引起不安的。

4

你的论文里有些基本观念,如你所知,我还不太熟悉。要熟悉这些观念,我需作一番努力。这就需要一点时间。所以,稍微过些时我再同你讨论那上面的问题。

再叙 祝你
快乐,进步

海光

十月九日,夜

·22·

〔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

毓生学弟:

1

许久未通音问,颇有天涯海角无任神驰之感。想来你们的情形都好。

2

这一阵常常想到要往你家去看看,昨晚居然成行。你的母亲问我怎么有时间来。我说,我并不是那么忙,而是难得出街一次。我一出街,有时打不着方向,颇有过海之感。在这一点上,我同你的弟弟刚好相反。他不能静下来读书思维,必须到处跑才觉愉快。这真正是“人上一百,种种色色”。

3

此行的目标有三:

第一,去看看你的父亲、母亲,和家里的情形。

第二,介绍一种德国药“KH3”。据医生说,这种药有帮助上了年纪的人清通血管作用。

第三,替你父亲介绍一处精神疗养研究所去试试。你父亲的病,根本就是急出来的。既然如此,我意不妨用精神疗养法予以帮助。万一无效,也不致有害。

看来昨夜之行,上列三个目标都达到了:

(A)我一进屋,你的父亲正坐在门口,精神比我想像中的要好些。

(B)当我介绍上述的西药时,你的父亲问是哪一国的。我立刻答道:“德国的。”他很信赖的点点头。信赖就好了。

(C)你的母亲和父亲都同意到精神疗养所去试试。

4

除了上面所说的结果以外,此行还得到一点意外的收获。

我在家的时候,你的母亲和弟弟问我要不要听你们从美国寄来的录音片。我当时有点迟疑。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说给家人听的。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就应该把尊重“群己权界”作基本的原则。我同业师金岳霖先生相处七年,除了谈学问以外,从来不谈私事。除非对方提到,彼此没有问过对方的个人问题。但是,这一次的情形完全不同了。这一次的对方不是英国式的学人,而是颇为典型的中国人。典型的中国人对于“privacy”〔私密〕从来没有英国人那么正面重视。他们要我听录音片,意思是要我也知道一点有关你们的情形,并且也分享一点快乐。他们一面说着,一面就打开录音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说:“也好。”

我的听觉颇不够灵敏。我只听到这几点:

(A)你同小敦谈“苹果”。我之所以特别记得这一点,系因我也很喜欢苹果。

(B)你得到一种什么样的奖金,秋后将再往哈佛研究,完成你的著作。

(C)你说你的写作很慢,一再迁延。

当然,根据现在美国的“潮流”,凡事以快速为尚。但是我看不出“效率”的本身就是一崇高的价值。这里有若干美国青年,中文半通不通,需要花钱雇人助读。他们急于赶忙拿学位,急于要当教授。试问,这个样子的快速,有何可取?学问之道,快煮不成的。古往今来,凡在学问思想上真有分量的东西,无一不是长期浸沉出来的。我认为大成为尚,犯不着跟流俗争一日之短长。

(D)你给你弟弟 instruction〔教导〕,希望他作享有定性。

这是很难的。第一,台湾没有使青年人定得下来的环境。第二,你的弟弟根本就好变迁。昨夜他告诉我,他最近在改行“跑大理石”。他说着就提出一小箱大理石样品给我看,真个是琳琅满目。希望他终于“跑”通一样才好。我最初听说他经商,曾大吃一惊。今日在台湾经商,必需奸、诈、狠、厚、黑、谎,样样精通才行。像他那样真纯的青年,怎么行?幸亏你们家的道德根基深厚,否则他老早染黑了。这一层比致富更要紧。

我听完你们的录音片以后,对你的父亲说,我明天就同毓生写信。他听了以后,喜形于色。这颇令我感到意外。因为,除非他把我写的当作是他自己写,否则没有理由那末高兴。所以,我更要遵守自己的诺言,今天开始写这封信给你。

5

现在谈谈读书。我近来收到好几本令我佩服的书。其中与我们有共同兴趣的二本:

(a) Philip P. Wiener and Aaron Noland ed., *Roots of Scientific Thought*, Basic Books, 1957.《科学思想的根源》

(b) Arthur C.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历史的解析哲学》

前者以“scholarship”〔学格〕胜。它使我明了西方何以发展出科学,而中国、埃及、巴比伦诸伟大的文明则科学不昌。

以上四月二十九日写

后者的分析力是那么强,运思是那么灵敏,所涉及的问题是那么深而且广。我实在对之悦服得很。

此外,海耶克先生的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自由的构成》,及波普尔先生的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都是我的案头书。我每一翻阅,即有身入宝山之感。际此

乱世，真理在明灭之间，每读这类的伟著，辄兴悲怆中的希望。

别事再叙 即祝

全家福

海光

四月三十日

·23·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毓生学弟：

1

手书读悉。信中论学诸问题，只有留待我康复以后再详谈。

2

现已七月底，你们似乎就要离开奥勒冈前往哈佛。兹托弟二事：

A 哈燕社给我的援助，在过去于七月初即已寄到，今年则至今尚无消息。如弟所可想像，我今年最需支援。弟至哈佛后，请问负责人，该款已否寄来。

B 久闻奥勒冈擅自然山水之奇美。希弟和祖锦在离去之前，为我选购大小邮片各若干张，供我病中神游。但是：

(1)我只要自然景物片。我一看到美国的汽车和高楼，便觉末日快临。

(2)水路寄来即可。航寄太破费，而且不必。

再叙 即祝

全家愉快

海光

七月二十一日

·24·

毓生学弟：

1

前几天寄你一封平航，此时可能已经达览。未知现在你们已否离开奥勒冈前往剑桥。

2

最近内人从×××那里获悉，哈佛燕京学社已经停止对我的经援。这等于对一干旱稻田截断水源。

我已和张灏提到这一问题。他将在八月底来哈佛。届时希弟和他商议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再叙 即祝

大家平安

海光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致 张 灏 (二封)

·1·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张灏：

1

请毓生转致给你们长短信各一通，未知收到了没有。迄未见毓生和你有信来表示。颇为悬念。

2

上月我写给你的一封短函，表示你们的援助，谅已收到。这类

援助,正可使我目前在尚未能更换环境以前,得以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写作。

3

不过,你们对我的支持,也引起我的心灵之轻微的震动。这并非起于支持的本身,而系在它所表象的历史意义。如你们所知,我是一个特别爱想的人。近年来,我常常要找个最适当的名词来名谓自己在中国这一激荡时代所扮演的脚色。最近,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封为“a post May-fourthian”〔五四后期人物〕。这种人,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坚持独立特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亲则认为他是一个“欠稳健的时代叛徒”,有意无意的和他 alienate〔疏远〕起来。下一辈人呢?绝大多数和他分立在两个不易交通的“心灵世界”里。他们和他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底牢结和不同的展望。他们是失落了。但是,他们的失落的内容和他的大不相同。保守人物呢?毫无问题,褪他为祸根。于是,在这一时代,他像断了线的风筝。这种人,注定了要孤独的。

杜维明这次来台,我们坐在院内石头凳上,喝咖啡。我告诉他,西南联大校园内的风光,就是一个小型的五四。它给当时中国大西南的影响,也是一个小五四。我们的学校,可说集了五四的精英:从保守到维新,从全盘西化到本位文化,从欧洲思想到孔孟思想,从甲骨文到英吉利文,从唐诗到十四行,从楚辞到莎士比亚,从老庄到休谟,形形色色,好一个“文化的共同市场”,真乐坏了我们

那些青年的顾客！我们确实受到心灵的鼓舞。当时西南联大校园内的朝气蓬勃，歌声洋溢，思想开放，充满信心，这些，都一幕一幕地展现在我眼前。这些，和今日一部分青年被激刺成冲阵的火牛，另一部分被压成腌菜，成为多么强烈的对照！一想到这儿，我不禁热泪盈眶。

五四是过去了，那一时代的人，除了极少数像赵元任等真有学术成就的以外，大多数只做过一小点学术工作，或者开开风气。实实在在，他们在思想上的底子薄弱得可怜，因此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激变并没有真切的认知。于是，他们惶惑了。时代的大变动、大震荡，震掉了他们青年时代漂进来的那一层浅浅的底子。他们在狂风暴雨里站立不稳。但是，他们还要保持“学术名流”的空中楼阁。他们变得不愿面对现实世界。他们对中国的激变已失去反应的能力。因此他们对激变里出现的新形势连正眼也不敢看一下。于是，像 E. F. romm 所说，他们要“escape from freedom”〔逃避自由〕，要依靠残影，要躲在冰山似的权威底下。多么可悲的幻变啊！我呢？我受过这一代人的影响，但却没有来得及尝到他们尝过的甜头，新知识分子期待的黄金景色被战神抹掉。我所接受的，是一连串时代的苦难考验。我待在这个几乎没有灵魂的岛上将近二十年。我感到我是被封冻在一个冰箱里，又冷又闷。人们愈叫嚣，我愈感到寂寞。我碰到一群一群没有大脑而又自私的动物，连看一看的兴趣也没有。所以，我才能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来回的在小径上走一两个钟头，沉思。在这一时代和环境里，我像一只想乘风破浪万里浪的船，可是现在却成为一只两不靠岸的孤舟，狂风随时可以吞灭它。

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顽强。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的人理价值。正因这样，我不仅变成一

个生活的孤岛,而且是一个价值的孤岛,以及一个感情的孤岛。虽然如此,我又自认是冰山上的一枝小蜡烛,它挣扎着要在浓雾中发出一点微光,免得船触了礁,免得乘客们同归于尽。在任何时代,这种人物都是难得受大众欢迎的。这是我在现实里遭遇困窘的基本根源。我常常在近来想,我这二十多年来的生命历程,正好象征着五四后期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多少年来,我为了自己的见解与整个环境扭执。可是,自身却是一个 uprooted〔无根物体〕,像一片飘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小时跟家中闹别扭,那时我的父亲要我学医,我硬是要读哲学。父亲愤怒地说:“你要读哲学,将来饿死了可不要怪我。”现在回想起这话,差一点说中了。好险啊!恰好后来我有几门功课不及格,父辈认为我简直不堪造就,强迫我去一家商店当学徒。我当然不会服的,半年后就逃跑了。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代,我又跟专爱耍花样的左翼分子闹别扭,几乎被打。一直闹到我作《中央日报》主笔,《联合报》前身的《民族日报》总主笔。这个阶段,我差点儿“右”起来了。到台湾以后,我了解世事多了。我加入《自由中国》以后,逐渐接触更多的西方思想,于是也逐渐自行调整思想的方向,并改造自己思想的内容。等到我认为自己的思想经过长江三峡的千回百折,好不容易走上一条正路,不左也不右,正待顺流而下,直赴东海时,终于连这半碗冷饭也敲碎了,我如今,头发如霜,现实里的一切,什么也不属于我,连基本的生存也成问题,还要 student-friends〔学生朋友〕来支持,并且还要向那陌生的“学术市场”出售自己。我的心情,在某些方面,颇似晚年的陈独秀,或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每一念及,心灵怎不感到轻微的震动。

4

因要做的事较多,延迟了许久,前几天算是把 R'esum'e〔履

历)改了一下,现在寄来。我依然觉得这份东西很鄙俗。有人问我:“你是讲格调还是求出路?”我答:“目前当然是求出路。”他说:“求出路就不能太讲格调。”几经折中,才搞出这份玩意。我自己知道,我精采的部分列不出表来,能列得出表的不精采。我想,我这个“货”,商标欠佳,如果没有知音,作 special recommendation(特别荐引),恐怕难以出售。近大半年来的打“回票”,可以证明。今天恰好接到慰祖的信。他接洽的结果,核心的问题,也在“Ph. D.”[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定是困难的症结。看怎样打开。

R'esum'e 中的 reference[咨询人]栏,也是七拼八凑的。根本难得找啊!这种光景,你们是不难想像的。在我心目中,无论何人,只要他知我,都可做我的 reference。我在第三页上空了些地盘未填。张灏或其他的人可否填人?我想人越多越好。

5

我只要一个小小的角落供作研究就行了。对于 China Study [汉学研究],我心中称许的高峰是已故 Balazs 先生。对于近代中国真有相当了解的,我认为是 B. Schwartz 先生。他除了 scholarship [学格]扎实以外,又能掌握那么多的语言,且相当熟悉 European ideologies[各种欧洲意理]。就我所知,他是 China Study 方面最称“资本雄厚”的学者。但是,谈到“中国近代思想史”方面,我常常想我自己是水平很高的一人。严格的说,老一辈的中国人在这一方面根本尚未入题。郭湛波“编”的那一本勉强可作目录用,他的学问底子太浅了。年轻一辈的可作很精的专题研究,但要能创构一部“体大思精”的思想史,以目前的水准而论,似乎还差十年哩!而且,我所有的长期参与以及因此而得到的原手经验,好像不是能从书本于上 exhaustively[穷根究底]得到的。中年的学人,就我所知,只有何炳棣、刘子健之流,但他们都不是搞思想的。外国人搞,在

文据层面,他们可以弄得很细致。可是,要他们再进一步,penetrate into the psycho-cultural level[深入精神文化层次],那还早的很。他们常常犯了隔。中国人自己搞,一般的毛病,除了为 culture[文化]所 bound[束缚],为 ethnocentrism[种族中心主义]所泥以外,又不能运用行为科学;及考据以外的方法论。难怪搞不出名堂,也难怪人家瞧不起。对于能 free from culture-bound[脱离文化束缚],又能相当掌握行为科学及新的方法论之中国青年学人而言,这是至少十年以内外国人无法竞争的园地。像我这样的中年人,正好是天设地造的顾问。

别人一看我的 R'esum'e,除了因找不到“Ph. D.”而眉头一皱以外,又看见我是教西方哲学的,现在要来搞中国近代思想史,也许疑心我是为了找面包而客串。我认为,如果一个学校因为一个想进来的人没有 Ph. D. 而表示“碍难接受”,这是常规之所当然。因为,在通常情形之下,在第一流大学接受了几年正规训练而且及了格的,总比“来路不明”的人可靠得多。现在美国一般大学这种训练方式也许训练不出 Wittgenstein,可是太糟的人要想混到哈佛之流的“union card”,似乎也是少有的事。特别在语言方面是如此。我想每一个得哈佛、耶鲁之流的 Ph. D. 在语言方面比我强。所以,即令美国现在盛行的非 Ph. D. 便碍难进大学的制度妨害着我的机会,我仍然相当尊重这种制度。不过,如果说因我是教西方哲学的所以不能搞中国近代思想史,那末这种不够成熟的“sense of specialty”[专业意识]实在是浅薄得可笑!恰恰相反,正如我自己所了解的,我多年所从事的哲学训练,正是一般从事 China Study 的“专家”们所甚难企及的。一个人因此而得到的思想力之强弱,一眼便可看出。以科学为例,人类要致知固然得靠手脚找材料。然而,人类最高的成就都是最后取决于思想。高级逻辑,纯粹数学,大的哲

学创建,都是思想的结晶。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能用手“做出”纯粹数学。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能用手“做出”哲学系统。历史何尝不然呢?如果搞历史的人只自限于“动手动脚”,那末终其身不过是一名档案管理员而已。所以,中央研究院办了几十年,只出产了一些考据家,连半个陶英贝也没有。于是,一点灵魂也没有。我并不轻视考据。这些工作总要勤恳之士去作。但是,一个社会没有了灵魂,如何得了?过份走“专家”之路,就是走向无灵魂之路啊!

话说回头。我是一个“rare combination”[罕见的结合体], unique[独特]得令人难以了解。一个真正的 writer[著述家]不是制造得出来的,而是在一个时代里生长出来的。我希望有机会给我试验一下。长期在冰箱里是难得开出花来的。我需要阳光的刺激和新鲜空气的滋养。我期待这一天到来。

6

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子,“公敌”是很多的。这大都是因思想或见解相左而引起的。我在这方面所表现的,像父执熊十力先生似的,是丝毫“不通融”的样子。但是我一辈子没有私仇私恨,虽然我因爱随口严格批评人甚至骂人而招了不少的忌恶。可是,不料谢君这样使我伤透了心。此人如此势利凉薄,实为学界罕见。我已经在最近抽空把他所行所为之为我亲身感受的,写成一个纪录,为世道人心戒。你和我是共同受害人。你也应该来一笔“相对基金”,把你身受其苦的确实资料见告。我另外要去信李楣处请她帮忙,把她们几位受弄的故事见告。我也要托人到台大外语系去搜集他的资料。这是一个很好的“case study”[个案研究]。由此我们可以认知当前中国知识分子之灰暗的一面。

上帝似乎并非有意完全使人活在地球上难过。他在虐待人之余,有时也赐人一点糖片甜甜心,使生命得以昭苏。这不是一部人

类的历史吗？真是巧的很，紧接着谢君离去后，我忽然认识了杜维明君。我们谈了几次。我并且听了他的两次讲演，够意思。他说话不慌不忙，态度极佳，学识稳实，情感内蕴而不激放。我看他将来可成大器。他最难得的是含蓄着一股道德力。予我一种信赖感。维明说他和你及毓生颇有交情。这真是令人高兴的事。这种年头，我们谈得来的人实在无几了。我的悲哀之一在此。我要谈的话，只有远隔重洋同比我年轻的人谈。这太别扭了。在此间呢？也只有二三子可谈，都是学生。和我同辈的人呢？我觉得他们的“精神状态”已经先身体而衰老了。很少例外，他们不仅失去了创造力，而且也失去了吸收机能。他们不知道怎样把新知识和新理论安排在自己原有的观念型构里，于是害怕新知识和新理论，于是对之索性不闻不问。恰好中国之封闭式的及自足的及崇古的及我族中心的传统意识，给予他们以不求新知和新理的制度化的理由。于是，他们理直气壮了。于是，他们固步自封得心安理得了。于是，他们嘲笑追求新知新理为时髦了。这股风气，跟三十年前是多么不同啊！为了说明的逼真起见，让我举个实例。许多弄历史的知道李××其人。他在出身、学历、年岁方面，都和我最接近。可是，他一开口，我马上觉得他是钱穆幽灵附体，在想法上是我的前辈。我们同住一条巷子时，几乎朝夕相见；不过是“无言相对”但却未必“已魂销”哩！李先生跟我相识二十五年，根本不知我是怎么回事。相形之下，维明和我只接触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便对我有相当深的了解。这才算得是弄 humanity〔人文〕的人。这给予我寂寞而孤独心灵的温暖和鼓舞，真是无法计量。

7

关于美国“学术市场”的情形，维明似有某种程度的明了。他对我的处境也相当明了和关切。同时，他为人思想缜密。你北上

时可就我事和他一商。再谈 谨祝

俚 安

海光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1

这信我很想毓生夫妇知道,本拟先寄给他们,再请他们转寄你们。但久未得他们来信,近况不明,所以还是直接寄给你们。你们阅后,可否寄他们一阅,再寄回给你们?

2

兹寄来 R'esum'e 三份,及来信一个 copy[副本]。

3

兹寄来《思与言》一册及《大学生活》五份。后者由你送人。无论怎样,台大是你们的母校,你们总有些关心她。读她总有些温暖的。上面有我的访问纪录。

·2·

[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

张灏学弟:

1

你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给我的信已经收到。融融给我的信,也已收到。贺年卡片也已收到。谢谢。你们对我事的关切、考虑、和致力,使我感到寒天里的温暖。世变如斯,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处此境况,我们须临之以忍耐并努力以赴。

2

斐理哲先生约定寄 funds[研究费用]来。可是,已经两个多月,毫无消息。你好像不久要回南部去了。可否请你就近询问斐理哲先生一下?

3

你患的感冒,凉来已好。患感冒的原因,可能是北部天冷,加以工作过忙而抵抗力减弱所致。

提到忙累,实在是“时代之艾”。这是打了一回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藉工业化来搞“复兴建设”,搅出来的局面。在这一局而中, intellectual aristocracy〔知识贵族〕逐渐解体了。回忆战前的读书人多么写意。现在知识商品化,于是连致知的自由也逐渐受到限制了。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常常笼在种种 tyrannies〔暴政〕里: tyranny of myth tyranny of religious creed; tyranny of despotism; tyranny of ideological claptrap; tyranny of total organization; tyranny of industrialised bureaucracy〔神话暴政;教义暴政;专制暴政;意理鬼话暴政;集体暴政;企业官僚暴政〕;一般妇女们被笼在 tyranny of vogue and fashion〔时髦暴政〕里。……In general〔一般来说〕,凡属 value system and its institution〔价值系统及其制度〕,不是 spontaneously〔不知不觉地〕使你呼吸于其间,而是有意被用来建构 whatever form of domination〔各种统制形式〕,你自觉得不合自己的 value system or disposition〔价值系统或气质〕但它已对你构成一种 pressure〔压力〕,使你不能不去 deliberately conform to it〔费尽脑筋迎合它〕的,都是 tyranny.

我这半辈子追求自由,当我在院内散步,想到这里,内心有时不免些微感伤。我感到我像故乡田畔夜间扑磷火的小孩。他是的确看见了磷火,他喜爱它,他想得到它。但当努力向前扑去时,往往扑一个空。

当然,这一扑向自由的“内在的动力”,并不因挫折而消失。也许这正是人类文明突破性的创造力之所系,也许这正是人类值得活下去的基本理由。

4

毓生最近来一长信。内中谈到“人文学”的种种,有些见解之深广,使我的心灵为之震动。这算是新年收到的最佳礼物。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非千言万语不能道其梗概。这只好在别的机会去谈吧!

5

你的著作大概快要完成了。我希望有机会读到它。 祝二位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海光

一月八日

致何秀煌 (七封)

·1·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九日〕

秀煌学弟:

1

我最近才弄清楚,在美国收挂号信得亲自去领。难怪我的侄儿常常向我提出抗议,说是如果没有特别的要事,寄平信就好了,请不要寄挂号信。我对你也要遵守这个原则,尽可能地不寄挂号信,而寄平信。可是,一件事情重要或不重要,并非一个事实(陈述),而是一个价值判断。像我这样的人,平时绝不写应酬信,不同任何人敷衍,要写信的话,不是论学,便是谈事。所以,在我,一动手写就是重要的。依此,要我寄平信,只好说是迁就收信人。现在写这封信,其中事关你们结婚的人生大礼,不能说不重要,所以又

写了这封用挂号寄的信。

2

首先,让我向二位道贺,祝你们在圣诞节的喜悦气氛笼罩之下行着愉快的结婚礼并且过着愉快的生活。

3

我从前对你说过,我有一个侄儿也在密西根州。他大概是一位物理学博士。他们一对夫妇是那么温厚、善良、开明、平易,很好相处,不像我这么生硬,动辄严格地批评人。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你会喜欢他们和他们的胖孩子。我已经把你介绍给他们。我并且希望他们代表我前来参加你们的婚礼。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结婚的地点距离他们住的地方究竟有多远。然而,无论他们能到或不能到,我希望你们寄他们一张请帖。

4

这两天有一件极令人高兴的事。昨天下午四点钟淑儿来,我拿点心和最好的咖啡招待她。我们谈了两个钟头;谈的内容有她和傅伟勋之间的种种,傅之为学和做人,以及他最近出版的这本哲学史。词间,我之严切你是熟悉的。临别时,我一再强调,我绝不要在背后道论人。只有当许多人摆起一副架子,拒绝别人论评时,我感到气闷,才大骂一顿。诘知今天上午傅伟勋来了。我就说哲学系的一些老人如何如何饭桶。你在这种环境里,许多人不及你,于是被宠坏了。但是,你没有碰到顶硬的人。你不从基本训练入手,就作那些大的 speculation,这是中了方东美的毒。你要想有真的成就,必须趁年纪还轻的时候,赶紧重新打定基础,将来可望有些真实的成就。同时,你读的哲学,未见之于行事为人;足见没有内化。他大都承认,而且是真诚地承认了。只是关于我说的他受方东美之影响一层,他竭力否认,他对方东美的批评,颇具 insight。

他说要从头干起。他说去年本可到夏威夷开会；可是“那种茶会谈不出什么道理，我拒绝前往，改请野和尚金礼福前往”。这倒还有点 taste。他告诉我，他颇受你的德化。他这人一付滑滑假假的样子，给我的印象欠佳。可是，在严重的敲击之下，毕竟显现了震动式的真诚，和灵光的展露，我实在高兴。我们的了解也增加了。

我觉得你有一股道德的领导力，常能“化敌为友”。你对人不轻易施以攻击，也不凭冲动做事，不像我这样的一个焦躁的心灵，看见人有一不是，马上施以严厉的抨击，结果“四面楚歌”，更是一筹莫展。这次跟傅的深谈，在我把他的外衣拨开以后，发现了里面颇为宝贵的内容。对我而言，颇有点教训作用，就是仅从静态来批评人是容易犯错的，还得从动态来作判断。

5

海外有许多留学生，尤其是习文法科的，多少有些失落感和孤独飘零之情。我实在嗟叹这样的一代！依照 E. Fromm 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之中的人，[……] 实在危险！仅仅是面包和汽车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创造一组新的理想价值系统。你说我“随着年纪增长，也许你略有灰心之感。”一个人的某些想法，也许受年岁的影响。可是，我近四五年来的一些变化，主要原因之一，系受我接近人理科学的影响。由于我接近人理科学，我更了解“众生好渡人难度”（借用佛语）。我自觉到我的心灵状态是一方面向上提升而另一方面又向内收敛——当然，碰到逆意的事、逆理的事，也会爆发；可是，过一会儿也就消散了。近年来我愈益感到人事之难以对付，而且我在现实中十分孤立，所以愈来愈少与外界接触了。然而，这并不表示我“灰心”。我希望慢慢改正自己，醇化（“etherize”）自己，在学术思想上为我们这一代的人做个真正的拓荒者。

6

我有位朋友徐传礼君，人极诚挚、苦干，头脑也还算锋利的。可是，每次的来信，总是充满了悲怆之情，看来他是很寂寞的。一位真正帮助人者是能给人精神以支持者，我希望你能给他一点热力和温暖。论年岁你是学弟，希望你在抽得出空时先写信给他。地址在下面。

好了！下次再谈 谨祝
圣诞快乐，新年进步，新婚好

海光
十一月二十九日

殷乐义：Dr. Lo I. Yin
1384 E. Lincoln
Birmingham, Michigan 48008

徐传礼：Mr. Hsu Chuan-lee
501 E. College Street
Carbondale, Illinois

·2·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秀煌学弟：

1

你们结婚以后，即未见来信。近况怎样，时在念中。

2

这个半年成中英来台大哲学系教书，还算不错的。思路比老一辈的人清晰多了。我觉得值一个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

3

托你购的两本书有否购到？

4

近日心情时欠开朗。古人云：“患莫大于有身”。其实，患莫大于有生命之自觉的意识。这年头弄哲学的活该倒霉也。

附寄照片一张。 并祝

俚 安

海光

一月三十一日

·3·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秀煌，剑芬：

信及叶新云同学转交的美金五十元支票均收到，非常谢谢你们。

老师于五月一日开刀，割除三分之二的胃。五月十五出院，现在家调养，老师目前的情形，一直 So far so good，精神不错，胃口极佳。

老师这次生病，得到许多同学的关怀及帮助，真使我们又感动又感激。同时上帝也在老师身上创造了一次奇迹，使我们有信心胜过恐惧及疾病。

这时才知道“信心”是多么重要啊！我是时时为老师祷告，愿神看顾他一天比一天健康，直到完完全全好了。

老师说等一久他会写信给你们的。 祝
快乐，平安！

殷夏君路上

五月二十八日

·4·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

秀煌，剑芬：

许久就要给你们写信,但是笔重得很。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谈才能表达较多的意义。

我现在所能说的只有下列的事情:

(1)我的胃病已经完全好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2)秋后哈佛大学请我做一名“research fellow”,为期两年,全家同往。我们现在正在办理 red tapes 中。

(3)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来看你们。但是,如你们所知,我们一出门都是乡下人,很不容易摸清美国的复杂交通系统,而且路费不会很充裕。我们希望努力克服这些困难。

有的时候,我还是有机会读到秀煌在别地发表的作品。那些作品至少流露两点:一、怀念故乡;二、对自然的爱好。我是多么希望能够和你们分享后者!

见到双福没有?他是一个 socially eccentric,但却纯真的学人。

希望不久能面对面的谈心。 祝你们

愉快

海光

七月十日夜

·5·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秀煌学弟:

来信收到多日,天天想着要写信给你。可是,每次隆隆重重地要写的时候,却有“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日前业宏来此,我提起这事。他也说,并非没有写信的时间,而是没有写信的心情。这似乎是这一时代里这一环境的情形。我只觉得闷塞。闷塞些什么,却也很不容易说清楚。可是,你们总可以凭记忆中的原料想象到一些。

现在要说的,是所赠的书全部收到了。总应该说声谢谢。然而,照我目前的心情来说,连这也是多余的。

你们现在安住一个朴素而宁静的小城,这引起我多么大的渴望!我所希望的意景,要么就是“小桥、流水、人家”;要么就是高山、巨泽、森林、海滨、石屋。可是,这一切,目前只有在梦里去寻。然而,我现在已成一个连梦也稀少的人了。也许,我的梦白日已经做了吧!

无论怎样,如你们想象得到的,我厌恶氛围里的一切。我只有把自己关在这个小院里,保持住不和外界接触,心灵才得到一点宁静。唉!多蹇促的生命!人生虽短,要好好过去,可真不容易哩!

有学位的人未必即有真学问。但是,为了市价,学位成为商标。同时,在像样的学校,拿学位的过程即是一个好的训练。例如,哈佛毕业的成中英。可是,急于去拿,为学位而学位,实在大可不必。我总认为学问是毕生事业,悠也久也;当作“business”,就太没有意思了。

Deontic Logic 乃 Modal Logic 的一支,有助于建构伦理学。你写的书目,我当然有兴趣;便中希望寄来一册。

关于我想“推荐陈鼓应人哲学系”一节似系报导有误,不然就是你对此事的了解有误。兹简陈于后:陈鼓应急欲进台大。系方谓如进台大,只有逻辑可教。他说就教逻辑,并一再挽我支持。他的逻辑不行,我自然很清楚。可是,在这次台大哲学系稀有的系会上,我还是代他说了一半,让他兼任。我的理由:一、让他有一个努力试验的机会;二、他天然的头脑至少不比哲学系至少一半的先生糟。因此,如不让他试验,殊有失公平。

你所谓“自己的土地”,我不太了解,是 physical, 还是 political? 是 historical or otherwise? 是 emotive 的还是 rational? 说来实在复杂

啊！我，当然还有救世情怀。可是，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人太少了总是不济事的。一、二人明白，举世皆糊涂，纵有耶稣下凡，也是很难措手的。愿见黄河清。

再谈 即祝

快乐

剑芬同此

海光

七月二十三日

又你们的住址常变动，这也是不便通信的一小因。

·6·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秀煌，剑芬二位；并请给双福看：

又是许久没有通信了，近况可好？

我来美的“手续”，办得极不顺利，被官方拖延三个多月了。到写这信的此刻为止，官方既不说“Yes”，又不说“No”，实在是妙！彼方之意，似乎很明显：一方面不敢放我这个“危险人物”出笼，另一方面又不敢背“警察国”之名，于是就使出传统的手法——拖，使我的事自动的 expired，于是不了了之。

我觉得这次是我出来的最好机会。如果这次不行，又不知等到何年何月啊！所以必须尽力争取。这三个月来，我们曾多方努力，但皆无效。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我认为只有采取联络海外知识分子写信向此间手操实力者呼吁之一途。有人反对这种办法。反对的理由，我曾再三再四的考虑过。结果，我认为，在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可行时，只有实行这个办法。何况我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来断定这个办法一定害事！当然，这个办法会使年轻人感到 quite disgusting，哎！谈至这一点，在这个时代，似乎没有人的感

受比我更深吧！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年轻的朋友认为为了“救我出笼是否值得作这点牺牲。如果大家认为我值得救一救，我是盼望大家为我一试的。”

做这种事，造成“声势”是第一要件，所以联络到的人愈多愈有效力。如有“博士”、“博士候选人”、“某某大学任教”等头衔，必须拿出来。这样做当然酸俗。但是，我们现在正要面对的是一个酸俗的世界。酸俗才能增加分量，因此才能增加力量。同时，写信的时候，尽可能不用这一纲要的原有字句，但须力求简练。不用说，刺激收信者的强烈词语是必须避免的。因为，写这信的目标不是革命，而是希望有助于我出来。

我在下面开列我认为妥当的人之地址，希望你们请他们，并说服他们，早早采取行动。为了方便，请把这份纲要重抄过分寄他们。为了种种原因，请不必使他们知道来源。我认为在全部进行的过程中，只有这一点 is to be eclipsed。不然，副作用真是太大了。

希望，真是渴望，我们不久能欢聚一堂啊！ 谨祝

秋天好

海光

九月七日

哲学系 谭陵 Miss Lana L. Tan
10948 - 88th Ave.,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除黄皮肤外，请她找加拿大籍的学生，另外写一英文信。署名的人越多越有力。

物理系 卢澄乾 Lu Chin-chian
1414 Highland Ave.,

Knoxville, Tenn. 37916

请他多找人。

政 大 徐传礼 Hsu Chuan-Lee

General Delivery, Stateline Station,

South Shore, California 95705

王志英 她在科伦比亚大学当中文讲师,曾托人带我五十元及感情深挚的长信一封。可惜地址不详。有法子打听否?如找到她,她曾在纽约发展到许多人。

·7·

[年代不详]

秀煌学弟:

1

藉着文字而吸收的经验常常不及直接吸收的经验。你此番可以直接经验到一个“open society”里的实况是和“closed society”怎样不同。我总觉得在这个岛上的知识分子缺乏一点“氧气”,实在可怜的紧。

希望你尽情地吸收吧!

2

你说“在台湾一个人很容易变得心冷”。这话特别适用于 sensible 的人。为什么呢? Harry Levinson 说:“人人都喜欢觉得,自己能够操纵自己的生活,而且希望越来越能支配环境中与他有关的种种外力。如果一个人觉得,他对这种种外力无法驾驭,日久就不再奋斗而变得对人事漠然。”这正好说明台湾一般知识分子为什么对社会漠然。我对哲学系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但我又不能做到完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地步。

3

傅伟勋最近出了一本《西洋哲学史》。他很热忱赠了我一册，我很谢谢他。可是，就内容来说，我实在为他悲伤。如果是你写这样的一本书，那么我一定劈面就说：“你的哲学还得从头起。”可是，对于他这样不够成熟的人，我怎能说呢？这样的一部大著，大有助于他指日成为副教授。那就更不能说了。我打开那部大著来看，方东美的影子，赫然在目。礼貌一点说，方东美夫子是一个活在“Platonic dream”里面的 dreamer。他一辈子都是如此。他教哲学就是 duplicate 跟他一样的 dreamers。当然，在当今之世，尤其是在像台湾目前这种环境，一个 dreamer 远比一个 waker 幸福得多。一个 waker，就是一个 empiricist thinker。这种人是难得快乐的。

福增最近来我处，我把傅著给他看。他一翻开，就发现错误满页。这部著作，正好提供一个证例，来显示我平时指责的东方人搞哲学的通病“指法还没有学会，就要弹调子”。这实在危险！实在玄空！个别的小错且不谈。全书他要以一种想法来观照。这就是不自觉地事先假定了一种 Monism。何以见得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一个 monistic 的线索可循？我们之无从预设它是 monistic 的，正如我们之无从预设它是 pluralistic。究竟怎样，只有跟着历史走着再说。

这里的人总以为 philosophical analysis 是“哲学的一派”。一旦自居何“派”，便是自设藩篱，哪还有何“哲学活动”（借用维根什坦的名词）可言？Philosophical analysis 只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如所期望，中立于哲学上的任何 sect。我把这些先生们的作品一看，更感到这种训练有基本的重要。

4

今年我“又”休假。可是，我自动教两门课，各三学分。一门是 philosophical analysis，改变教法及更换教材。另一门是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knowledge。我用的教本是 Thomas English Hill,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Knowledge*, 1961。这本书是一部力作,而且内容丰富。可惜本系同学——老师包括在内——没有真正预需的知识论的训练。这部力作对于大家嫌太深了。未知你们那儿可有合适的标准知识论的教材或教本?

5

暑期我写了两篇文章,现在寄给你。如果你有空,或能抽出一点空,希望你看一看。你的意见,我总是重视的。你已经置身于和台岛极不一样的一个社会文化场地。可能,你对于我十几年来来的奋斗,多一些同情的了解吧!

我另寄你一篇“指教”我的大作。凭此,你可以新鲜地了解目前这儿的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的一面。

6

我,或我们,最需要于你的,就是要你做我们的窗子,使我们多少得知外面有关哲学的种种——包括重要的出版在内。当然,我们所须知道的出版消息,以逻辑、知识论和伦理学为主。

7

我个人所要你“效劳”的,目前是买书。可是,我不悉你现在的经济情况怎样。想来你初到美国,总要添购东西,尤其是台岛前所未见的那些厚而且重的冬防衣物。因此,我想你不会太宽裕,不会有太多的钱垫出给我买书。不过,我还是开列三种如下。三种合计不贵,大概在十元左右。第一和第二两本在美国不难购到。第三本似乎是英国出版的,请查查看。购到后,最好挂号直寄我处,以免遗失可惜。我的经济情况可以叫做“阵雨经济”:偶尔有点稿费或“科学研究”补助金时,就可以买一点书。你替我买的书,我可以你指定的任何行得通的方式付还所需“资本”。

8

本年以内,大概不会再给你信。因对我而言,邮费太昂也。

祝你

快乐,进步 并预贺

新年

海光

十一月六日

(1) A. N. Prior, *Logic and the Basis of Ethics*, 12s. 6d. Oxford Univ. Press.

(2) J. O. Urmso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ts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8s. 6d. Oxford Univ. Press.

(3) Nidditch, P. H. *Elementary Logic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致罗业宏 (十九封)

·1·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业宏:

你真的到了那梦幻一般的岛上,我真为你兴奋而高兴极了! To say the very least, 换换环境,无论该校的学术气氛怎样,对你总是一件好事。

Have you had your orientation finished yet? If so, how about the result? 我对于该校的实际情况茫然。我只听到这里的美国学生们说,该校的 academic standing 不高。对于该校哲学系,我只有一点 faint ideas which so far occupied me。第一是几年前搞些“民俗学家”,其实这些拥护民俗的人,并非真的民俗学家,真的民俗学家是经验

科学家。与/或不三不四的污七八糟的人开会。看名单,没有一个够得上是能做严格思考的人——我根本不管内容,这与人之学历毫不相干。第二听说课程只有存在主义和东方哲学之类的东西。吾非教皇,当然无权禁止学校教这些东西。但是,我教哲学系愈久,愈觉得这些松垮垮的东西对于年轻人思考之训练一点帮助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一位纯数学家又是一位诗人。然而,我的经验促使我越发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要使年轻人做一个 independent and stringent thinker, 必须严格地先从那些硬硬帮帮的课程(1)现代逻辑;(2)语意学;及(3)科学的哲学解析下手。否则,哲学也者,不过催眠剂而已。我不确知该校哲学系是否这种情形。如果是的,那么对你的影响怎样,当然是值得从长研究的。然而,无论怎样,一定比你在友联做事时的环境好得多。你正可利用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审度情势,做种种准备和打算,建立起自己学问的基础。有了学问的本钱,一切都比较好办了。

暑假后我所要 offer 的一课是“Language and Meaning”。为了实行学术合作,我当然很想将印的讲义寄赠各位。不过,究竟是否寄得成,主要地看印得是否太糟而定。依过去的经验,台大的印刷真是“不敢当”:错误百出;不堪卒读。希望下年的印刷进步一点。

Nagel 的新著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自出版以来,学界赞誉。想来是一可观的贡献。有一位在美国习物理学的同学已赠我一册,现正在寄递途中,等寄来当细续。

我近来读的书,除哲学外,有 Stark 的 *Sociology of Knowledge*。这本书写得欠佳,思路混乱。不过,该作者学问颇丰富,有许多地方很 suggestive。知识社会学这门学问尚任其 childhood。可是,在说明思想之 General trend 上,颇有帮助。传统哲学里的某些问题,根本就是知识社会学这门经验科学里的问题。(例如, Hegel 等所

云“精神现象”，“Zeit Geist”等)。

张灏、林毓生他们，你有否写信？朋友们久不通音问，会生疏的。他们的学问实在比那些老辈好得多。我们的知识圈子有增大的必要。再谈。 祝你

快乐

海光

九月十九日

又你所提及的“*Bertrand Russell Speaks His Mind*”此间尚未得见。何人所编？何处出版？

又此老近又被判坐牢七天。知之乎？

·2·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业宏老弟：

别笑我老是把事情搞得那么严重，爱寄挂号信。这当然涵蕴一个价值判断在其中。跟你们通信，我认为是一件大事。你们的来信，对于我们这里的风气多少有些影响：时时吹来一阵新鲜空气，至少对于这里弄哲学的青年多少给予一些震荡和启蒙。叫他们知道，现在的这一套，并非殷海光一人之见，而是一个基本性的改变。要学哲学 *philosophistics* 而能不致愈弄愈糊涂，这是一条必要的路径。

这学期我请洪成完讲形式语意学。哦！真是不错。他这二三年的进步真够神速。这样独立自主的研究者，我想在地球上任何区域都是不多的。如果他再能到像南加州大学或史丹福大学这样的学府训练三四年，那一定又成一个在这方面站得起来的脚色。此外，前不久杨国枢讲演“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中国人的性格”。*Quite scientific!* 我得到很多启发。他对方法运用之灵活，掌握经

验 data 之丰富,和分析之清楚,在台港一带是少见的。

我想请你送我一本书:

Stephan Komer: *Conceptual Thinking*, Dover, \$ 1.75

这本书现已出这种廉价本。希望你最近就购。

看光景,你到南加州大学以后,似乎已进到一个 New Frontier 里。希望你得便时把那里的情形报告给我,使大家得点 fresh air。别的事情可看给民雄的信,用不着重述了。

又,有否游好莱坞,吃唐人街? 再谈 祝

快乐,进步

海光

三月二十八日

·3·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业宏老弟:

0

收读你的来信是一乐事;写信给你也是一乐事。当然,由于收读来信而意识到的美国第一流大学哲学和逻辑进展神速,也引起我心情上的紧迫感和沉重感。We are now facing an Age of Upheaval, or an Age of Analysis, or an Age of Criticism, or an Age of Anguish! (Yervant H. Krikorian and Abraham Edel: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 Problems*, Preface)

1

你的信中不仅思识 Quite sound,而且意境优美——至少我觉得这样。我想象着,一个青年 who is quite philosophical and thoughtful, rambling alongside 那美丽河畔的林荫道上;他似乎在浏览自然的景色,又似乎在沉思。也许,这异乡游于太寂寞些吧! But 寂寞

是任何伟大的思想家的凝炼乡。吓! if possible,我真想到那遥远的海边、山巅、松林、石屋里去沉思数年。

你的信,是真与美的结合。它对于我们这里的知识青年会很有益。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拿给澄波办的哲学季刊(?)上刊载。希望你能同意。

2

你说因逻辑基础不够以致许多艰深的功课听不懂;但终于努力读完这一学期;考试结果颇佳;D. Kaplan 先生并且答应将来为你说法使你能够在 U. C. L. A. 学习,这真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希望你尽力写一点可观的作品,以加强这一可能之实现。

3

关于你们与 Carnap 吃饭和谈话的经过^[1],希望赶快写出寄来:怕日子久了,印象不够 vivid,淡忘了。又我非常希望你写一篇文章“*How to treat of philosophical(最好是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in a technical way*”。写时选择几个 typical 的实例示范。这对于帮助我们推动 technicalization of philosophy 极为有效。你知道我对于此点持之甚坚。但,从一现代的标准看,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需要弟等力较足者来干。而且,做这件事,对你自己而言,也正好是做一练习^[2]。希望你答应下来。[(逻辑对哲学我是在 feel 和 know(知识学)何以这样 indispensable)之间。]

4

你说:“I'm now convinced that appealing to intuition and formulating a problem in the vague framework of natural language should be avoided if we want to do philosophy seriously.”这话要 scrutinize 起来真个是“说来话长”。For the time being,我所能表示的是:(1) This is rather a claim. (2) 这与 Oxford approach is almost diametrically opposed. (3)

I would rather prefer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4) However, "intuition" and "formulating" (formulation) 根本是两回事。后者之 subject to linguistic adjustment and /or scrutiny 远较前者为甚。(当然, Theoretical constructs 之 construction 须走 Carnap 及 Tarski 之路, 此则为更进一步的 claim)

5

你说 Mr. Scriven 谓 There is an "essential unpredictability of human behavior." 我实在想不懂。我所想得懂的只是 human behavior 很难预断而已。假定 Scriven 所言成立, 那么一切心理实验室岂不可以改成花园? 此点实在太重要了。

6

关于 natural deduction 我只在 Quine 的 *Methods of Logic* 上见过, 且语焉不详; 我简直连一点 faint idea 也没有。It seems to me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P. M.*, 逻辑关系重要的进展, 除了 Gödel 的 theory, Set theory 对 foundational problem, reconstruction 和 recursive function 以外, 就算 natural deduction。

7

读书报告: 最近一个月以内, 包含你们所赠的在内, 一连收到二十本书, 简直应接不暇。其中最为我所须读的至少有一半。兹谈二本。第一本是你送的 Körner 著 *Conceptual Thinking*。这本书可说是 philosophical Analysis 的一示范。写的堪称细致。有些地方我读起来颇觉吃力。但它对我的帮助很大, 所以无论怎样我要细嚼它, 直到全部消化为止。第二本是 Francis L. K. Hsu: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 Approaches to Culture and Personality*。我想这门学问与郭任远先生近来的研究极有相干。这门学问只有二十五年的学龄。该书内容与我所要做的工作有密切关系的论目至少有一半。

我准备至少读一半。另外林毓生送的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据说是 Mill 以降这方面最伟大的著作, 我已读了一部分。Hayek 思想之周密, 和学识之渊博, 实在令人惊服。别的书妙趣亦多, 简直使我应接不暇。殷海光变成三个就好了。(一个习 Logic; 一个习行为科学; 一个谋生)

8

我想是想写本逻辑, 但一方面自问训练太差(又出了个 natural deduction, 使我更慌), 另一方面又要写一思想史(analytical)忙不过来; 所以, 虽然资料堆积盈尺, 仍迟迟未能亦不敢动手。最近成完等极力怂恿我开始。看样子非开始不可了。有些论目成完等可帮助我——成完非常 sharp, 为人也纯洁而真诚; 自你们走后, 他要算最好的青年朋友了。——; 可是, 有些论目则需要你们帮助。例如, 假定你把与 natural deduction 有关的资料寄来, 又假定我因能 marshal 它而采用之, 但我们通常是照着 *P. M.* 系统走的, 那么该怎样处理?(目前我还不悉 natural deduction 与 *P. M.* 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我希望你和民雄多多帮助, 使这部中文 logic 书写得生色。过些日子我会把细目寄给二位, 请多多提供意见(“意见”二字极不合, 姑用之)

9

Suggestions:

(1)在你送给我的 Komer, *Conceptual Thinking* 后面(广告 page 9)有一本书 *Primitive Man As Philosopher*, *F. Radin*. 该书的说明写着: “A standard anthropological work covering primitive thought on such topics as the purpose of life, marital relations, freedom of thought, symbolism, death, resignation, the nature of reality, personality, gods, and many others. ……”我猜想这书所说的内容与古往今来一切未经 pu-

rification 与/或不能作 conceptual thinking 与/或不能运用 symbolization 及 formalization 以作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的“哲学家们”在思想的基本 core 与/或 kernel 与/或隐藏得最深的那些出发点与/或 Santayana 所说“animal faith”上实在和这书所说 primitive man 并无二致。印度为 caste system 而辩护的“哲学家”，港台一带为“历史精神文化”而著书立说的“哲学家”亦然：充其量只是学问上的装潢较原始人高些、复杂些而已。这类“哲学家”，与 Carnap, Quine, Tarski, etc. 相较，并非谁好些谁坏些，谁高些谁低些，而是根本不在同一时代。They are not different in degree, but different in kind. 这本书我猜一定很有趣。如果你没有看过，as a pastime, 你愿否买它一本读读？Two dollars only!

(2)你既到 Boston, 当然会去 Harvard. 请你代我问候张灏, 并请他寄点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 writings 给我读, if any. 我不知道他的地址, 因为: 一、许久没有通信; 二、他的住址似乎常变。不过, 在这儿一定可以问到: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6 Dunster Street, Cambridge.

(3)你既要 Stop over Seattle, 愿否去访问我们一个熟人? 如果方便的话。如果不方便的话, 最少请你按址打个电话给她, 说我托你向其全家致意。她是一个聪明而有趣的人。

Mrs. Winnie Chu(朱), 4011, 152nd Ave.,
S. E. Bellevue, Washington.

够多了! 下次再谈, 盼望着你进一步的来信, further letter 意也。并祝你
旅途愉快

海光

六月二十六日

又如方便,可否寄一点 Minneapolis 的明信片来,让我们分享那里的美景?

注 解

[1] 可否就近向他索要(用我的名义也可,用你的名义也可)他所作与此有关的作品?

[2] 你能否寄来一点 expository writing materials, or, to say the least, 指定我们若干 available and accessible 的 References?

•4•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

业宏学弟:

1

近来时常想到要写信给你们。在未提笔以前,好像有许多话要说;但一提笔,要说的话似乎消散了。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心理方面的特征。

2

我对你们关心的有两件事:第一,你们的情况有否改进,在哪里工作。第二,读书的进境怎样,读些什么样的书或专文。

我有时偶然读到港九的出版品。如果那些出版品是代表港九的文化水准的话,那么那样的文化水准实在不高。港九有相当的自由,经济条件也不差。在这样的情境之中,港九的文化水准应比现在高一点。在哲学方面,一般的思想方面,弟等大有努力的余地。

3

我的近况,几乎可用“如常”二字尽之:读书、思想、写作,在院

内漫步,做点园内杂事,偶尔和访客谈谈。我年来求知的兴趣扩大,因此读书的范围也相应的扩大。这样一来,所知的也增加了。不过,相形之下,理论哲学在我心中仍居最高地位。我喜爱它的纯净和彻底。

4

有便时盼来鸿。 谨祝

俚 安

海光

九月十二日

·5·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

业宏:

0

你寄的那么多美丽的明信片、画本和一本书,都先后收到了。谢谢。美的事物,是我们人的世界所不可少的。不然,多么乏味!年来,看形迹,你似乎对此也逐渐发生兴趣。

1

你能继续在加大南校读一学期,这是非常可爱的消息。那里的高手多,能使你进步较快。但不知你这学期修习一些什么功课;也不悉读完这学期以后,你的动向何如?

2

信中讨论学问的事,我几乎完全同意。关于 Natural Deduction, 我比从前明白一点,它是从一九三四年 Gentzen 发展出来的。因其在演证上的 agility 较 *P. M.* 为大,看来会取代后者的证法。

3

这个学年,如前所说,我本来打算教基本符号逻辑的,无奈许

多条件未备,今年改教“历史的理论”。这门学问,现在浩瀚之至,弄起来是够累人的。

4

现在有下列几件事托你:

(1)有位朋友徐传礼君,现在洛杉矶,曾和民雄见过。徐君为人极诚恳——这在今日的世界是少有的,且向学心切。但彼初来此地,事物不熟,心情尤为寂寞。希望你在不妨事时给他一些温暖和鼓励。我另写信给他,要他来找你。他的地址是:

Hsu Chuan-Lee
949 Chungking Road
New Chinatown
Los Angeles 12, Calif.

(2)Camap 教授现在已否退休? 他的地址可否查到?

(3)据说 Sidney Hook 编了一部书,叫做 Dimensions of Mind。这部书内容怎样? 对于 sociology of knowledge 有否一些贡献? 价钱多少? 请你调查一下见示。

(4)我今后较须注意的逻辑是 Logic for Philosophers。今后如有这类著作或出版物,请代为留意。

5

其余要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但是,临纸彷徨,反而不知从何说起。邮费,对我而言,实是太贵。一九六二年以内,如无特别事故,不再写信。明年再写。因此,我在这里很早很早的预祝你:
新年快乐和进步

海光

十月十八日

又:(1)请你把这后面的一封信转交民雄。

(2)在转交此信之前,你被允许阅读此信。

·6·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业宏:

0

不久以前写给你的信谅已收到。托你打听 Carnap 教授的住址等事,未知已否抽空进行?

1

十月二十日的来信已经收到。信内许多道理,真正是“深获我心”。所说美国和加拿大的分别极是。加拿大那种光景,咳,正是我梦想中的天堂,原来人间早已有了!如果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大国们都以加拿大为榜样,那么大家岂不是快活了?其实,祖师爷 B. Russell 多少年来所倡导的,在基本上还不是这一境象之实现!

2

所云 Kalish 先生的看法,我有保留的同意。我们有必要把 formalized language in logic 作一标准的 language(严格地说,只能算一种 language sketch);而把各门的自然语言之翻译成这种语言的事委诸各门专家。但依 Reichenbach 先生的说法,吾人必须在前种语言和后种语言之间找出一个 coordination,准确的翻译才能进行。这一个 coordination 怎样找出?再者,如果逻辑家不懂经验科学(理想的逻辑家应该一点也不懂),经验科学家不懂逻辑(事实上的经验科学家常常如此),那么翻译工作岂不是也无从进行?

My way out 之一 is 把形式语言作一个事后检验 validity 的标准。Structurally,二种语言间只能求得一 partial congruence。除了在极高的理论建构层次以外,当自然语言在经验界域打滚时,Strawsonian challenge 多少还得顾到。理论建构的抽离层次愈高,吾人须

仰仗形式语言之程度愈大。理论物理学是其具体的 exemplification。

以形式语言作标准构造,自然语言依之作翻译,这种办法能促进自然语言增加 structural exactitude,而且较便于作 transformation, derivation。

要满足经验科学之目的,必需:(1)Rule of Designation;(2)Rule of Truth;(3)Rule of Range。这些 Rules 的订立,都是非常费事的;但为到 scientific language 之路。

Copi 的书太松,我老早停用。但我也须考虑教育因素,所以选书时不能只考虑 formal strictness。如果你发现适于做大一逻辑教本的书,请随时告知。

3

十张照片收到。初次试拍,能有这样的成绩,真是不错。你好像胖了许多。你在观音菩萨前的照相,样子一本正经,可与观音比美也。我把它们给双福、成完、Abby 等人观赏,大家都同声赞美。我所顶喜爱的是 May Lake。咳! 苍茫幽邃, Metaphysical! Poetical! 其次是加拿大瀑布。我常常想,一个人既可以是一位解析家,又可以是一位诗人。Elliot 似乎是这样; Kalish 教授好像也是这样。这些人是可喜爱的。我常常想,最可恶的动物是人,最可爱的动物也是人,虽则他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4

你能继续留在“加大南校”——希望这次说的没错——一个学期实在是好消息。但未知以后怎样。我觉得夏大至少对你而言没有什么意义。最好能设法久留美国本土,慢慢地读下去。不知道你是在怎样准备的。

5

悦恒有信来,希望他能念得好。展骥也有信来,他在香港似乎搞得满上路。朋友们都有办法,总是令人开心的事。

徐传礼君谅已见到吧!他虽然在台湾教过逻辑,但他显然还得从最起码的训练起。因他从前的老师是陈大齐,太不相干了。希望二位在不碍事的时候提醒提醒他,请他按步就班的进行。看来他似乎还诚心向学,而且为人颇有 sincerity。

暂停 祝你
进 步

海光

十一月二十一日

·7·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

业宏:

0

一九六二年轻地从我的发尖溜走了,真快!我的头发白掉了一半。这一年中,我脑筋里装的东西变换不少。而最不易了解的是我明显地意识到友情对于人的实存生活之重要。

当然,人为什么要在 $365 \frac{1}{4}$ 天过年, that's quite contingent。火星以地球上的八十天完成公转一周(记不太清,一查便知。),所以我们过一年,他们要过四个多年。于是,我们一年“新”一次;那儿有“人”的话,要“新”之次多。今后太空科学如够发达的话,我们的老祖宗传下来的 geo-centrism 之消失,亦若 class-centrism, national-centrism, 等等之消失——或终将消失。到那时,“国际”一词相类于“校际”——sink into insignificance; 而代之以起的是“星际”。那时,地球内部已无人办外交;要办外交只有“星际外交”。

不过,目前,我们还在这个小圆球上爬,我们习惯地以这个小圆球围绕那只看来花眼睛的大火球转完一周算做一“年”,而且,如果无人藉词逼债,这样分个段落,至少没有大害。好,在这新年开始的日子,回顾回顾过去,展望展望将来,似乎是一件有些意思的事。

过去的一年,对我而言,简直完得太快了,就像昨天一天之消逝一样。说到这里,即令我这个比较 tough minded 的人,也不免微有伤感。眼前的阿修罗周遭(借用佛语, emotively,)因其“意境”高超,使我好像自己是一道行高超的贫僧,而目清瘦,头发花白,一群恶犬围着他,随时准备把他撕个粉碎。他则冥目合十,寂然不动。恶犬们反而愣住了,莫测高深。这里所说的恶犬,当然是 bigotry, bias, taboo, prejudice 等等的化身(embodiment)。(一号刚写完这一张,就食饭,以后就没空写。二号晚间来了两个小朋友,其中一个三岁多,简直闹坏人,于是又写不成。三岁多的一个很野蛮,但我很喜欢他。他说“要打”我。我问他用什么东西打。他说“用石头”。我大笑,说:“你是新石器时期的人!”呃,大人们还不是一样!)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这些东西常常以种种化装出现。但其为害 a desirable way of human life, 实与洪水、台风、瘟疫、火灾、蝗祸无异。Mr. Kennedy 算是把这个问题 touched 到了一点。他说:“Ignorance and prejudice” are “two of democracys greatest foes”。(*Reader's Digest, 40th Anniversary Issue, February 1962.*)但他又说这些东西“can be dispelled by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希望全人类终能实现这种光景才好。你寄来的美国学生办的刊物,真是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我读到那些简短而又有力的言论,仿佛一个黑夜茫茫在大海孤舟上飘浮的孤客忽然看见远处射来一线灯光。这告诉我,世界不完全是漆黑的,人类尚有希望;在地球的那边还有

年轻的一代的思想和我同调；他们能把 Hayek, Popper 等人的思想抓住最重要的地方，提炼出来——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我们这里的冬眠教授，能有几个赶得上他们？我细味那些言论，感到他们的热心因而内心的温慰，不是拙笔所能表达的。

我新年的希望，除了加紧完成著作以外，是希望世界的舵手们头脑清醒一点，不要胡来。我个人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不受生活之累，住到一个有流泉通过、面临大海、后靠高山的森林里，去做沉思者。Unexpectedly, 有像你们这样的通人造访谈天，毫无拘束。我可以煮咖啡给你们喝，流连忘返，如维也纳古咖啡店之客！

1

来信、书和讲义，都收到了。每次收到这些 articles, 我的心情，就像小孩收到糖果包。这些都是我最欢迎的思想食粮。S. Hook 编的 *Determinism and Freedom*, 和卡片，正好在新年除夕收到，算是最好的新年礼物。我已把 Hook 书的 Introduction 读过，已对这一重大问题厘清不少。这才算“开卷有益”。年来重读 Hompel 等先生的著作，重新得到一些了解，而且 to some extent, 可以实际应用于处理问题方面。并且由此获知那几本有关 Philosophy of science 的文集里所选的 topics, 几乎都有 significance, 不是随便摆在一起的。

你的新年卡片后面所打的 Erich Fromm 所著 *The Art of Loving* 里的一段话真是只有“深获我心”一成语方足形容。那一段话，把现代人之工具化、之危机、之悲凉，一下子 exposed 出来了。可怕也！然而，这是近代社会结构 industrialization 的结果。工业化不改变，这一结果怎样改变？人之求舒适是无止境的。我在美国东部一小冷僻的乡镇，参观所谓十八世纪的“古物”——跟西部片所呈现的差不多。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西方人的器用已经够安适了，何必搅得像目前这么烦人？坐马车岂不够诗意？如果大家都

坐马车,那么有什么快慢之分?但是, big shots 们, tycoon 们, magnate 们为了追逐利润,利用人的“不知足”心,推波助澜,以致了无穷极。这样下去, Fromm 先生所说的现代人之悲剧,只有越来越严重。(以上三号写,暂停。)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方略之一,只有把美国生产疯狂患者的大亨们一律放逐到泰国佛院去安息。然而,这有谁办得到?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 irrationalism! 一个地区也有一个地区的 irrationalism!

2

我读到所写“Reflections”,其感觉有如食鸡腿。(I am now using a controlled metaphor.) Specify 起来,非二三十张纸不能尽。现在只能挑出若干点说说:

(1)头一条是说错了。逻辑的定理 can be derived without any axiom,并不能 explains that logic is empty of contents。因为, in fact,任何科学的公式或陈叙,如微积分中者,如古典物理学中者,皆是如此。假若把它们 axiomatize,那是后来的玩意。这些 disciplines 中的任何一条皆可 derive from a null set of premisses。故:所说不 conclusive。有关这方面的理论,请看王浩于一九五五年(大概是在 Mind 上的一篇“On Formalization”。手头无此文,真是不便)

Natural deduction 出现以后,算是打破了一项 myth,即以为 logi-co-mathematical 世界里 axiomatization 非 monopoly 不可,或说,在 logi-co-mathematical 世界里的一切 statements 都得编组成像 *P. M.* 那个样子。现在, natural deduction 告诉我们,每个 formula 可以独行其是——可不从前提像几何命辞似地导演出来。

Whether logic is empty of contents, 我以为那要看 how to define the word “content”. As a matter of course, or, at least as some philosophers assumed it, logic is empty of empirical statements as its content.

However, I don't for this reason think that logic is empty of whatever content. At least, it must take a certain list of "inference rules" as its content.

(2) Sure enough, 任一界说必须以一 language system 为其 context。自 *P. M.* 以降, 对 definition 取 "freedom of stipulation" 的看法, 我像是觉得此乃刚从 Aristotelian 的 real definition 解放出来, 而进入一个新的符号世界, 得意忘形所致。In the actual practice of definitional construction, 它一定得受其所在的 language convention 之种种限制。它没有绝对不受约束的 *Laissez faire*; 可是在这些 Given 的限制以内, 它有相对的自由。这是极易在现代 Logic 著作里看出来的情形。

(3) 所说 elementary logic 的标准, 我极同意。可是, 我似乎又有点认为 "要求太多"。因为, 这么一来, 势必 *P. M.* 第一本, 大部都变成 "elementary logic" 啰! 王浩在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某期, 手头未备, 查一九五〇以后的某期王浩某文之 foot note 便知) 也提到他对 elementary logic 所规定的内容, 他的要求少一点。可是, 无论怎样, 逐渐提高标准是一定必要的。

But let me pettifog a bit, just for fun: 如果 elementary logic 未包括 identity 和 description, 到不因之而 "practically useless", 而是 "practically less use"。Do you think so?

(4) (这些号数系依寄来的文章之号数而定) 所见极是。"practical semantic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oretical philosophy。它应该附属到每一种 Natural Language 的修辞学部门里去。因每一种 Natural Language 的 ambiguity, vagueness, …… 都不同; 但我们总不好意思说用每一种自然语言所说的 theoretical philosophy 是不同的 theoretical philosophy, 谁好意思说这种话, 谁就得承认, 用英文写的物理学

和用德文写的物理学是“不同的物理学”。什么“西洋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简直是胡说！胡说！胡说之至！希特勒仁哥就说“咱们德国有日耳曼物理学”。我建议让他独得最佳勇气奖！可惜天不永年也！奈何！

(5) A fully formalized language would be empirically blind. But, a completely uniformized language would be elusive of any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The only way out seems to be a parallelism, or a mixture. (这里当然有许多技术的细节。)

(6)或(7)所见极是。

哲学家不该撇开现成的科学成果而对经验世界作任何论断。如果有人说了除了科学家对经验世界所作陈述以外，哲学家格外还能对此世界找出别的有意义的陈述，那么这是我完全不能思议的事。

哲学家所能论断者，只有后设科学。

(8) As far as “definiteness” is concerned, and if push to the extreme, what Russell remarked is right.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写那么多的哲学书？他为什么还要写那么一大本“The Wisdom of the West？”爱因斯坦的话值得注意：

“As far as the laws of mathematics refer to reality, they are not certain; and as far as they are certain they do not refer to reality.”

Anyway, 传统哲学是一大杂烩。里面有许“多”rubbish, 也有点富于 suggestiveness 的话。但要我在五吨沥青矿物提炼出 one gram 的铀放射性元素来, 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奉陪。我要利用科学知识的话, 我可以直截了当在各门科学里去找。果实既丰富, 吃起来又爽快。U. C. L. A. 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神来读 rubbish, 再成一个 Ph. D, 我认为“太划不来了”。当然, 别人高兴做书虫, 我们没有

权利阻挡。

(9) There is no ebb-tide of any isms in theoretical philosophy, 这应视为哲学进步的现象。逻辑经验论, as an ism, it vanished away。然而, its impetus, 却 permeated 到 theoretical philosophy 里; 当然, 也到新的科学里。心理学中的行为“派”及 Gestalt“派”也相似。时至今日, 很少心理学家自居“行为学派”或“Gestalt 派”了。可是, 二者所给予心理学的冲击, 尤其是 methodological impact, 经过一番 Transformation, 已经深入现代心理学。

(10) 极赞同。我们这里的哲学系, 说严重一点, 是老糊涂虫制造小糊涂虫的作坊。今年有位仁哥开一门课曰: “物质论与生命论”。又有一门课曰“哲学的人类学”。我的天! 这大概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学科!

赶快停笔, 要不然这封信更过重, 吃不消。就此提出一九六三年开始实行的“三一制”。但不知你的经济状况如何。

Feigl and Maxwell: *Current 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祝

进 步

海光

一月十日

·8·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二日〕

业宏老弟:

1

半年没有得到你的来信; 我在本年一月十日写给你的信也还没有得到你的回音。这种情形是很少有的。你的近况怎样?

2

听说你颇为懊丧。之所以如此,可列举的原因是颇杂多的。最显著的是对于前途的出路有茫茫之感;对读哲学不顺利,一看见那些陈书就没有胃口。这些情形我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历史里,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集团的人好过,哪一个不好过,这是因时代因区域之不同而不同的。在中国,知识分子从前一直是天之骄子;而弄哲学的则是天之骄子中之天之骄子。现在,他们就得让位给核子物理学家了。在从前,Leibniz, Hegel 之流常与王公巨卿交游;现在的哲学家们多成教书匠,甚至沦为文丐。个体的生命是渺小而短暂的。就出世的机遇来说,固有幸与不幸,个体不能自己在事先决定或选择。有了这一认知,我们的 frustration 可因 intellectualization 而减轻一些。

我们活动的 sphere 比从前小,可供选择的 alternatives 也比从前少,但弄哲学的人的想头却特别多(有时候“高”;Plato 是祖师爷代表)。所以,挫折也多。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自童年开始,遭逢世变,我就受到轻微的或严重的挫折。自童年而少年而青年而中年,一直是如此。现在还在基本的挫折之中:经济的、心灵的,种种等等,不一而足。这是每一个对我的处境熟悉而且 sensible 的朋友都可明了的。人生的挫折,我想是任何人都无法完全避免的,即令是库存亿万金元或手握核子武器的巨人们也不能例外。问题在于我们的 frustration tolerance 够不够强,我们能否在经历挫折中站起来,重新照着目标前进。

我承认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种重商重利社会对弄哲学的书呆子是不利的;可是我们并非没有我们的天地——尽管窄小一点。

3

据说契约规定你须回港。是这样吗?果尔,对你当然是一个不便。又据说香港政府新近办一九龙大学。你能否活动一下,暂

时回港栖身,然后再谋到欧美之路。如果这样的话,龙铎可否帮你在唐君毅那儿致意一下,谋一教席?复次,如果你认为牟润孙处不妨试试,我也可以为你写信到他那儿说说。不要像我这样闷着发愁。重要的是展开行动。

嗨!老弟!你们身在港、美的人处境总比较好多了,不用太愁也!

希望知道你的情形。 祝你
快乐

海光

五月十二日

P.S.前信所 claim 的书,Feigl and Maxwell 合编的那本 *Issues* (exact title 忽然记不起来,大概是 *Current Issu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可否买?已买否?

·9·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业宏学弟:

许久就念着要写信给你。因为,这样长的时间彼此没有通信,情况不太清楚了。可是,你的地址我不太清楚,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前几天收到来信及卡片,从上面知悉你的新址,于是这封信写成了。

首先,我所要说明的,根据过去几次的经验,我们在信中讨论问题,一碰到 *subtler points*,往往没有交通。于是,提到一下,就算了,没有结果。未知这次是否如此。

你对哲学丧失了兴趣和尊敬,这是可以的。但是,我看你的理由却不够充分。说“哲学不成学问”,必须有个限制。如果说哲学不够严格、精确、*homogeneous*,无疑是真的。传统哲学,尤其是

东方的,更是一大堆像文学而又非文学,像历史而又非历史,像科学更非科学的废料。对于这堆废料,如果一个人有钱且有闲,他高兴出高价买来欣赏,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我反对的是开一个哲学系,硬要人去读。我更反对的是像港台之间的这些糊涂虫一样,硬是说这样的哲学是宇宙人生的大道理、行为及价值的准则。可笑!可笑之至!然而,我们却不能说 Carnap, Tarski, Quine 等人弄出的一概是 rubbish。在事实上,自维也纳运动兴起以来,这一路的“哲学”(虽然它自己在消失之中)刺激甚至帮助了科学的进步。所吃亏的,它们所能做的只是间接的。间接帮助科学的 discipline,不能直接有助于生产致富,于是难找雇主。所以,除了若干大教授以外,能靠哲学为生的似乎愈来愈少。但是, it is further from the evil of philosophics。是吧!

Furthermore, 我们不能因个人在这条路上所受的 frustration 多, 而把哲学当一 scapegoat。无论弄哲学是否一条好的出路, 与我们是否把它当作一个本身就是一个目的, 总是两回事——除非我们能证明几无工具价值的东西其本身即无价值可言。民雄的 argument 似乎一直在这里搅混和旋转。我们总不能直率地说: 因为习哲学难有出路, 所以哲学不成东西。如果习哲学难有出路, 而我们却很喜爱它, 那末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把别的当出路而把哲学当目标?

我仍认为你已经有许多进步, 并未“青春浪费”“一事无成”。我仍认为你在哲学上的 potentiality 比港台之间的每一位有名的教授老爷好。只要你坚定, 你迟早会大有收获的。

为今之计, 你当然得暂时回港, 准备将来再回美研究。在回港期间, 设法在笑国新闻处或什么学校去“碰运气”。人生就是“碰”。

我们要说的还多。 祝你

新年快乐

海光

十二月十八日

·10·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业宏,玉朋:

1

从一方面看,西方世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之需要远不若东方世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之需要。依此,你们之远道来此,也是值得欢迎的事。何况,我们这里也委实需要一点新的学问刺激。更何况,我亟需人谈谈?

2

玉朋是习什么的?如果是习英文的,应能申请在此间师范大学教英文。手续仍是经由教育部。问题是已经到六月初,未知是否来得及。如果二位在原则上同意,我认为试试并不妨事。另一个可能,玉朋是美籍公民,可以申请在台湾美国新闻处工作。无论是现在申请或来了以后申请都可以。就我所知,此间一个大学的任何职位养不活在这里的两个知识分子。

3

悦恒何日到你那儿?什么时候来台一游?我最近还寄往加拿大一封信给他,未知他有否收到。我渴盼能和他长谈。我们在几年前坐在北投山上所说要做的启蒙工作,至今仍属需要,而且极其需要。我觉得救人和为学一点也不冲突。我们知识分子在这样蒙昧的东方世界要救人,使东方露一线曙光,唯一可行的大道就是从事文化工作,切实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这并不是陈序经所说的什么“全盘西化”。全盘西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是不可能

的事;而且,也不必。我们所需的,是一世界性的普同文化。地球委实太小了。

祝二位
快乐

海光
五月二十八日

·11·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业宏,展骥:

刚托朋友带出给悦恒等的信,接着就收到你们寄来的六月号《明报》月刊。

二位的作品,立论那么客观,分析那么精密,写文的技巧太有进境。我看了之后,心湖激起一阵一阵的涟漪,觉得这个世界尚不致于完全漆黑:海角天涯,还有一片光明。

※ ※ ※

目前最紧急而又重要的事是救我出笼。这比助我金钱重要百倍。请二位也看看我给悦恒等的信。由此可知一些有关的资料。请二位协同悦恒等尽快采取下列行动:

第一步,发动港九可能发动的文化机构,非公开的但却正式的联名向此间陈氏呼吁。这事令人不愉快,但对我出笼有帮助——至少,我的困难可因此而减少。在做这一件事时,请注意两点:勿漏出系由我提示。在事实上,我处此困境,对有关出笼办法,必须极力思考。其次,和此间权威势力人士打交道,万不可撕破“面子”。盖吾人所有者,只有舆论力量。在这种场合,二位当然不可具名:以免生反作用。

第二步,发动所有在港九曾念过台大文学院的同学,如张伟祥

等等,二三人为一联,正式向沈刚伯写信,请他助我解决手续上的困难。但切勿言明“出笼”问题。基于中国的“历史精神文化”,这类的事指穿了反而不好搞。反正大家心里有数。在此间教育界,唯有沈先生有跟官方权势人物“拿言语”的关系。但此人对什么都不热心。海外知识界之出自台大文学院的人正式向他为我事建议,意即海外重视此事,给他以支援,并作道义和鼓励。在这种场合,二位可以具名,也可以不具名,听便。

兹附来一张致沈函的大意。请复印若干份,分寄拟发动的台大文学院的同学们。这一大意,是我再三思考的结果。当然,可以加一点,但切不可长;亦无须说来自台北。

※ ※ ※

在我正要想出笼的时机,二位发表了这些文章,只有更进一步转变成为舆论力量助我出笼的本钱。这当然要看怎样运用才能发生有利的效果。为了发生有利的效果,必须使二位的文字得到美国留学界的知悉和声援。

※ ※ ※

我有一位在美国的朋友,他为人真诚而富于正义感,并且对我很关心。我请展骥把六月号的《明报》月刊航空寄他一册。我现在附一张给他的信。

※ ※ ※

现在,我正在忙于搞那些烦人的事端。那些事端,毫无半点意义,很是费时分心。因此,还有许多要和二位以及在港九的朋友谈的事,只好缓一下了。

即祝

快乐

海光

六月二十三日

又：请告鸿才，他的作品很 vivid。等麻烦告一段落后，我会有信给他。

·12·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业宏学弟：

1

久别归来，想你们有些欢悦。情感对于生活，也是一种营养。

2

你来台湾教书，当然是一件可欢迎的事。但是，谈到哲学与这里的哲学系，我心里就经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如果一个人教数学而当堂演不出题目，那么我们确定地有理由说他“不行”，并且请他走路。如果一个人教外科而开刀连死数人，那么我们确定地有理由说他“不行”，并且请他走路。推广地说，科学先生行或不行，总有一条红线为大家公认，总有一个不太容易曲解的评准以资对照。唯独“哲学”是这样奇怪的东西：它好像也是一种“discipline”，正正式式地在大学里跟数学一样开系，但却这样没有“准儿”——北方口气。于是，无论什么奇奇怪怪的说法，都可以叫做“哲学”。如果一个人连一元一次方程式也不会解而要教近代物理学，那么立刻有人看出这个以不是骗子就是妄人。可是，连初等逻辑运用都不会而当哲学教师的比比皆是，并且很“混”得过去。我在这种情形之下经验将近十七年岁月了。每一思及，实在是 frustrated 到极点。我竟是在这样的气氛里过了将近十七年？如何是了局？！

然而，就我们所知，哲学究竟还不是那样一团雾似的东西。年来我常想办一个比《现代学术季刊》通透的现代学术季刊，有系统

地介绍新学术思想,立一个学问的标准间架起来。但苦于无钱何?来知你们的计划怎样?欲求生命不浪费,必须集中思想做点工作也。

3

你要来,最好在十月初。因可 save 三个月的薪金做开办费。此间房屋,尤其是学校附近的合适房屋,颇为难找。在这一段时间以内,必须弄妥。未知二位有否托人帮忙。

4

我们这些读书人都 p-o-o-r,而且我的生活简单,不需要什么。

见面再谈 即祝

二位俪安

悦恒及淑贤致意

海光

八月四日

忽然想起,请带一二盒颇佳的饼干来饱饱口福。但是,如果不方便,就停止。

·13·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业宏,玉朋:

1

你们的突然离去,有点令人神伤。

2

所提 Robert C. Tucker 在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那本书,仍然要买,并且希望你们赠我。但不要 paperback。因一成 paperback,知识就不高贵而庄严。请尽早买。买到后最好挂号寄来,免得遗失可惜。

3

别的事下次再谈。

即祝

俚 安

海光

九月十五日

·14·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

业宏,玉朋:

1

前后二信和食物都收到了,谢谢。

2

展骥如来台大教逻辑,自然是我高兴的事。但是,我已离开台大,失去进言介绍的资格。且我若说话,反而对彼有害。所以,我没有表示。展骥若仍愿来,以直接跟洪先生交涉为宜。盼转告他,并代我谢谢他送的罐头。我的太太谢谢你们送给她的瓜子及手电。

3

你们二位现在做什么工作? 在念。如业宏明年能到美国去习数学,当然是好事。盖弄哲学已至穷途末路。人真是易于朽坏的动物。若果我现在是廿岁,我就从物理学读起。到了四十岁再把哲学当消遣品不迟。

4

关于要玉朋设法请律师写信到亚洲出版社结算版税的事,我并非没有兴趣,而是你们临走时把费用退给我,我知道你们并不宽裕,所以觉得有所未便。现在,我的经济情形来势愈不好,如果能

够弄点版税来救济,也是好的。但该社对于给版税事甚不感兴趣。所以,希你们垫一点请律师写信的费用,代我办理一下。该书在这儿已经八版了。

5

Tucker 书尚未到。谅已去订了。

6

悦恒的信劳驾请妥转给他。

再谈 祝

二位新年快乐

海光

十二月一日,一九六六年

·15·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业宏,玉朋:

去年十二月一日寄二位一挂号函。后来又寄一圣诞卡,询及你们有否收到我信,尚未见复,颇为悬念。

那封信是托你们垫一点钱,找律师写信到亚洲出版社清算版税。希望来点钱济穷。

再者,又问

Robert C. Tucker, *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已否购来?

我的近况可由悦恒及淑贤处得悉。这儿不再赘述。 即祝

二位

进 步

海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夜

·16·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

业宏学弟：

来片和手书都收到了。谢谢。

关于授权书的事，稍缓即有来信。现在我急待处理的事颇多，且每天要打捞池中浮萍，掏沟中污泥。

余事见给展骥和悦恒的信里。 即祝

你和玉朋都好

海光

一月十八日

·17·

〔一九六八年二月三日〕

业宏学弟：

1

老早预备写信给你。一来因为忙着读书写作，二来因为这事那事，所以今天才动笔。

2

在美国读过书的人，在香港不易插足。而且，就我的感觉所及，以及看他们的作品，香港主持哲学的当道人物，思想和学问很少不是混沌云雾状的。在这样的环境里，弟等要打开一条出路，当然要费些周折。经验告诉我们，人类自生下来第一个呼吸直到最后的一个呼吸，有许许多多困难横阻在人生的道路上。受着“生存意志”的支配，我们又不能不去设法克服这些困难。否则似乎只有倒下去。当然，如果有人通力合作，克服的力量可能要大些。你有展骥等人在一起努力，实在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将来如能正式教日课，经济情形自然会改善些。际此时日，努力和忍耐，二者同

等重要。

3

关于你们教书所用课本的问题,有这几条路可走:(a)译一本好书;但这会有不适合地方情形的材料。(b)自己编或著一本。这是最根本的途径。(c)修改《逻辑新引》。如果二位一定要做这件工作,我也不反对。至少,在修改后,它可以做一本课外自修读物。该书台湾版听说已印八版,版税也是骗赖不给。只好算了!

谈到授权书的写作事,我觉得实在有点好笑。早在你们夫妇二位快要离台的时候,我就已经写好一个,大概你们弄丢了(我记得该书合同在你们那儿。)后来,你要我写一张,我已照办。现在,你们又要我写,我现在再写一张寄来。如果真的弄得到版税,当然是穷文人感到兴趣的事儿。希望这一次写的能生效。

别的事以后再叙 即祝
你和玉朋都平安、快乐

海光
二月三日

·18·

[年代不详]

业宏:

1

从展骥和你的近作,可知你们的作品之品质甚高。我的写作和翻译能得到你们的编辑和修正,实在是我意外的福气。

2

我不要分享任何利得。除非在一定的必要时,我要求你们在一年半的时间以内赠我在此间不易购得的欧洲书四册。我希望这种事根本不致成为必要。

3

这里有我在不久以前写的短文十四篇。其中有一篇我修正了。希望这些短文构成你们选择的新域——假设你们尚未见过的话。兹托黄锦满同学带来。

再谈 即祝

近 佳

海光

七月三日

·19·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日〕

业宏及玉朋：

好久没写信给你们，你们好吗？Abby 来信说去年圣诞节接到你们的卡片还有安雅的照片，非常谢谢。

我来美快四个多月，最初在 Seattle 落脚，在一朋友新开的餐馆帮忙。今年一月底来到 Washington, D. C.，在一家做佣工，因我是以 visitor 身份来美，现欲以 housekeeper 资格来申请 P. R.，正好主人家也愿意 sponsor 我，男女主人皆是医生兼教授，均有学者风度，对人亲切有礼，相处十分融洽，使我暂有安身之所。

悦恒最近来信，说他与卢苍闹得不愉快，因卢要悦恒再付他贰千元港币，为悦恒拒绝，卢扣住资料想另自行出版。我想出版《殷海光文集》，为纪念的目的大，为利的目的小，爱老师的师友弟子们能帮忙者，多少应出份力，但是根据卢先生过去先后给我的来信，到现在所给我的印象是纠纷、争闹、各不相让、自以为是，弄得我深深不了解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形在我们的朋友们身上。

老师去世后，因怕 KMT 特务来搜收老师的文件，第一批清出大部分托 Mrs. Susan Arkush 带到香港请何友晖先生保管，第二批

我又清出一部分托玉朋带去香港,放你们那儿保管。其中包括一袋剪报,一份用稿子纸写的英文手稿,及一些书信等。卢苍曾向业宏要求剪报资料被拒,我想是对的,在何友晖处的稿件悦恒想用,我已去信请何先生借给悦恒参考引用,用完后马上寄还给我。至于在你们这儿保管这份则不必借给悦恒,因那份英文手稿有 copy 在何先生及数位友人手里。若某些文件你们想复印下来是可以的,然后请将全部稿件包装妥善用航空挂号寄还给我,一定要航空挂号以免遗失,我已请何友晖转交伍拾元港币给你们作为寄费(我有一百元港币稿费存在他处),因航空挂号费用太贵,不能使你们负担过重。非常的谢谢!

我现在已在还算自由的美国,身边总希望保有殷先生的遗物,希望你们能体念我的心情,将资料寄还给我,使我心里上能多有慰藉,我对生活并无奢望,只希望能找一块安静平和的地方,让我把 Abby 抚育成材,这对我一个不够能干的人来说,真是有肩负艰巨之感,因此也无心、无力介入殷先生身后文籍出版的纠纷中,只盼求一切顺利。下次再谈,祝你们全家
幸福快乐

殷夏君瑞上

三月廿日一九七二

致黄展骥 (四封)

·1·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

展骥学弟:

1

今天接到李楣来信,说是美国有一位朋友寄了一点钱给她,要她买点吃的东西给我,于返台时带来。李楣说要请你代购。这对于好吃美食的文人而言是一件好消息。

这里有些冒充香港来的糖果,我希望你买的是英国的苏打饼干及什锦饼干各一盒,再买点顶好的 candy 就行了(不要多)。

2

我给业宏的信之内容,正是我希望你知道的,所以由你转交。

再叙 并祝

近 佳

海光

五月二日

请再买两盒去核应子(类似陈皮梅者)。信旁是我剪开又贴上的。

业宏学弟:

1

来信及文件收到。《逻辑新引》我看到的有九版。奸商滋味,弟尝之矣!但我辈书生,如何对付?

2

我最近看到评你文的文章。说什么思想方法有东商之分,真令人好笑。该文作者似引用林语堂的权威以压人。殊不知林语堂正好在这方面是个天真的小学生哩!

3

台地最近翻印了若干精采的哲学书,可惜无法寄出。不过,我希望你们知道其中你们会最感兴趣的几种:

(a) R. Carnap,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Physics*, 1966.

(b) Richard Rorty, *The Linguistic Turn*, 1967.——文集(真丰富

啊!)

(c) Ian P. McGreal, *Analyzing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1967. (展此做哲学工作的严格方法)

再谈 祝
你和玉朋都快乐

海光

五月二日

·2·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

展骥学弟:

顷闻最近《明报》月刊上有一篇戴天的文章,我急于想看。请你即寄赠我一册。根据过去的经验,把书本卷起来挂号邮寄,损失的机会并不多。

余事稍缓再谈 即祝
快乐

海光

一月十八日

机会难得,再写一点;此间这样放手侮骂人者,在功能上根本就是“文字警察”(1)在台湾无论怎样侮骂殷海光,绝对安全。(2)在台湾侮骂殷海光可以立刻出名。那位多年默默无闻的徐君,一骂殷海光就有记者访问,就被请上电视。(3)骂殷海光的刊物,看的人多一点,因此可以发点小财。如某党工作人员侯君所办的刊物等等。(4)毒骂殷海光为效忠的最佳表现,如徐君。(5)痛骂殷海光反其年轻朋友,可以板起为学术而仗义直言的脸孔以泄愤。武人杀人系以枪杆;文人杀人则以笔杆。二者所用工具不同,但心理的动因完全一样。彼执笔杆者若有刀枪,当会把我碎尸万段,方

快其意。[……] 因我绝对不理这些人,他们认为我看不起他们,故恨我深也。

·3·

[年份不详]

展骥学弟:

来信所列刊物都收到了。谢谢你和大家对我所表示的关怀。

现在有一件事要提出一说。就我所知,港九地区人杂,务须小心有人伪装同情者藉机探刺底蕴。我们久住台岛的人对此特别敏感。尤其是我,简直太容易相信人了。在过去,来者只要吹三句自由民主,谈点罗素,附带骂骂唐君毅头脑如浆糊,钱穆是义和团的历史鼓手,我便立刻引为知己,马上把心肝五脏都吐给他。哎!这类受骗的事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变得对不够熟识的人谨严起来,人是可能接受经验教训的动物。在某些有关重要的事情上,我希望你们缜密些。

别的事体,稍过几天我会再来信说明。 即祝

快乐

海光

一月十一日

·4·

[年份不详]

展骥学弟:

1

老早就想写信给你们。只因暑期连续做水泥工作。每次工毕,颇为疲累,故难以执笔。

2

“人身攻击与人身攻击的谬误”不切合题旨,必须改为“人身批

评与人身攻击”。“人身批评”不算谬误；而“人身攻击”则是谬误。

二者怎样区别？从逻辑上区别不难，唯一的办法是看有无推论关系。但是，一牵涉到社会文化传统，问题就很复杂了。

我把你的作品保存起来。我希在不久的将来就你所说的写一篇文章。

3

“今日的问题”，在我的感觉上，几乎成为埃及古墓了。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收藏这类的出版品，因此无从指出其中有哪些文章是我写的。

4

你这个学期在哪里工作？在念。

听说悦恒要办一个学校。果真如此，那就美了。

再叙 即祝

近 好

海光

九月十二日

致林悦恒（二封）

·1·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

悦恒，业宏，展骥：

港九骚乱未已，令人系念。值此时期，唯有藉镇定和忍耐来支持。看来港九政府尚有应变的能力。唯用水奇缺，日子久了，也是很困扰人的。只希望大家多方设法，等待局势的好转。

如前信所说，我的聘书竟又来了。为着维护学府尊严，并为顾

全大体及表示我从不以何派为敌,我没有即时将聘书退还。我目前唯一的道路为离台赴美。现仍在办理手续中,但进度很慢。有何结果,当会函告。

展骥对我的资助收到,致谢。在人生旅程中,挫折是难免的。我到现在仍在挫折中。挫折是人所不欢迎的。但是,有些挫折临头时,可能增进人的能力。教书的事一时不成,如能自力从事出版事业,也是一条出路。

关于《逻辑新引》事,如业宏有兴趣和时间重写,自是一大佳事。将来出书时用我个人名义或用二人名义或用业宏个人名义,都无所谓;而且我除将来可能要你赠送一二册欧洲出版的书以外,不要分享任何利得。总而言之,我们之间,一切都好商量。但是,亚洲出版社不讲信用。因此,我坚持不要再和这家发生任何交涉。该书的内容既然大改,书名稍变,就根本是一本新著,因此也就根本不发生法律问题。我们干我们的。

其余的事,陆续再叙 即祝
大家都平安

海光

七月十八日写

业宏和展骥寄给我的刊物,前后共收到二本。

·2·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二日〕

悦恒,业宏:

老师去世前两天(九月十四)李敖托王晓波给我一信,信上说信愿为老师出全集。李敖曾救老师一命(前年是他硬拖老师去宏恩医院检查的)我非常感激他,但我实在不喜欢其为人。所以我跟几位同学商量了一下,有几位主张让李敖出来,因为佳能力强,搜

集老师的资料最全,反正让他出不要考虑其为人。十五日晚我约他一谈,当时还有王晓波、詹之丽(我嫂嫂)、夏邦胜(我弟弟)、奥特华(我老友)、廖融融(张灏太太),那夜李敖所说的一些话令我非常不愉快,但是我觉得为了老师把全集弄好,还是只有找他。我告诉他我今晚先把遗稿找找看,假如有明晚再谈(所谓遗稿是张尚德所指的老师写了关于清代约有五万字,尚德在老师病危时问老师此稿在哪儿,老师说在书桌旁的书架上,师母知道)。(我才不知道)他们去后,我和弟弟找了半天并没有这份遗稿。第二天我要我弟弟跟晓波说,并无遗稿,并要晓波转告李敖。(王晓波有股莫名其妙的诗人的性格,说是翻着白眼,咬着牙齿说些由他幻想得来而以为事实的话,而执得很,从不接受别人的观点及想法。)没有遗稿,事情就简单了。这天是十六日下午老师就去世了。日后慢慢我也冷静下来,我想这事不能由我一人决定。后来我又约李敖一次,我告诉他,我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我对我丈夫的思想及著作又不懂,所以他出书的事,我要征求有学问比较懂得他的友人及同学们的意见,假如他们同意让你出全集,我就写授权书给你(我实在不懂授权书干嘛,但是李敖说既然请他出全集,就一定要写授权书给他),假如他们不同意,那就算了,正好 Mrs. Arkush 廿五日回香港,我托她带一封给友晖,征求你们的意见,后友晖来信,说你们反对,认为不妥,那当然就算了,我也再没有跟李敖见过面。陈鼓应最近快出一本纪念老师的集子,他把初稿给我看,并要把版权送给我,我拒绝了,我想谁为老师出书,版权就是谁的,我不要任何版权(除非是我自己出的书)。你们愿为老师出书,我当然非常赞成,祝福你们一切顺利。请转告友晖、鸿材、展骥他们。悦恒:我寄给你的一封信及照片,及一袋老师追思礼物的节目单不知收到否? 鸿材:我写的老师去世的情形一信收到否? 念念,你寄来《明报》的剪授已

收到,谢谢!

我写了一信给殷乐义侄儿及朱先生,假如你们愿意看,请看后再发。

玉朋转交给我悦恒的 US. \$ 30, 饼干、糖、两瓶果汁及展骥的 US. \$ 10, 谢谢!

师母

君璐上

十月十二日

致伍民雄(二封)

·1·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日]

民雄
止宏 二位老弟:

你们寄来的书共四册(其中一本稍早收到),信、片和练习,都收到了。知识和情感的媒介从天外飞来,如何不喜欢!我怎么把“知识”和“情感”相提并论?这,在以往我是不大感觉得到的。现在感到人而失去了情感像鱼离开了水:那是很难活下去的。人,究竟不是一架逻辑机器啊!可是,人如果没有知识,则未必很难活下去。当然,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没有知识似乎无法活下去。但是,这是把眼光局限到最近的请形所榨出的一点结果(想法)。真人,或 *homo sapiens* 的历史已有三十万年。而人类真正有“知识”至多只有一万年。在一万年前,人是怎么过的?人是否不比现在快乐?是否不比现在紧张?这都是值得回味回味的问题。二位说在人生观上喜欢道家,这又是志同道合了。我看不出,一点也看不

出,就内容说,我们现在喜好的哲学与道家的人生观有什么冲突的地方。我喜欢清静寂坐,喜欢自然。回想几年以前,我们一齐在林国治老弟家里,大吃其烤猪肉,在他院子中谈天说地,在北投山上松树旁随地躺着,在落日余晖里,不分师生,纵声谈笑。这种滋味,在我,是说不出的好啊!哎!人生难得几回!知识和情感,都是我们需要的。

民雄的信里所说的(有关念哲学的种种),我百分之百同意:它印证了我近若干年来所想的及对同学们所说的。只是,有些人信,有些人半信半疑,更有些人反应不佳。你们的信和习作,我总是尽可能地给过往的同学看,使他们知道世界之大和潮水的流向:不要以为这是殷海光一人的偏见。看光景,这一二年的风气变好多了。至于我个人呢?我越看到那些外来的出版物,越看到那些前线人物的新著作,越发心头感到一阵一阵的压力:晓得现在弄哲学不是消遣的事儿!我所能够做到的,是勉力做个好的启蒙人物:介绍好的读物,导引大家打定基础,作将来高深研究的准备。我常向同学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许多教书人常自以为聪明,以致看不出别人的聪明。我认为一个好的教书人必须能够很快地发现聪明的学生,尤其应该因着发现比他自己更聪明的学生而高兴。今年我班上有四位同学头脑很锋利。我很喜欢他们。

业宏寄来的习作,显示着是在南加州大学很切实地用功,并且有相当的进步。这表示留学之外的再留学并没有白费。那篇关于“事物语言”的报告颇为扼要,我想给林澄波将要主办的刊物《台大哲学》刊载,如果业宏不反对的话。我希望民雄也寄点作品来。这会给予母校哲学系以良好的影响的。

近一个多星期真是发书财。一连来了六本书,三本来自你们,二本来自林毓生;一本来自一位美国教授。其中只有两本是 ex-

pected的;余四本都是 unexpected。在我们此地的 dull 的生活中, unexpectedness 常为快乐的泉源之一。你们二位寄赠的书对我当然最有用。Pap 先生最后的著作,显见他的学思比十年前写 Elements 的时代进步多了,虽然我嫌他作的 Glossary 似乎太 facile 了一点。这是一本抓问题抓得很扼要的著作。他在写 Elements 时在二十七岁左右。In one sense,他可以说是 the Ayer of America。可惜三十七岁就走了。不然他可能有更高的成就。近年来哲学界英年谢世的时有所闻,像 Nicod, Ramsey 等等都是。喂!希望你们别太用功啦!

下年度准备再教符号逻辑。前年教过一次,结果我很不满意。下年度决定“痛改前非”。现在,这个学年快要结束了,暑假快要到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切实自修准备一下。不过,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这很需要你们二位帮助,请你们来点“美援”。隔些时我会把草拟的教科细目寄来请二位参加意见。在另一方面,请你们寄点相干的资料来。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有些不大好意思。因为,年来二位赠书已经够破费了。二位都在求学时代,且非百万富翁,怎好多打搅?何况目前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可资交换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要二位尽可能地寄用过了的而又不太需要保存的相干资料,如能代向教授们讨要一点更好。当然,我在这里会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包括二位已经寄来的)资料。今年刚出版的牛津 Kneale 夫妇合著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一书,谅必二位已经见到。我们已经弄到一本。这一本书对我的帮助就很大。二位在逻辑资料的“美援”供给上愈丰富,对于这里的同学之逻辑教育(请注意,我只说“教育”,谈不上研究)的助益将会愈大。所以,希望二位有空(或抽点空)进行搜集,并尽可能早一点寄来。

听说业宏就要作加拿大之游,真是爽意。民雄暑期有什么计

划？

再写下去，话愈写会愈长的。过重的信要加十元钱的。你们知道十元钱对于我这“教瘦” means a good deal。所以，现在打住，以后再谈吧！ 即祝 二位

快乐

海光

六月十日

又忽然想起：Los Angeles 有唐人街。你们二位有没有同去吃馆子？

·2·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民雄老弟：

来信收到了，寄书也收到了。都令我感谢而又喜欢。我在这里心灵上的寂寞，你们是很清楚的。能得到外面朋友们的关切，内心温暖多了。人，不是一架 logical machine 而已。你到美国后，从父母、兄弟、亲戚，种种等等 primary relations 骤然拔出来，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那份寂寞与 helpless 的感觉之侵袭，我是充分了解的。现在，虽然隔着半个地球，我好像已经嗅得出，自从业宏来了以后，你的 feeling 好多了，兴致也高些了。是吗？人就是这么一种动物啊！

你送给我的 S. Körner: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正合我的需要。既然 *Language and the Pursuit of Truth* 内容太浅，赶快不要寄，免得糟蹋钱。我们买书读书都得讲求经济。你说要寄赠我 Kalish 先生等的逻辑，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你提到 Kaplan 教授，哎！我真佩服极了。照我看，may be 在不久的将来他会成为逻辑经验论的 technical achievements 和实效论对 bio-social subjectmatter

之处理二者 synthesis 的一个 landmark。他所开的一课 Methodology of Human Science,其内容正是我渴望知道的。他在这方面的论著已否出版?或者,他有否讲义印行?务必请你帮忙,尽可能设法寄来。

哎!你们南加州大学有那么多明星高照,如果再吸收不了什么,肚中漆黑,那才是该死哩!一笑!

其余的事,可看致业宏的信,因此用不着赘述。 即祝
快乐进步

海光
三月二十八日

致陈鼓应 (五封)

·1·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

鼓应学弟:

现在灯下,提笔写信给你,心头有说不出的滋味。

要中英^[1]进行的事,时机已紧迫,稍纵即逝。还得你自己再去“钉”紧一下。因他是洋那边来的,说话香些,且无人事情感上的牵联。

如有需商量处,除下星期一下午有事外,每日下午四点都可来舍。

内心有难以言状的凄凉。幸得二三知己,稍感慰藉。人和人内心深处相通,始觉共同存在。人海苍茫,但愿有心肝的人多多互相温暖也。

见面再叙,兹不一一 谨祝

俚安 并 进步

海光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写

注 解

[1] 成中英,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编者

·2·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

鼓应学弟:

版税与亚洲出版社结算未?此事是这样的:《逻辑新引》出版之初,该社只付“版税保证金”约合美金五百元。此后我一再依合同要该社结算版税,社方一再置之不理。无已,不久前我托香港一学生托律师写了一信给该社,花了二十五元港币。大概这下该社怕吃官司,所以“找起殷海光来”。发行已六版之多,请你跟他弄明白,每本二十四元。

我们知识分子的脑汁被奸商喝够了,今后宜筹自救之策才好。

久欲请你们几位吃饭,但苦乏资本。版税拿来后,拟同你面商一下。

余面叙 即祝

健 乐

陈小姐好

海光

四月十二日

·3·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

鼓应学弟:

1

昨前两天和宋瑞楼医师等晤谈,知我的身体情况无问题,且该种新药万不可乱打。归来后胃口日佳,故住院事当作罢论。请转告查老师。

2

便中请代购该论及宗教的书,你的《存在主义》一册,及其他你认为对我有益的书。购书款项总数最好请勿超过一百元;见面时奉还。

3

余事面叙。 即问

伃 安

小胖好

海光

六月十一日

·4·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三日]

鼓应学弟:

今晨查老师来舍。他说刚才已向钱校长及沈院长^[1]提及你事。他们回称,在今天的情形之下,你只好兼任,专任等以后再看。

我觉得既有这么多的先生们关心并爱护你,你的前途是很光明的。希望弟忍耐一时并努力向学,建立起独特的自我。

再叙 谨祝

秋 安

太太致意,小胖好

海光

八月二十三日

注 解

[1] 指查良钊、钱思亮、沈刚伯。——编者

·5·^[1]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二日〕

鼓应学弟：

1

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为存在主义而努力。

2

又是许久未见面了，近况可好？在念。

前几天查老师曾来我处。看样子，此老还是兴致勃勃的。

不一 即祝

全家福

海光

二月廿二日

注 解

[1] 这五封信选自陈鼓应编：《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台北，一九六九年十月）

致於梨华^[1]

·1·

〔无日期〕

1

许久以前内人^[2]给我看你给她的信。在那封信里，你表示我对你的印象欠佳。的确，我对你的印象一直欠佳。可是，你有作家所需的这种敏锐感觉，而且把它说出来，足见比一般女士心怀开

阔。这些,撩起我跟你写信的念头。直到最近又看到你给内人的信,并且收到你赠来的稿费,于是我要写信的念头才形成了行动。

人是最奇妙的动物。奇妙的泉源在心灵。坏的印象也许可能转换成好的印象之基础^[3]。

2

说起“稿费”,它跟我这个穷文人结不解缘。我十几岁就偷偷投稿给报馆。平生第一次领到稿费的那份狂喜,至今不忘。我记得领到稿费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罐鹰牌炼乳,打开来当街且走且喝。小狂士啊!正如初恋是甜蜜的一样,我自从得到这点稿费以后,稿费成了我写作的一种甜蜜的鼓舞力。近六年来,台湾很少刊物要我的稿件了。在那以前,我是有地方投稿的。稿费有时几千,有时二三百^[4]。无论多少,我一样喜欢。我的教书薪水这么少,稿费收入成了补助生活的一部分援军。可是,不管稿费对于这种“正用”怎样不可少,我得到稿费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往点心店里跑,买一大盒点心回来,下午四点同内人及小女一起吃。大人各泡一杯咖啡,或是好红茶;小孩一杯牛奶。让她们共享我卖文的果实,同享我的快乐。

自从去年^[5]大病以后,我学得一个新的嗜好,就是爱吃芒果。去年病后,刚好有屏东的一种新品种的芒果上市。它的形状像苹果,成熟的时候颜色红而黄。我的内人和小孩不爱吃它,这对于我正好。我每餐饭后必定吃一枚。有时睡个长午觉起来也要吃一个。我吃的时候,一定要摆在盘子里,有洋刀恭而敬之的割皮,礼节隆重的很。估计起来,去年暑期大概吃了二千元的芒果。如果有人问我,台湾什么最好吃,我会毫不迟疑的说:“芒果!”

你最近赠我们的八百元稿费。真正是“礼轻人意重”。见到“稿费”,像见到少年时代的朋友一样,在心灵上有一种无可抗拒的

力量。我的高兴,像是自己得了稿费。这笔稿费,来的正是时候,我已经把它用来买芒果吃。吃芒果,听蝉鸣,人生之至乐也!

3

现在,我要跟你谈谈你的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说来惭愧,我一辈子所读过的文艺书,包括水浒、红楼梦在内,没有超过十本。来台将近二十年,我简直没有看过任何一本小说^[6]。台北市面上流行若干女作家的作品,在我的印象之中,不是写性感恋情,就是写耳环,再有一种就是板起面孔说教,贩卖廉价的伦理哲学。我没有时间来欣赏那些时髦啊!大概是前年吧!像乡下人上街似的,我在一个学生的陪同之下到衡阳街一带逛书店,偶然瞥见一本书,叫做《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这本书的作家“於梨华”是相熟的,就顺手买了一本。我回家把它翻了几翻,恰好翻到一些地方,大有说美国不如台湾的含意。我觉得这是宣传文艺,不感兴趣。随手在前面批了一句:“What an ethnocentrism!”〔民族中心观是什么东西!〕把它送给和我友善的一对外国夫妇。这一对夫妇向来是尊重我的意见的。隔了些时,我的内人去看那位外国太太。那位外国太太提起这本书:“这本书所说的美国情形,实在可笑。如果不是殷教授要我看,我才不看哩!”这本书的下落怎样,不得而知了。

隔了些时,你回到台湾来,听说还领这本书的文艺奖金,并且到什么机关去演讲文艺。这样一来,在我心灵上与这本书的距离更远了。我知道台湾搞的这类玩意,多是为热闹。热闹直接间接又是为政治,很少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是为学术面学术,为文艺面文艺的。在台湾,我是一个孤岛。我的身体虽然住在台北市内。可是我觉得搞这些花样的人,与我像是在不同的世界里。这些人物的一切是非都影响不了我的判断。他们捧什么,只有增

加我的戒心。

去年暑期,项武忠君来看我。不知怎的他说起他正看完你这本小说。他说写得不坏,小说所写的莫氏弟兄,美国留学生说就是写的他两弟兄。他并且当时把他的一本送给我。他说这本书好或坏,是影响不了我的。但是,他说你书中描写他两弟兄,倒引起我看看的兴趣。我把书中关于莫氏弟兄的地方看了,因为事忙,再没有看别的地方,就搁下了。后来一个朋友来看我,我就顺手转赠给他。这本小说就这样第二次和我脱离关系。

不久以前,有人告诉我,於梨华写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有些中国社会史的价值。“哦!那我倒要看看!”这话引起我重新看《又见棕榈》的兴趣。不久以前,我趁内人上街之便,特地托她再买一本。最近,我逐字逐句仔仔细细把它看了一遍。这是将近二十年来谈小说的第一遭!下面就是一个“读者报告”。

4

书首有夏志清先生写的《评於梨华著〈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可是,我避免读它。为什么呢?第一,我知道夏先生是有文学修养和写作经验的,我一点也没有。第二,我很难想象中国熟人不捧熟人,至少很难不说些鼓励的话。有一于此,即足以影响我对这书的判断。我要维持我的观念独立,以在文艺上的一个 naive reader〔素朴的读者〕的基线去读它。

(1)人物 Personality models〔人物模式〕大都刻划得颇给人 sense of reality〔真实感〕。

主角天磊:刻画得颇深。若非优柔寡断,我倒颇喜欢其为人。

父亲,母亲,小妹:点点素描,写来颇为 essential〔深中肯綮〕,恰到好处。

意珊:还不够 characteristic〔突出〕:作者落笔时值乎有点迁就

现实的某一方面。

(2)结构 布置井然。

开局明朗:处处紧紧把握着主题,并依之而发展。

穿插(episode)分量恰好;没有喧宾夺主。

第十一章以后,一波紧似一波,波峰迭起。

转折虽快,但并未予人以不自然的感觉。

结尾:不落俗套,余波荡漾。

(3)描写的方式[用]对比法(expression of contrast)写天磊的 uncertainty of mind[心灵的不确定感]。真的,也刻划了这一时代的特征。反衬时运思颇见灵敏;对心理描写有些地方也够细致;有些地方颇为 original[有新意], imaginative[有想象力]。但许多句子太长,嫌 redundant[多余,重复]。西化中文 syntax[句法]是好的,但这一 syncretism[荟集]必须相当的 elaboration[谨慎]。

注 解

[1] 原系草稿。无日期。但据信中内容推断,应是写于一九六八年夏天。於梨华女士在一九七一年底访港时同意发表此信。——编者

[2] 於梨华女士和殷海光夫人夏君璐女士系台湾大学的同学。——编者

[3] 傅斯年对丁文江也有过相同的情形发生。傅在巴黎留学时,得知丁为孙传芳做事,便常常对人说:“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后来傅、丁却成为极好的朋友。

人的行为可以有先后的不同,对人的看法无必要保持“一以贯之”。心理学上的 ambivalence,不完全是病态。——编者

[4] 除特别注明外,都是指新台币。——编者

[5] 一九六七年。——编者

[6] 殷先生五十年代早期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过不少书评,评介过的文艺性读物有《雅舍小品》(梁实秋著),《莫斯科的寒夜》(齐文瑜译。按:

“齐文瑜”即夏济安先生。),《一九八四年》(乔治·奥威尔著)。——编者

致徐传礼 (二封)

·1·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

传礼学弟：

提起笔来,从哪里写起呢?我此生的心愿之一,就是和你面对面的促膝谈心。你是特别关怀我的。兹将近况简略报告于下:

第一,我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已于七月十八日被查禁。理由是:“该书内容反对传统文化精神,破坏伦常观念,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违反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六款之规定,依同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第二,我的收入本很微薄,这是你很清楚的。这几年靠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才勉维生活。现被停止申请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结果,使我本来就无多的收入减少了一半。

第三,接着面来的是变相的解聘,要把我赶出台湾大学。关于这一着的种种,细读附来的致钱校长书便知种切。

看这些情形,我今后的处境似乎只有愈来愈恶劣。可是,请你不必为我们太焦虑。我们会处之以镇静。同时,我们正在设法另谋生路:我们准备开设一个小成衣店。至于我个人,只要活着一天,便努力追求自由、真理、正义和友爱。我准备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

自由之实现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太阳被乌云遮蔽的时代,我之身受,正是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也许还得再付出哩!

以后再谈。

祝你

安好 并 进步

海光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

·2·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传礼学弟：

1

这些时常常想到要写信给你，直到今天才动笔。

你寄来的两本书及复印的文章都收到了。另外的书也已转给李敖。谢谢。

2

David Spitz 先生的 *Patterns of Anti-Democratic Thought* 《反民主的思想型模》，在许久之前详读过了^[1]。它给我思想上的冲击实在大。中国近六十年来，自梁启超起，到胡适、张佛泉等人，宣扬民主，好像“我欲民主，民主斯至矣”。他们之宣扬民主，都是闷着头宣扬的，很少注意与民主思想敌对的思想。于是，无意之间，使人不去注意与民主思想敌对的思想。这样一来，赞成民主的人正视不到对面的思想，因此并不了解，于是要对之驳议时也不见得有力。这是一种“思想隔离”。这种思想隔离，甚至于影响到我。其实，自古到今，反民主的思想跟民主的思想一样高深；而且在动乱的时代的落后地区，对于不安的群众，它们远比民主思想富于声诉力。我从前不愿也不敢正视这一事实。自从读了 Spitz 先生这部著作以后^[2]，我改正了自己思想上的偏差和漏失。中国近六十年来，许多人士口叫“民主，民主，民主”，也有人附和。然而，事实演

变所至呢？实在离题日远。民主是社会安定，生活富裕和人民理性这缺一不可的三大要素合成的必要条件之产品。可是，自古代雅典以来，满足这三大条件的地区有几？所以，在一切政治制度之中，民主是最难行的一种。尤其在这动荡不宁的世界中，民主简直好像是群众 demagogues〔煽动家〕所煽起的激情怒海里的一只孤舟啊！

Spitz 先生这部论反民主思想的杰作，有系统的逐一驳议反民主的思想之各支。全书系统谨严，议论纵横，驳诘精辟，笔力锐利，才思敏捷。读来令我思识□□^[3]。Spitz 先生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原来曾受教于 M. Cohen 先生，所以他有一般习文法科的人不易得到的解析训练。除此之外，处处见到他保卫民主思想和制度的热情洋溢。读后使人更进一层对民主发生 conviction〔心悦诚服〕。

本书除了少数不严重的 logic〔逻辑〕推演错误以外，令我不满的地方是把欧洲方面近代民主的 ideologies 说的还不够，而同时把美国不入流的言论家的说法也提出讨论。例如^[4]，

通过这部书，我间接认识了若干别的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例如 MacIver 先生。许久以前我就知道麦氏，但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我只读过他的一本小书。

当我从 Spitz 先生这本书而认识他的思想后，对他真有“高山仰止”之慨。他的 Leviathan and^[5] 这一题目对我就很有吸引力。我现在太忙，希望将来有空拜读^[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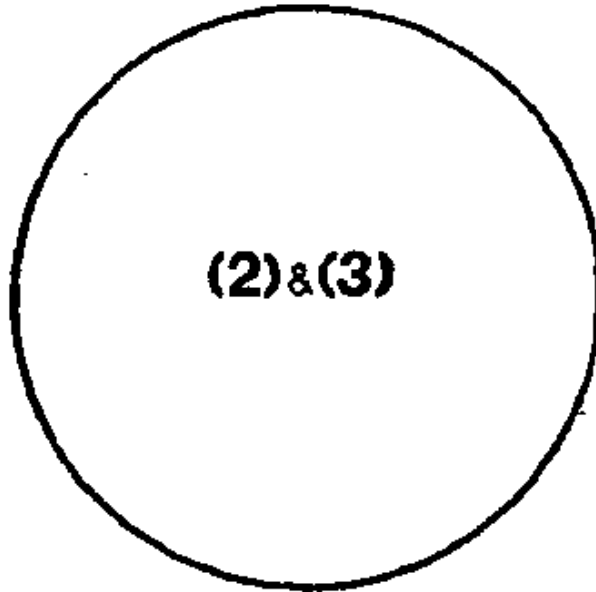
除了读过 Spitz 先生这书以外，我近来又读完一本书^[7]。这本书像是一本教科书，不及 Spitz 的书精深谨严，但非常之广舍。对于我这个门外汉而言，也开了一点见识。Dahl 等的书从前也读过。读了这些书以后，使我心中形成一个大问题。

自古至今，political ideas〔政治思想〕虽多，但大致分起来，最基

本的有三种：(1)Democracy〔民主主义〕；(2)Communism〔共产主义〕；(3)Fascism and Nazism〔法西斯主义及纳粹主义〕。Nationalism〔民族主义〕虽也基本，但可 cross-section〔横截〕于三者之一，所以可以存而不论〔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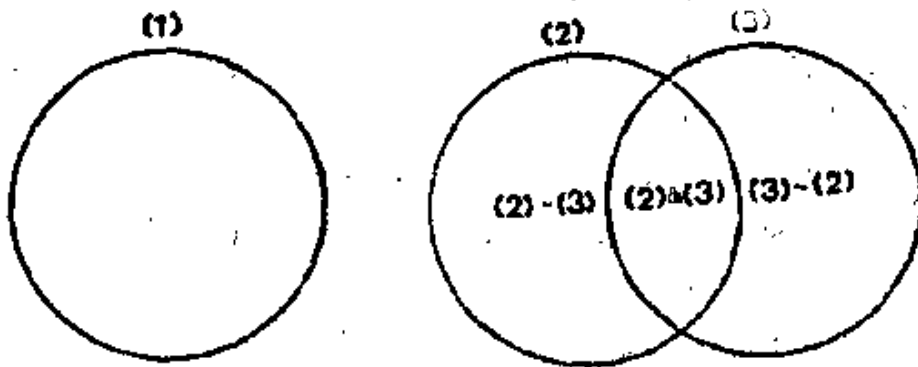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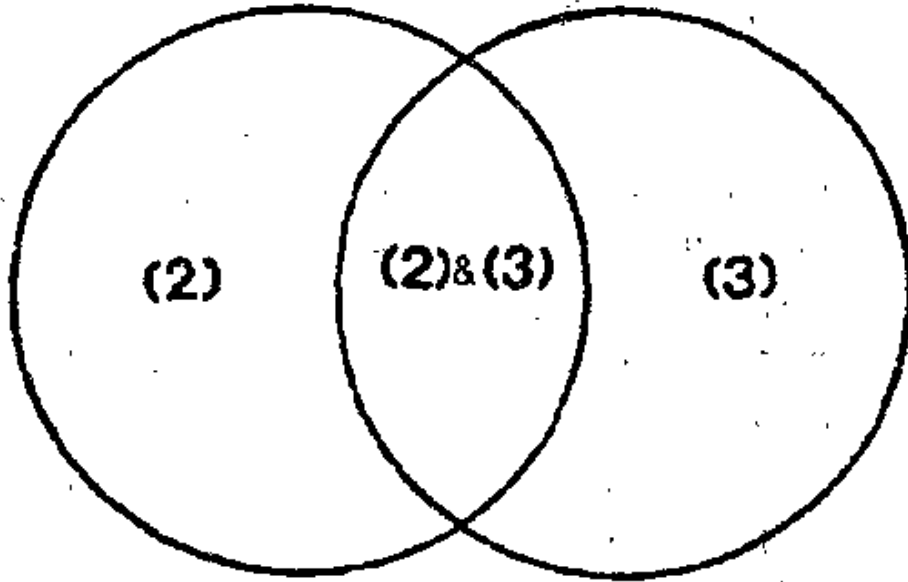
当然(2)，(3)以(1)为公敌，所以我们习惯的把二者类归到一边。但是(2)，(3)又彼此水火。(2)，(3)虽同为欧洲社会经济及战争的双生子，但思想及社会基础又各不相同。

(2)，(3)非同心圆如图：



A. Ideological Foundations〔各种意理基础〕

- (1) Empiricism〔经验论〕
 - Liberalism〔自由主义〕
 - Individualism〔个体论〕
 - Power pluralism〔权力多元论〕
- (2) Dialectical materialism〔辩证唯物论〕



Classism [阶级论]

Collectivism [集体主义]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Power concentrationism [权力集中论]

Universalism (at least theoretically) [普遍主义(至少是在理论上)]

(3) a. Racism and / or Cultural messiahism [民族至上主义与/或文化救世论]

b. Authoritarianism [权威主义]

c. Collectivism [集体主义]

d. Elitism [精英主义]

e. Power concentrationism [权力集中论]

f. Particularism (this can be derived from a.) [特殊主义(可由 a. 衍化而来)]

B. Value Systems [各种价值系统]

(1) To live and live well for all men [让人民安居乐业]

(2) For material life of all mankind [追求人民的物质生活]

(3) For racial superiority or national hegemony [追求民族的优越感或国家霸权]

C. Social Foundations [各种社会基础]

(1) Spontaneously generated community and / or association [自然而然产生社群/组合]

(2) Poverty-stricken mass [饥寒交逼的群众]

(3) Frustrated middle class and / or capitalists [屡遭挫折的中产阶级与/或资主家]

D. Behavior Patterns [各种行为模式]

(1) Individual human dignity above-all [个人尊严高于一切]

Electorate decisive (at least theoretically) [以投票表决(至少是在理论上)]

Restrictive use of coercion [限制使用强迫措施]

Check and balance [监察和平衡]

(2) Organization above-all [组织高于一切]

Party dictatorship [政党独裁]

Unlimited use of coercion [强迫措施为所欲为]

(3) Leader above-all [领袖高于一切]

Leader dictatorship [领袖独裁]

Unlimited use of violence [使用暴力不受限制]

(Note: Of course, the above table has to be further elaborated.)
〔附注：上表当然要进一步推敲。〕

我的意思是说，民主思想者不能再撇开这两种反民主思想不说，而只顾自己说自己好。这已无用了。Facism 同 Nazism 之形体虽亡，但其“精神”健在。爱尚民主的思想家，必须通过在思想基础上和制度上以及对人类和平富裕的生活上对(2)，(3)两系彻底批评，然后显彰民主确实优于前二者。从事这一工作，需从 Plato 起，到 Locke，……Hegel，以至 Pareto, R. Michals, Mosca, 加以彻底研究。这一工作，需时十五至二十年。题目可叫“Democracy Reconsidered”〔民主再检讨〕。这个工作做出后，乃对人类的一空前伟大的贡献。未知弟可否立此宏愿。以弟之年岁，实在尚来得及的。

注 解

[1] 殷有眉批：“实在可以说是一部杰作。”——编者

[2] 殷有眉批：“Maclver?”。可能是指还有 Maclver 的书。——编者

[3] 原空二格。大概是“扩展”之意。又殷在这里有眉批二字：“热情”。——编者

[4] 信稿在这里留空了一行。——编者

[5] 原稿如此。——编者

[6] 殷海光对 David Spitz 的著作有一篇较详细的评介，题为《看幕的那一边》。见《殷海光近作选》(香港：海光文选委员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页 200 至 210。他在这一段上面有眉批：“他真是近代思想的大师之一啊！”——编者

[7] 信稿在这里空了半行，没有写上书名。——编者

[8] 殷在这一段上用红笔写着：social democracy, democratic socialism. [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编者

致 周 堃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周堃学弟：

1

来信一共看了三遍。我仿佛感到一个孤寂的旅行者，看到远处来了一个同路人。

2

你的信里蕴涵着许多重大而又基本的问题。二十多年来，我最伤痛的事，就是中国经历如此巨变，人民遭受这样惨重的牺牲，不只于竟连一丁点儿经验教训也没有得到，连一丝一毫的真是非也未显现。大家的去路迷茫。叫人往哪儿走？今日，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失落与彷徨，实在与此有根本的关系。

今日中国人最重大而紧要的事是确立基本的真是真非。对于“故土故人”热爱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事有重建生命同样的重要。

当然，人事世界的客观真理远比物理世界的客观真理难求。不过，超越个人颜面情感作用，权势得失和集团的现实利害，而发出的认知，究竟比从个人颜面、情感作用、权势得失和集团的现实利害而发出的认知要可采信些。弟既在斯丹福，那里研究中国近代与现代史的学人比台湾的可信多了，那里有许多同你所注意的问题有关的中外书报。弟在能力所及的范围以内可以请教及阅读。只要认真的追求，我想对你所感到重大的问题之解答多少会有帮助的。

3

我对你所提办杂志来传播知识的事业不热心;但我也不反对。我对此事为什么抱这样的态度,说来真是话长。一个人对一件事的态度,总是受他过去经验影响的。假若要办的话,第一需人才;第二需本钱。我认为有限的力量须作最有效的运用,以收最大可能的效果。关于这类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4

我蛰居台北将近二十年,几乎哪儿也不曾去过。五月四日为了纪念五四,几位学生约我同游新竹清华大学,顺道一游附近的青草湖。湖光山色,荒烟蔓草,垂柳依依,白鸥悠然水上,我第一次感到我有点自由。我在湖边拍了照,现在寄一张给你做个纪念。当然,我也希望看到你的照片。

5

在我的印象中,美国的事流动性很大。未知你暑假何往。我需要知道你从现在一直到本年十二月的可靠地址,以便通信。

致 玉 仁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

玉仁学弟:

1

清华之游,给予我很多的愉快。五四跟弟等湖心夜谈,使我得到不少灵感,够人回忆的。

2

归来常想到为弟等介绍读物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十分简

单。因为站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实在有一些巨大而基本的问题。

吾人恰好生长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因此我们的观念、思维活动,以及行为模式不能不多多少少受它的影响甚至塑造。这,站在另一个社会文化的观察者,是会看得清楚的。然而,如果人类真是能够演进的动物,那末他多少须能在观念及思维活动上突破他的现状;年轻人尤需如此。而透视他所在的时代环境,实在是创新的先在的必要条件。

现在是一个科学与技术当先的时代。我一点也不否认它的重要性。不过,我觉得学问之道,快煮不出来。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些,并且想得到较大的成就,那末我们便知道“培根”是如何重要的事。在这一关联中,理论的训练必须居于优先的地位。我是从这里着眼来和弟等谈问题并介绍读物的。

3

我这几天想来想去,考虑的是这几个条件:第一,头流的著作;第二,最好台湾或美国易于购致;第三,从大后方对弟等所学有深远的启发作用;第四,尽可能的少,以便精读。现在,我就是根据这几个条件把我认为一个想从本源上研究科学的青年必读的书开列在下而^[1]。

注 解

[1] 信稿留空,未写书名。不过,殷先生在《新希望》第七期(台北,一九六五年一月十日)《论书初阶》一文(页五至七)开列了一个《文法科的大学生》《最少必读》的书单,可以参看。——编者

致张伟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

伟祥学弟：

1

别离多时了。海角天涯，系念于怀。关于你的情形，我还是知道一个大概。

这种岁月，有心灵自觉的知识分子要想照着自己的生活原理与价值观念生活下去，真是颇不容易。回忆我三十年来的生活历程，可以说是为着寻找自己的生活原理与价值观念并且依之而生活的奋斗历程。我想我毫无成就可言。唯一值得一提的，我没有被中国和世界这几年的惊涛骇浪同现实的诱惑而淹没了自我。我感觉到我的自我在种种打击中逐渐坚强并且净化起来。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任何书房外的热闹不能动摇我；任何无端的侮辱不能刺激我；任何现实的利益不能把我从追求真理的路上引向别处。

如果我的这一点人生经验值得年轻一代的朋友借镜，那末我希望他们要努力奋进。唯有在努力奋进中才体会得出，即令一点成就也需要付多么大的代价。也唯有在奋进中才体会得出生命能量的真实发挥。

这个世界目前太烦杂了，我们的性灵被各种花花绿绿的追求扯碎，这太易使人淹没在货物之海里。我们要从这一杂多而混乱的世界里自拔。自拔的基本法门，就是警觉，紧紧掌握着我，一切从自我出发，主动地透视这个世界，主动地创造，主动地欣赏自己的果实。是吗？

2

在我所处的情形里,我能看到你的信,并且知道你们给我的关切,在这寂天寞地里,感到一阵温暖。人间毕竟还不是到处漆黑。一个孤独的旅人,还看见远处有一线灯光。这一线灯光,也许可以接上巨大的光明,照耀着人类走一条坦荡的道路。

3

我看到你们编的《盘古》,《盘古》不古。它的格调清新,立论不俗。在香港那种重商的地方,要办好一个有灵魂的刊物是很不容易的。这得很耐心,作持久的努力。我遥祝你们在困难中进步。

4

听说最近的一期《明报月刊》内容还有趣。希望你挂号寄我一份,让我见识见识。可以吗?

再叙 谨祝

新年快乐

海光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

致何友晖 (二封)

·1·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

友晖学弟
兰珍太座

1

提起笔来写信给你们,我就忆起过去和你们在一起时的光景:池畔,小坐,饮咖啡,吃饼干,谈东论西。不知何日再聚首一堂?

年终的时候,我们计议到乡下去看郭太太她们,还有张飞少爷^[1]。想不到圣诞夜的前夕,而且已经十点半了,郭太太,兰珍的妹妹,她的男友,男友的妹妹,一支人马浩浩荡荡而来,并带来你们的礼物。真像一股暖流袭人。不久前有一位在美国的朋友寄来Lipton红茶二百包。这一下儿我们吃你们赠送的饼干,饮红茶,人生之至乐也!

郭太太来时,我们问起小胖弟的近况。据说很佳,只是吃的更多。我们又问起张飞小毛弟。郭太太说他很乖。郭太太她们说开了一个吃店,叫做“小茅屋”。我的内人去参观了一次。生意很旺,只是人忙的紧。听说小胖弟每个礼拜天要来店大吃一次。也许,郭太太她们忙出来的钱都填到小弟的大肚子里去哩!

兰珍和友晖寄给我们的照片都有趣。我们特别喜欢其中“一对番人”的那一张。二位的确看来很像番人,背景也优美。想来是在日月潭照的。兰珍给 Abby[文丽]的玉照,她已经放在新买的框子里。高高在上,金光闪闪。兰珍可以不朽矣!

2

友晖来信谈到交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这社会文化变迁因而伦矩(norms)逐渐破碎以致难得稳定人际关系的时代,是一个难题: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处群、交友、共事;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愿意弄的情绪不愉快,更怕伤害了我们的理想和善意。这怎样办?

鸿材说“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相异处,欣赏人与人之间的分歧”,而且“这种坦荡的胸襟,应由我们后代去拓广,而非狭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是很赞同这种态度的。不过,我个人在这种态度之上,又加两条原则:第一,为人必须怀抱基本的真诚;第二,如果一个人的头脑混乱,那末我立即停止同他谈论。为了坚持第二个原则,我显得颇不宽容。可是,这是我长期的读书的思想的生

活形成的,我实在没有办法改变。当然,第一个原则比第二个原则更为重要。别的暂时不提,人与人间如无基本的真诚,不仅毫无味道,而且互信不能建立,处处事事时时都得靠“办手续,拿证件”。这还成什么人的社会?

何君的问题,我们必须看作这个时代千万例中之一例。一点也不稀奇。鸿材老早就告诉过我,说他“头脑不清楚”。但是,他自己并不把这一缺陷看得严重而去努力改正。恰恰相反,他藉声威追求来补偿内心深处的自卑感。正在这个关头,来了一位“何友晖博士”,一起办刊物,大名摆在一起。于是飘飘然了,劲来了!除此以外,我实在看不出他有求知的真诚,更看不出他有任何理想及抱负。跟他谈话,他有时说的很对,但有时又胡扯。这足见他的思想核心是不通的。他又好在大众之间翻驳别人。这种行为,在这死气沉沉的青年一代,原是应鼓励的。然而,他不像是针对问题来发言,只是为了表彰自己。至于他为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足够的事证来说他虚伪,可是我有足够的事证来断定他“不够真诚”。你可记得,你们在我家小山上拜弟兄时,要我说几句勉励的话,我在旁边冷冷的,什么也说不出,后来还是兰珍出来打圆场?我的心里是明亮的。然而,以我的年岁及所处地位,我只好默默有苦难言了。何君有许多事并非出于自觉。他只是“志大而才疏”,常常不自觉的吸收并模仿他所在的环境里的那一套。这就很容易受人玩弄和利用了。

何君才短,作不出太大的祸害。话说到这里,我不妨顺便说鸿材上次所提到的谢××。上次中文大学李定一先生来寓,谈到谢君,破口大骂,说“谢是个坏蛋”,盖因受了他的骗也。谢君颇机智,粗豪的李先生非其敌手。何君同他比较起来,真是小巫之见大巫。谢君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现在只能用八个字来总

结：此人“势利凉薄，卑鄙无常”。我之所以顺便提到此君，是为了在你们心中留个底片，以免上当。

我们身边这一变乱的时代，这类遭遇是免不了的。二十几年来，我吃的这类亏苦，比你不知多出若干倍。我的为人，好恶分明，壁垒森严，是非之际毫不含混。这样的心灵结构，不难被人摸透。来骗我的人一进门总是谈点民主自由的口号，浅薄的谈点罗素，科学的哲学，再附带的骂骂人，说钱穆是义和团，唐君毅的头脑像浆糊，我便为之激励，像古人一样，立刻“相见大悦”，马上引为知己，相与推心置腹。来者的这一木马计(the policy of Trojan Horse)既然得售，接下去的演出就是我上当了。

上面所说的光景，我一想起，不禁哈哈大笑。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第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太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自卫，因此他总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 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碰，也可以寻找，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不少朋友。当然，时至今日，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

3

除了何君你看漏了眼以外，你对于那些人的识别(characterization)都很正确。提起××，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他从前在台大念书时，喜欢弄逻辑，也读点罗素哲学，心灵亦颇算开放的。但是，真

想不到,上次从美国回来,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和他第一次谈话就“格格不入”。我真惊异于他的闭塞和说不通。这也就是说,他的内心怎么那样“Stubborn, diehard”〔偏执、顽固〕。显而易见,这是由于他在美国的期间心灵受到挫阻(frustration)和创伤。他矮小,黄皮肤,英文比道地的美国人不如,读书不容易特别出色,找事很难,又穷。这样的人置身于美国的高头大马的富人之间,自然容易产生陌生感甚至于自卑感。这些经验是够令人不愉快的,因此一般人不愿意想它们,而是努力的排斥于意识阈以外去。但是,排不去的,只好掩盖罢了。存在但却被掩盖于心灵深处的这些不愉快的经验依然构成内心的压力和紧张,有时甚至泛到意识阈来使人难堪。怎么办呢?攻击和理由化(rationalization)就成为救命符和解除紧张的良药。于是,痛骂美国使他感到舒畅,再强调“nationalism”〔民族主义〕使他自己感到重要。我就不是这么想的。我这人矮,瘦,丑,样样俱全。我上次到美国,也没有人重视我。我并没有搬出“民族问题”来自我解嘲。如果真是“民族问题”,那末王浩,杨振宁,李什么物理学家,种种等等黄皮肤的角色,在美国不会受到那样高的尊重。我认为这在基本上是个人问题。既是个人问题,就应个人解决。

我只怀“compatriotic feeling”〔同胞感〕,同时有更深和更多的“cosmopolitan feeling”〔大同感〕。因此,我交朋友,根本不去管他的“nationality”〔国籍〕和历史来源。我只问他的“human qualities”〔人性品质〕。如果好,不管黄、白、棕,都可做朋友;不好,一概不理。我自己不讲“nationalism”。但是,我尊重别人的基本感情。我之尊重别人的基本感情,正犹之乎我之希望别人尊重我的基本感情。因为,感情是绝对的,在理知以外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论断别人感情之真、假、对、错。不过,我们不可对自己的感情“说

出一个道理来”。因为，一旦我们对自己的感情“说出一个道理来”，那就必然是客观的和理知的。如果它是客观的和理知的，那末必须有真、假、对、错可言。但是，任何感情并不因为穿上理论的外衣而变得客观而理知化。所以，藉 *reductio ad absurdum*〔归谬法〕，我们可知这类理论的工作根本上无一不是可笑的把戏。曾经使许多人为之疯狂的 *Nazism*〔纳粹主义〕就是最显著的例子。你可以有所谓“民族哲学”，你就没有理由说他不可以有“阶层哲学”。哲学不为任何特定的政治目标及任何特殊的集体吹号。

在中国社会文化里，弄哲学的人常有一项不自觉的危险，就是，他们常任稟自社会文化的“世界观”，“*social myths*”〔社会神话〕，“*group feelings*”〔群体情绪〕，“*ethos*”〔民族精神〕，“*pathos*”〔悲怆〕，以及“*credo*”〔教条〕，种种等等，沉淀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原封不动，而未曾藉 *Cartesian doubt*〔疑析〕来刷除——因为这需有正视全部社会文化传统的透视力和大勇气而且会给自我带来挖心的剧痛，只是在这原封不动的珊瑚岛上面涂抹一层康德、黑格尔等等堂皇的油漆，美其名曰“融通中西文化思想的大流”。这样，既可医治自八国联军以来累积的群体自卑感，又可“恢复自信心”。这类音乐时下不愁没有听众。但是，却经不起稍有头脑的人分析。康德是一位典型的开明和世界心灵的哲学家。因此，你可以强调“*national culture*”〔民族文化〕之类的东西而放弃康德哲学，你也可以采取康德哲学而放弃“*national culture*”之类的东西，但无论怎样你不能二者兼得。然而，从台岛到香港，尽是这种“哲学家”。我这个不在潮流中的人看在眼里，觉得满眼都是年老的小孩子。这些人在人事上世故深，在学问上却又那么天真。这也许就是“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免产生的特景吧！

友晖对于香港知识分子的观察,与我的印象相符。我对于香港知识分子的印象,主要得自出版物。就思想方面来看,一般而论,香港知识分子不是“浅”就是“腐”。后者可以《人生》杂志为代表。英国人的思想精密,自成一格,而且 Locke, Hume, Mill, Russell, 等人在经验哲学上的影响巨大;香港有相当的言论自由,经济情形颇为不恶,法治也还过得去;为什么香港的华语界很难看到英国本土思想的影响芳踪?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至于知识界的“领袖人才”,那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像严又陵,梁启超,和早期的胡适,在香港那种社会是很难产生的;不过,绝对应该而且可能产生一批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

你觉得××他们“有点冷淡”。这有普遍的和特殊的两层原因:第一,普遍的原因。Gesellschaft society〔联组社会〕在性质上和 Gemeinschaft society〔通体社会〕颇不相同。后者重情谊而轻利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primary group〔基本集团〕居于核心的支配地位。前者重利害而轻情谊,primary group 的核心支配力渐失,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各样的 impersonal〔无人格〕的组合。所以,在这种社会,人际关系一般的冷漠,于是出现“陌生人”,“异乡人”。香港正是这样的社会,所以不容易出现我们所希望的“一见如故”的情形。第二,特殊的原因。〔下略〕

5

话说的不少了。以后再叙吧!

谨祝二位

快乐

海光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写

注 解

[1] 指收信人养的狼狗。殷先生很爱狗,自己也养了一条。他说过:“狗好,狗比人有感情。”——编者

·2· [1]

〔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

友晖学弟:

1

你们能看到我的亲笔字,总是一件好事。

我现在重新接受另一种治疗。究竟结果怎样,目前不能确定。这要等到一九六九年底才可知道。

2

我的重点并不在“钱”,而在“谊”。与人交往,取与和援受之间,贵在适当。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破费你们,内心总有点不好意思。而且看来还免不了会不断发生的。所以,我才提出由我负担之议。

3

病中难得读书,更难写作。不过,偃卧终日,思想却多。所以,录音机倒很用得着。藉着录音机,我可以把我的思想捕捉住,免得烟消云散。你们要赠我这样的设备,我很欢迎。请托妥人带来。

4

由你来研究中国人的性格及文化,我真高兴,一定比空谈“人文,理性”之流切实多了。尤其是请鸿材作助手,简直再适当也没有。鸿材热忱,思想精密,材料熟悉,为人识见深远,非时下流俗之士可比。我希望你们的良好合作能获致卓越的成就。

5

我要的书,大概太老了。如果港大书店再不来,过些日子我改

订两本别的书。手颤,不能多写。 再叙 并祝
衽 安

海光
八月八日 病中

注 解

[1] 此信曾载《学苑》第十五期(香港大学学生会,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第二页。——编者

致何步正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步正学弟:

1

回港多日,谅必吃了许多好的粤味,看了不少朋友,很是快乐吧!

2

托弟物色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资料,想已在进行中。此外,如发现有关的英文书刊,或其他好书,如不太贵,也请罗致一点。

所需费用,你来台时再补。

3

鸿材不识台湾滋味,更不明我处境之困难。请弟转嘱他:(1)此后切勿将给我的信夹在给外国朋友的信中,以免不必要的麻烦。(2)来信不必特指寄来何种资料。因此举既无必要又无帮助——

可能还有害,或招致损失。

4

请弟赶早通知鸿材,最近可能有外国友人来港。希鸿材尽早将已搜集到的资料或可能搜集到的资料理出,择其中不便邮寄者,托该友带台。届时我会转信给鸿材。

5

除友晖的饼干一盒以外,如果你方便的话,请另购一盒。因我的胃好吃而台湾不易购到英国上等货色也。又希购买锡兰红茶一包。

来时面叙 祝你
快乐

海光
八月二十五日

致佚名(二封)^[1]

·1·

[无日期]

李楣和约翰带来的你们的礼物都收到,谢谢。信也收到。信对我们实在更重要,因为它表征着对我们的支持。

※ ※ ※

关于我们来美的事之意义和方法,我年来想了很多,现在扼要的谈一下:

实在,人的行为动向,最后分析起来,决定于他的人生态度,基本感情和价值取向(valueorientation)。从一方面说来,人也不过是生息在地球表面上的一种生物。自有人类以来,多少人生出,有多

少人自然的死亡,有多少人死于疾病,又有多少人枉死战场。一批一批的生,一批一批的死,如海上泡沫,旋生旋灭^[2]。如此人生问题在:“汝安之乎?”汝安则为之。我就是不安。我二十多年来,所做所为所言所写,都出于这一不安之念。“不安”些什么?

我不采取民族“主义”。我对于任何主义都存戒心——包括自由“主义”在内。但是,我有同胞爱,我有故乡之恋。午夜梦回,听鸡声喔喔,辄兴故乡之忆,心情凄然。我生长在中国。我在中国的动乱里成长。作为一个好思想而且有责任感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我对子置身于其中的大动乱不能不体验,不能不努力认识动乱的前因后果,不能不寻求解决的方法。为此,二十多年来,我几乎没有一天停止。

四十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康、梁、谭、陈等人,对邦国大事何等有责任感,何等热心。我把他们同今日的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现状对照起来,真是有隔世之感。……在大陆的怎样我还不太清楚,在台湾的许多变成自了汉,天天公开叫嚣的则变成权势集团的播音筒,对中国的现状无知,对前途是一片迷茫的幻想。自胡适以降,对国事完全失去独立思考的判断力,几乎完全以权势集团的是非为是非。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各人自顾各人的,只努力追求金钱和个人地位。俨如飘零的花,一群散失的羊,自谋生路,各不相顾。他们失去 national identity(民族认同),对国邦前途迷茫,又受到现实的压力。

中国自中英鸦片战争近百余年来的问题繁多,许多人物和党派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于是而有各种“主义”,并因之而凝聚为许多政治势力集团,花花绿绿,令人目不暇给,因而也促使中国的动乱。归结起来只有四个大字:富强;人权。富国强兵是为了御侮图存,基本人权是民主的基石,没有这层基石,民主徒具形式,一切努力

也都会落空。中国大陆共产组织近十几年来在富强这条路上有空前的成就,已足使中国在列强之间抬起头做人。[……]

今后世界的大势,决定于由中、美、苏三大主导力量形成的一个“新三国”。这三角关系有两种结合原理:一种结合原理是 ideological [意理]的;另一种结合原理是 anthropical [人类]的。依据前者,中国共产组织与苏俄联合对美。……后者美苏二大白种强国联合对中国共产组织。战后三国,一直是在这二大结合原理上游移。现在的形势已可分明,美苏二大白人强国联合对抗中国共产组织。自中国共产组织由不服苏共领导,提出恢复领土要求,想自行权充亚非集团第三势力以来,美苏合围的形势结成。而中国制出氢弹使苏俄位于乌拉山的军事基地暴露于新疆核子基地的威胁之下以来,美苏的结合对抗中共的形势愈来愈明显。现在,至少在太平洋西弦,中国完全在美国核弹射程之内。美国可能在认为必要时,找个藉口一举消灭中国的核子设备,然后封锁中国大地,让七亿人民自生自灭于国际社会之外。这真是人类的大悲剧!

然而,逃向台湾的这一撮残余的以统治为专业的人正在等待这一天到来! 趁机抢回政权。人生是为了政权。政权即是生命;有了政权即是有了一切。照他们所言所行看来,仿佛只要能夺回政权,即令美国夷平中国大地,亦在所不惜,以泄胸中这股恨气。

中美两国远隔太平洋,中美两大民族有传统的友谊。我真是想不出任何实质的理由他们必须这样仇视敌对。近二十年来中美的敌视局面之造成,主要系由于偶然的因素:第一,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组织抓拿若干美国人;第二,美国传统人士对中国共产组织的错误 image [印象],及美国一般 sinologists [汉学家]不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变动及因而形成的错误印象;第三,台湾统治集团及其 lobby [外围活动集团]之有计划的乘机构煽。第四,美国战后势力

之扩张。除第四以外,第一,第二,第三,都可以说是 accidents〔意外〕。Accidents 并非不能解释清楚。一个政策建立于 accidents 之上总不能说是健全的。第四项未尝不可设法重新调整。并无非诉之于毁对方之理。

※ ※ ※

Formosa〔福摩萨〕标榜反共。我观察了将近二十年,实在看不出 Formosa 反共的任何实质理由,而且愈来离题愈远。谈反共,最后分析起来,有而且只有一条实质的理由,就是为了维护基本人权。而维护基本人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道理理想。[……] 观乎现在台湾嚷叫反共的人,[……] 他们之所以高唱反共,对外是投美国之所好,藉以取得美援;对内藉以消灭一切异己,造成高压统治^[3]。

※ ※ ※

我观察并思索了战后产生的中美之间的问题近二十年之久。我深深觉得美国的现行政策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加激化。根本解决之道,是中美两大民族实现和平共存(peaceful coexistence)。实现之道:第一,逐步减少目前的 belligerent air〔交战气氛〕;第二,不要有意无意支持并鼓励台湾目前的统治家族的战意,一切努力以能维持秩序为限;第三,在事实上承认并尊重其存在;第四,时机成熟时,美国给予中国人民以技术援助,助其发展农业,轻工业,提高生活水准。帮助中国人民得到三十年一息的时间。等到这一代在斗争中起家的人过去,新生代起来,暴戾之气消失,逐步走上修正主义之路,正常地步入国际社会的大家庭。

※ ※ ※

我觉得我们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基于爱中国及爱世界的宏愿,有权利也有义务,起来作这种和平运动。现在,台湾的知识分子沉

睡,海外的知识分子失落。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感的人应该携起手来,对于这一件事共策进行。人生一世,与草木同腐。为什么不在这件大有意义的事?

我个人实在没有什么希求。名,利,权位,对我淡如浮云。我平常过的,近乎清教徒的生活。我二十多年来,就是这一件事放心不下,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如果我肯稍微迁就一下,何致弄到这样焦头烂额,四面楚歌?我之所以如此,就为了这一点理想,同时也为后世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并不都像胡适等人那样在心灵上死光了。

※ ※ ※

我们现在讨论基本原则的确立。来信说要以“长期纠缠”对付“长期拖延”。所见与我可说不谋而合。我对离台来美的基本原则是“长期奋斗”。

我上次请你也写信到这儿的权势人物说理。我在作这项要求时,我当然考虑到你过去在《自由中国》写文章的历史,以及近年来你在美可能有的言论及政治态度。据××说,你认为写了对我有害。我知道你写信不写信,反正两方面都说得通。你不写而置身幕后也许作用更大。

现在,我把我为我来美事所构想的程序写在下面。这一程序是阶梯步步提升(escalation):

第一步 请人写信,越多越可能有力。这一步已部分实行。

第二步 请你以我的老友身份,与 Pelzel 联络,请其致函此间教育部,帮助我速办。

第三步 与 Fairbank[联络]。他与我相识,……现在是国务院对华政策小组主席。促其请 State Department instinct [国务院敦促]此间美国驻华大使馆表示对我来美事

关切,并请中国官方协助^[4]。

第四步 如上述步骤无效, then to make my event as publicly known as we can[尽力把我这件事宣扬]。技术可由你设计^[5]。

这一步最好由第三者事先让这儿派往 Washington, D.C.[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工作人员知悉。故以“要用不用”为最有效^[6]。

关于这一步,可分为三方面:

- A 你所可能联络到的华府政界人士
- B 美国学界人士
- C 香港文化界人士

你以尽量不露面为佳,并防人 approach[摸底]。

※ ※ ※

基本结构与形态^[7]

The present regime here on Formosa is [台湾现政权是]三合一的怪物(spectra),它的核心是一个宫廷。它的意识形态是法西斯和纳粹^[8]。它的组织方式则为左派共产式的^[9]:一个安全网牢牢抓住整个台岛,深入并遍在每一角落^[10]。学校教师的聘请也需通过这一关。其他更无论矣!

教育为制造统治工具,并为不断动员的程序,灌输一党政治观念之工具。

银行,公营事业全被掌握或至少间接掌握于一党之手。军队、警察、镇压工具全被掌握。一个党听命于一个宫廷。一个国听命于一个党。

为了海岛经济生存,不能实行完全的“锁国主义”。为了装饰民主,不能不让人出入。与政治无关的商民人等的确有相当的出

人自由,故对彼等不构成[“水幕”]。但对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知识分子则查禁甚严,构成水幕(water curtain)。

为了造成“天下归心”的印象,并与中共隔海竞争地位,以招待(?)华侨、祝寿、观光,海外学人归国讲学等变相收买方式行之[11]。

吃、喝、玩、乐,等“自由”丝毫不下于民主国邦。但对言论则尺寸必予监视。政治性的结社自由则不待形成即击碎之。[……]不及纳粹粗糙,但细密过之。行来常曲折有致。

经济成长,除日本外,在东南亚第一[12]。

注 解

[1] 以下二信都是由信稿整理出来的。原稿极乱。二信都没有写收信人的名字,亦无法推断。——编者

[2] 殷先生在这里有零星的眉批:“有些事得从根儿上说起”、“长大,结婚,又生小孩”。——编者

[3] 殷先生在这一段上有眉批:“梦:王师西征,光复故土。”——编者

[4] 殷海光在这一段上用红笔眉批:“这儿的使馆人员似乎不能决定甚么。”——编者

[5] 殷海光在这一段上有红笔眉批:“长期奋斗”。——编者

[6] 红笔眉批:“第三、第四步可以并用,或谁先谁后,可以考虑。”——编者

[7] 上段刚写完一张纸,这一段紧接着另纸抬头写,但文章不衔接。不过,殷海光自己在稿纸上的编号是衔接的,而且也夹在一起,故这里仍当作一封信的部分。——编者

[8] 殷有眉批:“是右派保守的:诉诸民族传统的光荣”。——编者

[9] 殷有眉批:“留俄派取代黄埔派。前者更无顾忌而狡猾。”——编者

[10] 殷有眉批:“在一层民主形式的外衣之下,首脑为政府内里的政

府。”——编者

[11] 殷有眉批：“政治第一造成社会正义之日形低落。”——编者

[12] 上段刚写完一页稿纸，这一段写在页顶。可能是补充。——编者

·2·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1

来信收到。

2

曹俊汉已来谈过。他说的话，我可以听得入耳。

人对人有些尊敬，乃□□之所需。但人对人如果有崇拜式的尊敬，历史证明往往为祸乱，阻碍进步之一源。

人类所需者，不是崇拜偶像，而是凭理智以去取信某人之言论及行为。

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普遍出现了一种“现代人”。用我爱用的言词来说，这种人就是“无原则的人”。他自己只有基于生物欲求的价值系统，只要享用现代器用文明舒适的活着，此外无所坚持。于是，社会是怎样的动向，他便去适应。这是一种现代化的“顺民”。

4

你说一般留学生，缺乏治学方法训练及社会科学的基础。习理工之类的科学的留学生怎样，我比较难得判断，就习文史的留学生而论，我颇有同感。我看有许多赶急火出来的博士，学问还薄弱的很，这有几种原因：(1)受美国学术市场供求律的影响，有好商标才易出售。(2)受美国社会环境的压力，必须缩短生产过程才能早些在美国立足，以至成家立业，减少海外孤独感；(3)对学问的本身

兴趣不大,或小于对实现成就的追求。

在这些学问以外力量驱迫之下,真正的学问怎搞得不好?

时髦并不一定是对的,现代时兴的趋势左右个人的力量诚然很大,像天气变了似的,人人难以与之抗逆。然而,这却非全对。我认为第二次大战以前欧洲及中国北方的学术风格值得回味。

说到最后,学问的事是自我心灵的建筑。造宫殿慢而艰苦一些,但比一件商品伟大。年轻人得看远大一点。

四 致卢鸿材^① (二十六封)

致卢鸿材 (二十六封)

·1·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1]

鸿材学弟：

正要寄信给悦恒，便收到你的信，所以匆匆写几个字。

我很佩服你那种维持原则的味道，但我也感到惆怅，这类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了。

至于自传，没有写过。我几乎可以说是一个“historyless figure”[无历史的人物]。我的心灵，正像罗素所说的是：“a changing fluidity [变动中的流体]”。我多用 analytic method [解析方法] 追求真

①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10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理。我不大注意过去,我对于过去的事物多淡忘了。就为学而论,我是不成功的,虽然我还未停止。今年暑假曾有人用一个暑假写,但那人学识太差,抓不住要紧的地方,尽是不喜欢的歌颂之辞。我这半生确值得写,但想要到十几年后才说吧,我也想在《明报月刊》写稿,但现在试问哪有心情写呢?请你查查,《明报月刊》七/八月号是否有关于我的文字。若有,请寄来,挂号可免没入海水中。我寄其他东西同你交换。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注 解

[1] 这是殷海光先生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原件已佚。但我在收到信时曾把要点抄在资料卡片上。这里刊出的就是卡片上的转录;文字可能略有出入,唯原意决无丝毫改变。——编者

·2·

鸿材学弟:

1

我许久就想写信给你,但直到今天才动笔。之所以致此,原因很多,兹举出几端:

第一,这一年几乎每天有做不完的杂务。例如,捞浮萍,替芳邻收拾从墙头扔过来的垃圾,翻土种花,修理我的小河的堤岸。

第二,被读书所吸引。近来陆续收到若干好书。常常是这一本没有读完,就来了第二本。我的好奇心又重,来了新书一定要翻翻。这么一来,许多事都拖下来了。

第三,你所提出的事,例如要我写自传,我感到难以置答,须要反复考虑。

第四,我对人对事,越来越不顾持敷衍应付的态度。依此,我

把写信的事看得比较认真,我不肯随便写几句话搪塞了事。

基于上列四种原因和理由,所以写信的事就迟迟未行。不过,我重新展读你的来信,一封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写的;另一封是今年一月六日写的。这些信都还没有作复,实在是抱歉得很。我要痛改前非,立志从现在起,如有问事的信,一定在三天以内作答。

2

在我所作的杂务之中,最有意义的是捞浮萍。就市内而言,我住的院落算是大的。十多年前,我异想天开,在院内旁边开一条小河,长约三十公尺。河旁种植树木;河内养鱼,种睡莲。我常常一人在这静静的河边漫步。有一年,不知是风带来的,还是水鸟身上附来的,河面发现浮萍。浮萍太多了,布满水面的话,睡莲得不到阳光会死,鱼儿们无法露出水面也会闷死。我当时费了相当的气力才把它们打捞干净。

可是,这一次严重得多。去年春天,我发现莲花附近大约有二十个肉眼看得见的浮萍。我以为这不足为大害,没有十分重视哩!接着,因患大病,我进了医院。住院不到一个月,归来巡礼河畔,水而浮萍布散了二分之一。这下可糟了!然而,我当时实在没有气力来对付它们,只有眼睁睁的看着它们以几何级数来繁殖。到了去年十月,这条河完全受它们统治:鱼儿不知去向;睡莲也失踪了。

去年十二月,我就请台湾大学几位工友来清剿。工友的班长对我说:“先生,这个东西很麻烦。我们可以搞走一部分,但是搞不干净。”“搞不干净?”我心里极不以为然。我要下决心搞干净。这一下,我的苦头就来了!

浮萍的繁殖方式,主要的是细胞分裂。我每天用杓去打捞。打捞的结果,我发现一条定律:除非捞起的浮萍之数量在一定的时间内多于浮萍繁殖的数量,我没有希望完全消灭浮萍。根据这

条定律行事,我每天至少必须花两小时在这件工作上。一点也不能间断。一有间断,前功尽弃。所以,我只有坚持,无间晴雨的努力。天雨时,你可以看见一位头发灰白,讲逻辑经验的人,戴着斗笠,在河畔打捞这绿色的小植物。

终于,河面的浮萍完全肃清了,河水恢复了它往日的笑容。我以为工作完了。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一阵雨过后,河上又来了千千万万新的绿客。原来,我这条河跟台湾别的河一样,暴雨时水位上涨,天晴时水位下降。浮萍们妙得很。河水上涨时,它们跟着上涨;可是,当河水下降时,它们并不跟着下降,而是依附在河岸的草上。等待一阵雨来,它们便纷纷顺流而下,回到河中。这真使我忙坏了,又得努力去清剿。于是,每次雨后,便是我同这些小植物奋斗的时候。现在,才告一段落。

这些小植物柔弱,也不懂数学;但是,它们的数量多,而且生长得快,又能适应各种环境;所以,这样难得对付。目前,我的河上之所以没有萍踪,主要的是靠我坚持,一有发现,绝不放松,一定捞起。在这种场合,发脾气一点用也没有:想要成功,只有忍耐到底。

说到这里,使我联想起去年我大病中的情形。去年大病,我吃的苦头不少。其中最须要忍耐力的,就是打葡萄糖针。常常一次要打十个钟头整,身体一点也不能动,连大小便也不能下床。这对我这性躁的人实在是一性情上的大磨练;也使我联想到东方人几千年的生活形态之一面:忍受,并由此而构成的人生态度。

3

我写的那本《逻辑新引》,照我现在看来,已经“老爷得很”了。按理说,我应该对它大加修理一番。但是,我不拟这样做。理由:

第一,我的时间不够。

第二,我的兴趣转变了;我有我认为重要的事做。

第三,我缺乏找实例的助手。在写这类的著作方面,许多年轻人比我强,所以应该让他们去做。

关于(Entscheidungsproblem){decision problem}我再形述一下:决定问题乃对于一个形式系统 S 而发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乃是设计一个构作的程序(a constructive procedure)。当着我们这一程序应用到 S 里的任何公式 F 时,可藉它来决定在有限的步骤以内 F 是否有效(valid)。这儿所说的有效,意即 S 里形式的可推演的形变之纯语法的性质。

时至今日,决定问题之已经解决者只有语句演算。根据 Church 及 Turing 的分析,有限的谓词演算(the restricted calculus of predicates)则没有甚至不能有普遍的决定程序,因此决定问题也就得不到一普遍的解决。这一层的问题,牵涉到 Gödel numbering{葛代编号},递归函数,或 computable function{可计算的函数},我未进入,所以不能讨论。

4

关于要我写自传的事,我简直不知怎样答复弟才好。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无价值。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牟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了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直到今天为止,我在思想上积极的建树还少得可怜,可是我抖落的东西够多了。若干人是把我极力抖落的东西穿上玄学的新装来出售。真是又糊涂又无知!我的思想困苦成长于中、西、新、旧交会面又冲突的际会。像我这样的一个思想者的传记是有时代意

义的。前年有人写了一篇约两万字的。但我看他太不够了解我这个人和我所在的这个荡动的岁月,而且我觉得他有意拿我的传记卖钱,所以没有让他拿出。要写得真实,又富于意义,似乎只有我将来自己动手。希望我能够活到那一天。更希望我们有在一起的日子,由你来帮助我。

5

我的照片,有一堆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先拿这一张赠你。不过,我必须告诉你,这是十多年前的旧照。现在的我,可没有这样精神哩!

暂时停笔 祝你
春天快乐,进步

海光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3·

[一九六八年四月廿一日]

鸿材学弟:

1

今天上午十二点收到来信,下午马上复信。我读你的信是一种享受;写信给你是一种快乐。

2

你说我“一向缺乏历史研究的实际经验”,的确是实情。我在理论方面,很少人能左右我;但是,在史材方面,往往需要别人提供。这么一来,我在选材方面,就受到相当的限制。

再者,我对古籍不熟。我只凭机会碰到什么就用什么。你所提出的版本问题,我在头脑中几乎一点影子也没有。谢谢你的提示。

3

你要在《人物》发表我给你的任何信我都不反对。但是,关于指明某些个人的部分,目前还未到公开的时期,所以务请保留。

写给私人的信,岂有要稿费之理?不过,如果你能把有我的文字的那一期《人物》妥寄一册给我,将会使我感到高兴。我可以考虑给你们写点有关人物的文章。

4

我目前主要的工作是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你可以想象得到,我对史料的搜集是很不内行的。现在,我请了一个学生作半时助手。这显然是不够的。在不妨碍你自己的事时,我希望你帮点忙——特别是在扩展视野上。

听说香港方面流行的中国史料颇多。请你注意一下,有否叶德辉编的《觉迷要录》一书。如果买得到,希望你露书头挂号寄来。

听说你很穷。我也很穷。不过,这几本书我还买得起。问题在这点书费难得寄。可否暑期托侨生带来?

5

台北最近翻印了三种很不错的哲学书。这些书是不准寄出的。如果你找得到可靠的人带,那末我乐于赠你。请早些来信说明。

6

你信中提到的何君对我的论评,比起此间二三个杂志来,真是文雅啊^[1]!从一九四九年,起,批评和辱骂我的文字不下五十万字^[2],当然以近四年为高峰^[3]。从台湾到香港有关我的这类言论,一是出于某些分子有计划的制造和传播,二是出于误解。至于扯到学问,实在完全是笑话——不登大雅之堂的。

我被这么多人痛恨,有时代的背景因素在内。不过,我为人处世不圆滑也是一特定的因素。我不像你所提到的王[浩]先生那样

谦和厚重。我所表现的是高亢；不假词色，好恶分明。有人问到我关于港台哲学界的情形，我总是没有好话。“唐君毅的为人倒真诚，可惜思想像浆糊”。“方东美读书多，但只是一鉴赏家，他没有什么思想力”。诸如此类的话，常出我口。在这样一个好尚奉承的时代，我这样的人怎会被大家欢迎？我谈得来的人愈来愈少了。我越来越孤独似的。但是，我丝毫无悔。我不爱跟门外的人打交道。我安于在这个院落里读书，写作，沉思，看朝阳，望明月，独自徘徊，凝视白云舒展。我觉得我也许属于过去，或者属于未来，但不属于目前。目前的种种，跟我愈来愈疏远了。这个样子的社会，不需我这个脱节的人，我也实在无法参预这样没有灵魂的社会。然而，我并不对人类绝望。我愿意为着人类的未来作思想上的努力，努力的奉献自己的心灵。

7

王[浩]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头脑之一，也是最纯洁和朴素的灵魂之一。在这纷乱的世界里，我觉得他像一座安静的楼宇，风雨不能使他飘摇。

王先生对现实层界的见解，我大部分同意。他说他“个人方面”是“不愿卷人政治”。我看了这话，内心有说不尽的创伤和感慨。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内，真是“各党各派”，“异说争鸣”。我当时几乎事事反应，简直静不下心来苦攻学问。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一个浮动分子。这位王先生对于当时那些五花八门其实是怪明白的。但是，他好像已经看穿了，根本动不了他的心，他事事不反应。他只闷着头搞逻辑，究哲学。结果，他有了世界水准的成就，我则什么也没有。

不仅如此，多年来我给人一个印象，以为我是一个跟政治有关的人物。弟乎！这真是一河水也洗不清的冤枉。不错，我有我在

政治理念上的选择。年来我对政治学理也发生一点阅读和思考的兴趣。但是,这纯粹是把它安排在人类的前程里所作的努力。我也写过有关政治思想的零星小文章,也同若干高谈民主自由空论的人士发生关联,也痛骂过我不喜欢的种种说教。但是,严格说来,这一切的一切,书生式的感情发泄的成份居多。谈不到深厚的学理阐发的。无论怎么说,我这个人不具备从事于政治的任何条件。而且,现实政治的一切我都厌恶。就中国而论,至少近几十年来,各种政治卖买的布景有的颇为堂皇。可是,一看后台,无一不是“人欲横流”。这种卖买和人事,绝对不是稍有书生气息的人所能碰的。因为我有这些了解,我大有“今是而昨非”之慨。我十分明白,在这种氛围里,连发抒书生式的议论都会弄的祸患无穷。所以,这几年来,无论怎样对我公然叫骂侮辱,甚至设词构陷,我都能处之以沉默。弟乎!在这种年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要是能够享有“沉默之自由”,已经算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啊!

王先生说“今日作中国人十分难”。这句智者之言真是意味深长,也令我苦笑。以王先生今日的声誉和地位,身处美国那种自由社会里,尚且发生这种感受。假定易地而处,他置身于我今日的境遇里,他可能会说“今日作中国人万分难”罢!个中滋味,我真是“备尝之矣”啊!我在这里,只能像一个寂寞的蜘蛛,躲在一个小角落里,结一个小网把自己封起来。然而,即令如此,耳根并不清静:窗前充满了轰隆之声:他们要摔死这只蜘蛛才舒畅!

8

你说:“平时虽喜孜孜的从事自己深爱的研究,可是一旦空闲下来,老觉一种莫名的郁闷抑压在心头。”有时,我正是如此。不用说你这种年纪,就是我现在头发灰白了,有时也突来一阵无名的失落之感。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时代,对于如此社会人生的现实有所

感受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兴寂寞和孤独之欢,那才是不可思议之事。除非不用思想,一天到晚追逐声色货利,让这些完全占有自己,一个人才不发现人生的空虚。

人是不可没有感情营养的——即令他是爱因斯坦。但是,随着器用便利和金钱势力的增加,感情的营养反比例的减少了。人,住在鸽子笼式的公寓里,终年交臂而过,终年不知姓甚名谁,各人忙各人的肚皮,谁也帮不了谁的忙,友情只是利益关联的延伸,隔一道板墙像是隔半个地球。现代人,正是“寂寞群众里的寂寞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被分离了,传统及血缘的纽带逐渐被工业文明割断了。人,被原子化了。除了要“用”你以外,谁分享你内心的愉快?又有谁抚摸你内心的创伤?或者,像春天的柔风,拂去你心头的抑郁,让你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忘记了自己?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宇宙在冷却中。物理宇宙的冷却有限,对我们的实际影响很少。人事世界的人际热情,理念、感兴、友爱,真是日渐冷却到冰冻人的心灵顺利而又洋溢发展的地步了。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在近代欧洲民族国邦的构成和城市兴起的过程里,人本思想(humanism)同科学本是互相激刺和彼此创发的一对双生子。但是,科学的发展作了工业革进的先锋。工业革进又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先锋。在经济发展的程序里,技术当先,资源第一,功效领头,齐一为成功的捷径,一切从属于生产制度。于是,在工业社会里,个性差异压平了,人的尊严矮化了,人际关系受“利害原则”的主导了。于是,人失去了原始的快乐。人的存在,几乎完全被束缚在人自己用工业与经济创造而成的佳境(habitat)里面。于是,人的“自由”逐渐消失了。

以上的说明,一点也不暗示要复古。复古是办不到的事。往古也不一定那么可爱。所谓“黄金时代”多属后世苦难者的幻梦。

自然,当人在梦里得到在现实中得不到的满足时,梦往往被当作真实。梦一蒙上一层历史传统文化的学问外衣时,就看来更真实了。这是诗人的办法,也是幻想者的办法。可惜,幻想和作诗,都解决不了人的实存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一基本问题,还得基本上从人本思想和科学发展的调协上着手。这是当今思想家必须切实努力的一件大事。

9

希望你发现能谈得来的人和新奇的好书,并写出了不起的著作。

再叙 谨祝
进 步

海光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写完

注 解

[1]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一位北大出身的何先生在九龙尖沙咀泰丰楼对我说:殷当年想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做事,为国民党排挤,一怒之下,变了民主人士。殷不是纯粹读书人,人品很差,非常热中。

这一段话是指殷先生在西南联大就读时期而言,但完全经不起事实的验证。事实是,在淮海战役以前,殷先生始终是非常右倾的。他不仅没有在西南联大时期变了民主人士,反而稍后应聘为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的主笔(一度代总主笔),并成为国民党党员(这是当时担任《中央日报》编辑的许冠三先生面告笔者的,但殷海光夫人否认殷先生曾加入国民党)。——编者

[2] 这是指中共的《新华日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叶青(任卓宣)的《政治评论》等等报刊上的文字。中共还曾宣布殷海光为重要的文化战犯。——编者

[3] 这是指胡秋原、徐高阮、侯立朝、周之鸣、赵慎安、许遯等人的文字。——编者

·4·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鸿材学弟：

1

本月二十二日寄你一通航空挂号信，想来你已经收到了。

2

兹再来一信，系专为托你搜罗一点史料的。

前信说到请你搜罗叶德辉《觉迷要录》一书，请你露头妥当寄来。我现在把所要求的扩大一点于下：

(1)叶德辉，《觉迷要录》(全书)

(2)苏舆，《翼教丛编》(全书)

(3)胡适，梁实秋等，《人权论集》(全书)

上列三书，如能买到原书最好；不然，能到新亚书院或其他图书馆影印拷贝也行。

3

我因恐使你在经济上为难，所以前信只请你设法购致第一种。我的学生及其夫即将来台，我托他们设法购致另二种。如果他们已弄到一部分，重复了不要紧，我都要的。我现在考虑了一下，觉得这个办法不算最妥当的。我的学生××××新近生了一个小孩，一天到晚忙的不可开交。当然没有时间做这件麻烦的事。她的丈夫××是个外国人，且不通粤语，想来也很难做这件事。所以，我想来想去，不如把这件事完全托你。经费在他们那儿拿或你用后在他们那儿取都可。他们五月十日左右就要离港。所以，这件事请弟早日动手。(这也是涵蕴着说，希望你在五月十日之前把资料弄好托他们带来。) 即祝

进 步

海光

四月二十四日

·5·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

鸿材学弟：

前寄两挂号信，想都收到了。

今天又接××来信，谓她及其外子将先后来台。

我前信请你购致中国近代史的资料数种，谅在进行中。兹以机会难得，如弟认为尚有其他重要资料，也请一并购致，托他们带来。当然，一切以不使弟感到困难为条件。

××的外子××是一位厚重的青年学人。他不爱多言，可与交友也。

再叙 即祝

快乐

海光

五月二日

·6·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鸿材学弟：

1

前后两信都收到了。谢谢。读你的信是一件乐事。人的心灵有可相通的。

2

你给我买的四本书，我就是基于好奇心也想看。你会见费先生的光景，我极感兴趣。你那封信，我看了不下三遍。率真的事，这个世界越来越少，因而越来越可贵了。

3

不过,在高兴之余,身住台岛的人很自然的会考虑到另一方面的事。这事就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政治上的癌症问题。

香港和台湾虽只一水之隔,可是香港方面对于台湾政治真相之欠缺了解,正犹台湾方面对香港政治真相之欠缺了解。今日的台湾,在表面上是一个“国”,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这一个殖民地在骨子里完全被置于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之下。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的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之所以如此,说是为了“反共”。[……]今日统治台湾的人生恐外来观念入境,尤怕台岛人民看见阳光。所以,他们对外来的观念隔绝唯恐不力。依此,假定你现住台湾,如果那描写费先生动作及带书的信被查阅,你至少会被判“感训”三年:过三年囚徒生活。

4

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里真正看得清问题而又对时代有责任感的人愈来愈少了。我们要为中国的前途作长期的努力,尤其是在开辟思想的新境界上更须如此。这种工作是很艰巨的。我愿意贡献一点力量。我希望得到弟等的合作及帮助。

我不主张与任何人身或集团为敌,否则便是浪费生命,并延长历史性的动乱。但是,我坚持我们应有人的尊严,享受基本人权。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享有思想自由和致知自由。但是,这些自由,在今日的台湾,受到严重的妨害同压制,以致中国大地二十年来的变动我们茫然少知。研究中国近代及现代思想史而不悉中国大地二十年来的思想波澜,不止是严重的缺陷,简直是笑话。因

此,我很需要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与此有关的资料。当然,我是笼中之鸡,要得到这类资料,是有困难的。因此,我希望得到你的助力。为了工作的顺利和持久,兹与弟相约:

第一,以后寄书刊给我时,寄就寄,切勿在信中提及书名与作者,甚至不必提寄来书刊的事,以免招致损失甚或莫测之事。

第二,每二个月寄一次或二个半月寄一次。意即间隔必须大一点。寄递时以挂号为宜。

第三,有时可寄给我的朋友。这一点请参看后文。你的姓名及地址宜多留作通信之用,少作寄资料之用。寄资料须尽可能商借朋友的姓名和地址。

第四,你对史料比我熟悉,罗致时不必事先与我商量(请参看第一点所述理由)。可是,为了顾及时间和费用的限制,我们对资料的选取,以精简而有代表性的为重要标准。这当然颇要一点眼光。

第五,你不必专门为上列的事忙。你只要把它放在心上,有机会时注意作一下就好。

在经费方面,我想出两个办法:一,暑假托人带你;二,准备在香港刊物上发表一点文章,藉以创造一点“资本”给你。关于这件事,稍缓我还要同你商量。

5

等我的钱带来以后,请你为我买下列三书,用你的朋友姓名和地址挂号露头寄给下列收件人:但头也不可露的太多。总之包扎时须技巧一点。(地址略)

这个地址有效地到一九六八年年底。明年的地址明年再说。
x x 为人热心而可靠。我极信赖她。

兹将所要三书开列如下。但因系在外国学术刊物见到的,所

以写不出中文。这只好麻烦你猜了。

(a) *Chin-ling ts' an-chao chi* [*Sunset for Nanking*]. by Ch' en Shao-Hsiao, Chih-ch' eng Publishing Company, H. K. \$ 3. 80. 陈少校著,《金陵残照记》。

(b) *Kuan-nui Liao-tung i-chu ch' i* [*The Chess Game in Liaotung and Within the Pass*]. 同上,《关内辽东一局棋》

(c) *Chiu-pan t' an-ping lu* [*Wine Talk about the Military*] 同上,《酒畔谈兵录》

祝 好

海光

一九六八、五、二一

·7·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鸿材学弟:

1

我并未无条件的答应为你们的刊物写文章。如果我写给你的那封信你还保留着的话,那末你把信看清楚便知。我的意思是说,等我亲眼看过你们办的刊物以后,再考虑一些相关的条件,然后再决定是否为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盼弟勿早早将文章的事“赖”在我身上哩!

2

你寄来的快信早已收到。谢谢你为我抄录拙作的目录。那样精细,可见你在史学方面有些训练。

可是,我对我过去的写作,相当的失去兴趣了。我甚至往往对半年以前的作品不满。我认为我过去的写作,除了文笔锋利及思想快捷以外,在内容方面距离成熟遥远得很。《中国文化的展望》

那部书,在我现在看来,只能算是开风气的作品。如果我有两年时间,把那部书重写一遍,我想我可能写的较好。我常常对人说,清末以来胡适等知名人物的著作,绝大部分只有“历史的价值”,很少有“学术的价值”。我这样批评别人的著作,我自己的写作何尝不也是如此?所以,你替我抄录拙作的目录,我当然感激。但是,我不希望你费钱复印那些东西。万一已印,可以寄来。费用我设法带来。

3

三本翻版书,我已为你准备好了:

1) Rudolf Carnap,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Physics*, 1966.《物理学的哲学基础》近年来这方面最杰出的著作乃一。

2) McGreal, *Analyzing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1968.《哲学界论争分析》这本书,就我所知,是把逻辑形构应用于哲学解析的开创之作。严谨。读后可知哲学不是可以“宇宙人生”的瞎谈的。

3) A. W. Levi, *Philosophy and the Modern World*, 1958.《哲学及现代世界》这本书的“气味”与前二书刚好相反;但是,论断深刻,范围宏大而不空泛。

这三本书都不能邮寄。你可有熟人能带?

4

五月四日,我同几个学生往游台湾新竹郊外的青草湖,以纪念五四。那儿真是遮不住隐隐的青山,流不尽悠悠的绿水。白鸥上下,杨柳依依。滞台将近二十年,我第一次感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在湖畔照了相,现在寄你一张,以作纪念。当然,这也就是我最近的摄影。

余事再谈。 祝你

进 步

海光

五月二十四日

·8·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

鸿材学弟：

1

现在介绍×××先生给你。×先生是在哈佛大学研究政治学的。他现在台湾研究北洋时代的中国政府。他的思想通达。这次彼来香港，希弟在可能范围以内给他帮助。

2

兹趁×先生来港之便，托带美金二十元给你，替我买下列的书。预先嘱咐：来信切勿提及我托外国人传信及办事等情。（我觉得香港的人对于台湾这一警察国的实情不明，因此许多事不警觉。）

(a) *Chin-ling ts' an-chao chi* [*Sunset for Nanking*], by Ch'en Shao-hsiao, Ch'en Fan (Major Ch'en), Hong Kong Chih-ch'eng Publishing Company, H.K. \$ 3.80 陈少校(陈凡)著,《金陵残照记》。

(b) *Kuan-nui Liao-tung i-chu chi* [*The Chess Game in Liaotung and Within the Pass*] 同上 H.K. \$ 3.80《关内辽东一局棋》

(c) *Chiu-pan t' an-ping hu* [*Wine Talk about the Military*] 同上 H.K. \$ 3.80《酒畔谈兵录》。

×先生在港约有十天的住留。我认为良机难得，上列三书我又急于想看。所以希弟赶早买到，托×先生带来。这样较邮寄更妥。Tip Top 糖也可托他带，如果他方便的话。

(d) 张君劢，胡适等著《科学与人生观》(又名《人生观之论战》)这是民国十二年的一套老书。我只有下半部，而重要的上半

部则缺如。万一香港买不到全套,买得到上半部也好。

这种书与政治无关,买到后可稍微露头寄来。但是务请挂号。

(e)《陈独秀文存》

这部书请寄(地址略)

如果尚有余钱,那末请搜购左派有关思想的书(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重要论著一律欢迎)。寄书时请勿忘借用一外国人的姓名作 sender,挂号寄给×××,二三周一次,不定期(前说一二月一次,太久了)。这样可以减少被没收的损失。务请照这些要点进行。

3

最近从医院回家,收到你六月五日的信。我这几天会再写一信给你。现在有一事必须趁这个机会先说一说。来信云:“本期载有尊函的《人物》杂志已出版。为‘安全’起见,明日特托朋友以洋行寄文件用的厚信封挂号寄奉”。难道你这封信就因此不被拆阅?如被拆阅,有何“安全”可言?这类语言,一概是有害无益的。台湾不比香港啊!

《大学生活》五四专号上如有我的文章,请买五本挂号寄来。

又你为我预备的《明报月刊》,我很欢迎。如数量较多,请分卷直寄我。只要是挂号,这类刊物从未损失。

再叙 即祝

快乐

海光

六月十二日

·9·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

鸿材学弟:

1

你托人带来的东西都收到了。很是谢谢。

无论怎样,在台湾将近二十年吃着陈腐东西的人,骤然看见香港来的货色,总觉得新鲜开胃。哈!

2

在原则上我想为《明报月刊》写文章。题目已经拟定:“论传统与现代化——并以中国为例”。近得许冠三先生来函,要我为你们办的《人物与思想》写文^[1]。我愿意帮忙。

有关细节,下次来信与弟商量。

3

为我出文集的事,在原则上我赞同;可是有些次级些的问题,我还需同你讨论。

4

你为我预备的《明报月刊》,虽很零碎,在此间是珍品,所以便中仍请寄来。胡菊人君赠我该刊全套,真是令人高兴。但是,这样全套的东西,未知你已否寄出,务请寄给前信所说的人(悦恒寄来的《大学生活》,我迄未收到)。对于好东西,我们要设法尽量减少损失。此意谅弟明了也。

5

请不要太苦了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我们必须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重建作持久的努力。

海光

七月一日

关于《科学与人生观》:

(1)我要 photostat copies〔影印副本〕。microfilms〔缩微软片〕对我很不便。

(2)我所有的这部残书,为一九二六年上海泰东图书馆出版的三册中之中下二册。但是,该书重要的部分恰好在上册。所以,请印制上册。

如果我在以上对版本的了解有错,则请如你所说,印制半部(即上半部)。请弟裁夺从事。因弟之了解常比我好。

注 解

[1]《人物与思想》是许冠三先生独力办的。笔者从未“办”过任何刊物。——编者

·10·

[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

鸿材学弟:

1

前几天托带给你七月一日我写的信,想来现在你已经收到了吧!

兹趁步正回港之便,带你前时所说赠你的三本书。这三本书各别的代表哲学上三个不同的相度(dimensions),都很精采。希望你在这阵忙过了以后,每天能抽空精读一点,藉以增进自己的认知能力。

又趁步正回港之便,带你美金二十元,为我采购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资料。当然,这只能在你便中为之。据××说,他们一家将于九月再去香港。我希望那个时候能再弄到一点费用,托他们带给你。

2

为我出文集,在原则上我是不反对的。我对于过去的写作之基本态度,已见之于前些日子给你的信。我很难廉价地称赞别人

的作品,但是我对于自己的写作更苛刻。在文人中,我似乎是最不“敝帚自珍”的人。我想我在为学上很少长处。然而,我想我真正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人。因此,照我自己现在看过去的作品,只能算是“青年锐气之作”。不过,如果你们看我过去的作品不像我自己那样苛刻,而是仍然多少对青年有益,甚至对这个时代也有益处,那末出个文集也未尝不可。但是,真要出的话,我希望你能仔细校正一次。悦恒他们是有出的拟议,可是迄未实行。这事在友谊上最好跟他们商量一下。我想双方不一定有什么冲突,所以不难解决。

至于什么引殷海光以“沽名钓誉”,“捧着殷海光的招牌卖钱”,等等话头,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这种纷乱之世,国与国间,人与人之间,在是非价值上,几乎完全违离正轨。只要有一点兴举,便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如果都要招顾,那还能办事吗?我们立言、作事,只问是否合理,不问其他。“虽于万人吾往矣!”年轻人尤须有这种气度。

3

为《明报月刊》写文章的事,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年来我的想法不少,写出来以供同好确是我的责任。同时,为年轻的朋友帮帮忙,我也很乐意。不过,我最顾虑的事是怎样保持我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独立性。这话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并不是凡人要在思想上纯洁和独立便立刻就得到思想上的纯洁和独立。中国近五十年来,左右这两大集团都成了“气候”,各自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形态上的影响够深远了。我们试用解析的方法来检视时人有关思想的论著,立刻可以发现很少人在基本处能自外于左右这两大气流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所酿成的影响——包括第三期的胡适在内。我个人为了摆脱这些影响,几近三十年作着继续不断的努力。在这么长

的时间以内,我很少停止修正自己的观念,我常常因自己寻找到自己
的错处而自喜。到了现在,我在学术上的贡献依然是零。可是,
我在境界上,倒近似禅宗两句话所描写的光景:“云散水流处,寂然
天地空”。现在,我看中国近几十年左右这些气流,可以很轻松的
说,他们都是“乌烟瘴气”。二者都贫弱,所以都要靠“势”来支持。
一离开了各自的势,便什么也没有了。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
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
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
特定的答复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
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我接着又
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
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
想。”这一番话,我当时实在并不很了解。现在,事隔二十多年,我
经过了许多思想上的风浪以及对这些风浪的反思,我想老师之言
我完全了解了。无论内容怎样不同,休谟、康德和罗素等人的思想
都是纯洁而独立的。我一直以做这一类型的思想工作者自勉。因
此,如果我要写文章,我也极力避免在受左或右的影响甚或支配的
刊物上写。你的来信说《明报月刊》的“背景亦最清楚”,我信赖你
的判断,因此我可以替它写。但是,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如果刊
出来的话,一定得设法寄我三份。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如果一位
作者不能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刊出,那末即令稿酬不薄,也很难
支持他继续写作的。请弟等设身处地的正视这一交通问题。

4

你们办的《人物》月刊上我的第二篇东西,尚未见到。《大学生
活》五月号,也迄未见到。希弟稍空时买几份,连同整套的《明报月
刊》,挂号寄到前信所说处,以减少损失。这里所说“前信”,即是托

×先生所带的信。我们读书人的凭藉渐少；特别是我，处境比一般人困难。这些情形，凉弟深知。所以，为了得到多方面的资料以便于研究，在应付恶劣的时代环境方面，不能不多用点脑筋。

5

我写中国近代思想史，是采重点式。因此，在资料的搜罗方面，也相应的必须是重点式的。台湾关于清末思想变动的资料，大致还不难找。但是，自五四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十年间的资料，就比较难找。尤其是左派的东西，大家碰都不敢碰。今日台湾如果尚有知识界的话，那末是被关在另一个天地之中。这种情形，港方知识界也许难以想象。我要你帮忙便中搜罗的，主要就是那二十年间的思想史料。如寄资料，来信不必提及。何况你在史料方面比我内行得多？

6

我在六月间体重减轻，食欲不振，精神萎顿。我的内人和学生以为我的癌症又发作了，大家紧张起来。去年动手术后，医师背地对旁人说，我的癌细胞已经分散到淋巴腺了，切胃只是尽人事，我最多只活一年。恰好一年，就出现上述征象，难怪大家那么紧张，逼着我到医院去检查。我自己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自信力。我说：“不会的！这些现象是临时泻肚形成的。”检查的结果：“一切正常”，只是有点贫血，而且医师说不要紧，只需多吃点好东西就可补过来。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也希望你要注意身体。身体拖垮了就难恢复了。

再叙 并祝

健 乐

海光

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

·11·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

鸿材学弟：

1

你的流行病好了，总是令人宽慰的事。工作固然必须认真，保重身体尤为根本的事。我们穷书生，除了身体以外，还有什么本钱？

2

《甲申三百年祭》，《明报月刊》三包共二十五期，附录二册，《大学生活》五四刊号一本，《人物》一本，都安全的收到了。令人欣慰。不用说，我是谢谢你的，也请你代我谢谢胡菊人君。

你给刘福增的信已经转交。

3

兹托我的学生、×××××带你美金三十元，供你购买资料之需。××说为了赞助我著作，要提供一点“相对基金”。这当然是我们皆大欢喜的事。如果你运用的可能经费多一点，那末你搜集的范围相应的也可能大些。

关于经费的支度，以方便搜集为优先考虑，不必太过于考虑经济原则。只在经费快用完时通知我一声。支用的情形，根本无需对我细列。

希望你有一天发大财，解决我的生活问题，无限制供给我书籍。那就好了！

4

最近××拿你写给她的信给我看。你在信中说寄来的东西是我的。看完了信，我们相视苦笑。这不是泄露天机吗？我既然请她代收邮件，事先当然会有一番嘱托的。为着稳健，我们必须假定

(assume)每个邮件被检查的可能。我的处境这样恶劣。魔鬼们日夜找藉口来陷害我。为着生存下去,并且为着研究工作能顺利进行,对外交通不致受到严重的困扰,我必须特别谨慎。尽管台湾的统治集团要靠美国人保护,可是一般人民跟美国人来往密切,他们是采取疑忌态度的。尤其对我这一种“不忠于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更甚。像现在这种情形,我自己有现成的通信地址不用,而要由外人代转,你给××的信如被检查,则彼等一目了然。除疑我“勾通外人”以外,以后每次寄来左派资料,彼等不动声色的登记下来,日后就成为对付我的口实武器了。生长在香港自由社会的人,实在不易敏感到台湾统治的这些真实的内情啊!

为今之计,我提出补救的办法于下:

(1)你以后寄交××的资料,切勿再用你的姓名和地址。每次用不同的姓名和地址,并更换不同的笔迹。这样总可相对的减少被注意的机会。

(2)如果你认为特别重要的资料,意即特别为台湾权势人物所厌恶的,例如宋庆龄女士的言论,那末你可寄到下列地址。当然,请勿写任何信函,也勿写你的姓名地址。意即写别人的姓名地址,也请挂号。〔地址略〕

有效期间也是一九六八年以内。

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区,一个从事著作的学人怎会这样操此类的心!

5

我现在写文章,越来越不愿像十多年前那样的“要才气”。现在,在我心目中,“要才气”与“轻薄”已成同义语。我动笔时,必须谨严从事。我为《明报月刊》写文章,在动笔以前,除了构思以外,还得把我所见得到的相关的书刊阅读。现在,这类工作快完了,我

就要动手写。写完后,我会双挂号寄来的。

6

史料的相干范围不易甚至根本不可能像行星系统那样划限或算定。这类“历史的理论”问题,真是说来话长。我希望将来论析这类问题。任何人,即令是他自己,我的资料也不见得会件件相干合用。所以,在你帮助我找资料时,你应根据自己的思想和判断,放手去作。何况你根本就比我熟悉?现在我又附来一个书单,作你找寻的引线。以后如有必要,我会随时开列给你。

我的眼力病后不如从前,microfilm[缩微软片]难以阅读;且更无法剪贴。所以,在原则上,我主张影印。影印的经费是比较贵一点,但对我方便,且因一目了然可减少检查程序上的疑团作用。台湾简直是一个猜疑世界。外来书刊之牺牲于猜疑之下的,二十年来,真不知凡几!

7

我否认我在给你的信中有所谓“自谦”之语和“捧你”的地方。我一辈子不作这些事。我对人对事常有错误的判断,事后想起来常觉歉然。但是,在立意上,我绝不自谦,也绝不捧人。我的基本信条,在这一认知的关联上,有而且只有一个。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是什么就说什么

8

在这样一个迷茫、纷乱、而又失落的时代,心灵的相通真是稀有而又十分可贵的事。回忆我在故乡时,谈得来的人不算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岁月里,和我心灵契合的老师及同学随时可以碰见。在学校附近文林街一带的茶店里,在郊外滇池旁,在山坡松柏林中,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踪迹,常常可以听到我们谈东说

西。现在,我回忆起来,总觉得“梦魂不到关山难”!内心说不出的想念。可是,我在台湾一住将近二十年,越住越陌生。我在台湾大学十八年了。当我在校园散步时,我实在感觉不到那儿有独特的灵魂,足以引起我梦回午夜。战后的世界,人是愈来愈多了,可是人心的距离反而愈来愈远了。我们饥渴的追求心灵,真诚的心灵。

以后再叙。暂时停笔 祝你
健乐,进步

海光

八月十八日,一九六八年

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观察丛书)

这是二十年前的书,如果碰不到而图书馆有,请考虑
择其有代表性的部分影印。

潘光旦,《政学罪言》(观察丛书)

王了一,《龙虫并雕琐语》(同上)

艾思奇,《大众哲学》

大陆赤化前中国知识分子左倾、不满现状、等等有代
表性的思想言论都当包括在我的著作里。

《明报月刊》

我收到的《明报月刊》止于今年一月号。请继续收购
二至八月号。如《明报月刊》见赠更好。

宋庆龄的言论(我记得有集子)

包括沈钧儒、李四光等先生的言论。一九三三年六月杨杏佛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事被刺。孙夫人曾
为此事发表谈话,我想香港存报上可以找到。这类
的事端和言论,官方讳莫如深,弄现代史者多不愿
提,我认为是中国民权运动及其思想上重要的节目。

岂可不书？

中国法西斯的运动和言论(一九三〇年左右的报纸,刊物或书本)

·12·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

鸿材学弟：

兹托××××××带给你一封信和美金三十元,需面交。希望你最近得便时去看她们一次。她们的小女儿立雅,Lia,很聪明、美丽、可爱哩！

再叙 祝你
快乐

海光
八月十九日

·13·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鸿材学弟：

1

前些日子经××托人带给你我写的一封长信及二十元美金,谅已收到了。三本书,想也已交到你手了。

2

现在又带来一个待购书单。当然,我所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资料甚广。像郭湛波写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是太狭了。五四以降的政治思潮,以及文艺背后所藏的思想观念变动,种种等等,都在我论析之列。所以,鲁迅这些主要人物的主要作品,我必须注意。你在这方面的识见颇为丰富。我希望你替我作些主。

××来港时,我再设法带点费用给你。这种工作,看来总要持

续二三年的。

3

《明报月刊》种种等等,已否寄出?如尚未寄出,请妥当从事,以免损失也。

余事再叙 即祝

健 乐

海光

八月二十六日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3

郭沫若:《革命春秋》,1947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1958

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

于平凡:《中国民主自由运动史话》,自由出版社,1950

鲁迅:《呐喊》

鲁迅:《彷徨》

鲁迅:《狂人日记》

其他,等等(尤其是他批评中国社会思想者)

艾思奇:《大众哲学》

·14·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

鸿材学弟:

1

托××带你的美金三十元,此时谅已收到。

另外,我想创造一点资本。

2

兹趁友人魏××夫妇游港之便,寄这封信和书单给你。

3

魏先生夫妇在港约勾留一个星期。机会难得。请你购的这几本书,托他们带来最便。

当然,如果尚有其他资料,也可托他们带我。

他们为人可靠。

别事再谈 即祝

进 步

海光
九月十日

司马璐,《斗争十八年》(旧版)

司马璐,《中国和平演变论》(展望丛刊)

自联社编,《中国修正主义》(展望丛刊)

王少平著,《中共与修正主义》(展望丛刊)

中共早期“斗争”金岳霖、潘光旦等先生的资料,我也很需要。

·15·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

鸿材学弟:

1

函悉。

关于某君之为人,你和××的分析是对的。自从你们提醒以后,我又发现了一些无可置辩的证据来加强你们对他的看法。

我的基本态度是这样的:对于任何欠缺真诚的人,我避免和他交往。

2

许久未曾看到你同××拟供我的史料,例如前半部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以及其他的种种等等。

现距前言一九六八年度的期限已无多日。若资料能在十二月一日以前供用更妥。因冬天来临,雁鸟提早西飞也,时不我待也。

不一。 再叙 即祝

健 乐

海光

十一月八日

·16·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

××
鸿材 二位学弟:

1

前寄一贺年片及附言,想来已经收到。

2

你们已经认识友晖,真是好事。他与一般留学生气味不同。他们夫妇二人跟我们全家人谈得来。

我现在将他们给我的信寄给二位看看。看毕请还我。我又将我回复他们的信寄给二位看看,看毕请你们妥交给他们。我另函他们这封信为什么要给你们看的理由。

3

我寄来一本小书给××作为新年礼物。这本小书虽然“不值钱”,但内容精彩,我很珍爱。基于“美味不可独食”之义,所以寄赠。我另赠鸿材这儿出版的刊物一册。鸿材虽因粘上“殷”字边而遭池鱼之殃,然亦可名垂千古矣!

4

东西无论部分或全部未带到,我主张不要追究。鸿材所提嘴甜的某女士,前年某外国友人交彼美金三百二十元购买资料,不得已换我托人交涉,问为何久久杳无音讯。这年头怪事多得很。这不过一例而已。追究,除滋纷扰以外,鲜有结果的。

我所要的资料既然迄未收到,务请停寄。

二位进步

海光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日

附赠鸿材照片二张

·17·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

鸿材学弟:

1

一月初寄给你和××的信,相片,书刊,想已收到。

另寄你转交友晖的长信,谅已转交给他。我给你们看的友晖致我的函件,未知你已否寄给我。

2

我为《明报月刊》写的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文章,只算起了一个头,有六七千字。看来距离完成的日子还颇遥远。

3

你前信所说锡兰红茶及丹麦牛油饼干,我颇感兴趣。文人就是如此。××来信说她在旧历前要来台看母亲。她们是可靠的,毫无问题。我想请你将上列的东西各购一样托她带来。因为,这两样东西台湾很难购到。所需资本,我当设法还你。

再叙 即祝

进 步

海光

一月一八日

·18·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鸿材学弟：

1

前寄二信，未知收到否？近来的情况怎样？工作忙吗？在念。

2

你同××寄给我的资料，除了一次的以外，完全未见踪影。所以致此，原因很多，我们没有时间去分析。不过，如果你们邮寄时的包装易于辨识来源及投递的时间规律化，那末就是易遭损失的构成条件。我已经说过，生长香港的人不易想象台湾统治的真面目；因此临事的心情及处理方式也就不易完全沟通。特别是我这仅存的自由知识分子，所可能遭遇到的困难更多。

因资料损失而损失金钱，这倒不是最关重要的事。损失当然由我负担。但愿资料的损失不是无可补救的绝本。据说，依照国际通邮规律，甲地寄往乙地的邮件而不受乙地欢迎时，乙地可以原件退回，不得没收或损毁。你们为我寄资料时如已挂号，可持收据向原邮局查询，要求退回。这一办法也许可以保全尸骸。请你和××努力一试。

3

以后为了避免类此的损失，我们不得不改变资料运输的方式。重要的资料，以托带为主。非最重要的资料，才设法邮寄。这件事务请二位继续努力，助我完成一部重要的著作。近来搜集的成绩怎样？希望有许多收获。得到收获后，请联同××要卖给我的书，妥交悦恒兄，由他设法转运给我。这事以三月二十日为最后时效。

务请记住。

4

通达意念如此之不易,我将希望你们二位继续搜集的资料开列在下面。为了促起你同××的注意,有些在从前曾经提到过。当然,如果有新的发现,我是无任欢迎的。如果你那儿经费不足,请先垫付,我可设法归还。

- (1)宋庆龄的言论
- (2)三十年代人权运动的言论(见当时上海的报纸杂志)
- (3)三十年代法西斯运动及言论
- (4)三十年代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在独立评论、大公报等)
- (5)李大钊的言论
- (6)从西安事变到一九四九年左派重要的或具代表性的言论
- (7)民主同盟的代表言论
- (8)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观察丛书)
- (9)潘光旦:《政学罪言》(观察丛书)

5

别的事情再叙 即祝

进 步

海光

一月二十二日

·19·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鸿材
二位学弟:
××

1

一月末托悦恒转致的信,谅已得达。其他的函件等等,想来也

已收到。

2

托二位搜罗资料的事,务请尽力帮助。我现最感困难的是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五〇年之间的思想言论的代表作品。在这一期间,有左派与右派的冲突,民主和独裁的论战,保守对激进的歧异,及其衍生的附随言论。真是形形色色,光怪陆离。希望二位多多向这一阶段用力。

3

现在介绍黄锦满同学给你们。锦满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四年级读书。他喜欢社会人生问题的探求,为人热心而平正,可以托事。年来我颇得他帮助。希望你们能做好朋友。

以后再写。 即祝

进 步

海光

一月二十五日

·20·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鸿材

二位学弟:
× ×

1

久未得信,近况怎样?时在念中。

前托转给友晖夫妇的长函,和赠给二位的书刊,照片,想来已经收到。友晖给我的信,便中请寄还。

2

你们由别人转寄的资料,除一次以外,完全没有收到。之所以致此,台湾的“防疫”政策已无挂齿的必要;而在邮寄的技术上,可

以说到的原因至少有二：第一，“每周寄一次”这样规律；而且第二，大概寄件人及包扎形式和笔迹没有变化。这样一来，当然容易认出而遭没收。

损失的金钱尚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应由我负担。但愿损失的不是绝版的東西。邮件进口时如不合该地政治气候，照章可以退回，不得没收。如果那些资料已经挂号，可持收条向邮局交涉退回。我们希望不致完全“石沉大海”。

3

我写思想史，并不要像美国学人那样作地毯式的资料搜集；可是，重要的及有关键性的言论则一点也不可忽略。至于什么是这类言论，就需要凭学识与经验来作判断了。不过，这还是有些标准的。例如，原始的主张宣言，重大政策转变时的言论，有分量的宣传文章，等等。

我所要的资料，晚清大体已备，五四时代的也有了若干，当然还需要随时充实；而最感困难的是下列论题：

第一，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之重要言论。

第二，上海人权同盟的言论（三十年代，宋庆龄等）。

第三，救国会的言论（黄炎培，沈钧儒等）。

第四，民主同盟的言论。

第五，人民阵线的言论。

第六，民主与独裁的论争（胡适与蒋廷黻等）。

所以，希望二位多多集中注意力在这方面，给我以帮助。所需费用请暂垫付，我当设法奉还。

4

资料的邮寄既然这样没有收到的保障，以后须以托带为主。邮寄只能拿并非无可补救的次要资料作偶然的尝试。下列二个收

件处〔略〕,未知二位已否用过,绝不可再用。如尚未用,可拿次要资料挂号一试;但不可用同样笔迹,包扎,人名,与住址;否则恐十之八九会打入冷库。这是乱世啊!我们读书人有何可说?《明报月刊》一九六八年也未见过。需要一套。

不一 即祝
进 步

海光
一月二十五日

·21·

〔一九六九年二月八日〕

鸿材学弟:

1

一月二十日的来信已经收到,并且欣赏了几遍。你每次的来信,都是我最提神的读物。你的信中常常充溢着真纯的热情,像一江春水似的流荡而来,激起我无穷的感兴。我的学生林毓生说我一边是诗人,另一边是分析家;在认知活动上那么冷酷,可是道德感又那么强烈。所以,我的内心常像沸水似的起伏,因而心灵时在紧张状态,但也因此产生在不平衡中的创意力。我觉得茫茫人海,这真是知言。照年岁说,我对人及对事应该随和一点才是。然而,我的心灵发展恰好相反。我的态度愈来愈严峻。稍不合分寸,在我的分析表上就遍不过。可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在物质器用上突飞猛进,而心灵却愈来愈空茫。这一发展,与我的正好背道而驰,台湾更成为无魂之岛,所以我益发感到孤独了。然而,只要是碰到真东西,无论是真的感情也好,或是真的知识也好,我却又无条件的溶化了。斯人而处斯世,如何得了!

2

你和××有共同的处境,其实和我也有共同的处境。在现实里,二位大概为所谓学历,资历,及人事关系所限,做劳苦的工作,拿很少的待遇。想多读书和写作,但为时间所限。这种境遇,和自身的能力很不相称,当然不安。我从××的作品,来信和照片上,可以感到他有点愤懑之气。我知道香港的社会也是颇不合理的。香港的文化界也是一团糟。有些学问同文章比较好的人做底层的事,拿少量的酬报。有些人肚皮空空,但会写点消闲小品,或贩卖点“历史文化”,便可以居高位,作极少的事而拿极多的酬报。自昔至今,人间这类的不平事,几乎无处没有。单拿我来说,遭遇已够辛酸了。将近二十年前我毅然辞去某大报^[1]薪给优厚的主笔职位,满腔热血要到台湾大学教书。岂知台大根本不承认我凭单枪匹马努力得来的副教授地位^[2],硬要我从讲师作起。我当时已经放弃生存据点,除了接受台大的这一“不平等条约”以外,再别无选择。从讲师当起也好。可是,我一看庙里那些高高在上的菩萨,除了一二位以外,简直是黑漆一团,一点灵气也没有。我当时的确颇受精神打击。事隔这么多年,这些菩萨的思识同学问一点基本的进步也看不出,而收入比我这种人多出一倍有余。人间的公平和正义,连学府也讲不通,遑论一般社会?更遑论既不够现代化又不合传统的过渡组合?

我现在透视这样的社会人生相,益越觉得无权无势无钱的人跟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正面论理,在非民主的社会简直是與虎谋皮,极少有美满的结果。现在,世界的人口这样膨胀,我们的生存空间颇为有限。我们首先必须利用现有的空间来发展自己。尤其是二位老弟,有一项丰富的资源,就是都很年轻。就我现在的感受而论,年轻是多么重要!这一资源,万金难买;可是,浪费掉了,也万金莫赎。二位所能优为的,就是拿时间换取空间。就我的阅历看

来,二位的出路,就是坚持进步,作恒久的努力,著出几本硬货色的巨构。到那时候,就不怕没有人承认了。古往今来,许多有大成就的人,往往经过艰苦的历程。我们有了这样的意志和远景在怀,自然会能活得有劲,克服得了许多困难,而视写消闲小品以搏利益不过是过眼烟罢了。

3

我为什么喜食好糖、好饼干、喝好红茶,这是有原因又有理由的。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形成了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这种基本的人生态度,可用两句话来总括:

头脑要复杂;心志要单纯。

如果头脑不够复杂,那末便无法研究现代的学问,不能了解经验世界,更不能认知如此多变的社会人生诸相。但是,如果心志不够单纯,那末人格会陷于分裂。在现代社会里“混”的人中,许多人就在人格分裂的边沿。古往今来,无论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还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事业家,没有不是心志单纯的。在近人中,头脑复杂而心志单纯的典型可推爱因斯坦。他是我心目中完美的模范。他头脑里所装的数学公式和物理知识可说复杂极了;可是他一辈子的心志也可说单纯极了。他只追求真理,不问其他。至于生活,他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是照着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过日子。他不故意迎合习俗,也不故意违反习俗。他在普林斯顿镇上漫步时,高高兴兴来买一个纸杯冰淇淋边吃边走。他是而且只是为他自己而吃;不像中国若干名士派的人为了钓誉而表演给别人看。这两者的心灵内容,一高一俗,相距何止万里!

我并非一下子认识爱因斯坦先生的伟大的。我是在这样波谲云诡的世变里体会到他的伟大处。罗素先生像一颗巨星,但这颗巨星的光彩我嫌太多了一点。他的单纯处还逊于爱因斯坦。由于

生活经验及不断思索,我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系统。我发现了复杂中的单纯,以及单纯和复杂的统一。无可避免的,我于不知不觉之间与这我深觉污浊的环境隔离起来,而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依自己的特殊存在而展开的。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交际、不应酬、三年之间难得看一次电影、除了买书和理发以外不上街;大病以后,咖啡也少喝了。日惟读书、沉思、著作,在院内漫步,看朝霞、夕阳、星星、月亮。偶然有客来访,谈话投机时,拿饼干和红茶等共享;话不投机时,我便看表暗示他请他离开;如果他不知趣,还要谈下去,我就直率的告诉他:“我要工作了”。我绝不敷衍。我认为敷衍足以腐蚀心灵。所以,我的家已经做到“门可罗雀”的地步了。我想,如果没有家室,我比许许多多神甫更有资格住进隐修院。只有一点,就是爱坐在树下的石块上,一边喝好茶,一边吃好的小东西。友晖和兰珍共享过我这种生活情调。如果我能在香港,我一定时常用这种方式招待你和××。也许,有时话不投机不欢而散。没有关系,也许隔些日子气消了,有新的想法需要聚谈,好,来的一方缴纳一盒好点心,一包好红茶,再来谈个痛快。[……]

礼品这样美好,而且带来一份大家给我的关心,我很感谢。

4

《人物与思想》月刊一份收到了。这份刊物虽然不够深度和广度,但风格确实清新可喜。

菊人的信已经收到。关于写文章等等事,稍缓我会写信给他。请你便中告诉他。

你在《明报月刊》上所发表的关于罗素的文章,我觉得颇为有趣。应该多多撰述。

关于论及台湾的那篇文章,我的评语是八个大字:“雾里看花,

痴人说梦”。所提把台湾的法治“带向大陆”的问题,等等,岂非无的放矢,白昼作梦?该文作者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来的激变之深度与广度完全无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局势演变对于今后中国问题的影响完全无知;对于中国大陆统治的实质及台湾统治的真相完全无知。我不知道,这个样子的“政论”是拿什么作基础的?

我认为人必须多用点大脑,千万不要把交感神经的产品展览给大家看。对吗?

5

现在托李大姐带来美金二十元作购致资料的费用。你或你们又可以有机会看到小立雅了。

再叙 即祝
进 步

海光
二月八日

注 解

[1] 台北《民族日报》,即《联合报》的前身。——编者

[2] 殷先生在南京金陵大学是副教授。——编者

·22·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日〕

鸿材学弟:

1

兹托李大姐带来给你和友晖的信各一组;美元二十元。
给友晖的信,希望你看看,看后请你妥交给友晖。
美元系添作购致资料之用的。

2

你又有机会看立雅了。前些日子立雅来我家时,我对她瞪瞪眼,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以为是偶合: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After this, therefore on account of it.][1]。我接着又瞪了一次,她又哇了一次,可见不一定是偶合。对不起,我做了一次不愉快的实验。只希望你不要学样。一笑!

不一 即祝
近 佳

海光
二月十日

注 解

[1]意思是“居后为果”,是一个谬误论证。即当乙事件(在时间上)跟随甲事件出现,就以为乙是甲的结果;例如每个黑夜永远随着白昼,就以为白昼是因,黑夜是果。这种“居后为果的谬误”是“假因谬误”之一。

·23·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鸿材学弟:

1

先后来了那么些好吃的和好看的。真是谢谢你;也请你代我谢谢菊人他们。

2

前次那几位美国学生走的太匆促,没有联络好。想来这类机会以后可能还有的。

我目前最感困难的,是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九年各形各色的民主自由言论及活动。请弟特别在这一阶段留意。当然,《观察

周刊》和《观察丛书》对我都会颇有帮助。

现在,我写出几本书名。如果不太难找,那末请弟在三月三十一日以前准备妥当。说不定也许再有便人来港。

不一 再叙 并祝

快乐

海光

二月二十六日补写

- (1)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春秋出版社
- (2)潘光旦,《政学罪言》(观察丛书)
- (3)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观察丛书)
- (4)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观察丛书)
- (5)张东,《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观察丛书)

·24·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鸿材学弟:

1

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请你不发一言,静静的看下去。

2

关于现代化问题的文章,动手以后才知道内容极为复杂,而且牵涉的方向广泛。如果没有十几万言,那末这个论题是分析不清楚的。就我现在的工作进度和身体状况来看,这篇文章在今年五四以前是不能完工的。

3

我托××带给你和友晖的长函各一封,及美金二十元,此时你总已经收到了。或迟或早,我总要继续设法弄点“资本”给弟作购办我所写思想史的资料之用。事情的进行固然困难不少,我们总

要忍耐和努力。是吗？

4

你托人带来的购致及借用的资料的清单,我已经看过了。

第一,借用××的书,在单子上共八本,带到的只有三本。这三本据说需要在暑假归还。我想这是来不及的。我希望延长一些时候。要不然,全部由我承购,以免××遭受无谓的损失。

第二,《鲁迅全集》只收到二册。3,4,5,6,7统统书沉海底。连其他的书,一共损失十四册。真是损失惨重!托侨生带资料,就容易出这类风险。

在损失了的资料之中,我最感痛惜的是《宋庆龄选集》之沉没。弟可否尽力为我补救一册?

另外的毛氏选集第三册已经寄到。其余1,2,4三册请托来人带我。关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惊天动地的大问题,我们自由的知识分子必须力求从各个不同的重要层面作可能的客观了解。这样才算是诚心追求真理。不然的话,我们大可从事别的工作,何必走这条路?

5

我这次请你托来人带我的资料,除前一长函所开列的以外,还请弟弄到下列的书:

- (1)宋庆龄言论的集子(对我是不可少的)
- (2)《李大钊选集》
- (3)张忠绂,《迷惘集》,香港友联出售(新出的)
- (4)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67。

6

兹介绍×先生前来。他是颇为通达的。你把他在港的地址弄清楚了并且联络妥了以后,可以将资料交他带来。这是一次不易

得的机会。

再叙 并祝
进 步

海光

三月二十二日

差点忘记了。又请购《明报月刊》37期及今年1,2,3,4月号，
一起交×先生带来。

·25·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鸿材学弟：

1

我已另外写了一信给你，托××带到《明报月刊》社面交给你。
因为这样便于彼此联络。

2

我不知道《明报月刊》社里的人是否不复杂。所以，我在那信
里一开头就要求你“不发一言，静静的看下去”^[1]。

在这反常的日子，我们的学术工作必须沉静的进行。

再叙 即祝

春 乐

海光

三月二十三日

注 解

[1]笔者在一九六八至六九年间任职明报资料室，但没有在《明报月刊》
供职。当时只因为《月刊》的胡菊人和黄俊东两位老大哥较谈得来，故常到那
里聊天和帮忙做些琐碎工夫。——编者

·26·

〔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

鸿材学弟：

1

书信和资料都收到了。谢谢。所有的资料对我都有帮助。

2

每次展读弟的来信，辄感到温暖、真挚和敏锐，所以我常喜再读。

弟对人的论衡常精到，但自己为人则温厚。相形之下，我有时过于严格，有时又过于松泛。

3

达伟夫妇是品质很好的青年学人。我相信你会发现他们，且乐与之交。我希望你能给他们帮助。

4

沙千里著《七人之狱》，龙门翻印，务请购致一册，在七月十日以前挂号寄：〔地址略〕左右双方任何文献皆不能左右我的判断。但我渴望扩大视野，以刺激思想活动。

5

我仍病卧，不能多写。相信不久可好。勿念。即祝
近 佳

海光

六月一日

随 笔

西行漫记*

后面所写的,零星片断,多属兴到神来,随感随录的镜头。当然,这样以感觉为主的东西,是特殊的。笔者也无意把它们加以普遍化。从特殊到普遍,总是有几分冒险成分——甚至完全是“观念之冒险”(adventure of ideas)。何况我底特殊经验是这么有限?更何况我的注意力是受个人底兴趣、知识、生命力,甚至于一时头痛或不头痛所左右?不过,如果人所活动的这个世界不是知识的虚无论者所说的那么偶然,而从特殊的穴孔里咱们可以想像普遍的章法,那么我的漫记便也不止于是写来供喝杯清茶之际的消闲而已。诚然,这年头,一份消闲的心情,高贵过于为脏目标(dirt purpose)的忙碌远甚。(古往今来,卫道夫子很少不为脏目标文饰的。)

不过,在一切不必说的话之中,笔者有一件却忍不住不说,而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且是要正正经经说的。自然,这也是由于我“六根未净”,尚不能做到“太上之忘情”。目前,在世界发炎地区邻近的处所,有高喊防止发炎的。诚然,防止发炎系人正常生理的生活之所必需;但是,为事业并不是那么容易。现在世界所发的炎,并不是许多只用交感末梢神经而不惯用中枢神经的人所想像的那么简单。比如说,自老邱发明“铁幕”这个名词儿以来,援用的人很多了。但是,就我所观察到的,了解这个名词之意涵的人,实在比用这个名词的人少,而且少得多。假设你被关在一个大圆顶建筑物里。屋顶上有星星,按时出日月,有时水蒸汽造的空彩冉冉上升,……你怎么会知道你所“知识”的世界是一个人造的假世界?现代科学技术太发达了。这样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一旦被掌握在藉民主以外的手段而掌握它的人们手里,那么,他们实在不难安排一个他们愿意你所呼吸视听的“知识世界”。这才是现代统治技术真正可怕的一面。它使你自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他们所安排的那个样子的世界,像话剧布景,或电影银幕一般。在这一套“安排”之下呼吸视听得太久了,即使是最具有独立思想的倾向和能力的人,也无可避免地多少要受到影响。只有等他一旦跳出这一“安排”之后,他才晓得自己底思想在哪些地方受到歪曲,他才晓得这个世界底真相如何。然而,这样的机运,毕竟是很少的。

空中小姐

空中的旅人最先接触的自然空中小姐。谈起空中小姐,人们底印象总是觉得她们漂亮,挣钱多。尤其是挣钱多这一项,许多女孩子提起来,总是流露一股艳羨之色。人的头脑不能处处设防。这类谈料多了,自然而然地溜进笔者底头脑,因而对于空中小姐也

得到这个印象。印象常常是不可靠的。长途的空中旅行,使我底这个印象动摇。

“漂亮”真是难得下定义的名词。至少,就笔者而论,我是没有看见漂亮的空中小姐——请别以为鄙人“眼界”高超啰!我底了解,我觉得航空公司底选择,与色情盛旺的男顾客底标准稍有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希望招请到漂亮的女郎。当然,招请到漂亮的更好;不过,最重要的选择条件还是能力。当一名空中小姐,必须身心健康,任劳任怨,熟悉救护常识,处理膳食,能操几种方言。空中旅行,有时一飞十几个钟头;或者遇到恶劣天气,机身特别颠簸。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旅客可以躺下来休息,然而这正是空中小姐必须不休息的时候。身体不够标准的,在此情形之下,自己早已倒下来了,哪里还能照顾旅客。至于体格标准方面,我看与其说注重标致,不如说注重体型。我看当空中小姐底体型必须“三长”:身长、手长、腿长。有此三长,活动半径才够大。当然,满足了上面所说的条件,再长的标致,那就是“锦上添花”了。不过,无论是否锦上添花,丑八怪总是不及格的。

一部分东方人对于妇女从事某些职业,常存着不正当的观念:以为女子之从事某些职业,系以色相换来。生活枯燥无聊的中年男子这样想,实属情有可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许许多多小姐们也这样想。她们一谈到“空中小姐”,第一个观念就是艳羨她们挣钱多,几百几百美金的。这些美金怎样来的呢?答案冲口而出:“生得漂亮嘛!”至于她们做这一行需要多少本领,就很少再往前考虑了。假若一个社会对于妇女就业常存着这样的观念,我看只有多打点 DDT!

东京印象

笔者这次旅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东京。老实说,我一离开围困六年之久的观念藩篱,骤然飞临东京,恍如置身另一世界。我所最惊异的,不是东京底繁华,而是我自己底头脑也竟受人歪曲。六年来,只要打开报纸,对于日本底报道,不是美军占领如何如何,便是政局如何动摇;其他方面,则几乎一字未提。这就于不知不觉之间,使人觉得日本是一个“纯政治的存在”。泛政治主义对于一般人的毒害如何之泛,由此可想而知了。其实,政治充其量只是人生社会活动之一方面而已。人生社会底活动还多得很哩!泛政治主义者藉政治强力扭着社会跟着他们走。天天报道别处的政治活动而不言其他,这于无形之间给人以暗示,以为别的地方也是以政治领导一切的。这一暗示所发生的心理效应,回过头来又可加强自己底泛政治主义。其实,人家民主国家才根本不是这回事哩!民主国家系以社会活动为主体。这个主体并不跟着政治走;而是政治必须跟着社会走。搞民主政治必须观察舆论,就是这个道理。笔者一到东京,所接触的是其社会主体。政治也者,不过是浮在这主体之上的浮萍罢了。

最易惹起旅人注意的,是东京底摩天大楼和汽车。这些东西许多都是战后的产物,也是美国化的标记。不管摩天大楼和汽车是怎样来的,一座一座的高楼耸立天际,无数的汽车在马路上飞驰,这些现象,使旅人很直观地觉得东京有一股新气象,尤其有一股新力量在那里搏动。说也奇怪,这股新气象和新力量,竟是由战败得来。不管怎样得来,日本是又向着在经济上恢复旧日繁荣的道路上走。这与法国学者德贝吾(De Beus)所描写的西欧之情形

正同。如果东西世界的民主地区都朝着这条路走,而不是偶然的,那就很值得注意。

仅仅就 Nikatzu Building 来说,其建筑之华丽和现代化,与美国一般摩天大楼相较,毫无逊色;只是规模较小而已。纽约底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姑且不论,波士顿最有名气的大厦要算汉科克大厦(John Hancock Building)。但是,至少就像笔者这样的东方人看来,我觉它远不及 Nikatzu Building 秀媚宜人。许许多多东方人对于美国货喜欢到近乎崇慕的地步,我看在某种程度以内,这是由于“禁止入口”,来路稀少,所形成的幻想所致。美国货品只是“气壮河山”,多而已。她底工业出品之多,举世无敌。但是,论手工艺品之精美,在许多方面,恐怕不及日本。Nikatzu Building 窗柜内所陈列的手工艺品之精巧,正像日本美女一样,秀丽动人。我在这个大厦所见到的美国人对这些工艺品之光顾,似乎比在纽约第五街要努力些。像台北幸福夫人窗柜内所陈列的手提包、绣花拖鞋,正被视为美国货出售,“奇货可居”的样子。其实,它们底来路没有那么远,我想。

东京主要街道上的汽车之多,要笔者来形容的话,就像血管里的血轮一般,终日川流不息。速度虽高,但并未使人感到威胁。出租汽车多于过江之鲫。但是,就笔者所经验到的而论,司机底品质,比纽约底要好:他们端正,不要小费,不叫着兜揽生意,更不欺负生客。

笔者到达东京的时候,正是冬末。东京街头巷尾,也有像台北擦皮鞋的。但他们擦皮鞋的,常围以布幔,幔内生以炭火。他们所用木炭,没有台北的那股强烈的猫尿气。擦皮鞋的生涯,本小利微,一般都能支持这种场面,可见东京都市生活水准之高。

东京近郊城市,笔者到过鎌仓(Kamakura)和海滨。那里苍松

古宫,一派东方气息。小镇上水果摊,五色缤纷。电视横陈街头,观者如堵。“美化”至何程度,可以想像。笔者很不喜欢这些玩意。但这是另一回事。最易被“美雨”感染的自然是妇女底服饰。笔者所见乡下妇女大体上着和服,但东京市上妇女服饰之美化,比台北程度高多了。如果台北成都路、衡阳路一带妇女美化有五十分的话,东京妇女就至少要打七十分。这股水是挡不了的。

皇宫是日本底象征之一。过往东京的旅人,总不免要瞻仰瞻仰一番。在我未“瞻仰”皇宫以前,凭着我这小百姓多年来实地的经验想像,以为一定是森严万状,警卫周密,到处都竖着“禁止通行”的牌告。至少,根据归纳法这是合理的想法,可是,等到我亲眼目击,事实把我底归纳推翻得一千二净。苍松翠柏中的宫殿,原来是那么气息寂聊。护城河畔,游人处处。有的看鸭子,有的竟对准宫殿照相。我心里在想:“这小子不知分寸,等会儿准吃警察干涉。”我一面在想一面停下脚步,等待期望中的结果。可是,等了许久,并不见有任何人来理他。“小子”悠悠闲闲,一个人提着照相机往别处去了。我这位“逻辑教授”底“归纳法”又失败了一次。回廊曲径,苍老古殿,杂以新式建筑,我感觉不到这是居住天皇的圣地。若不是导游的朋友事先告诉我,说这是“皇宫”,把这个名称所引起的心理意象与当前的感官知觉搅混在一起,那么,我会觉得呈现在我眼前的,只好说是故宫博物院。“是啊!假若自古至今,一切皇宫是故宫博物院,一切皇帝都是博物院院长,那么,这个世界岂不更令人留恋!”我这个讲“哲学解析”的人,居然临时装起新老残来:一面沿着城河走,一面做白日梦,同时又极目四顾。我想:“应该有警察的。这样万人之上的天皇所在之地,岂可以无警察?”这次我没有想错。然而,只是有而已。在“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曲径通幽处”,站着一位警察。制服倒是穿的制服。但是,怎么脸上没有令

人见而生畏的那股肃杀之气？至于武器呢？有的，但系木质的，长约二英尺，直径约二英寸。这样的武器，孙武子拿来教美人阵倒很合用；若是碰见一个醉汉硬要闯人“面圣”，就很难用它挡驾了。“日本警察一定还在木器时代”，我想。

爬虫多，不咬人

尽人皆知美国是个爬虫国。爬虫之多，几乎可以说无处无之。在美国，要避免爬虫，简直像在西康要发现爬虫一样困难。然而，爬虫虽多，但训练有素、管理良好，并不咬人。笔者住台北几年，除了空气、声音、人像和水分以外，最怕的东西要算爬虫。我简直可以说是有点“恐虫病”(motorcar - mania)。每次碰见朋友上街，我总是以“小心爬虫”殷殷告诫。这并非因为日子特别美丽好过，实因戏未终场，半途闭眼，颇不甘心也。我之所以这样恐惧爬虫，不能全拿鄙人特别胆小来解释。爬虫底训练，尤其是那些脑袋里的想法，实在叫小民不敢放心，多少年来，拥有小爬虫者，下意识地总自以为高人一等，撞死人是常事，从玻璃窗户里吐一口痰到你脸上更是你自己晦气；至于爬虫相撞互咬，则日有所闻。我们那条陋巷里，不过爬虫三儿头，但每次爬来，无不黄尘滚滚、旁若无人。窥察驱使爬虫者面部表情，只要你不是白痴黑痴，便很容易看出，他们并不是对旁人生命特别慈爱，而现今死后因果报应之说又无人相信，他们最多怕衙伯抓到，“法律从事”。实际情形如此，就无怪乎像笔者这样的人，每次从街上回来，莫不是神经疲劳，满身大汗了。美国爬虫之多，为世界第一，而且速度之高，无与伦比。要就我所住的地方爬虫给我的威胁想像起来，那美国每分钟不知要“阵亡”多少人。但是，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美国爬虫所产生的威胁，连

我这样胆小如鼠的人都感觉不到。为什么呢？最表面的理由，当然是交通管理规则良好，人民守法成性。但是这只是“外在”的东西。这些外在的东西固不可少；然而，仅仅有这些东西，是不够的，是不足以维系社会的。除此以外，最要紧的，是各人从很小的时候起教育所给他的在他脑筋中打转的那点东西：重视生命。在东方看惯美制电影的人，往往形成一种错误印象，以为美国开汽车的，总是不顾一切，横冲直闯。其实满不是那回事。笔者因为想知道美国一般人在大脑中平常打转的那点东西，所以特别喜欢留心他们不自觉的动作。至少，直到目前为止，就笔者所经过以及住留的城镇而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大小爬虫因夺路而争先恐后的。恰恰相反，他们走到路口，总是因互让而停下来，直到有一方被对方举手示意，请他先走才止。手推小儿卧车的太太们，更是若无其事，逍遥过市。爬虫王见了她们，也要“退避三舍”。笔者看见他们所颁行的爬虫遵守规则，其中有一条问你曾否“逞强”（violence）这样动辄得咎的名词，加在爬虫驾驶身上，真是令人感慨无穷。笔者因自小受爬虫威胁，养成一个习惯，见虫即避。因而，在此间大大小小的镇上，见了爬虫也作这种反应。但是，已不止一次了，我总是被请先走。胆小如我者，受宠若惊，既惭且感，总是三步做两步，很快地跨过车头。人贵知趣嘛！因我在自己国土上，从来没有受过这种优待。但是，他们底仕女，则照样慢步过去，视若应享的权利。对此请此境，好思想如我者，哪能不一面走、一而想呢？当然，我并非说美国没有车祸。醉酒闯祸之事，当然是有的。但是，那根本得放在另一范畴里讨论。防止音响，为现代都市要政之一。而爬虫为音源之一。美国办理市政者规定，爬虫后面必须装置一种特别机器，减少音响；否则要受处罚。街上爬虫尽管比南京臭虫还多，但除非绝对必要，不能按喇叭。所以，很少听到爬虫叫。回忆

笔者所住陋巷之中,隔壁有一位部台大人,才不过一辆爬虫。但是,无论三更半夜,总是“人未到来声先至”,常常于夜半三更,把人从梦中惊醒。两者相较,我不知道哪一种才算得是“精神文明”?

美国爬虫虽少咬人之事,但是,究竟因为数量太多,速度太大;而且虽然被设法尽量减少音噪,但是总有点音响,所以,至少从我这样的东方人看来,终究是一种“破坏风水”的不祥之物。记得笔者少年时代,在北平考学校,住在沙滩。古树溪流,红楼映照,一幅闲适舒展古老的气氛,至今犹深留脑际。笔者现在所住的地点,是剑桥旧城,就在哈佛校区以内。房屋许多都是二十世纪以前的建筑。四周古木参天,古老教堂,隐现其间,钟声则远近可闻。哈佛已有二百二十年的历史。旧建筑物尤多,麻省堂(Massachusetts Hall)、怀德堂(Weld Hall)、爱默生堂(Emerson Hall)是其中最著名的。照说,这个区域,应该古意苍然,发人怀古之幽情。然而,笔者很惭愧,我虽然尽力把心情移向这样的境界,但客观环境无论怎样不能使我产生少年时代在北平红楼附近的那一股情愫。勉强“唯心”是“唯”不来的。之所以如此,当然,因素很多;但是,在感觉刺激方面最直接的,显然是汽车太多。我所住的地点,已算很僻静的街道了。可是,一天到晚,就是汽车穷跑,把一点古意都冲散了。

“古”与“静”是分不开的。我想,百年前的剑桥一定比现在古!

究竟为消费而生产,还是为生产而消费?

作者在这几年中,常常默察近半个世纪以来某些地区之政治与社会发展。我总觉得,这些发展,在最大程度以内,实在没有什么“理性”可言;而系受“盲力”底支配。我只看见几股盲力在那里相激相荡,像开足马力同时又失去控制的火车一样。即使有人看

出这种趋向的危险,但是,这样的盲力之本身已经“欲罢不能”。好像滚下山的石块,一定要等到它底“势能”(potential energy)耗竭,才会自己停止。几十年来许多地区的几个“革命运动”,就是这种“欲罢不能”的盲力之实例。这些革命运动,起初也能耸人听闻,有光有热的样子。但是,它们底内部却蕴涵着更大的阴暗面,更大的危险和更大的悲剧。在这一大趋势底驱策之下,大家所比的,不是真、善、美;而是厚、黑、狠。谁比谁更厚、更黑、更狠,谁便能俘获他底猎猎物,谁便能夺取总锦标。起初,竞赛者都拿“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宽解自己。行之既久,成了习惯,手段变成目标,要收手都收不住:谁不够厚、黑、狠,谁在竞技中准失败,于是只有变本加厉坏下去。这是近几十年来大悲剧的主导方程式。

起先,我以为只有近几十年一部分东方人底命运受这个“欲罢不能”的盲力所形成的法则之支配。近来,我登临新大陆,我立刻嗅出,原来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生活之主导方程式,也并不是全然理性的,似乎也正在受着一种“欲罢不能”的盲力之支配。这种盲力,倒不是“革命动力”所构成的那一套激烈而动辄要人脑袋的东西;而是工商业竞争所构成的社会张力(social tension)。当然,这种力量所加于人的,绝没有东方“革命动力”所加予人的惨苦酷烈。不过,在一长远过程中,它会使人瘫痪,也会因高度发泄而毁灭一个文明的。假若说这种力量应须停止但又“欲罢不能”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新大陆这块地方也正陷于另一种盲力底支配或推动之下。长久如此,总不是可以十分乐观的事。

笔者从小就嗜糖如命。现在虽然这么一大把子岁数,格调高的糖果还是喜欢的。巧克力总是糖果中格调高的。我所住的地方贤明的“保护政策”,把巧克力列为禁止人口货品之一,因此巧克力曾一度绝迹。偶尔有“问道而入”的少量货品,或由洋机关辗转卖

出来的,那就“奇货可居”了。喜欢加上好奇,对人的吸引力更大。我偶尔买到一两块,与妻分食,细嚼细咀,像吃什么仙糖似的。但是,来美以后,看见车站上有卖巧克力的,餐馆中有巧克力,药房堆满了巧克力,更有很大门面专卖巧克力的店子。巧克力之多,多过台北的鱼丸子。见此情此境,我对巧克力的稀罕之情,像被一阵暴雨冲散了似的。偶尔买一两块尝尝,也觉得甜得腻人,不再发生兴奋之情。在台北与东京的时髦小姐太太们,对于美国货喜欢得近乎崇拜的地步。据说有些日本货,先要运到美国,贴上美国商标,然后再运回本国,才能卖得到好价钱。但是,假如你来美国,到纽约第五街大百货商店,甚或小于剑桥的商店,你看到满坑满谷的货物拥塞到你胸前,我相信,你底崇拜之情马上激剧下降。再如,你看到“五分商店”那堆得一塌糊涂的粗制滥造的货品,保险你底崇拜之情会冷到接近零度。这种情形,与另一种情形相似:你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但是你走进餐馆吃了一点以后,店伙又把大块肥肉肥鱼堆到你面前。本来,“制器利用”,一切商品之制造,是为了供大家消费。消费是目标,生产是手段。但是,你在太多的货物的威胁之下,你就觉得你成了制造商“揩油”的对象。他底货成了吸收你身上油水的工具。因果倒置了。照我们底观念想来,以美国科学设备之发达,农产品歉收的情形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因而,农业比较稳定,竞争情形比较少。然而,事有大谬不然者:农业也受工商业巨轮产生的力量之推动,也工业化,居然也是“竞争激烈”。我侄儿底美国朋友某君,自己经营苹果园达五十英亩,成年的弄得紧张不堪。因为,他说竞争太剧烈,稍一不慎,会失败的。我底老朋友恩斯特(Charles F. Ernst),他说去年苹果过剩,牛油生产过剩,还有许多东西生产过剩。他底儿子到处劝人多买苹果。因此,他底老太太 Mrs·Ernst 本来要买橘子的,也改买苹果。似此

情形,令人不明白:究竟是为消费而生产,还是为生产而消费?

假定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解决之道厥惟减少生产。但是,减少生产的话,问题就多了。一减少生产,必须减少工时。减少工时,是否减少工人呢?或是工人平均减少工时呢?如果减少工人,那么造成失业。如果减少工时,那么工资如何维持原有标准?在在都会引起问题。有人说,这是过虑。美国目前的生产过剩问题并不严重。她可以扩大援外,藉援外来替生产成品找出路。这种答案,等于说自己吐一口痰自己又舐回来。恐怕不太高明吧!

但是,你别因我底话而欣然色喜,而咒诅自由竞争。老实说,只有美国才有资格受这种批评。因为,她太胖了嘛!患脑溢血嘛!而你在工商发展上第一课都没有上,贫瘦到这种地步,事事遭受苛烦管制到这种地步,你哪有资格批评“自由竞争”?

太忙! 太忙! 太忙!

笔者还记得在纽约第五街某大百货商店玻璃门前,一个一个的摩登女士,鱼贯而入。笔者猛一低头,只见一双一双尼龙丝袜和高跟鞋的脚,随着玻璃门急速作轮盘转。作者猛省:“这哪里是人在走!这简直是机器齿轮在动!”一念之下,美感全消!

美国朋友碰见外国人,总好问:“你觉得美国怎样?”他们所希望于你的答案已经装在他们自己腹中了。作者碰到这样的问题时,总是笑哂哂慢吞吞地答道:“嗯!……每件事都很合科学,……不过,你们底生活太忙一点,太紧张。”有的人很自然地辩护道:“我们讲效率嘛!”我就追问:“不错,讲效率又是为了什么?效率本身是一个目的呢?还是一个手段?”问到这里,他们瞠目结舌,不知所对。一般人忙还可另当别论。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某位教授对作

者说：“在学期开始，我们简直忙底不得了”。这就颇令人担心了。

美国人的生活，就是忙忙迫迫、紧紧张张。所以，据报告，心脏病和神经病年有“增产”。我简直没有看见美国人行路时作优闲态。夜间，霓虹灯照得半边天通红，电灯那么耀眼。简直没有人“举头望明月”。太工业化了！离自然太远了！他们动不动就是：几点钟做什么，几点钟会客，十五分钟吃饭，……一件一件都要规定得好好的。生活太机械化了！假若一个社会像个钟表，发条一上，自此而后，各部分齿轮照走无误，方便诚然方便，但这个样的社会似乎总缺少点什么。

“你们不太好沉思。”我有一次对一位美国朋友说：“我希望我这种想法并非东方田园社会底产品。英国人有些地方我不喜欢，但他们比你们深沉、成熟。是不是？他们许多人，没有事，就好坐在自己屋子里想。你们美国人以为原子弹是你们发明的，是不是？假如以为是的，那么这个观念得马上修正。原子弹真正重要的部分是英国人在剑桥大学 Cavandish 实验室里搞出来的。你们不过把原子弹做出来罢了。……美国人，就气质来说，很难出一位像罗素这样的大思想家。罗素到中国，看见轿夫休息时，抽口烟，状至闲适。他马上看出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精神可以医治西方人底紧张。罗素懂得这个道理，他著书立说，为懒散赞。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前的道家思想。”美国人虽然不深沉，但也少成见。他们对子这种议论，觉得新异。

笔者说到这里，也许有人欣然色喜，想趁机“办出口货”了。且慢，不用说倒霉人底货色无人要；就是咱们自己底人也很少相信的。卫道夫子，一提起老庄，便怒目横眉，击案叫骂，斥为“异端”哩！

笔者说美国人一般太忙，不够深沉。有人听了也许颇觉快意，

连忙接下去：“所以啰！美国人浅薄，没有历史文化。”如果你从美国人“不够深沉”就推论“美国人浅薄”，那么你底逻辑不及格，还得从大学一年修起。历史固然必须时间，但占时间长的民族不必就一定历史丰富。短命的天才之生命常比长命的白痴有声色。有的民族或国邦，占的时间长，但如长期在凝固状态，停滞不进，那么所谓几千年几万年也者，是白过的。在时间中，没有变动没有演发什么的阶段，就是德国史学怪杰斯宾格勒（Spengler）所说的“无史阶段”。美国底历史诚然短，但，她很少成见，凡好的东西她都要，可巧她又“资本雄厚”。所以她收集的东西，世界各处流去的，不知凡几。我在 San Francisco 博物馆，就看见秦剑、木乃伊，以及托勒美时代的东西。美国人自己底历史虽短，但一点一滴他们都爱护。并不像许多地方，改朝换代，或流寇蜂起，便盗、劫、焚、毁、破坏，唯恐不及，结果所剩下的，不是残篇断简，便是残垣败壁。这个样子的平均水准，还侈谈“历史文化”，真是令人羞愤。像波斯顿这样人文荟萃的古老地区是不用说的。就像洛基斯特（Rochester）这样不太有地位的城镇，都有她底历史特色。现在大家最常用的照相器材，多出自举世闻名的柯达厂。而柯达厂底创设人，就是依斯脱曼（Eastman）。依氏是改进照相机底大功臣。该地为了纪念他，设依氏堂。依氏生平之一点一滴，都一一展出。设备之周至，陈设之典雅，令人不信出自这样不重要的城镇。有的，你只要稍微留心，美国大大小小的城镇，有数不清的歌剧院、博物馆……美国有艺术。只是，这些东西，没有弥漫到一般人底生活里。工商业底巨轮所造成的气氛，淹没了社会，艺术气息不易透露出来。工商业及科学把美国人底生活方式弄得高度格子化（Highly departmentalized）。这似乎才是基本的毛病。

照我看，美国建国底物质基础已经满够了。现在，美国应须充

分发展的,是宗教生活、艺术生活,以及一般的哲学思想态度。要向这些方面发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在国外,苏俄停止捣乱;在国内,工商业之推动者下午一律午睡。

蝴蝶满街飞

人总是容易注意到他所喜爱的东西。笔者喜好花,因而注意力天然就落到花上。东京花店里的花之丽,已足使台北花店黯然失色。然而,与美国花店比,又是小巫之见大巫了。蝴蝶兰一项,被视为台北特产。记得某好写字的老翁,在蝴蝶兰出境展览之际,题字“国香远播”。在我印象之中,蝴蝶兰由种芽而成花,需时六七年。在台北市上,风姿稍微绰约的,一株要四五百元。美观的确美观,只是太矜贵了。笔者一到 San Francisco,看见花店中蝴蝶兰插在瓶里,与玫瑰同住一室。初见颇以为奇。后来在稍微大一点的城市所见的,无不如此。看这种光景,蝴蝶兰不能被“奇货可居”了。美国人见好的事物就学,见美的东西就要。他们看见蝴蝶兰美观,就用科学方法培养。我想,他们一定能设法缩短蝴蝶兰的生长过程。不然,何至于也能“大量生产”?当今之世,科学昌明,科学知识能穷究事物之底里。只要是真被别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都可以学到;而且“后来居上”,也许比别人弄的更好。再没有什么“祖传秘方”可以居奇的了。

相应不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许许多多的人,甚至大规模通过教育的染缸,把种族、民族,这些差别说得怎样重要。这一类底灌注,造成

许许多多人一些观念,以为异类必定相拒,同类必定相吸。这一类底灌注,不能说一点生物学底基础没有。但是,这点生物学底基础太窄了,不足以建造自昔以来这么大的楼房:异类相拒的事未尝没有,若干年前白种人之自命一切优越而轻视有色人种便是。然而,这也要看在某些方面,并且也不是不能藉教育等等方式来改变的。总而言之,异类相拒,未必是先天的;至少不尽是先天的。至于同类相吸之说,恐怕想像成分占多。同类相残,其猛烈酷辣之程度,正不在对异类之下。希特勒之大开杀戒,是从白种人开张的;苏俄之对白种人之疑忌,恐怕至少与对有色人种一样。笔者登临斯土,最大的发现之一,便是凡属黄皮肤,只要是不太认识的,一概相应不理。即使是相识的,但不甚相知的,其不亲热的程度,也远在意料之外。相形之下,倒是白人反易打交道些。“这不知是点什么窍?”笔者为之闷闷然者久之。我先以为因鄙人容貌古怪。不易使人发生好感。果真如此,这倒是人情之常。我后来问过许多人,都有同样的宝贵经验。其中有一位堪称美少年者,遭遇亦复相同。可见因“其貌不扬”而遭人不理底假设根本不能成立。我后来问一位在此待久的人:“这种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是一九五〇年左右。“哦!”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种缘故!”政治歧见,能使人六亲不认,何在乎一点点黄颜色呢?黄颜色碰见黄颜色,彼此看一眼,不知你底来路如何,又好像不知你肚子有一本什么账,还是以少惹麻烦为妙吧!空气里的“政治以太”,竟有这样大的力量,渗透到了各人底潜意识中。这年头,政治的存在高于一切,生物学的同异只好“敬陪末座”了。

见微知著乎？

当然，我们不能说，在世界底现状之下，白种人对于有色人种毫无歧视。这种事实之存在，多少有其生物学的基础。有生物学基础的事实，都是在情理之中的，因而是可以原谅的。就拿作者自己来说，像我这样脑筋中没有“观念染色”的人，在世界上恐怕不多了。传统以及地域所构成的那些“界线”、那些“差别”在别人看得严重的不得了的，真是抱歉，在我脑筋中起不了什么作用，范围不住我的思力，除非我自己根据经验有意地去选择它。但是，要我现在跟黑人亲热，实在怎么样也亲热不起来。我这话丝毫不夹杂轻蔑之意。近若干年来，黑人底进步既大且快。美国各个部门逐渐发现他们的踪迹。但是，我总觉得他们看起来不太顺眼嘛！这种生物学的事实，我想连罗素都一时不能克服。我不能想像罗素会跟一个黑人妇结婚。除此以外，近几十年来，有色人种，在种种鼓励之下，要从白人手底下翻过身来；可是，同时，特别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又非常需要白人帮助。这种既要翻起来又要你帮助的情形，不能一点尴尬也不产生的。这种情形——心理状态，消散在空气里会成个什么气味，聪明的读者一想便知。虽然如此，至少对于不纯凭感觉而生活的人说，并不怎么有了不起的不便。假若你记得同种之间所给你的是怎样的不客气，假若你记得你没有足够的社会地位而走到各“部门”去所受到的是怎样冷酷得可怕的脸，……那么，你在这里会感到礼貌、正直与坦率。人如把人当人看待，即使有点生物学的差异，比人把人不当人看待，即使没有生物学的差异，滋味是很不同的。你在路上走，碰到毫不相识的人对你微笑，甚至警察向你打个招呼，“您好！好天气！”与你见了皮肤

相同的身着制服的公职者心里至少起一阵不轻松之感。你会觉得,在实质上,究竟何者为佳?但是,很奇怪的,人们常常在想像中对于异族的不够友好很敏感;而对于同族的威胁则很麻木。这是不是说,同族的虐待,是应该忍受的?是否有这种“伦理上的应然”?如果是的,那么希望有人花十年功夫著一本书“观念所作的害处”。

美国人很随和,一般说来如此。他们也喜欢公共生活。但是,他们底家庭可不能随便闯进去。如果你想进去,须得他许可。不要说家庭,就是一条路,他钉上一块牌子,说这是“私路”,你就不能乱走。侵犯私有的一切,法律会临头,警察会干涉。至于夜半三更,穿制服的人闯人民宅,拿起手电筒在老太婆床底下随便照,这是闻所未闻的。家庭,就是美国人自由底堡垒。

人底社会须要法律。但是,人底行为是动的;而法律是多少固定的。法律不能遍及人底社会之每一角落,也不能事先对人底每一发展之中的行为有所规定。碰到有些事务,为法律之所未逮,那么怎样决定呢?这就要看无形中流行于社会各个分子之间的意识空气是怎样的一种意识空气。如果社会中被政治引擎弄得流行的意识空气是彼此猜忌,互不信任,谁都怕好了谁,没有人敢负责任,心灵深处潜藏着一种毁灭感,或者,至少厌倦,那么碰到可上可下、可准可不准,可成可毁的事务,十分之十就是一百个反面的结果:“行不通”。于是,任何好事生长不起来。这样的社会,在实质上,是向地狱里沉沦的社会。愈是走向地狱的社会,愈是需要多涂油漆的。然而,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充满了建设感,人们互信,也敢于互信,大家肯负责,负了责也绝不会出毛病,彼此喜欢帮助,乐于成人之美,那么,碰到这种可上可下、可推可就、可管可不管,可准可不准的事务,一定是朝好的方向作决定的。久而久之,这个社

会底团聚力会坚强的。会蒸蒸日上的。笔者有一次在某校图书馆看见一个外国学生要领借书证。女馆员照章问他要看注册证。那位学生底证件掉了,女馆员也就不敢作决定。那个学生弄的很窘。正在这个时分,戴金丝眼镜的老组长来了,问是什么情形。那位学生说明了,老组长于是马上作一决定:“好的!给他一张吧!”我有一次寄邮件。邮务员问我“其中有专门技术性的文件吗?”我说“没有!您要不要打开看看?”他连忙摇手:“不用,我相信的。”我看到以及亲身经验到这一类底实例太多了。这才是“真东西”。见微而知著。测验一个社会有无希望,这是一个最真实的尺度。

书*

书生总是容易注意到书。圣经是羊皮书，这差不多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就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叶，还有封面用羊皮做的书。如我在某校所见，甚至有的书，封面用珍贝母壳镶嵌。装订之讲究，更不用说。差不多，每本书拿出来，其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当然，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一阶段，能够得到书的人不多，能够读书的人也不像今日之多。今日，我们是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西方世界近一百五十年来，在科学与工业方面的进步，超过历史上任何阶段底成就。美国底科学与工业，以之视西欧，真是后来居上，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底刺激，把美国底工业带上一个新的里程。科学、工业与商业，在美国是一不可分的连环套。三者相互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作用,连环反应,妙不可言。书,这可怜薄薄一页一页的东西,哪里能逃出这连环套以外?别说太古的书,就是亲眼看见百年前的书的人如果他不太麻木,以与今日美国市场上书的光景比较比较,他会产生不胜今昔之感的。书在今日的美国,显而易见,也是“大量生产”原则所形成的生产滚滚洪流中的一个泡沫。古人著书,多采慎重态度,此理无分东西。我们今日读的典籍,多是古人长期酿造的结晶。一书之成,往往需时数十年。这种办法,在美国书商看来,太不合“大量生产”原则。他们要作家多著作,尤其要快。这并不是说,美国没有长期酿造出来的结晶。有的,但这不是出版波澜的中心。出版波澜的中心,是利润最丰的那些作品——姑且这样名谓吧!

现在就笔者之所知,美国的出版情况,大致可以这样分类。

一、大量翻印古典。这,当然很有益于文化。古典数量少,不易得。图书馆隔得老远,而且开关有一定时限,对许多人不方便。古典翻印出来,廉价出售,人手一册,公余之暇,可以躺在沙发上随意吸收一点知识。不过,古典之不抽版税,似乎也是被大量翻印的原因之一。请读者注意,我只是说“原因之一”,没有说是“唯一的原因”。不然,于区区不经意之间,我就流露了我是马克思经济史观底信徒。虽然,我看唯心论弄得不合分寸就神乎其神;而经济史观则是最卑劣的哲学。在经济知识的领域中,一切一元论都不足取。

二、孙悟空七十二变。这是最妙的事。有许许多多书,出版不久,书商就大吹大擂说又出了新版本,新版本如何如何与旧版不同。懂行的人翻开一看,有的书确乎新版与旧版大不相同,例如最可尊敬的大著之一 Dampier: *History of Science* 就是如此;不过,有更多的书,懂行的人翻开一看,发现所谓改版也者,不过若干“正误”

而已；多加了一篇附录，或一篇前言的，已经算是很好的了。但是，美国的书这么多，门类如此复杂，哪能有几多顾客这样懂行呢？

再不然，广告上又说，有什么什么书出版了。从前中国人生下小孩，作父亲的人（对不起，母亲可没有份）总要绞一番脑汁，替它取个名字，越响亮越好；好像名字与孩子底终身命运有莫大关系似的。男的总是叫做“维国”、“柱国”；女的不是“金枝”，便是“玉叶”。这可以叫做“命名之命运观”，或“命名之堂皇观”。美国人也注重取名字，也善取名字。可是，他们取名字底着眼点，不在“命运”；讲“人定胜天，人类征服自然”的人，才不信这一套哩！他们取名字底着眼点如何在如何能动人听闻，如何能吸引人底注意力。新书一出，名称往往引起你底幻想，以为真是新的，不可不读的。等到你真的跑去一看，发现还是流行的几篇老东西，重新编在一起而已；或者，就是某作者若干年来散在各处发表的文字，搜集起来，出个专册而已。前者冠以编者底前言，那前言就是唯一的新东西；后者冠以作者序言，那序言就是唯一的新东西。

以上系就一本一本的书而论，此外还有各种小丛书，也常常是同一个孙悟空变出来的。例如，D. C. Heath and Co. 出版的美国文化丛书。这种小丛书，系把新新旧旧的散见各出版物的文字，依性质分类，冠以名称，印单行本，价钱都在一元以内。就美国人底购买力而论，这种价钱只合一顿最平常的午餐而已。

三、硬货色。前面所说的，并未意涵，美国书就尽是这些“花样”。美国地方那么大，“殊别”（varieties）那么多，你不能随便作概括与推广。美国书中，用若干年搞出来的原汤硬货色，依然层出不穷。就笔者比较熟悉和注意的哲学与逻辑方面而论，像 Price 教授在哈佛出版社印行的 *Thinking and Experience*，等等就是。理、工、医等方面的书更不必说了。不过，这类货色，多半是“英美联营”。可

是,同一种,英国出版的拿到美国卖,就比在英国贵得多。这类书定价往往很高,不是一般读者所愿意接受的。

至于在东方世界书店里可以发现其芳踪的袖珍本(Pocket Books),在美国,真是满坑满谷,汗其牛而充其栋。车站上、药房中、报摊上,无论是通都大邑还是“穷乡僻壤”,几乎是无远弗届。定价从三毫五到五毫,专门一点的九毫。这种价钱,在美国就是吃三两块巧克力的价钱,或者一客牛排的价钱;所以,很受人欢迎,销路因之也就大得惊人。Spock's 小孩看护书,销路达二千万册。

美国书业所呈现的这种光景,究竟是好还是坏呢?“好”与“坏”这种字眼底本身,如塔斯琦(Tarski)对于自然语言所说的,是意义最不确定的。因此,由这种字眼所构成的问题之意义也就不确定,对于意义不确定的问题,无解答之可能。我们现在所能陈述的,只是,从普及知识这一方面看,这确乎是一种有所助益的办法。美国一般人民常识之丰富,不是东方世界所能望其项背的。不过,受利润追逐的动机所左右的出版事业,总不能相当健全。你在美国,要买刚出版的新书,正像要买新出的时装一样,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要买旧书,就像要买过时的女装一样,那就很困难了。尤其是买笔者这一冷门的旧书,困难更大。笔者有几次到书店订书,书店老板把订单一看,看到其中有几种,连忙把头摇几摇:“这几种恐怕已经绝版了吧!”“你可以替我试订吗?”“可以的,不过没有把握。”这种所谓“恐怕已经绝版了”的书,谈不到是什么了不得的“旧书”,不过是十几年前出版的而已。专门而过时的学术刊物,尤其难买。文化事业也受供求律之支配,似乎不是很可取的现象吧!

小游,小谈^{*}

假定以剑桥(Cambridge)为中心,周围几十英里,学术机构,大大小小,不知有多少。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大学。如果我们一定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何可爱的收获,那么就是“国”的名义增加了不少。当然,这可满足一部分人硬要做太阳的欲望,这可增加联合国会议上的热闹,并且在纽约那滚不动的汽车长龙上再增加其尾巴。仅仅哈佛一校,各国来就学的,以及类似笔者这种访客的,就有七十七国之多。美国人民在事实上享有“组合之自由”,加之他们爱动,更加之汽车和电话增加他们活动的范围与次数,所以,民间男女老少,社团之多,简直不胜枚举。他们又具有开放的心灵,欢迎外国人参观他们的市镇、家庭和他们自己珍惜的事物,就像你家里来好朋友时主妇拿她认为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精采的东西给客人看一看。

笔者这一次游的是勒格森顿(Lexington),受家禽俱乐部招待。这一次同游的人,虽然没有七十七国之多,不过也够复杂的了。欧洲来的英国人、法国人、丹麦人不必说,来自非洲和亚洲地区的也有几国,还有个来自什么“赤道国”的。抱歉之至,笔者的地理向来不及格,听到这个国家的名称,平生还是第二次。至于目睹赤道国人民尊容,这还是第一次。一听到“赤道”,我们自然联想起“酷热”。我就问这位赤道先生:“贵国有多少人口?”“八百万。”我心里一怔:“几乎巧合!”再问:“贵国很热吧?”问到这里,赤道先生似乎唯恐别国人士以为他的赤道国有此天生特点,连忙用不易听懂的快板英文说:“非也!我们虽然在赤道附近,但并不热的。”笔者聆此宏论,立刻觉得,等于阿拉斯加人说阿拉斯加不冷一样。假若一个国家很热,“据实道来”,并无损于其“国格”,何必拗着事实说哩!当然,如果这位赤道先生可巧与我同行,但却又是个“唯心论者”,他听到我说这番“浅薄的理智主义”之言,他可能要教训我一番:“‘心静自然凉’,你还知道吗?”这样一说,许多难过的事就化为乌有!

还有一位印度先生,曾在印度某大学任教,现在某校某研究所攻一项新学问——地理物理学(Geophysics)。寒暄数句,一听他是攻纯科学的,我不由得肃然起敬。一会儿,不知怎的,话题转向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发展来。笔者涵养功夫不够,心直口快,以十分关切的态度对他说:“贵国的共产党如不及早谋妥善的解决,将来就会像敝国一样,作大祸的哩!”我说的是句老实话,哪晓得这位科学家的反应大出我意料之外。他扬起那一双扫帚眉,提高金嗓:“不是你所说的那个样子。中国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都是他们国民自己的党。我们与俄国的背景不同,因此,两国的共产党与俄国共产

党不同,也与俄国并无任何关系。所以,我们有共产党,并不可怕,它不过是许多政党之一种而已。”“噢!”我心里在打寒噤,“印度共产党究竟是来亨鸡,还是洛乌红,是何品种,道路阻隔,我不敢妄断。至于中国共产党的来路,你印度佬简直比我中国人还清楚!尤其是你比我还清楚,这从何说起?”笔者觉得这位先生至少在知识态度上,起码就不合科学。你碰见一个中国读书人,不先请教一番,自己倒先大吹法螺。因此,我就不便对此问题深谈,连忙把话题岔开,“……那么,尼赫鲁先生怎样?他对印度是否忠诚?是否民主?”这一问,我又吃亏了,白白给他一次广播的机会。“尼赫鲁在印度所行的民主,较美国毫无逊色。我们有议会,有民选代表。尼赫鲁自从主政以后,振兴教育、发展工业、增产食粮。所以,我们多余的粮食输出。这几年,印度在尼赫鲁领导之下,进步得很多很多了。”

“印度有多余的粮食输出?这真是天方夜谭!”我想:“这简直像是对刚从火星上来地球旅行的客人演说。”一九四五年,笔者在印度滞留了八个月,也走过大小几个城市,我对印度最深刻的印象,除了莫名其妙的一些神秘风俗习惯以外,就是普遍的穷酸。除了通都大邑以外,你在印度,如果走到小村庄甚至镇市,那简直等于到了另一世界。不用说投宿无处,甚至饮水都发生问题。这并不表示印度人特别残酷,或特别欺负陌生客人;不是的,而是由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观念世界里。他们用以了解自然与人生的方式,与西方人大不相同。几乎无论什么事物,传统的印度人都在观念上赋予神秘的看法,或传说遗下来的解释,或宗教的观点。这,多少类似我们乡下人认为打雷是雷公发怒,天旱是由于人心不好,……譬如,在印度阿萨姆乡间,一个外路人,从他们村庄经过,口渴了,拿起杓子在村前井里取点水饮。这就糟了,他们并不是来

干涉你、打杀你,而是从此以后,他们全村不再饮用此水。他们对此种情形,又赋予什么特别的说法,因语言隔膜,我们不知道。以之比诸美国,只要你有钱,几乎任何角落可游,乡间有 Inn 供你住宿,饮食更不成问题,那简直是两个天地。

印度之穷,比敝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笔者坐在火车上,或闲步公路旁,看见那丛莽间、河谷里、平原上,远远近近、既矮又小的屋子,建筑材料之简陋薄削,非美国土生人士所能梦想。我只觉得像雨后初生的菌类,只要一阵风起,什么都吹得不见了。印度平民,特别是平民小孩,很少不是骨瘦如柴的。只要有牛拉出一泡粪,就有几个小孩用手去抢着接。至少就笔者所经验到的而论,不管是火车站、公路旁,只要有外国人经过,印度穷人无不伸手说:“把革西斯。”(意即“赏一点吧”)小孩如此,老头也如此;男人如此,妇女也如此。在咱们中国,穷人固多,向人讨乞的事也不少,但年轻男女当街向人要钱之事,笔者是未之前见的。中国人多少还讲点面子。可是,印度年轻女子,则与老人小孩一齐动员,若不以为耻者。

至于西方国家所说的民主,在印度思想传统中何处去寻找,颇令人怀疑;英国占领期间,也没有给印度人这一套训练,虽有文官制度的建立。

这么样的一个国家,这么样的一个背景,尼赫鲁如何能在短短几年之间,弄成该地理物理学家所说的“进步”,居然还有“粮食输出”,我是想不通的。我只记得,才不过两三年前吧!印度缺粮,[……]前几天,我的房东老太婆和我谈天,还以十分怜惜的态度对我说:“我们美国家庭最顾到经济负担,每家平均,顶多两三个孩子。所以,我们的生活不太苦。你们东方人怎么不讲点节制生育!譬如印度吧!随便生孩子,人口多,粮食不够吃,生活苦。”“你的意

思,这样下去,共产党的煽动会得势吗?”我接下去。她说:“很可能的吧!”至于尼赫鲁是否民主,我只得到一个印象,他曾经威胁印度的新闻自由,别的,我就很模糊。不过,有此一项,足以证明他的民主是怎么个样子的民主了。事实如此,而这位地理物理学家的外交辞令却如彼。他这个样子办国民外交,只合与爱听神话的小朋友去办。稍稍掩饰自己国邦的丑处,乃人情之常,过了火就不行!如果一切观念和言论都从我族中心出发,不顾事实,那么效果也许适得其反!

笔者觉得尼赫鲁不够民主,读者千万别以为我是受了某些人长年宣传的影响。其实那些人比他差的远。我有我的理由。自一九四五年以来,我对于所谓“争取国际地位平等”一词,有了不同于中学教育的觉悟。严格地从语意学及运作的(Operationistic)观点来看,仅仅是“争取国际地位平等”这一个口号,说不上对或错。虽然,这个口号,久受屈辱的民族听来,直觉地就很合口胃。但是,你要知道,你也可能被这个口号所宠坏;这个口号更可能被奸雄们利用。自列宁以来,一切简单而动人的口号都有这个危险。如果你想要跟美国人一样高的个子,那么最好的方法是注重营养、勤于运动、奖励优生。同样,你要争国际地位平等,你必需增进国人体格、健康、教育程度、道德水准,再看你国对于科学、文学、艺术,在世界上有无贡献。这些做到了,你不空口谈白话,争平等,人家自自然然要平等看待你。你实实在在做到一分,人家就多给你一分。这与站队一样,一号高个子站头排,再二号,再三号……我在印度时,正值世界第二次大战末期,许多国家的人,为了战争的理由,来到印度;美、印、中、英、缅等国家都有。名义上,这些人的“国际地位”是平等的。可是,在人与人相处时,无形之间,就有一个等级分类:第一、是美国人;第二、英国人;第三、中国人;第四、印度人;第五

缅甸人。并没有谁故意这样做,很自然地就是这样“感觉”的,要勉强也勉强不来。有人对此情形很生气。我就依据冷眼观察所得告诉他:“请你暂且把毫无基础的虚荣心丢开,稍微冷静而切实想一想吧!无论就体格、经济力、军事力,以至于诚信之程度来看,这种无意的分别是否很公道?如果我们想站到美国人前面去,空争假面子没有用。四万万人埋头干三十年再说吧!”史迪威公路沿印缅的一段,天气经常很热,雨季的雨,常把路面冲坏,所以,护路也是一大工程。该路每隔若干里,就有十来人合组的小队修路。我经过这段路时,亲眼看见印、缅籍的路工常常躺在树荫下睡觉,而美国班长,则在炎阳之下挥汗如雨,拿起铁铲拼命挖土。目睹此情此境,我心中当时就起一个感想:“我的老爷!像这个样子,东南亚的人,空口争什么国际地位平等!要争的话,必须勤快一点!”

现在,尼赫鲁不自量力,不专心致志于增进自己的国力,不用尽一切方法改善人民生活,就想跳跳跳,要“大国际政治”,这哪能说是对印度人忠诚?他这样做,是有其个人政治利益的。印度久受英国人统治,屈辱已久,独立以后,一般印度人下意识中想乘机伸头,扬眉吐气。这一共同的潜意识之流,抓到尼赫鲁手里,成就了他的政治资本。他对外能“扬国威”,满足一般印度人潜意识中的这种愿望,便可以巩固他的地位,扩大他的权力。在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有一个很显明的对照。独裁政治可以对内不管人民的死活、祸福、安危,但“国威”不可不张。[……]希特勒是如此,墨索里尼也是如此。“独裁”与“扬威”是结了不解缘的。民主国家没有这一套。因为,他的政府是人民自己的,不需搞这一套把戏来巩固他自己。从这一方面来观察,日本现今的政治家实在比较贤明得多。战前少壮军阀得势时代,需要大张国威,结果弄得不可收拾。现今日本的政治家对于管外边事的兴趣似乎较少。他们

注重到如何稳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前者独裁,后者民主,从这一对照,我们可以思过半矣。

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到勒格森顿之游吧!这一次还有一对人儿,特别惹笔者注目,就是法鲁克的同乡。那位男同乡,生的脸型,简直和法鲁克一模一样,留一丛又粗又大又黑的胡须,神情也颇像法鲁克的玉照。不过,他的太座,可没有法鲁克第二任太座那么精采。这位太座,其胖一如东洋罗汉。这还不算,她的一双高度近视眼,鼓出额前,活像一对叫“水泡眼”的金鱼眼。我就对来迎接我们的美国朋友说:“你看,这不像人种大展览吗?”这位美国朋友听到我这句话,不禁哈哈大笑!

勒格森顿是美国自由诞生之地。最近有专书出版,以志其史实。(Bruce Lancaster: *From Lexington to American Liberty*)厚厚的一大册,可见这个地方虽小,但在美国历史上却甚重要。这里古迹不少,所谓“古迹”,不过三百年左右的东西而已。然而,在我眼中,所可羡慕者,倒不在时间之久长,而在保存得完好。其中较引起我的兴趣者,是一家酒店。这家酒店,是当年抗英革命时英雄好汉们集议的地点。店内的陈设和光景,和我们平常所看西部武打片中的酒店差不多。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西部武打片中的酒店是以这类酒店为蓝本的。店内的酒器,英雄们用的长铳、十八世纪的农具、咖啡壶、羊皮装制的书、当时的壁饰、绘画,以至于小孩的摇篮、大人用的床帐,无一不是照原样保存得好好的。我一看了,顿时感到,人类在“制器利用”这方面,有十八世纪西方这种规模已经很够了。除了若干医药以外,何必弄得像目前美国这样烦呢?诚如罗素所说,近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科学技术的成就超过已往任何时代;然而,我很怀疑在艺术方面是否也如此。在这方面,笔者的看法,与德贝吾(De Beus)先生颇有距离。

参观了“古迹”以后,附近养家禽的人家请“各色人等”去午餐,并看看他们的家。笔者所去的这一家,可说是这类家庭中最通常的一家:厨房全部电器化,冰箱、电炉,大大小小,一应俱全,照我们眼光看来,总觉得太过火,有此设备三分之一已经足够方便了。当然,电气制造公司总经理听了我这种议论,一定不以为然。家中有一架钢琴,还有许多书。我所参观过的许多非教授家庭,大都有这些设备。读书人容易注意到书,我看到书,就拣其中较有价值的夸赞了一下。那男主人倒老实,照直说:“这是我太太的书,我没有读过。”太主人抢着说:“哪里?你忘记了,这是你买的嘛!”私有财产确乎重要。但是,私有财产观念在夫妻之间这样分明,“似乎大可不必”吧!

显明的对照*

笔者起先以为只有在敝国弄文哲的人“冷恹恹”，弄理工的“红东东”，跑到美国来一看，发现这种对照表现得更为明显。我想，这一现象之形成，不是哪一个国邦之事，而是拿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作社会活动之主导力的结果。这也就是说，这是“工业时代”底特征。

说起美国最“吃香”的，要算弄理、工、医的人。习电机工程等等部门的学生，还未毕业，尚在二三年级时，各大工厂之类的制造机构，就向学校要名单；派人向学生“勾搭”、“暗送秋波”，尽量讨好他们。发展这一部分“勾搭”工作的，又有专设部门或人员，叫做“社会关系”。美国人做某件事，只要他们认为重要，他们一定使用一切技术。他们要“发展社会关系”的话，一切做法，保叫你“好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过”，连笔者这样“孤僻”成性不喜与人接近的人也觉得舒畅。每到暑假期届，各大制造机构派人来“发展”学生，请你到他们设立的研究部门里去，并发给你足够花销的费用。有一个学生，被邀参观五个工厂，来回交通费、膳食费由厂方供给。这位学生排好程序，依次参观，结果，不独未花一文得到许多见识，反而倒赚了二百多元；可是，他们并不显明的，不给你任何限制与要求。你在里头打球也可，放爆竹也可，谈恋爱也可。“想像”为创造之母，这些企业家有的是远大的眼光。他们知道，在一长远过程中，如何培养并激发青年的想像力。凡青年讨厌的那些限制，他们一概不让它出现。在从前，纯科学的研究，是设在各大学里，制造机构从旁出资补助；现在，渐渐由他们直接设立。然而，这些研究所，对工厂又是独立的，只为研究而研究，工厂方面一点也不要求它从纯实用的观点来研究。这些企业家，在这些方面，用起钱来，真是慷慨之至，几十万几百万不算一回事，比我们中国的主妇买一只鸡子还轻松得多。但是，因此而碰出一件新发明为独家专利的话，他们的财就发不尽了。美国大制造家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竞相发展研究机构。因而，在这种竞争之下，习理工的，脚一跨出校门，就被一抢而光。至于得到理工博士学位的，那不消说得，在学位还未考以前，说句笑话，就好像被人“包”了似的；一出学校，一般的起薪是年俸五千；稍微特殊的，是七千、八千不等。在这种风气之下，位于美国东部而驰名世界的麻省理工学院(M.I.T.)，简直成了“富贵之门”。该院入学松，但考试严，每次考试下来，总是“刷”掉一大批。然而，美国优秀青年，趋之若鹜。附近中学的前几名，大都走人该校。如果有人问起一个青年在何校念书，他答是在M.I.T.，脸上就有三分光彩似的。哈佛习物理学的，纷纷往M.I.T.“溜”。哈佛老，麻理新。无疑，哈佛在理工方面的权威，会慢慢被麻理占过来的。

再说习医的,其“生意”之兴隆,有非意想所及者。笔者有个朋友,想治治牙齿。那位医师说,对不起,我现在太忙了,咱们来个约定(Appointment),请你两个月以后再来看吧!普普通通的牙科医师,周薪是以二百元为底子,有活做,另外再算。刚出茅庐的脚色就是如此,至于名医怎样,笔者不知。医师生小孩,牛奶有牛奶厂免费奉送,直到你说“不要”为止。美国食品公司专为小孩制造的食品,名色繁多。医师写封信去要,立刻免费送上。爱惜人命的国邦,医道之昌隆,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且看看学习文学、艺术或哲学的人所处的光景。当然,我们不能说,弄这些东西的人没有出路。有的,但是,其“供求情况”,与前者真有天渊之别。第一、二流的文学人才、艺术家、音乐家或搞哲学的人,当然不愁没有职业。学校可以聘请他们,乐队可以邀约他们。然而,到了这一格的人,为数究属有限。其他的人,要求就业,常需“脱离本位”,另谋出路。拿到“哲学博士”,开街车的,并非新闻。从前,在咱们中国,跑到美国混几年得到“哲学博士”头衔的,回到国内,一步登天,居然当起“教授”来。现在,许多哲学博士,比如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要从最低级起任职,在哲学系当助理(中译为“助教”,其实,美国的助教 Assistance Professor,地位颇高)。这还算不太坏的境遇哩!

同是中国人,同是来美国避乱的,有的学医,有的学音乐。学医完成的,现在纷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自己有单套住宅(Apartment),有的也有半新汽车。学音乐的那些人呢?尽管拿到硕士学位,一离开学校,立即感到“茫茫人海,何处是归宿?”奔向社会,走遍南北,没有人“需要”你。加入乐队?好,可以来“敬陪末座”,周薪三十元正。活不了命,命又不能不活,于是,拖着硕士文凭,参加大工厂的打工役(不是工人,在美国当一名正式工人,颇不容易,

除专业技术外,必须具有美国公民资格;工役则是做零工的)行列。在这种现实环境压迫之下,有的则抱着探险的心情,重新跑回老巢。有的呢?在一方面害怕那不可知之深渊,在另一方面又感到这样下去,了无已时,于是,“前功尽弃”,放弃本行,改习物理等实科。扯下硕士帽子,又从一年级新生“改造”起。至于美国习这一行的,家里有钱的子弟,对出路问题尚不十分感到紧急,他们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一般的人,则需自觅出路,弄的不巧,常需找个图书馆员之类的职业,混饭吃而已。这种景象,不是十七八世纪的知识分子所梦想得到的。

文、实,两者底处境,对照起来,相差太远了。显而易见,这是商业、工业、科学技术,大众底直接基本生物需求,这几种因素成为美国社会底推动力之后果。这种现象是否社会健康的现象呢?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我看来,答案是反面的。一个社会,主要地受这几种因素底推动,好像人主要地发展肌肉,而少发展心灵,这是偏枯的。我们不管这派那派道德家抱持何种价值判断,人类与生俱来的那些“欲与恶”总不能不作为价值判断底出发点。例如,人除了吃饱、穿暖、有屋避风雨以外,心灵不能不予以滋润——暂且不问“心灵”二字怎样解释,情感不能不满足。这里所谓情感,不是别的,只是像你和我一样的常人共同具有而且几乎每天可以实际经验到的喜、怒、哀、乐、希冀等等。科学之研究,对于科学家诚然就是目的;但是对于一般人而言,在许许多多情形之下,只是手段,并非目的。科学与技术,诚然有助于增进美感,或作达到希望之工具。但是,就众人而言,科学底自身并非即是美感,尤非希望。人,当陷入饥饿时,很自然地过分高估“物质”生活之重要。所以,马列之徒的宣传,在贫困而落后的地区特别奏效。然而,当人满足了“物质”生活以后,情感精神的生活则尤其显得重要。所以,美国有

个百万富翁的承继人,宁愿抛弃财产,与乞儿为伍。这不是马列哲学所能解释的。依此,美国想自己健全起来并领导自由世界,她必需纠正这一趋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一点印象,意见*

从容罔算起,中国留学的历史已超过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底历史不能说太短。这一百年留学底成绩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底内容很复杂,而且其结果不是短时间所能完全看出的。不过,个人陈述个人的印象和意见,总是不太碍事的,反正不是做官样文章!

从最近几年的经验、观察和思索,我得到一个假设:一个国邦,她的历史走到某一进程,她的各方面也就止于某一进程。除了少数突出的例子以外,要高明也高明不了好多。这种情形,就所谓的“学术界”来说,因笔者在里面待了几年,比较清楚。尤其笔者在比较熟悉的哲学范围,了解得更清楚。就近几年的情形说吧!有些人误哲学,在刊物上所见的,你说他是通俗的谈法吧,又似乎太深,论者还满口立异鸣高,瞧不起“常识”——尽管他们似乎还不知道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四十年来剑桥的穆尔(C. E. Moore)如何为“常识”辩护。你说他是严格学术的谈法吧！那又嫌太不严格、太不学院气，相差太远了。你说它是“社会哲学”，又觉其太玄，离题太远。你说它是“专技哲学”，更不像是受过这一套训练的样子。开起口来，古今中外，大不可当。批评逻辑实证论，这是很可以的，而且任何新起的学术思想都需通过许多批评。但是，那些批评者所表现的，只是粗糙、外行与不喜三者而已。在哲学上，天大的问题，西方哲学家绞尽脑汁，还找不到好的公认答案。这些哲学先生，却只把手一摇，眼一闭，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这些先生却喜互相抬捧，专门向不懂哲学者谈哲学。笔者起初看到这种光景，颇为愤慨。后来看惯了，再与别一界比较比较，才晓得这是一般的现象，哲学范围单独要好也好不起来。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头吧！百年来中国底情形是怎样的呢？暂且可以一语概括：“一切都不顺利”。你说有进步吧，又有些退步。比如就思想说，台地的退步至少五十年。你说完全退步吧，不见得，在别的方面也有点进步，但不多。总而言之，用两个字可以含混地表达：“乱拖”。国邦在乱拖状态之中，留学又何尝不然呢？至少，笔者多少年来的印象是如此。现在不过是印证一下而已。

说起“留学生”，真是“良莠不齐”，各色人等，应有尽有。好的好到天上，洋人抬头够一看；坏的坏到地下，洋人瞧不起。当然，居中的还是多。像现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的几位，像现在美国王牌大学任教又到牛津大学讲学的某先生，像在耶鲁、加利福尼亚等校的人，以及散在美国各处的，在美国，都要算第一第二流的学人、技术专家。特别自第二次大战以后，中国留学生真是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处境苦极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肯上进的就乱混一阵；肯上进的人，有如背水作战，发奋图存。所以，有的在美国学界能

够立足。搞技术的,加入工厂;习医的,自行开业,或投身医院。这一流的人才,被美国社会各界吸收的不在少数。

清末至民国初年“官费”送出去的,不乏纯良优秀子弟。因为,清末至民初那一阶段,中国还有一股开创气象。在这一气象影响之下,多重人才,少重“关系”。近二三十年的味道就不大一样了。近二三十年来,能够留学的,大致分别有三种:有钱子弟、“有组织关系者”、纯学术机关考送者。后者素质优良,平均成绩最好,可以不论。靠“组织关系”留洋者,不可以论。我现在要论的是有钱人子弟出洋留学的成绩如何。这中间,仍有许多杰出人物,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不过,有些恐怕不妙。这等人物,在国内读书不成器,考不及格的,只因家里有钱,就往外国送。在国内读书不行,一到了外国,有了语言的隔膜,怎么反而忽然行起来?这是不易了解的事。他们之中,有的在外国打一个滚,就跑回来了。这一下,臭皮囊,满身金,分外香。有的死皮赖,搞好多年,为的是想得个头衔。美国有些大学,对于有色人种,另眼相待。你要头衔,好,缴学费,读学分就是了。马马虎虎过得去,就送你一顶帽子。就这样,连滚带赖,弄得一个头衔。这样,他固然是“美国制造”,学问一道,可能尚未入门。但回来以后,可就“吃香”了。他神气十足,派头满大,瞧不起在国内苦学之士,起码要当教授。中国主持新教育的多是老留学生。对于个中情弊,他们难道毫无所知?但是,他们从来不露这些口风,不仅不露这些口风,而且只要是外洋回来的,便“特别优待”。在另一方面,他们有意无意,贬抑在国内苦学之士。好像,只有在国外读的才算是书!自己在国内读的是白搞的。假设有两个同级学生,姓张的优秀而无钱,姓李的有钱而不优秀。姓李的跑到外国喝两三年洋水回来要当教授。姓张的只能留校当助教。难道外国大学有这样的神通,在这短短时间之内,使他的成绩一下超

过这许多年？可是，多少年来，大多数主持新式教育者，助长这种浇薄之风。其所以如此，恐怕只有下列几项才能解释：一、“官官相卫”；二、广告心理。如今搞政治的也多是“广告政治”。仿佛只要我的广告到处贴，便可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堂堂搞政治的尚且如此，何况是有些办教育的哩？

笔者有位敝同行，在美国某王牌大学混了四年，回去自称“博士”。笔者在此间有一次偶然提到，答者曰：“哪里？他只是一个硕士！”我觉得很奇怪，应声而言曰：“博上，硕士之分，有什么大不了！有博士头衔，而学问内容又充实，货真价实，这是最好的。不然，学问好，无头衔，识者不会小看你的。不过，既非博士，何必一定自行通货膨胀？搞哲学的，不比经商的，难道这点还没有看穿？罗素没有博士头衔，何损于其为罗素？陈寅恪先生在国外十八年，没有半个头衔，谁会小看他？牛津大学还要请他讲学哩！”“噢！”该位先生又提醒我：“你的见闻太不广了！有的人在国外混了几年，连硕士都不是，他回去还要自称博士哩！”“哦！”笔者为之愕然，“那么，这样说来，我这位同行究竟是搞哲学的，还讲点真理，有个六十分打底！”许多远离美国的人，震于美国许多大学之名，以为如何如何。殊不知有些学校的学位之颁给并不严格。就笔者所知，某王牌大学，对于硕士学位之颁给，有如美国人做面包，简直是“大量生产”。通常的人，一年以内，就可得此学位。笔者这位同行，居然用了四年之久。其余三年，不知是吃冰淇淋去了，还是看电影去了。不过，他回某处后，改造文书，巴结权要，居然就当起教授来。而人亦莫可如何。我们自然不可以偏概全。不过，我们总不能说这不是留学生。你也不能担保“天下只此一个！”当然，最近几年的情形在变。最近几年，平民想到美国，那真正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白丁想到美国，那真是要跑断腿、说烂嘴。难关重重，你想飞渡，得

支付人类最高忍耐。等到你真能成行,你已经磨掉一层皮了。因为得来不易,加之大大小小的环境多多少少为远行者了解。所以,这几年的留学生,比从前的大体用功多了。苦难的折磨,也许可以熬炼出一批新人材。

如果要笔者对于留学表示一点小小意见,我认为需合经济原则。就是:“当国内师资与设备不够供你作进一步的发掘时,才用得着留学”。当然,为了镀金,那又当别论。记得笔者在南京某校教书时,有一个二年级的学生要我写封介绍信,到美国去念书。当时我就有点感慨:“跑到美国去还是从哲学概论读起,这何必呢?难道中国没有人教得下你的哲学概论不成?”许多金钱就是这样浪费掉了。复次,同是到外国作进一步的发掘,最好分个缓急先后,愈需依赖仪器设备的学科,愈应留学。否则,等一等也不妨。像弄哲学,大可不必太急。这并非意谓中国不需哲学人材,非也!中国需要第一流的哲学人材。不过,哲学究竟靠个人“头脑工作”者多,靠设备者较少。毕生的工作,慢慢来又何妨!同是到外国弄哲学,笔者认为还要分个级距。所弄的东西不能太旧。太旧的东西,已成传统,国内的设备多少将就可以应付。所以,可以不急。但也不能太新。这何以呢?因为,也许国外还没有正式成为一门比较定型的学科,而只尚在草创阶段。在这情形之下,你如非已经很有预需的根底,跑去不见得会有所获。例如,哲学的语意学就是如此。我看不出中国目前有能和国外这一门的开创者进行专门性的讨论的人才,日本也许好一点。目前,你要到美国去弄比较高深的数理逻辑,那真是最好的季节。这样看来,留学如非为着说来好听,而又要避免浪费与颠顶,期有所成,那么各部门必须有专家以供咨询才好。但是,千万别误会以为我主张“统制”。一统制,“百事大吉”!

从口头语看^{*}

中国人说：“言为心声”，这话到了今天，似已发生重大的问题。时至今日，有许多建构，专靠制造并贩卖神话及迷执谋生。你别自以为聪明，容易识破谎言，也许，你在一种环境中，天天呼吸迷执空气而不自知；你还感到陶醉哩！当然，这年头，能自我陶醉，要算一种福气。只可惜，这种福气和酒醉后的福气相当。冷风一吹，酒醒后，无限苍凉寂寞。当你的身体陷入层层铁丝网之中时，你不会感到出路困难吗？你陷入一个组织严密的迷执系统中时，情形正复类似。所不同的，迷执系统没有铁丝网系统那么容易被察觉。因此，陷入其中的，很少人感到需要突出。即或感到需要，他也不见得那份本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某国某大将军，为了想解决中国国内的某种“纠纷”，特地好意跑到中国西北某地去“视察”。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懂事的人就在旁边说：“这只兽快掉进陷阱了”，果然，他出来的报告，印象不恶。其余千千万万天真无邪的年轻男女之堕入网中，更不足为奇了。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现代的宣传，语意学的运用，加上政治性的布景技术之联合作用，会替你安排一个安排者所希望你产生的反应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许许多多旅行苏俄的“内幕报道”，实际上都是苏俄“谎言组织家”底得意杰作。他替你布景好了，你照着写就是了。这一门，快要发展成专门的学问了；而且，正被普遍采用着。我有充分的理由说：漫野的唯心论是其中的一大要素，其恶果常被唯物论者利用。请读法兰克的书，便知理由。

然而，如果我们不因过分愤世疾俗而妄肆推广，那么，我们得承认，在谎言不起作用的地方，在谎言并非日常生活必需品之处，“言为心声”这话还是说得过去的。美国人，无分男女老少，一天到晚，随时随地，挂在嘴边的口头语有这么多：well, good, sure,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 are welcome, fine, O. K. 他们对于这些字眼的用法，照讲究用字的分寸之人看来，也许觉得有点滥。不过，如果我们不斤斤于这些小节，而把它看成一个普遍的心理趋向之表征，那么其意义真不算小。一个国邦，整个社会里，大家都爱用这些好字眼，那就可以表示他们共同趋向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光明的一面。在反应未疲劳时，某种语言是有诱发某种行为之作用的。

笔者个人最感兴趣的是美国人常说的另一口头语：“I think so”（我想是如此）。也许有人说，区区三个字儿，哪有什么重要？用得着大做文章？这可能是你不弄知识学而我弄了一点点所产生的差别。认真地说，这三个字着实讨论起来，不用说一篇文章不够，就是写一本五百页的书也未见得够。请看 Brand Blanshard 所著两厚册 *The Nature of Thought* 便知。

拆穿了说,人的许许多多动作,在许许多多情况之下,是受一点脑筋丝儿一转所支配的。你看到汽车司机转方向盘没有?他只要把方向盘稍稍朝左边一拨,汽车就向左偏老远老远;他只要把方向盘稍稍朝右一拨,汽车就向右偏老远老远。人的思想作用之于行为,正复类似。至于脑筋丝儿怎么会这样动而不那样动,形成的原因至为复杂,只有别立专栏讨论。好在这类问题与我们现在的论旨不相干,所以可置之不论。我们现在所需留神的是,人常由思想支配行动。在这一关联中,我们的思想不能止于仅是一篇构造良好的神仙小说或剑侠故事,而必须与外界形形色色的事物碰头。我们对于“事物的思想”与“外界的事物”碰头的情形,有这几种:一、完全相合;二、部分相合;三、完全不相合。完全相合的情形,在实际上根本没有,即令是最精确的科学方法也办不到。完全不相合的情形,恐怕也少有;即使是梦,多少片断也是与事物相合的。“日有所见,夜有所梦”。第二种情形最多。我们可以说,人类在知识方面是活在第二种情形之中,即科学亦不例外。我们的想法有时跟事实符合,有时并不符合。同是符合,也是程度之差;物理学最高,常识最低,符合程度愈高,愈好办事,不然,愈感困难,有时甚至要大出毛病。例如,气象报告与气象变化是两回事。气象报告之准确程度有差等。愈准确,则对于飞行、航海、军事、养鸡,以至于旅行度蜜月,愈有帮助;否则,愈不利,甚至会出事。总而言之,我们的思想与外界事物不能完全符合,而总是难免多少要错开一点点。这和笔者照的相差不多。我有一次把园中一簇美丽的花照成一团美丽的雾。这点“觉悟”,是多少年来,科学所得到的经验。爱因斯坦也明明白白说,实际的物理世界并不全与几何学相合。弄知识学的人也可发现这一点。可是,许许多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尤其是没有科学经验的民族,愈是原始的,愈容易以为“思想即

存在”。我想怎么,外界就是怎么的。他们把“想”与“在”混为一事:认为想即在,在即想,我想怎样,世界即是怎样。你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打这种如意算盘,等于白昼作梦,有助于忘记现实。可是,如果你要把你的这种想法付诸行动,可能就很糟了。再发展起来,也许结果严重。比如你有了权力,像金枝玉叶的慈禧太后一样,那就更糟糕了,你有力量不顾一切让大家一同遭殃。我从前住的地方,有一位老太婆,她十八岁的女儿晚上十一点钟还未回来,她就在家咕噜不休,认为她女儿会在外面有“不端”之事。旁边的人劝她:“不会的,她平常满好的嘛!”这位老太婆更怒:“你们不要替她打圆圈。我想定了她是这样,她就是这样的。”请读者不要好笑。如果她是一位男士,而且又有“彪炳宇内”的“勋业”,又有稀世之宝的崇高头衔,说不定你还会向她顶礼膜拜哩! 古往今来,许多英雄、教主、大法师,很少不是这类人物的。这类人物,看起来,倒是满有精神的,很过瘾的。人类太平久了,生活单调,出个把这类奇才表演表演,倒也不无新鲜刺激。可是,不能出多,出多了,咱们非英雄就吃不消。尤其不可同时并出,同时并出,[……] 叫鸡公斗天下,害得小鸡天天搬家,很不经济! 那个希特勒,著一本《我的奋斗》,一开头便说:“天幸生于莱茵河之畔,予良以为幸。”这与“天生德于予”是一个调调。我们凡夫俗子,看不出希特勒凭哪一点“通天”;至少路德马丁会反对他。但他就以为真是如此,以为日尔曼民族真对世界有何“使命”,自以为天下无敌;真的动起手来。结果,那样美好的一个国家,先挨一顿痛炸,后来弄到四分五裂。希特勒在德国之所以能够如此猖狂,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凡尔赛条约之刺激;而在心理状态的置境(collocation)上,则应归大功于自斐希特以来所制造的那一套“观念论”为之在思想模态上铺路。不然的话,像希特勒这种鼓眉瞪眼的脚色,照英美人士的心性看来,早已

应该送精神病院静养。有人跟着他跑才怪哩！对于这样洞若观火的事实，许多人还不当作教训。他们以为中国目前的乱是“精神真空”之结果。有人居然提倡“绝对精神”。[……]

所谓真理，不就是头脑中的那点影像(image)，真理是四进向的，真理离不开实际运作的过程。如果明知客观世界的真象与自己的愿望相违，或与自己的现实利益不合，而有意歪曲事实的报道，那么为祸之深远，甚于黑死症。

美国大学教授、大学学生，口里常常挂着“我想是如此”，这不必说，就是商店店员，或稍受教育的，也多用这种语气。这就表示，他知道自己所想的，不必然与事实相合，可能有错误的。这种想法，遍及全社会，可见并非偶然一二人之客气，而是教育与风气造成的。人既然自我意识到我可能有错误，不武断用事，这就好同他打交道了；社会也就比较容易改进错误。在这种心理气流之下，“伟人无失误”之绝对哲学就只好放到博物馆去陈列。于是，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跟着钻牛角尖、错到底了。你说区区这点想法，实际的价值不大吗？

如果你嫌这太“浅薄”人，那么我劝你务实一点，先从原始心理前进一步，做到这一层，再谈其他不迟。

荀子说：“学不躐等也。”

风格与才干^{*}

这是谈点人物品鉴，假若不限于道德的意义，假若是可实证的，假若言之不太泛滥，那么笔者未尝不可以承认可能有一“人格世界”。“可能的世界”可能很多；既然有“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在逻辑上，当然可能有“人格世界”。

风格不等于人格，但却是人格的流露。我们看见一座古代建筑，历代对人类生活有影响的人之塑像，见其古色斑驳，辄可引起多少向往之情。我们常谈“建筑风格”、“艺术的风格”。我们对于人格的欣赏，又何尝不可如此？绘画中的古典派、象征派、写实派，各代表不同的风格，各引起不同的心性者之摹拟。同样，人的风格，也有一种吸引、示范，甚或令人慕念的作用。这种作用，常不易言谈，因语言毕竟是贫乏得可怜的工具。动辄上万言书，谈情说爱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者流,常非深入爱情氛围之徒,少女们应该当心!但是,风格所起的这类作用,毫无神秘可言,更非非予以“形上学的基础”便不能稳固。它是全然可经验的。在人与人之间的生活,这点作用,似乎不能太缺少。我们看,宗教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诗人的行谊、风姿,常常流露着这类作用。

笔者认为,美国最多的是汽车;而较少的要算风格之类的东西。此间离某大学不远之处,有一座教堂,建筑之宏伟,巍巍峨峨,上出层霄。里而的“住持”某位先生,论年龄已经六十多了。他的尊头,既像日本富士山,又成中国大雪岭。他兼任两个神学院底教授,著作颇多,住持这个教堂已经三十多年了。照我想,这样的人,应该有一股风格流露出来,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了。岂知事有大出人意料以外者。这位先生,主持礼拜,依照程序表上的规定是一小时。他真的是刚到一小时,便宣告完毕,不多也不少。每次都是如此。其守时之准,比美康德。不独此也,礼拜完毕以后,他就走起陆军快步,跑到礼拜堂门口,与每一位做礼拜者寒暄几句。礼貌之周到,应酬之圆熟,与青年会总干事无异。起先,我以为这只是个人差别而已。后来,我跑到附近几个礼拜堂参加礼拜,都是大同小异的。老一辈的牧师如此,年轻一辈的更不必问,他们的动作简直已经制式化了。这里某王牌大学底哲学系,在美国也是王牌系。该系老一辈的教授都凋谢了,情形如何,我不得而知。下一辈的名教授是看到几个的。照我想,搞哲学的人,多少应该有点与众不同。有某教授者,真是名震英语世界,人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可是,就是差一点我所希望嗅到的东西。他走进门,总是一冲而入。动作之快,步履之健,俨如足球健将。“唉!”新老残叹曰:“堂堂的大哲学教授,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啊?”宗教界、哲学界底味道,就我所见,大都是这个样子的;一般社会人士,就不必提了,他们大

都属于办事员型。复次,同样是少女爱美,美国少女们爱美,从头至脚都要打磨得光光滴滴。有没烫发的美国妇女,真是少得可怜。其实,她们的头发已够松的了,何必再为理发店增加这笔收入呢?不独年轻妇女如此,老太婆亦少例外。笔者楼下的一位老太太,年纪已在七十开外了,她连那点古稀之毛已经失踪了,换上一头假发。有一天,她女儿扶着她,摇摇摆摆到波士顿去,我以为是去购物的,回来的时候,她那一头人工头发,居然焕然一新,俏皮非常。我真想不到,她对于她那一头假的三千根烦恼丝还这样感兴趣,舍得出动全般人马,远征波士顿!当然,从好处着想,这也是美国人可爱处。他们有活力,不怕老,对于事物永远有兴趣。是的!不过,有些事,我总觉得可以不必。相形之下,我看见有些法国少女,她们不烫头发,长发披肩,微风来时,如杨柳拂波,这又何尝不美?我喜爱自然。

美国之所以这样缺乏风格,除了说是由于高度工业文明之影响心理以及生活形态以外,我简直找不到解释。不过,我这样谈,请你不要乘机说项,为我介绍中国道学夫子。我所看见的道学夫子,没有一个不酸、腐、做作;有的还迂拙不堪。这还不打紧,最令人不敢当的,就是这些先生“立言”,总是把调子悬得高入九天之上,强人所难,而自己的实际行为却又不像配合得上的样子。这就实际地证明其调调儿之破产、之不近人情、之不合事理。在孔制以外,在理学以外,中国倒有几许可爱的人物。

玻璃花^{*}

就笔者亲眼目击的人造物而论,纽约的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总算是第一流的巨构了。这座大厦是曼哈顿(Manhattan)诸建筑物中之首屈一指者。位于有名的第五街,计一百零二层,高出街面一千二百四十八英尺;在第八十六层楼,置有观测台;计有电梯六十三具;起重机四具;通风设备每分钟输送七十二万五千立方英尺空气;全部建筑,用砖一千万块,石二十万立方英尺,钢九百三十吨。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巨大的建筑物,并不是现代工程学以及美国物资充沛的唯一产品。人一置身其中,立刻觉得身躯渺小。

这样的人造物,论吓人,的确是有些吓人;可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书生而言,却尚未心灵悦服。美国大学的校舍,笔者见的不多。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就已经见过的来说,哈佛的颇不令人发生快感;著名的维尔勒斯里女子学院的,优美倒还优美,可惜气氛欠佳;……最令我心折的要数耶鲁。提起耶鲁大学底校舍,笔者不禁为之欣然神往。校内建筑物几乎一律是模仿西欧有历史的大学校舍而建筑的,几乎全部是哥德式的,古色古香、老树参天、气氛宜人。耶鲁所在小镇名新港(New Haven)。这一带住民的礼貌之佳,态度之文雅,风物之优美,为笔者所仅见。作为一个读书人,一辈子优游斯地,也就无负此生了。我们应该让被那些虚夸“历史文化”搅坏了头脑的人亲眼来比较比较。谈到虚夸历史文化,我如今更明白了,那不过是废墟上二三幽灵那一股子郁积不解的情结(complexes)在心头蠢动而已。彼等所做工作似甚正经;而稍一究诘,不过是拿似是而非的哲学名词来文饰已形消逝的部落心理而已(pseudo-philosophical elaboration of tribal psychology)。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知好讲呢?算了吧!开明的自由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责任,是帮助这个时代尚可救药的若干人养成“开放的心灵”。开放的心灵,是不带任何枷锁的。

除了耶鲁的校舍以外,最使我动神的,是哈佛大学博物馆所陈列的玻璃花。提起这一宗玻璃花,真是科学与艺术融合于一体的作品;真是人类智巧与毅力底结晶。

这一宗玻璃花底历史是很富于意义的。一八八六年,哈佛大学有关当事人对于该校新建植物馆陈列的标本之性质,曾经认真考虑过。George Lincoln Goodale 教授苦心经营,一八九〇年植物馆方告完成。植物馆完成以后,他认为,这座植物馆,如果像一般植物馆一样,只陈列一些树木、纤维、种子和药材,那么是否能够引起大家底兴趣,实在颇成问题。他很希望在馆中能有一室,陈列足以表现植物生命发展的型模,好像在比较动物馆中足以表现动物生

命发展顺序的部门一样。但是,照他考虑起来,要达到这一目标,势必困难重重。假若用干燥植物做标本,那么不合展览之用。如果用彩色来绘画,或者照相,则只能表现植物底平面。在美国或其他国邦,许多搞这一行的人认为,唯一可用的型模就是用蜡制成的东西。但是,这种型模之制造,在技术上也有许多困难。

在那个时候,可巧动物馆得到少许玻璃制作的型模。这少许型模,是关于水母和其他水生动物的,制作非常精巧。Goodale 教授审究了这些型模以后,他就推想,玻璃既能用作动物型模,当然也许合于制作植物型模。他访知这些型模是出于德国艺术家布拉施加 Blaschka 父子手笔,于是他立刻设法和布拉施加父子接头。布拉施加父子的工作室在德国,靠近德勒斯登(Dresden)地方。

一八八六年 Goodale 教授访问布拉施加父子,并且和他父子二人讨论他的计划。但是,二氏对于他的计划不感兴趣。老布氏,即 Leopold Blaschka,这时正在从事他自己的工作。他不想制作别种型模,并且连试作也拒绝了。其所以如此,一来因为他怕新的工作将会扰乱他正在做得顺手的工作;二来,他非常怀疑他是否有能力把有花的植物型模做得好。二十多年前他曾替有名的兰花学者莱兴巴哈(H. G. Reichenbach)制作过六十幅兰花标本。一八六八年列日大火,列日博物馆被焚,兰花标本也付之一炬。Leopold Blaschka 虽然具有制作兰花的经验;可是他依然怀疑他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西方艺术家态度之谨严,于兹可见。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这位艺术家客厅底架子上,有几件玻璃制作的兰花。这几件标本之生动与逼真,宛如刚从温室中取出的。Goodale 教授向 Leopold Blaschka 保证,他虽然拒绝制作此项标本,但他所作的这些兰花,恰正合乎彼所希望的成就标准。经此劝说,这位艺术家终于同意为哈佛大学植物馆制作几样标本。这算是洋

洋大观的玻璃花之诞生。

一八八七年,标本制成,运送美国。可是,好事多磨,标本在入口的时候,一部分被纽约海关严重损毁。但是,即使这受到损毁的标本,运抵剑桥(Cambridge)以后,大家于观赏之余,咸以为制作全套植物标本,实大有后望。因此,Goodale 教授更亟欲用玻璃制作植物标本。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植物馆里的朋友,并且希望他们给予财政上的支援。Elizabeth C Ware 夫人和她的女儿 Mary Lee Ware 对于这一计划大感兴趣,并且开始经济援助工作。

Blaschka 父子经商定结果,接受半时工作合同;因为,他们也想同时继续制作动物型模。但是,到一八九〇年,他们觉得不能分出精力同时从事于两种工作。在此两难之间,他们愿意放弃制作动物型模的工作,接受在十年间全部制作植物型模的合同。维尔夫人及维尔小姐也愿意继续给予财政支援。这两位艺术家重新以新的热忱工作,并且保证他们的工作可以达到预期以上的成果。自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三六年,合约一再更新。Blaschka 工艺室的全部出品都运送到哈佛大学。一八九五年,老 Blaschka 故世。父子二人底合作才告终止,儿子接着工作。现在,收藏在哈佛博物馆的父子二人毕生精力结晶的玻璃花,叫做“维尔收藏集”。该集七百八十八种,计数千件,占屋四大间。

说起这父子二人,用北平土语来说,真可谓之“绝人”。他们制作玻璃花,前后耗时五十年,父死子继,他们不要助手,又无学徒,一切全出自二人之手。模型所表现的植物,真是维妙维肖。花上蝴蝶身上的粉粒,也像天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人可以说,这一集玻璃花不是人类心智高度集中之稀有的表现。

Leopold Blaschka 乃是色彩玻璃,表达自然史这种艺术之创造者。氏于一八二二年五月廿七日生在阿嘉(Aicha)。此地乃北波

希米亚的一个市镇。Leopold Blaschka 系 Joseph Blaschka 的幼子。Joseph Blaschka 是一位电气机械师, 又是一名玻璃器物制造技师。所以, 制作装饰玻璃乃此一家庭之传统。Leopold Blaschka 在完成其少年时代的课业以后, 就当一名金匠。他对琢磨宝石深感兴趣; 并且在波希米亚都瑙(Tumau)地方从事细工黄金工作。他对于这种工作也大感兴趣。几年以后, 他回到阿嘉, 在此地他与乃父从事金属与玻璃工艺。一八五三年, 他乘坐帆船到美国。当时船中无事, 他收集了许多海生无脊椎动物, 并且绘制了许多图样。依据这些图样, 一八六五年, 氏为德勒斯登地方自然博物馆首次构成 *Coelenterata* 之玻璃型模。型模一出, 引起许许多多人发生兴趣, 并且奠定了他生涯的基础。

Leopold 的儿子 Rudolph 一八五六年六月十七日生于阿嘉, 但却在德勒斯登受教育。他嗜好植物学及动物学。其所以如此, 乃受教师与父亲鼓励。当他预备做他父亲的助手时, 他已经熟悉德国中部的 *ilora*, 以及北海、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海生 *fanna* 之大部分。父子二人所制海生动物型模颇多, 迄今在许多博物馆中犹有保存者。可是, 植物与花卉的玻璃型模, 只在哈佛大学植物馆中才有。所以, 至今哈佛所存者, 为世界唯一的一集收藏。

Blaschka 父子是够幸运的, 他们有一所良好的工艺室。这所工艺室距离易北河畔 Pilnitz 皇家花园才一英里。这座皇家花园中, 有许许多多国外运来的品种。宫廷对 Blaschka 父子很合作, 他们可以把园中花卉拿到外面去利用。布氏父子自己也有花园。他们园中有许多美国植物。这种植物, 在 Saxony 底气候里, 可以在户外生长。此外, 他们从德勒斯登以及柏林底植物园中也得到许多品种。一八九二年, 小 Blaschka 来美, 研究热带植物。他制作图样, 记录植物颜色, 并且把标本放在酒精里携回德国, 以备作更进

一步的研究。他的足迹到过 Jamaica, 后又至太平洋口岸。一八九五年, 氏第二次访美, 到美国南部研究植物, 在维吉尼亚搜集了许多标本, 而至更南部。一八九五年七月三日, 忽闻父丧, 始匆匆返德。

现在哈佛大学博物馆备众展览的维尔集所包含的标本, 代表着一六四科花卉。其中有若干隐花植物标本, 表示复杂的生命史。另一组织型模则表示虫媒与花粉传播之关系。又一组则表示果树与病虫害之关系。这一组是最后完成的, 至一九二四年方才开始制作, 也是小 Blaschka 最后的作品。自一八九五年丧父以后, 小 Blaschka 即一人单独从事玻璃制模工作。一九三九年, 氏年八十有二, 五月一日故世。他的一生, 可谓尽瘁于艺术与科学工作。

谈到藏在博物馆里的玻璃花, 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博物馆里其他的收藏。笔者所见博物馆有限。然而, 即使就这有限的博物馆所见之收藏而论, 也够令人感慨无穷了。

人类, 不能不使用语言文字。语言文字诚然有其工具价值; 然而, 它的弊端也够大。许多所谓“哲学”, 完全是浮在语言上而的寄生虫。没有语言, 便没有观念论, 更无所谓理想主义。靠语言获得知识, 不仅贫乏, 而且危险重重。我们应需摸清语言功能的边际。不然, 我们常常不是在用语言, 而是为语言所用; 搞倒了头。笔者参观几个博物馆之际, 益发加重这种感想。

这几年来, 有些人士好谈“文化”。这类谈法, 饰之以拟似的形上学铺陈 (elaborated by pseudo - metaphysical statements), 一般人以其神奇, 遂望而却步, 敬而远之, 甚或如善男信女之见僧道之符箓而为之慑服。这类谈法, 在人手上, 完全是抓着某个单一的元素来一套“夫子之道一以贯之”, 状貌若甚皇皇。

这是完全藉“字”谈“文化”所造成的人为灾害。

假若你用眼睛看、用手摸……你将发现,在实际上,所谓“文化”满不是妙笔上所生之花。

依据任何一种“哲学的造作”(philosophical pretension)为基本观点来谈“文化”都是一孔之见,必定走样。难道这样宽广的世界,无一处不能在哲学上中立(philosophically neutral)吗?纯数学家、纯物理学家、纯经济学家,在哲学上无所取舍,一点也无碍于其研究。不让自然及人理在哲学上中立,什么都要往其“体系”里“套”的“统统哲学”,是最富于侵略性的哲学。这种哲学,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叶盛行于德意志。其所造成的空气所孕育出来的实际辉煌果实,就是希特勒。其变种就是辩证唯物论。尽管饮惯了白开水的人看清楚了这杯酒有毒,但嗜酒如狂者因饮它得到快感而奉若酒之神(Bacchus)。此所以美国禁酒令之终于行不通也。这类问题,说来话长,只好慢慢谈,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吧!真正研究“文化”,不是从任何哲学观点与自族中心主义(酋长天然自族中心主义看)及单一元素入手,更非玄思默想所能为力,而必需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入手。文化人类学是有关人类文化之经验的研究。博物馆里所陈列的,正是文化的经验题材。

笔者所见的器物,就时间而论,从新石器时期以至于近代;就地域而论,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太平洋群岛,遍及天南地北。各种器物、宫室,陈列眼底。谁高谁下;谁的文明最先进,谁落后;什么人懂数学并能充分利用数学,什么人不懂或少懂数学;优劣之分,等第之差,一一呈现眼前,颇觉判然分明。其间的区别,较之作文章要具体多了。这个地球,原不是为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众造的。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你不必是世界的中心。如果每一部落出一个“民族哲学家”,每一部族都自认为宇宙的中心;那么除了永远自我封锁以外,谁也讨不到好处。

笔者所见的几个博物馆,其中动、植物之美妙、奇异、丰富,真足显示造物之妙。而矿物形态之千殊万别;色调之瑰丽,更非火所能想像。我们只能赞叹,吾人所在的这个宇宙,原来是这么美!内容原是如此之丰富。我想,即使是参观世界各地的大博物馆,已足消磨咱们半生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多美的事物供我们欣赏,开阔我们的心胸,陶冶我们的性灵。为什么,偏有人以把人当蟋蟀来斗为乐,偏有人以能把人编成火牛阵而感到舒畅。他们的天地未免太窄小了,他们应该暂时休息五分钟,环游世界各地,多多看看博物馆,广广心胸吧!人生几何?君不见,那些“大英雄”的头盔,已经发霉,陈列在博物馆静僻的角落?君不见,那什么“大帝”的杀人宝剑,早已生锈,躺在玻璃柜中,被参观的儿童们看作玩具?

有一种哲学家,把这个世界的历史看成道德实现之演程。然而,在事实上,过去人类历史中的支配因素,是有种种文饰或无种种文饰的生物学的力量之蠢动;到现在,加入一项新的因素,就是机器。我在这儿只是指陈事实,说不上悲观或乐观。“春蚕到死丝方尽”。种种怨毒之气不出尽,热能未消耗完尽,谁也阻止不了这些蠢动的。可怜的,是那些被拟似哲学的名词愚弄的多少无辜之人。想到这里,笔者欣羨斗蟋蟀之事。这可以满足许多人好斗的欲望。虽然,以蟋蟀作代用品,有点对蟋蟀不够忠厚;但是,物爱其类,我只有向蟋蟀道歉!何况,斗蟋蟀尚不至于需要求助于宇宙至小之核子儿!

唐人街*

笔者所见的唐人街只有两四处。因此,我的感想,也只系对这两四处而发。

一进唐人街,我立刻为一种绝望的心情所袭击;虽然,我并非多愁善感的诗人。一眼望去,破落、窄小、简陋的饮食店、洗衣作坊,夹杂在辉煌高大的美国建筑之间,这就是唐人街,显得多么尴尬!店里的人物呢?年老的,已经在六十左右了,带着一幅僵硬而少表情的脸,木然地站在柜子旁边。年轻的呢?已经满口英语,说华语远比英语困难。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娶了一位“唐人街之花”当太太。有一次我的这位朋友请他们夫妇俩吃饭,我也在座,满桌都是黄皮肤。但是,这位“唐人街之花”却不善操唐人语。为了敬重女客,举座都得操英语。其实,似乎所有年轻一辈的华侨都系如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此。老一辈的华侨为这种情形兴悲,说后一辈的人“两头不通风”。意即本国原有的语言文字教化一点也不懂;而美国的好东西也未学会。我看,这种感慨,只能表现老一辈人的“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无可奈何之情而已,却丝毫无补于事。仅仅为了一点情感的维系,哪里抵得住因事实上的需要或不需作所作的适应?

唐人街存在的最大的理由,如所周知,是“中国文化”里最值得夸耀的一部分——烹调。然而,实际的趋势何如呢?餐馆里的饰品,固然有字画、有龙凤;但是,桌椅是美国式的,碗盏是美货。唯一可说是“中国固有的”东西,只有炒菜。然而仔细一品,很显然已经不是“纯”中国味。无可抗拒地,多少也美国化了。这种餐馆里菜饭的价钱,通常比美国餐馆贵。美国是个高度竞争的国家。照常理而论,这样的餐馆,在美国餐馆林立之中,应该早已不存在了。然而,这些唐人餐馆虽然丝毫没有兴旺发达的迹象,但也能苟延残喘。这有几个理由:一、“唐人”刻苦耐劳,起早睡晚,人力成本低廉;二、有中国人要照顾;三、美国人好奇心重,少不了花点钱满足满足好奇心,尝尝异味;四、独特性(uniqueness)。美国人善造机器;可是对于烹调一事,只重营养,不重口味。唐人街的烹调术目前是唯有唐人获擅的手工业。本小利微,美国人注意不到这点生意。反正不大碍事的,美国人让你作个点缀好了。

“无源之水啊!”我一看见唐人街,不禁脱口而出。

学得的一点烹调老法,老的生活方式,没有源头,失去创造力,凭着一点敬祖的情感,凭着一点固执,怎样继续得下去?如何不叫下一代的人与他们脱离?

同时,这也是一个写照——最真实最具体不过的写照。在这现代文明(当然有它的毛病,笔者已经说过)之潮流里,一种失去适应环境和反应刺激的能力之生活方式,怎样继续得下去?“文化”

是生活之全部,是“主”、“客”、“内”、“外”,交织形成的一组生活形态;不是单独的观念,更非纸上谈兵。过去环境里产生的一组生活模式,怎能全部适用于一个新的环境?

反省吧!力竭声嘶是无济于事的。浮词夸大更无济于事。

华盛顿湖畔*

路过西雅图时，蒙朋友挽留，小住了几天。从人文地理的观点着眼，西雅图一带似不及东部的新英格兰。但是，从自然地理的观点着眼，笔者无宁喜欢西雅图。这里的风光实在美丽，物产丰饶，气候尤其合于观想。西雅图与哈尔滨同一纬度，四面高山，夏季犹积雪盈盈。照说应该很冷，其实不然。今年一月路过时，天气毫无肃杀气，与江南无异。今夏再过此地，气温经常在华氏七十余度。有一两天在华氏八十二度，当地住民已感“热不可支”，谓为数年来所未有者。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落日余辉里，群山映照，下有观林大海。壮丽、庄严、缈远，令人神驰！此情此景，差堪生息矣！

西雅图近郊有一大湖名华盛顿湖，汽车十五分钟可达。三面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环山,曲折有致。中有半岛深入湖心。自湖畔至半岛,建有市立公园。山腰水涯,筑有敞屋;屋内设有炉灶,炉旁有大堆木柴。游客野餐烤面包及煮咖啡,可以随意取用,不花分文。古木参天,湖水浩茫,置身其中,可以暂忘扰攘之世界与忧烦之人生。

笔者游览华盛顿湖的时候,正值周末。市民纷纷来这里度其一周一度的周末,松弛一下周末紧张的生活。然而,美国人毕竟不能全然松弛下来。湖中有汽艇。游艇的人,开足马力,让汽艇在湖中以高速行驶。速度之大,不亚于美国汽车在公路上以高速奔驰,掀浪翻天。又有的青年,以滑板系于艇尾。常于游艇行驰正速之际,忽解缆向岸边滑进,表演惊险镜头。

从观察穿着的色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社群的人之心性。美国人的色调感与西欧人的色调感,多少有所不同。西欧人的一般穿着,多属寒性调和。古老的社群,常系如此。美国人的心性年轻,喜欢刺激、热闹,爱引起人注目,因而穿着之色调,多属热性调和。他们许多老太婆的衣着,拿到中国来,恐怕少女也难以穿出去。然而,美国老太婆穿大花、大红、大绿的鲜艳衣着,招摇过市,则是常事。这一个周末,一眼望去,真是到处红男绿女,徜徉湖滨;或吃冰淇淋、或运动、或玩纸牌……尽情享受人生。

笔者虽然杂坐人群,像也是来度周末的。可是,我的心却远离这群人,别有所思。我感到十分孤独,万分怆然。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了解他们的生活原则,但我却并不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当然,从我的生活观看来,美国人的生活格调,一般而论,实在不算高。然而,就人之所以为人之必需条件而论,美国人大体满足了;只是有待向上提升与增进罢了。与大部分东方人目前的处境相对待而论,目睹湖畔风光的笔者,无宁艳羨他们之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尤其艳羨他们是为他们自己而活着:他们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打算,各

人有各人自己的目的。他们活着,并非为了实现什么“国家目的”、“民族目的”,更非被迫为了实现什么“历史使命”,或“党派目的”。

近若干年的血泪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群体里的人,如被迫或被骗不能有他个人的目的,而只能有“党派目的”,或作什么“实现历史使命”之工具;那么,这个群体里的人,笔底下,无论怎样“光荣伟大”,而在实际上,是悲惨的。

我这样说,并不意含,在逻辑上,任何个人与其他的人不可能具有与大家共同的目标或采取共同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之下,这都是必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未尝不一致抗德。[……]但是,千万别要忘记,这些事例,都需由一个一个的人出发,藉群体组织作手段,然后再回到一个一个的个人。这期间,本末先后是必须弄清楚的。如果由任何形态的群体出发,藉群体组织作手段,再回到神话化了的群体,则个人所得者,在最可喜的情形之下,不过一只肥皂泡而已。提升个人才是生命的实体。否定了这个实体,我们还有什么?

其实,以上所说的,相对于民主国邦而言,完完全全是废话。因为,民主国邦,群体的代表者隶属于个体,所以根本不会发生上述的问题。发生上述问题的,压根儿就不是民主国邦。聪明的读者,我无意于把我个人的“孤愤之气”播散给大家的。我寄望于大家的,是别在金钱的打算上像个中年人,而在思想上像个幼稚园的学生,专爱听美丽的童话。我们须从近若干年流行的思想瘟疫里摆脱出来,两眼看清事实,从经验基础上来了解这个世界,明白事理,再决定行为方向。

和尚读逻辑*

笔者到达某校之初,见有若干黑衣白领的和尚,出出进进于爱默逊堂(Emerson Hall)。笔者起初以为,和尚与逻辑有什么相干,他们来此,不过是震于某某大教授之大名,来听听玩玩而已,并非认真搞这一门的。嘿!为时稍久,经验事实逼着我修正这一看法。这些和尚之有恒与勤学,使我觉得惭愧。他们之来此,是认真地为着学问。后来,在某一个社交场合,有安多夫神学院某位教授,满口的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卡勒·莫里斯、苏三·朗额等等,很引起笔者注意。再一询问,他说他在安多夫神学院教语意学。哦!这就奇了!我问他为什么在神学院教这样一门功课。因为,照我们想来,这样一门功课,与神学是毫不相干的。“不!”他很认真地说:“自从维也纳学派兴起后,它严重地打击着形上学,其中有人甚至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于根本否认形上学。形上学是哲学中多么重要的一个部门。先生！你教哲学的人，你说是不是？形上学不能讲，那么‘存在’(being)也不能讲；存在不能讲，他们只能讲知识学。但是，天下哪有不假定形上学的知识学？维也纳学派的若干人，口称消解形上学；但是，他们在谈知识学时，又暗中把他们所否认的形上学夹带进来了。你说对不对？关于这方面的道理，近来波格曼(Gustav Bergmann)教授讲的很深入。你总见到他的著作吧！”“见过的，此人是从这一路起家的，现在又严重地批导这一路，他大谈其逻辑经验论之形上学。此人真是近来哲学思想界的一个怪杰。……不过，”笔者笑着说：“你所说的那种猛勇的维也纳学派似乎已经过去了，已成历史陈迹了吧！是不是？……你还没有把为什么要到神学院教语意学的原因告诉我；我对于这一点倒很有兴趣。”

“是的，”他接着说：“这也是由维也纳学派刺激起来的。无论他们对形上学的攻击适当与否，我们觉得他们的刺激和批评是应予重视的。如果形上学和神学有真的要素在，而不都是些虚拟问题(Pseudo-problems)，那么我们也大可不必像中世纪僧侣对待异端的态度；我们应该趁此机会，自我检讨，刷新我们的信念。无论怎样，维也纳学派兴起以后所刺激起来的研究，在语言层次上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衣服穿久了要破。语言用久了，会走样，寄生物也会多起来。凡自然语言，无论是英、德、法，或贵国的文字，都免不了这种结果。人是有许多限制的，语言便是限制之一。语言既有这些毛病，当然难免衍生一些虚拟问题。到了这一步，我们是不拒绝洗刷工人来洗刷洗刷的。……所以，我总是教我的学生，愈是弄神学，愈得把语意弄清楚。”

听了这一席话，在一个寒冷的黑夜，我一个人走回寓所，心里想：“西方的心性毕竟是西方的心性。这就是开放的心(open -

mind)。”这与咱们东方人的心性相隔太远了。东方有许多弄哲学的人,只要是稍微有几岁的,碰到近几年来这些东西,明明是因其复杂苛烦而格格不入,便把手一摇,眼一闭:“这是另一派,末艺!”百事大吉。这种办法,确乎可以自我安慰,可惜世界不跟着他们走。他们厌恶这个新变的世界,这个新变的世界却把他们丢在老后头了!

基本假设*

聪明的读者,请你留意,我现在没有提出任一基本假设,而是“论及”基本假设。人底脑筋真是神妙之至。人脑的计算功能,是诺伊玛(Von Neumann)这样的数学家设计的电脑所能代替的。而且,一点也不假,诺伊玛以来发展的电脑之计算功能,比人脑好得多。人脑计算底速度,远不及电脑,人下棋就下不过电脑。可以想像得到,再不用过太多的年月,像吴清源这样的“大国手”,下围棋准敌不过一部电脑。复次,人底计算会错,电脑不会错;人常会忘事,电脑不会忘事。因此,在机器第一的美国,许多人著书立说,大肆宣传,好像寄无穷希望于电脑。我们可以承认电脑有其功用,但是,我们却无法想像电脑可以代替人脑。电脑无论怎样有用,它毕竟只是一部高等计算机而已。人脑有一部分是发生机械作用的,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这一部分工作,电脑很可能比人脑有效率。但是,人脑最重要的功能,情感、意志、意识之流,不是机械工程专家所设计得出的。人脑里奇妙的东西多着哩!所谓基本假设,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电脑里没有的。

基本假设对我们底思维有决导作用,它常是我们思维底出发点。但是,它有一特点,就是“提”不得。谁要是有意去“提及”它,它马上就失去原来隐伏的决导作用,不复成其为基本假设,而成为推理历程的前设。凡属稍有思想工作经验的人,都可了解这一点。基本假设之一经有意“提及”而失其原有作用,正如暗影之不能拿灯来照相似。谁个聪明人想拿着灯来寻求暗影,他将永远失望。

那些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来生活的人,不会捕这种风、捉这种影的。但是,古往今来,多少大哲学的思想家,为了大家不经意的“基本假设”问题,伤透了脑筋。到今天,真懂问题的思想家,谁都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搞穿了头。当然,相对的明白是可致的;绝对的明白则尚未可致。个人脑中有限数目的基本假设,凭着长期思想上的训练和努力,可以发现若干,并且淘除若干。但是,一个社群、一个民族、一个国邦或一群在历史某一阶段的人,他们底意识生活,不能不共同在某一或某些基本假设之中。没有这样的基本假设,大家不能在一块生活下去,也不知怎样相处。有了这样的基本假设,大家相忘于无形,依之行之而不知之,视若故常。这个“之”究竟是什么呢?在局内的人很少发生这样的问题。在海水中生长的鱼绝不会发生海水究竟是咸是淡的问题。它是一阵笼罩着每一个人的空气,大家呼吸就是了。除了某种哲学家以外,很少人再去问这空气之厚薄。然而,不幸得很,这样不为大家所注意的东西,却是对大家最有影响的东西。大家生活在好的基本假设里就幸福;不然,就痛苦。这个东西就有这么铁硬,唯心论者把它叫

做“心”，我们可以不那么叫。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鲍艾尔(Beuer)最近著了一本书,叫做《苏俄心理学之下的新人民》。他在这部书的前言里,一开头便说:“在苏俄,有一个基本公理,即是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笔者一看这句话,真是触目惊心。我这几年来的痛苦经验,使我太有资格了解这句话所指的实际内容了。在这类地区,每一个被治者都被看作是一个可能的贼。我们不难亲身经历到,许多人仅仅为了草上露水似的一点点人事纠纷,把大群大群的无辜者当作可能的敌人。他们有数不尽的看不见的绳索捆绑在身;他们被迫着随时随地服罪;人底尊严抵不过纸条子底尊严。眼光、脸上的表情,是最具体的语言。你不难想像,在苏俄这类地区,街头穿制服的,对每一个行人,被训练得虎视眈眈,好像随时准备攫取猎物。说人性是“善”的,人有“仁”根,而这仁根就藏在每个人“心”里。这些话,到了二十世纪,被[……]希特勒这些训练大师打得粉碎。说这类话的人,忘记或忽略了,人之为善,大部分是教育的结果。“满街都是圣人”,这句名言说了好多好多年了;然而,遇到“东厂”、“西厂”,却变成“满街都是贼”。没有一种良好而且适当的制度来保障,来器化(implement),一切的“善”至多只是美丽的晚霞而已。这个问题,到了技术高度发达的现在,更显得十分紧急。奈何一味在字句上作功夫的人,不正视这类铁硬而令人窒息的事实?起码起码,我们要与大家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外在世界”里,然后才有同情心可以实现。

自由民主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自由民主的国邦,至少就笔者随时随地体察所得,是假定每个人都可信赖的。“物质文明”(这个名词根本不通,但是大家用惯了,我只好暂且借用。不过,照我用来,丝毫没有与所谓“精神”对立之意,我只是用来表示某一组

事实而已。)诚然有许多令人舒适之处;可是,我无宁更艳羨“被信赖”的这点“精神享受”。泡在春水里的鱼儿,不知春水之乐;同样,被人信赖,亦非美国人彼此之间之所自觉者。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以此习为故常,已经把这一点基本地假定了(take for granted)。他们美国人自己不觉得。但像我这个饱受精神虐待的东方人一看就立刻明白。有一次,我告诉一位美国朋友:“你们享的福真多!”他马上回答:“是的,我们在科学的享受方面比东方人多。我们有的是汽车、冰箱、电视、……。不过,这是自爱迪生以来长期努力的结果;同时,我们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动乱。”“不是这个意思,”我连忙摇头:“这些东西,有了固然也好,但对我底吸引力不大。我最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人相处时的那点基本态度。”“什么?”他莫名其妙。“也许你不会注意到,你一天到晚搞你底电工程机学去了。我说的一点,就是你们人与人打交道时,彼此都假定对方是可信赖的。”“哦!”他若有所思,“……但是我们也有行骗的人哩!”“这个我知道的。但是,少数人破坏不了大的趋势,太多了当然不行。”在美国,杀人越货的事,数见不鲜;受某种电影暗示,家世很好的儿童行劫,这是常事。不过,这些事件,并没有基本地动摇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心理。报纸箱满街都是,没有人看管,你丢五分钱拿着走就是了。你到百货商店、食品店买东西,自己拿,然后自动拿到柜台结账。荣誉制度,依然相当地维持着。当然美国的许多光景,西欧来的人是看不惯的。不过,天下事的分别,常是程度的分别。在我们从癌症边沿来的人看来,觉得美国这样,已经可以活人了。

你在学校附近餐厅吃饭的话,不难看见十几岁的学生吃完,拿起笔在纸上开支票,掌柜的没有怀疑他是在开玩笑。这类事太寻常了。笔者到任何场合,只要口头说明身份,没有人不相信的,谁都没有向我索阅证明文件。笔者有一次拿一个支票到银行兑现,

那张支票对于银行职员实在太异样了。我说明来历,终于照兑了。我在肤色相同的地方,是受不到这种信任的。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信赖的破产,原因当然很复杂;不过,治理机构如果抓紧这一点作统治资本,使大家互相猜忌,其结果只有使不信赖更加扩大与深刻化而已。当人不被信赖时,意即他不受到尊重。当人不受到尊重时,生活也就意兴索然了。

我们守住哪一层楼？*

以自身的兽性为儿戏者

必将沦为禽兽。

以虚伪为儿戏者

必将丧失获得真理的权利。

以残酷为儿戏者

必将丧失心神的敏感。

——达格哈玛绍

(Dag Hammarskjöld)

我现在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全世界目前大部分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之发生，乃世界动乱之大根源，尤其是中国动乱之根源。这个问题又关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系乎任何一个人立身作人的成败。我被这个问题困恼了许久。现在,我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大家切实想想。

无论中外,文化发展到各自的中世纪型式时,宗教乘伦范乘道德而建立起来的人理上的是非、善恶、以及荣辱的轮廓都是相当清晰的。无论怎样,在那种型式里,是非可以成为社会制裁(social sanction)的一种力量。善恶不容混淆。恶人不容易假借善之名以行恶。荣辱之别也颇为分明。很少有人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明明是可耻的事当做一件光荣的事来正式办理。在那种型式里,无论好坏,大致说来一般人是生活在人理井然的价值秩序里。孔制之下的中国是如此;基督教之下的欧洲是如此;伊斯兰圣律支配之下的回教地区也是如此。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已置身于一个人理模糊的时代。在目前的这个时代,是非的界线不明了,善恶常常易位,荣辱往往倒置。是,常常被弄成非,而非倒取得主宰的地位。善的隐退,恶的变成司命之神。可荣的实际常是可辱的;可辱的则常实在是可荣的。同样,真正的伟大消失不见;渺小的倒是打扮得很伟大。[……]乐户的主人可以变成正人君子。数不尽的巧伪啊?

人类经历了两次大战。宗教、伦理、道德都还没有随战争以俱去;可是却走了样、变了味。教会成了青年会,伦理成了褪了色的抽象画,道德成了虚饰的修辞学。于是,任何反道德的人可以篡夺道德,任何恶行的人可以看来像圣人。这么一来,谁还愿为道德价值而牺牲呢?谁还顾到化理准则呢?

我们已经失去生活的原理了。然而,我们是生物。我们不能不活下去。失去生活原理的生活,就是受生物逻辑支配的生活。我们要活下去,还要求出路,更不能不“应付环境”。我们不能讲求品质,不能讲求格调,更不能坚持理想。我们只能作极窄狭的“边

际分别”(marginal differentiation)。我们常常只徘徊于“有”与“无”之间。我们不能在“有”与“更好”和“最好”之间作选择。

我们被安排在统计表中去铺张别人的成绩展览。这里只有数字,没有光、热、力,更找不到个体生命的特殊发煌。我们的心智若明若灭。我们的良知若存若亡。我们的判断若对若错。我们的感情要往内里压缩,但同时又得对外迎合。闷塞啊!不通畅啊!我们的心并非真正冰冷,但却也热不起来。我们读书、走路、谈笑,似乎与希腊人无殊;可是我们感到总是缺乏一点维生素。我们也常咒诅邪恶,但内心并不刺痛。我们也常想追求高峰上的真理,但又怕山路崎岖难达。我们向往光明,但又缺乏殉道者的勇毅。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所发生的动力,大大小小的战争,各种台风式的意底牢冲斗(ideological combat),辐辏成种种形式的权力争夺。十九世纪维多利亚式的乐观色彩离我们远了。在权力争夺的主调推动之下,几乎每个人都被编入争夺的队伍。我们的灵魂也许在印度圣山之巅,也许在太平洋之滨,也许在古长城上漫游。然而,谁要我们的灵魂呢?我们的灵魂一落人尘埃,便被机器轧掉了,便被公文程式刷掉了,便被巨灵(Leviathan)吞噬了。这个时代所需要于我们的是我们一堆一堆的细胞,一堆一堆的肉;灵魂是多余的,甚至是碍事的。这个时代要把我们塑成只会立即直接反应的呼吸机。这个时代要配给我们每个人一式一律的基本价值观念,一式一律的人生目的和一式一律的历史性的世界观。我们从里到外,从观念活动到肌肉活动,必须毫无保留地投掷到那些浪费性的空大目标上。然后,我们所得到的,是整齐划一的鼓舞辞令和拍空气的掌声。啊!我们在喧闹中多寂寞!多凄凉!

实在,这是对“人性”之史无前例的总挑战。于是,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如果我们要求动物性的生存,那么就得牺牲崇高的

理想,牺牲纯洁的心志,牺牲道德价值和做人的原则。如果我们要保持崇高的理想,保持纯洁的心志,保持道德价值和做人的原则,那么就难以活下去。这种情形正好是古人所说的“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怎样的抉择呢?是“舍生而取义”?还是“舍义而取生”?

义利之辨,人禽之分,就在这里。

这个“动物性的生活”及“道德理想性的生活”之选择的问题,也就是“怎样才算是人的生活”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误会,那么我们自然会承认人的生活必须满足动物性的生活层次。如果动物性的生活层次不能满足,那么道德理想性的生活便根本谈不到。这好像建造楼房。如果第一层楼没有建造起来,那么上而的第二层楼就无从建立。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如果人的动物性的生活满足了,那么是否就算是过着古往今来人类文化意识中的“人的生活”?复次,别的动物要满足动物性的生活,在程序上毫无道德规范可言。口咬、爪抓、抢夺、偷窃都行。人要满足他穿衣、吃饭、坐汽车等动物性的生活,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呢?问题逼到这一步,严重的考验又临头:我们“不择手段”就可得到。那么,我们是择手段还是不择手段?

为了易于说明起见,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extreme case)。兹假定如苏俄所曾常有的事:有人要你出售你的师友或弟兄。对于这宗交易,你可以处在三种情况之下。第一,你本来丰衣足食,但想得到某些便利或高官厚禄。你出售他们便轻易得到,否则得不到。第二,你的物质生活处于困境。你出售他们便可因获金钱酬报而轻易解决这种困难。你不出售他们的话,便得继续在生活的困苦中挣扎。第三,你处于某种性质的危险之中。如果你出售他们,那么这种危险就解除。不然的话,危险的阴影成天笼罩着你的

神经。就距离生物逻辑而言,这三种情形的“梯次”不同,一层比一层紧,因此你的“道德人格”一步紧一步地受到考验。这又有点像跳高栏。你如果有“道德的真我”在心中作主的话,那么你是否一栏接着一栏地跳过?

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文化崩解中受断丧得最惨苦但却不易被一般人察觉的就是道德和真诚。这几十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心中充满了道德和真诚的人最容易被鼓动起来粉骨以“救斯民于水火”。昔至今,任何巨大规模的权力争夺一定要能动员若干精干分子(elite)的道德力和掀起广大人众的同情。这样才制造得出荡决的力量;否则不能。但是,这类壮观的变动,等到事后回头一看,雨过天青,智者往往看出不过是病态心理的杰作,时代苦痛的结症。如果那是病症,那么便不是动手动脚所能医好的。病人动手动脚,恐怕只有使病更深。要治好病,只有诉诸科学和技术。波柏尔(Karl Popper)说:“凡人都有错,大人物有大错。”

我们不难看出,那些制造历史上壮观镜头的“时代先驱”们要能发动并利用一个时代长期培养出来的道德累积才较有希望在权力的角逐场上致胜,否则较少希望。而且即令致胜了,事后证明是得不偿失的。于是,“时代先驱”们就面临一个重大的考验:发动并且利用广大人众的道德和真诚呢,还是不去发动并且利用?能作这种决定的,不是天使,就是魔鬼。

就个人来说,所含道理在基本结构上与前面所说完全一样。兹假定一个人生于太平治世并且因受良好的人理教育而有了相当的道德修养、纯洁的心志和高尚的情操。可是,当他到了中年,忽遭逢巨大的社会文化突变,在这一突变里,道德价值破产了,伦理荡然无存。美感低落了,代替的是凄厉的号角声。讲品格,成为嘲笑的资料。说真话,是到坟场之路。讲义气,正好被人当做傻子。

说谎,变成比呼吸新鲜空气一样轻松的事。投机取巧,成为生存的正常途径。讲气节,只有与饿鬼为邻。重理想,必须与幽灵为伍。置身此情此境,这位先生怎样选择?如果他坚持道德价值和崇高理想,那么他难以活下去。如果他要活下去,那么他就不能不放弃道德价值和崇高理想。可是,放弃了这一些,即令他能活着,也不过像猪似的活着。然则如之何?

时至今日,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碰到这个躲不开的问题。我们究竟守住哪一层楼方不负此生?

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

我之被迫离开台湾大学,从一衍发的观点看,总有二十年的历史。如许多知识分子所知,我不接受共产制度,尤其不接受共产型模的思想。我之所以这样,系从自由、真理、人道主义出发的。而这些东西,照我看来,是人类普遍需要的。依此,我不从任何一个人及任何一个党同任何一个政权的现实得失利害来考虑共产主义问题。同时,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局部权势的观点出发会看得清共产主义的问题,而且会有前途的。我也找不出任何理由要任何一个人反对原版的共产主义但却乖乖地拥抱它的翻版。二十年来,

* 原载《殷海光全集》第9卷,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

我的这一思想一天一天的在发展,并且愈来愈清楚,愈来愈精炼。二十年来,我本着这一思想路线发言和著作。显然,这是藉“反共”和“反攻”来维持残余权势的集团所不能容忍的。这是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基本原因。

十八年来,从中国大地逃到台湾岛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被摧残得所余无几了。我这样的一二人之被清除,乃是“事有必至”的。问题只在等待机会。

二

一九六〇年英国伦敦出版了《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该刊中易社强(John Israel)有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有论及本人处,大意是说我学崇罗素,隐然推我为此间自由主义思想的领袖。这篇文章触怒中央研究院徐高阮君。他说易社强的文章错误,殷某在实际上是一专断分子,没有学术真诚,系一诈欺分子,并为一政治煽动者,他写的东西只合于在集中营阅读。徐君这一举动,我觉得大出常理。如果徐君认为易社强所说不合事实,那么他尽可写信到伦敦《中国季刊》申述所见。他这样的声明,尽管不合事实,但就办事程序来说总是对的。然而,徐君不这样做,却径直辱骂被报导的人。天下尚有此理乎?

徐君这篇发难的文字,载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出版的《中华杂志》。当我一看见这篇作品的时候,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学术思想其名而政治其实的事件,于是决心置之不理。我知徐君在一·二九左派学生运动中是一个重要的领导分子。他后来脱离左派阵营;到台湾以后,十几年毫无学问上的贡献,寂寞不堪。以徐君这样背景的人物,置身今日的台湾,亟思有以自效,来医治潜意识里的恐

惧并打破寂寞,这是无待弗洛伊德(S. Freud)来分析就可明白的。因此,我保持沉默。在这一期间,这儿有所谓“文化论战”。在论战中,胡秋原君知识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乱,被我的一群学生指破。尤其是他参加“闽变”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这一下使他的名流声威扫地。他痛心疾首之余,认为系我在背后策动,于是在《中华杂志》上参加徐君对我的围攻。这二位先生的言论,充满对我的污蔑、毒骂及构陷,但却俨然为学术尊严及自由民主和反共爱国而仗义直言。标榜历史文化儒家道德的某君,则从旁助威。对于这一切,我依然保持沉默。岂知我愈是沉默,他们愈是生气,愈是提高毒骂的阶梯。这一阵狂流,滋生出一些出版物,纷纷以构陷殷海光为赚钱并耸人听闻的法门。现在流行于台湾的这类出版物计有:侯立朝著《文星集团往哪里去?》、《新语》、《现代》等等。这些出版物的基调几乎完全来自胡、徐二君:(一)殷海光是反民族、反传统的毒素思想的泉源;(二)殷系一伪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一政治煽动者和投机政客;(三)殷系一文字卖国者;(四)殷系一知识诈欺者;(五)殷某从事煽动颠覆;(六)费正清(J. K. Fairbank)勾结毛泽东,殷海光勾结费正清,结论不言而喻了。

他们拿出红帽子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许多朋友和学生为我捏一把冷汗。我还是保持缄默。使们之欲假官势以陷我于死地,这是太明显了。可是,我有我的想法:古往今来,凡假借官势来陷害知识分子的无一不是小人。我跟小人有什么可说呢?他们大不了使我坐牢,家破人亡。在这一方面,我是一个弱者。但是,这一套办法,却消灭不了我的道理。想到这儿,我的心反而静下来,等待命运的安排。胡君见文字构陷的目标未达,一不做二不休,六月公然行文到台湾大学钱校长,谓殷某不学无术,不配做教授,应请改聘,或改任职员。哲学系主任洪耀勋将胡君这一函件转给我

看。我一过目,微笑道:“这从何说起呢?”他说:“那就不理他好了!”

这般子文人这样肆无忌惮,许多人说是由某党策动的。但无证据足以证明彼等之所为系直接由某党所策动。不过,问题的实质并不在此。少数文人对一个大学教师连续毒骂并倾陷达三年之久,无人稍予纠正。且诉之法律一定无效。人的名誉毫无保障,甚至人的尊严和安全都被逼到剃刀边沿。这种情形,滋蔓于今日的台湾。而今日的台湾环境之造成,则无疑是某党。且这少数文人在有利于他们的环境里藉文字形成的对我不利的空气,又转而被某党利用,成为对我的压力。

三

六月份是这里申请“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的时候。这每月六十美元的补助,恰为我过一最低生活的费用之一半。我必需靠这一半,所以每年申请。今年胡君等一再在《中华杂志》发表言论,指明我不配得这笔钱。六月初毛子水先生来舍,转告钱校长的意思。他说:“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在某党中常会上,遭张其昀当众大骂,说他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办得一团糟。讲三民主义的学者总是请不着补助金。像殷海光这样专门攻击政府的人却年年请到。这事使王院长为难。为了朋友面子好看,钱校长示意,希望你自动撤回申请。你的意思怎样?”我苦笑答道:“我实在没有兴趣跟这些人闹,我也没有时间跟他们闹。我的经济情形,您是清楚的。我之所以申请补助金,主要的原因是此外别无办法。……我很明白,现在某党这样对付我,是要逐步断我生路。……不过,既然如此,为了不使大家为难,我只好退让,牺牲自

己。”六月十四日，我去函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声明撤消申请补助金。就这样，我放弃了最低生活费用的一半。

四

今年春季台北文星书店在改组的烟幕之下遭整肃。七月下旬萧孟能君来告，我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被查禁，并转来查禁令一纸。见后面所列的：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函)

传递法	最速件	保密区分	保存年限
受文者	台湾省警务处		该部
分行及副本送达单位			大印
<p>主旨： 查台北市文星书店发行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上下册)一种，该书内容反对传统文化精神，破坏社会伦常观念，足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违反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六款之规定，依同办法第七条之规定应予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p> <p style="text-align: right;">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 陈大庆</p>			

本年上学期末，各校发现一种宣言，不知是哪儿来的。宣言的内容主要的是批驳费正清等在美国国会证词，说他们“助匪”、“犯

罪”。照我看来,这篇文章可算官方雇用文人的写作精华。彼等立论,完全是从一个政权的利益出发,罔顾世界大势。其实,费正清等人的言论,意在保全台湾。台湾这个小岛,若不是美国第七舰队保卫,恐怕早在一九五〇年便陷共了,还有什么“反攻”空话可说?复次,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签名”,实际则为“忠贞检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的人面对这一签名运动心里都有数,如不签名将被疑为不忠于某党政权。这样的人将蒙种种不便,甚至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在台湾这种形态的绝对主义的统治之下,谁不怕麻烦?在台湾这个饭碗难找的岛上,谁不怕打破饭碗?于是而有一千四百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盛举。我因为一方面认为那一宣言的内容幼稚可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恶那种“间接强迫”的[……]作风,所以拒绝签名。后来校方一高级党务人员亲自来舍劝签,仍然被我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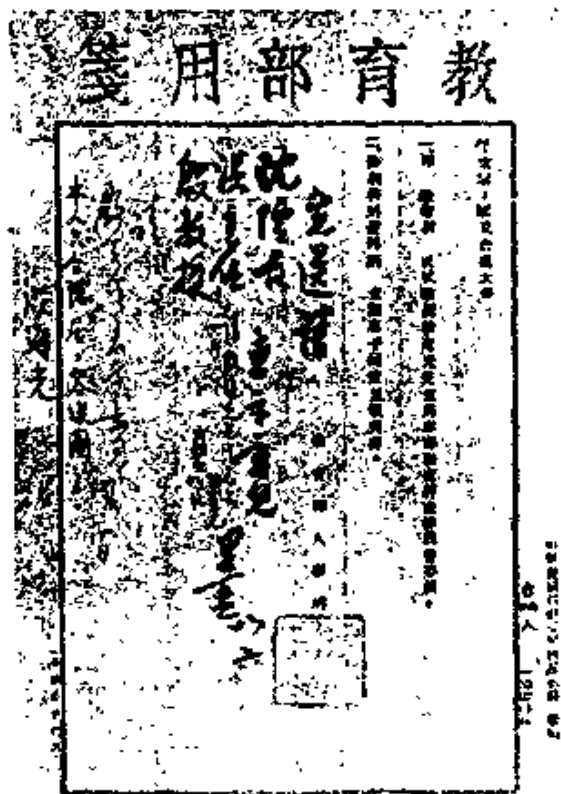
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五

八月七日下午两点多,哲学系主任来舍说:“教育部来了一个公事,要借聘你到教育部去任职。这是怎么回事?还能不能继续教课?”我想了一会儿,对他说:“这是调虎高山,不要我在台湾大学待下去,尤其是要我和青年知识分子隔绝。”洪问:“那么不去好不好?”我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八月九日,校方转来教育部的公文一纸。见后面的照片:

妙文就在“聘书另发”一点。而且,个中奇妙,非亲身经历的人不能想像。

八月十二日上午八时半,突有人敲门。我去开门,看见一陌生



人,年岁在五十左右,手中拿着一封信,说某总部某处长请殷先生,状颇紧急。他说的时候,将信在空中幌了一下。我一看那信确实是给我的。但他又说:“这封信必须带回去。”我当时没有悟过来,为什么写给我的信又须带回去。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怕留证据在我手里,证明他们作了黑事。我对那个来说:“哦!好!让我去穿衣。”穿好衣,我随他出门。内人一点也不知道。我看见巷口又有一人,旁停一大黑汽车,车内有一司机。我觉得这种形势不妙,但只得跟着他们上车。约十分钟后,车开进一铁刺网并有持枪刺守卫的大门内才下车。下车时我瞥见院内观者颇众。因为这里是关重政治犯的机关。我被导入一间屋子,坐了一会儿,主事官

员三人出见，七扯八拉的盘问了许多话。之后，其中一人说：“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教育部来一聘书，请你到那边去任职。”他一边说一边把聘书放在我面前。我看见这种光景，大为骇异。心里想：“怎么教育部文机关的堂堂聘书要在对付政治犯的武机关来发？”当时的气氛和暗示，显然是告诉我，如果不接受这张聘书，便休想回家。可是，我的义愤使我产生了勇气。我对那张聘书正眼也不看一下。我正色告诉那些官员说：“今天的事，我纵然不公开说出，难保不被外间知道。我这个人，一举一动，都是有人注意的。[……]如果今天的事被外面知道了，说台湾学大陆，也整肃起知识分子来，从殷海光开刀，这是对大家都不利的。”接着我又说：“……我并非对在台湾大学教书有那么高的兴趣。我老早想离开这里，到别处谋生，只是一时不得其便罢了。……我看今年在台湾大学拖过去算了，大家脸面好看些。”那几位官员似被说服；由一位高级安全人员送我回家。礼貌还算不错。

六

我以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詎知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许，某总部安全人员来舍。他说了一阵子话以后，又把张聘书从衣袋内掏出，说：“殷先生前次忘记拿这张聘书，我现在送来了。”我看见他搞这种小花样，心中颇为不耐，就直率问他：“你们究竟要怎样？请打开窗子说亮话。”他答道：“政府要你和台湾大学一刀两断，完全脱离关系。”我认为他们说话翻悔，心中颇为愤然：“既然如此，何必弄得这么紧张？我殷海光岂是恋栈的人？”我说着，又拿出致钱校长的信给他看。我又告诉他：“我已和钱校长约好明天见面，商量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求把我给钱校长的信之副本拿回去。

我说：“这样也好，你拿去好覆命。”他似乎满意，拿着副本走了。我实在不愿多啰嗦，但求越早把这一事了结越好。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我依约到钱校长家。双方议定课表照帖，但终止上课，到明年（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七月我与台大的一切形式关系自动消失。所以，造成我挂牌而未上课和名义上是台湾大学的教授而实际上已经不是的奇特现象。这一现象也可以使我们明白，今日台湾真正的内情很不容易从表面看清楚。那些“政治观光客”所写的报道，在身处这一岛上的明眼人看来，很少不是可笑的。

同钱校长作了上述协议以后，我以为这件事可告一段落了。哪里知道九月初的某一天（确定的日子忘记了）上午十点多，某党工作人员二名来舍。年岁较大的一位说：“我们是来给殷先生帮助的。”我心里想：你们这些人指使秘密警察把我逼出台湾大学，现在又来拍一下，未免太阴险了。我同你们有什么好谈呢？因此，我只淡淡的说：“我不需要什么帮助。”他又提到那张聘书：“殷先生为什么那样坚持不接受教育部的聘书？何必呢？一位有名的国立大学教授到教育部任职，有何不可？”强硬的方式失败了，他们又用劝说的方式。他们之所以不惜使用一切手段要我接受那张聘书，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们你恶霸一样，强暴了女人，又要受害人自己代他们掩饰。在我，打破饭碗只得由你们去，但是这个忙我却不帮。我不帮这个忙，他们便不能做得“天衣无缝”。所以，他们念念不忘那张聘书，千方百计要我接受。

过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年长的一位说另外有事，起身告辞，留下那位比较年轻些的继续和我谈。他还是劝我进教育部：“殷先生，你进了教育部，我们把你捧成国际名人，政府还要借重你的。”我告诉他：“谢谢，我不需要这些。我只想隐住读书。”他说：“现在

台湾,怎能隐住?没有话讲,咱们只有一条心,为反共复国而贡献力量。”我一听到这套欺骗人的真诚的空话,不禁怒不可遏。忽然猛击茶几,厉声说道:“还谈这一套做什么?难道我还不不懂?你们对付一个文人,不惜动员党、政、军。这就是反共复国工作吗?你们反什么共?〔……〕你们复什么国?不过是想复政权罢了!”我说着忽然站起来,又猛拍桌子两下:“你们所优为之事,无非是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正在这个时候,内人以为出了什么祸事,从隔壁房里冲出来,泪流满面,对那位党工说:“你们简直欺人太甚!”那位党工弄的颇窘。我连忙说:“让我来和这位先生谈好了,你请进。”我把她扶进房里。内人是一位极善良的女性,从未过问外事。这次因觉我太受委屈,所以情急出此。那位党工见我余怒未熄,说:“想不到殷先生四十多岁的人火气还这样大。”我正色告诉他:“我敢拿生命打赌,我不会接受那张聘书,我也不会去做官。”彼不得要领而去。直到目前为止,党方再没有人来过。

七

九月二十号海耶克(F. Hayek)教授来到台湾。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安排一个座谈会,约我参加,预定二十二号下午举行。二十一日下午四点二十分,某总部该安全人员来舍,问:“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你认识吗?”我答称:“见过一面,但并不熟。”他又问:“海耶克你认识吗?”我告诉他:“海耶克上次来台时,我们聚谈过一次。”他又问:“你有没有收到土地银行的开会通知?”我答:“现在还没有收到。”(会期过后才收到。)他说:“请你不要去开会。”骤然听到这话,我不禁大怒。但我极力抑制自己,问他:“这是谁的意思?”他说:“政府的意思。”我就有些按捺不住了,告诉他:“我这人不爱外

出,不爱到热闹场所去。可是,我有外出的权利。这是基本人权呀!任何人不能剥夺的。[……]”他根本不理这一套,只说:“我是奉命行事。”我送他出门时,见一便衣在巷口。

同一天晚八点半,历史系许倬云来访,说:“海耶克教授住在统一饭店,约殷先生往谈。请定一个时间。”我就把今天下午所发生的事情之经过告诉他,并问:“像这种光景,你看能不能去?”于是,约谈的事被打消了。

八

从七月开始,我住巷口就有一二便衣守候,夜间作纳凉状。我起先不知道,日子久了就察觉了。我外出时,也有时尾随。这种监护,到九月底才撤消。可是,逢着节日就出现。十月十日巷口有人。十月二十五日光复节有人坐在巷口榕树底下看报,十月三十一日,这里万岁万寿又有人守候巷口。自此以后,我再没有看见过。这种情形,附近居民有知道的。我住的围墙比较一般的高些。这一带熟识的知识分子戏呼我住的墙为“柏林围墙”。现在,围墙附近更清冷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殷海光

我们的教育*

今日的问题 13

近八九年来,台湾在某些方面有若干进步。邮政是显著的实例。可是,在另外某些方面则有实质的退步,教育则是显著的实例。今日台湾的教育,仔细观察,不仅不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满清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则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的社会”之途迈进。大致说来,这几年台湾教育的退步,至少退步了五十年,这就等于说,这半个世纪的时光是白浪费掉了。照目前的情形看来,这一浪费,还不知到何年何月才停止,我们真为下一代人担忧。

* 原载于 1958 年 1 月 16 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十八卷二期。

这几年来,在背后控制台湾教育的原则有两个:一是“党化教育”;二是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这两个原则又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

台湾党化教育的得以实施,显然并非出于家长及受教者之欢迎悦纳,而全系藉政权便利从事布署。厉行党化教育者挟其无可抗拒的政治优势和一二顶大帽子,控制学校机构,树立党团组织,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职人员,网既布成,彼等进而规定课程,灌输党化思想,传播政治神话,控制学生课内外活动。彼等藉党化教育,把下一代人铸造成合于他们主观需要的类型。

提倡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之类的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最积极者有日本和德国这类军国主义的国家。这类国家提倡此类教育的目标,系藉夸张自己民族的优点并抹煞其他民族的优点,来养成国民“老子天下第一”的自矜心理,与仇视邻国的态度及不能自持的狂热之情。最后的目标,则为驱策狂热的火牛,奔赴战场,对外侵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走民主路线的国家强调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的。目前台湾之强调民族精神教育者正是极力主张党化教育的人。彼等之强调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其目标当然谈不上导致对外侵略。彼等强调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是想替党化教育找传统上的依据,进而使党化教育与传统化合,最后等而为一。揆诸“党即国”的主张,此种作用甚明。当一社群的危亡感从潜意识里涌出时,这类教育所标榜的口号确乎多少可以使人得到象征性的安慰。例如,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使若干人直觉地认为国性未失,国种犹存。然而,这种教育,行之过当,结果是造成偏狭心理,并收迷恋过去和自我陶醉之效,何补时艰?更何补于发奋图强?

近来办教育的人震于科学成就之伟大,也知道非急起直追究

习科学不足以图存。但是,他们徒炫于科学的结果而不明科学的根本。科学的根本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思想模式。今日科学的成就,是从科学的根本产生出来的。没有这一科学的根本,便不会有科学的成就。但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及科学的思想模式,与党化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心理状态是绝不相容的。前者是重解析的、重实证的、富于怀疑的,而后者则是笼统的、空幻的和独断的。一个人头脑中怎能同时装进这样冰炭不相投的两种东西?一个人一只脚向前,一只脚向后,怎样能够走路?

当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在形体上对比起来较小,在直观中的强弱之势相形见绌时,心理方面难免产生自卑感。有了自卑感,就要想办法弥补。弥补自卑感的方式之一,就是想处处表现其优越。个子不够高的人喜穿高跟鞋,瘦人听到别人说他胖而欣然色喜。台湾这几年施政之最原本的推动力,就是深沉的自卑感。有自卑感者,唯恐别人瞧不起,所以处处要表现得堂皇壮大。而传统的面于心理,再加上现代的广告技术,益使这一点心理作用发挥到史无前例的地步。这几年来,凡属长而子的事,虽耗资巨万,亦毫无吝色。至于表理壮盛军容,制造新闻镜头之事,则日日相继,不厌重复。若干人在一方面高调民族自尊,可是在另一方面对于国际过往客人由于礼貌所发口头赞扬之词,则不厌其详,认真刊载。官方派驻海外通讯社对于新闻报道也以此为最基本的选择原则,而并不是“是什么,就说什么”。于是,海外一有恭维台湾的言论,虽一鳞半爪,也夸大报道。对于海外批评台湾的言论,则不是一字不提,便是断章取义,或歪曲篡改。久而久之,把台湾在纸上构成世界上至美至善的乐园。至于过年过节和寿庆时的铺张,则把“节约”的美德置诸脑后。……总而言之,这几年的政治是竞相大作其

表面文章,以图博取耳目声色之娱。于是这几年的政治成了“广告政治”。所以,为政越来越趋于表面化,内容则日益空虚。关系乎百年树人大计的教育也不能例外。不仅不能例外,由于办理教育者之好大喜空,反而更变本加厉。台湾这几年的教育,似乎很发达,其实是在制造统计数字,重量不重质,素质日趋低落。各种学术机构、文教馆所,看起来有如雨后春笋,大有“中兴气象”,其实,稍一究诘,内容则空空如也。有的馆所有开办费而无维持费,有的馆所有薪水而无事业费,有的馆所几乎只有一块招牌而已,馆所“通货膨胀”的现象,是官僚政法广告化的产物,是急求见功和表面热闹的结合。我们知道真正沉得住气为远大的目标而苦干者,哪会有这种浇薄的作风?哪会以为撒豆可以成兵?

世界的局势演变到了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想要生存下去,只有在政治上采取让大多数人得以自由发展其才智的民主制度,并且在学术上亟力从事科学研究。其余的说法,不是空话,就是不切要之谈。时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自由世界阵营里,如果还有人想藉一个党派霸占一块土地,高调一个主义,垄断财政、经济、教育,一切的一切由一个集团一把抓,这显得多么尴尬,多么不合时代需要,又多么令人憎厌!

今日要实现民主并提倡科学,我们的教育必须从党化思想里根拔出来,而与民主及科学密切配合。我们这样的教育主张,一点也不是什么新奇的说法,而是欧美民主国家行之有年的原理原则。依照这样的原理原则来办教育,才能使青年的心智和身体得到正常而健全的发展。欧美青年的心智和身体得到正常而健全的发展,才会有今日辉煌的科学成就,才有今日的富强康乐。我们为什么只羡慕人家科学成就和富强康乐之结果,而却否定获致此诸结果的教育制度?在党化教育和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园地里,是

开不出科学之花的。杨李是在美国培育出来的,基于配合民主与科学的要求,并为了挽救下一代,我们对于教育作下列的建议:

第一、停止党化教育。[……]党化教育压榨人心、制造偏见,除对一党以外,对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老实说,在世界的现状之下,党化教育是不会成功的。退一步说,党化教育即令可以成功,充其量也不过是造出一批只听一个党的话的盲从之众而已。这样的人,离开了党的窝子,根本不能适应外界的新环境,只有成为废料。真正“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而办教育的人,怎会做这样“伤天害理”的勾当?现在办教育的人,如果稍有良心和常识,应该建议有权力者赶快停止党化教育。停止党化教育,即停止对大家毫无益处的党化课程,以及围绕党化目标的一切设施。让青少年们的身心从党化的迷阵中解放出来,多用时间精力于吸收科学知识,学习科学技能。

第二、学术自由。自古至今,钳制学术自由的势力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泛宗教主义、泛道德主义和泛政治主义。泛宗教主义者把学术当做宗教的侍女。在泛宗教主义的笼罩之下,凡抵触宗教教条及神话的学说或理论,都被认为是异端邪说,都拿不出来,或压得不敢抬头。泛道德主义者认为一切思想学说必须从属于道德伦范。凡不从属于道德伦范的思想学说,都被认为是败坏人心的淫词邪说。败坏人心的淫词邪说,都在当被禁阻之列。在东方世界,泛道德主义者常在被御用的条件之下与现实政治结合而藉现实势力以行其道。现代的泛政治主义者从泛宗教主义者和泛道德主义者接收其管制学术的传统,而在技术上则更加精炼。苏俄统制,可说是把泛政治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的统制。在泛政治主义之下,一切学术思想都变成政治工具。政治教条成为学术思想之“先天的前题”,政治纲领成为学术思想之不可逾越的纲领。因而,

政治领袖也就成为学术领袖。于是,一切学术思想的发展,必须受政治路线之规定。然而,可惜得很,经验世界对于人间形形色色的政治一概是中立的,[……]泛政治主义已经走到山穷水尽之境了,奈何台湾官方有一部分人士还迷恋这将死的骸尸?我们总不能不承认,这派那派的政治是少数人一时闹的事,而学术则是社会百年千年的事。今日之闹政治者,何必连这冷僻的学术角落也不政过?为了社会的长久生命着想,我们应该让学术从政治权力之下解放出来,让它自由发展。不然,这个社会的智慧会由萎缩以至于死亡,常理里会有前途可言?

第三、简化课程。现在,台湾从大学到幼稚园的课程之繁重,无疑居世界首位。课程名目之多,也是世无其匹的。小学学生竟有忙到夜晚十一点钟才能上床休息的。世界各国,哪有这样办教育的?这样办教育,台湾的学术贡献应该居世界之首位了。但是,在事实上呢?是一部分学生被压得喘不过气,心身受到戕害;另一部分学生则采取敷衍手段,浪费时光和金钱。教师亦然。这样制造出来的学生,品质哪会特别精良?

第四、提高品质。老实说,处于台湾目前的地位,我们要在量上与别人争多比少,那是没有希望的。制造统计数字,是幼稚的宣传手法,何况区区的统计数字并不足以惊世骇俗?我们要谋出路,必须从提高品质着手。要提高品质,必须首先停止教育方面的通货膨胀政策。这一政策停止了,再剔除那些为政治目标而设立的课程、剔除那些为弥补自卑感而添设的课程以及活动,让教师和学生多些时间来究习有益身心的课目。这样行之十年,教育成果之品质自然就可提高了。

当然,要改善台湾的教育,方案不止上述四条,不过上述四条方案是最基本的。如果能把上述四条方案行通了,那么其他方案

就易逐步实行。

我们对台湾的教育作上列的论评和建议,并没有一点意思说台湾现在办教育的人不够努力。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台湾目前病在办教育的人太努力了。可是,办教育的基本方针错误,愈是努力结果愈糟。所以,我们认为要抢救台湾当前的教育,须请办教育的人“高抬贵手”。只有首先终止把这部车子向深渊里开,然后才谈得到熟筹健全教育的细节。



殷海光论著目录*

一、著作

- | | |
|----------|---------------|
| 光明前之黑暗 | 光明出版社,一九四五年 |
| 中国共产党之观察 | 独立出版社,一九四八年 |
| 逻辑新引 | 香港亚洲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
| 旅人随记 | 香港友联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
| 怎样判别是非 | 台湾文星书店,一九五九年 |
| 思想与方法 | 台湾文星书店,一九六四年 |
| 中国文化的展望 | 台湾文星书店,一九六五年 |
| 旅人小记 | 水牛出版社,一九六六年 |

* 原载王中江著:《万山不许一溪奔——殷海光评传》,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97 年版。

- | | |
|------------|----------------|
| 殷海光选集 | 香港友联出版社,一九七一年 |
| 殷海光书信集 | 香港文艺书屋,一九七五年 |
| 殷海光先生文集 | 台湾九思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 |
|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 台湾狮谷出版公司,一九八一年 |
| 中国文化的展望 | 中国和平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
| 殷海光全集 | 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一九九〇年 |
| 殷海光 林毓生书信录 | 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

二、译 著

- | | |
|--------|-----------------|
| 逻辑基本 | 正中书局,一九三七年 |
| 共产国际概观 | 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会,一九五三年 |
| 西方之未来 | 台湾华国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
| 怎样研究苏俄 | 香港友联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
| 到奴役之路 | 台湾文星书店,一九六五年 |

三、论 文

- | | |
|---------|------------------------|
| 五四与今日 | 《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
| 我们走哪条路? | 《青年杂志》一卷二期,一九四八年九月。 |
| 我对国共的看法 | 《创进周刊》一卷十二期,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 |
| 赶快收拾人心 | 《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

- 中国底前途 《民主评论》一卷一期,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
- 争思想自由的历史巨流 《自由世纪》三卷七期,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 中国现代政治思潮 《中央日报》,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
- 堵住中国这个缺口 《自由世纪》七期。
- 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 《自由中国》一卷一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
- 民族战争呢? 还是阶级战争? 《自由中国》二卷一期,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
- 中国会出现铁托吗? 《民主评论》一卷十四、十五,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十六日。
- 反布尔希维克主义 《中央日报》,一九五〇年一月七日。
- 战争与自由 《自由中国》二卷三期,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
- 这是唯一的出路 《前途杂志》一卷二期,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六日。
- 关于“统一思想”底问题 《自由中国》二卷九期,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
- 自由主义底蕴涵 《自由中国》三卷三期,一九五〇年八月一日。
- 罗素论权威与个体 《民主评论》二卷五、六、七期,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二十日、二十四日。

- 第二十二世纪
《自由中国》三卷九期,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
- 苏维埃怎样管制思想
《自由中国》三卷十期,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
- 民主政治
《自由中国》四卷一期,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
- 我忆孟真先生——自由巨星之殒落
《自由中国》四卷二期,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
- 二十世纪哲学
《自由中国》四卷三期,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 科学经验论底征性及其批评
《台大文史哲学报》二期,一九五一年二月。
- 追求与幻灭
《自由中国》四卷五期,一九五一年三月五日。
- 麦帅解职底教训
《自由中国》四卷九期,一九五一年五月一日。
- 美国八位伟人
《自由中国》四卷十期,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 怎样击败俄国
《自由中国》四卷十二期,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六日。
- 一九四八年
《自由中国》五卷二期,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
- 共党语言可以袭用吗?
《自由中国》五卷四期,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
- 极权对于民主自由的威胁
《自由中国》五卷五期,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

-
- 逻辑底性质与范围 年九月一日。
《大陆杂志》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
- 自由人底反省与重建
文明是怎样创造的？ 全集所载时间不明。
《自由中国》五卷七期，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
- 言论自由的认识及其基本条件 《自由中国》五卷七期，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
- 科学与社会 《自由中国》五卷九期，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
- 自由人 《自由中国》五卷十一期，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 第二次世界大战写真 《自由中国》六卷一期，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 雅舍小品 《自由中国》六卷四期，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六日。
- 罗素论权力 《自由中国》六卷七期，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
- 我为什么反共？ 《自由中国》六卷十二期，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
- 世界之新希望 《自由中国》七卷二期，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
- 经济政策与经济学理 《自由中国》七卷四期，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
- 罗斯福夫人回忆录 《自由中国》七卷九期，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

- 为害于人类的观念 《自由中国》七卷十二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 莫斯科的寒夜 《自由中国》八卷五期,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
- 美国去来 《自由中国》八卷六期,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
- 罗素画传 《民主评论》四卷九期,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
- 逻辑究竟是什么 《民主评论》四卷十、十一期,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六日、六月一日。
- 新苏维埃帝国 《自由中国》八卷十期,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六日。
- 治乱底关键 《自由中国》八卷十二期,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
- 科学与人文之理则 《民主评论》四卷十七期,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
- 实证论导引 《民主评论》四卷十八、十九期,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十月一日。
- 实证论底批评(译文) 《民主评论》四卷二一期,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日。
- 政治组织与个人自由 《自由中国》十卷二期,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
- 美国政治制度 《自由中国》十卷六期,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

- 独裁怕自由 《自由中国》十卷七期,一九五四年四月一日。
- 新实证论底基本概念 《新思潮》三七、三八期,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月。
- 这是国民党反省的时候 《自由中国》十卷十期,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六日。
- 恐怖征服 《自由中国》十卷十一期,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
- 从一点逻辑问题说起 《自由中国》十卷十二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
- 民主底试金石 《祖国周刊》八卷十二期,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
- 自由的真义 《祖国周刊》九卷四期,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 传统底价值 《祖国周刊》九卷八期,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 论科学与民主 《祖国周刊》九卷十期、十一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十四日。
- 自然思想与人文思想(译文) 《自由中国》十二卷六、七期,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日、四月五日。
- 相对论——一个较丰富的真理 《自由中国》十三卷四、五期,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九月五日。
- 历史解析底逻辑(译文) 《现代学术》季刊一卷一期,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 个人为国家之本 《自由中国》十四卷五期,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
- 守护我们底堡垒 《自由中国》十四卷七、八期,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五日、五月一日。
- 教育部长张其昀的民主观——君主的民主 《自由中国》十五卷七期,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
- 再论“君主的民主” 《自由中国》十五卷八期,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
- 怎样研究哲学 《大学生活》二卷七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
- 逻辑经验论导释 《现代学术》季刊一卷一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 自由之再划分 《祖国周刊》十六卷七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 不要怕民主! 《自由中国》十六卷一期,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
- 张其昀部长的原子迷 《自由中国》十六卷一期,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
- 反民主的民主 《自由中国》十六卷一期,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
- 经验科学整合底基础 《现代学术》季刊一卷二期,一九五七年二月。
- 科学统一之逻辑的基础(译文) 《现代学术》季刊一卷二期,一九五七年二月。
- 因果底解析 《现代学术》季刊一卷四期,一九
-

- 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 五七年四月。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一九五七年五月。
- 重整五四精神 《自由中国》十六卷九期，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 政治科学底指归 《祖国周刊》十八卷七期，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
- 运作论 《现代学术》季刊一卷三期，一九五七年六月。
- 雷诺事件底检讨与建议 《祖国周刊》十八卷十二、十三期，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二十四日。
- 是什么就说什么 《自由中国》十七卷三期，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 反攻大陆问题 《自由中国》十七卷三期，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 关于反攻大陆问题 《自由中国》十七卷五期，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
- 怎样研究民族主义？ 《祖国周刊》十九卷十一期，一九五七年九月九日。
- 读胡适先生在联大的演说 《自由中国》十七卷八期，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六日。
- 我们的教育 《自由中国》十八卷二期，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
- 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 《自由中国》十八卷三期，一九五

- 罗素底后设科学及其影响 八年二月一日。
《文星》一卷四期,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
- 轮选推论底解析 全集所载时间不明。
- 论定言三段式 全集所载时间不明。
- 世界的膨胀 《祖国周刊》二一卷八期,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
- 历史中普遍定律底功用(译文) 《现代学术》季刊一卷一期,一九五八年三月。
- 请勿滥用“学术研究”之名 《自由中国》十八卷八期,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六日。
- 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 《自由中国》十八卷九期,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
- 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 《自由中国》十八卷十期,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 共产党为什么清算“胡适思想”? 《自由中国》十八卷十期,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 “内战”问题底分析 《中央日报》,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
- 社会科学方法的总绪论(译文) 《现代学术》季刊二卷二期,一九五八年六月。
- 政治的神经衰弱症 《自由中国》十八卷十二期,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
- 与胡适先生论《反攻大陆问题》 一九五八年六月写成,为《自由中国》而作,未发。
- 中国民主运动底正确方向 《中央日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

- 论科学的说明 十九日。
《台大文史哲学学报》九期，一九五八年。
- 自由民主是反共的活路 《自由中国》十九卷二期，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
- 创设讲理俱乐部 《自由中国》十九卷二期，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
- 政教合一与思想自由 《民主评论》一卷十七期，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
- 论二分法 《自由中国》十九卷三期，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
- 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祖国周刊》二三卷八期、九期，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二十五日。
- 对梅部长的低调处理 《自由中国》十九卷四期，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
- 为政师争人格 《自由中国》十九卷六期，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
- 认清当前形势，展开自新运动——向大陆作政治进军！ 《自由中国》十九卷八期，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
- 从卫星放射到弥赛亚精神——寄语美国朋友 《自由中国》十九卷九期，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五日。
- 后设历史学试论 《自由中国》十九卷十期，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 你要不要做人？ 《自由中国》十九卷十一期，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

- 论自由主义者及其任务 《中央日报》，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 科学及其基本 《文星》十六期，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
- 自由中国之路 《自由中国》二十卷四期，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日。
- 胡适论“自由与容忍”读后 《自由中国》二十卷七期，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
- 展开启蒙运动 《自由中国》二十卷九期，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
- 胡适与国运 《自由中国》二十卷九期，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
- 科学与唯物论 《祖国周刊》二六卷七期、八期，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八日。
- 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取向 《自由中国》二一卷二期，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
- 怎样研究逻辑 《大学生活》三卷七期，一九六〇年一月一日。
- 乌烟瘴气的政治活动在台大！ 《自由中国》二二卷五期，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
- 新中国出现的一天 《中央日报》，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
- 经验科学底基本谓词 《祖国周刊》三十卷三、四、五期，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八日、二十五日、五月二日。
- 论没有颜色的思想 《文星》三一期，一九六〇年五月

- “五四”是我们的灯塔！
《自由中国》二二卷九期，一九六〇年五月五日。
- 逻辑经验论底再认识
《大学生活》六卷一期，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
- “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
《自由中国》二二卷十期，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日。
- 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自由中国》二二卷十期，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日。
- 外伤与内溃
《中央日报》，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一日。
- 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
《自由中国》二二卷十二期，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日。
- 我们要有说真话的自由
《自由中国》二三卷二期，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日。
- 我对于在野党的基本建议
《自由中国》二三卷二期，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日。
- 大江东流挡不住！
《自由中国》二三卷五期，一九六〇年九月五日。
- 从有颜色的思想到无颜色的思想
《大学生活》六卷九、十期，一九六〇年九月六日、十月十六日。
- 我看雷震和新党
《民主潮》十卷十九期，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
- 雷震没有倒——给李万居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公论报》，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二日。
- 法律不会说话——因雷案而想
《民主潮》十卷二十期，一九六〇

- 起的
《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
语言世界和经验世界
科学定律与伦理定律
论科际整合
论读书初价
自由的伦理基础
海耶克论自由的创造力(代序)——从无知论出发
论认知的独立
从一本逻辑新著说起
我同罗素的讨论
权威与权力
这样的红卫兵
- 年十月十六日。
《民主潮》十卷二十期,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六日。
《大学生活》六卷二一、二二期,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十六日。
《大学生活》六卷二二、二三期,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四月一日。
《文星》七十期,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
《新希望》七期,一九六五年一月十日。
《文星杂志》九六期,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
《时与潮》复刊一九八期,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八日。
《大学生活》一月号,一九六六年。
《时与潮》复刊二一七期,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
《时与潮》复刊二二二期,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
《时与潮》复刊二二三期,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
《时与潮》复刊二二四期,一九六六年十月。

- 红卫兵是义和团吗? 《时与潮》复刊二二五期,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 自动的把脓包戳破了! 《时与潮》复刊二二六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 狂徒的暴跳 《时与潮》复刊二二七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文化的自杀 《时与潮》复刊二二八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 我们守住哪一层楼? 全集所载时间不明。
- 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
向坟墓进军。 写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时与潮》复刊二二九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窑洞心理的分析 《时与潮》复刊二三〇期,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 背反的转变 《时与潮》复刊二三一期,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 大地的震动 《时与潮》复刊二三二期,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
- 人生的基石 《时与潮》复刊二三四期,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 评韦政通《中国哲学思想批判》
宗教与独断 写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
《现代学苑》五卷四期,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
- 评韦政通《传统与现代化》
五四的再认识 写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
《大学生活》五月号,一九六八年。

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
意底与时代的不安
语言与思想

《大学生活》，一九六八年六月。
《大学生活》，一九六八年十月。
《大学生活》，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看幕的那一边
五四的隐没和再现

《大学生活》，一九六八年。
《大学生活》，五月号，一九六九年。

剖析国民党

原题为 *the Anatomy of an Appendage*，一九六九年四月左右完成，后由卢苍以此名压缩译出。

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

《大学杂志》三七期，一九七一年十一月。